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六編 第二五冊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
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為中心

葉楊曦 著

花木蘭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5冊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
——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

葉楊曦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為中心／葉楊曦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 107〕

目 4+24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第 25 冊）

ISBN 978-986-485-369-4（精裝）

1. 旅遊文學 2. 文學評論

011.08 10700178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 第二五冊 ISBN：978-986-485-369-4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
——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

作　　者　葉楊曦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17294 字

定　　價　二六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
——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

葉楊曦 著

作者簡介

葉楊曦，男，1986 年 10 月生於江蘇南通，祖籍江蘇泰興。南京大學文學院學士（2009）、碩士（2012），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院交換研究員（2014），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2015）。現爲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台州學院和合文化研究院研究員。主要教學科研方向爲域外漢籍、海外漢學與東亞比較文學。曾獲南京大學程千帆獎學金（2012），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學術成果獎（2014），等等。曾在大陸與港臺刊物發表論文、書評、譯文多篇。現主持科研項目多項，其中省部級以上項目 6 項。

提　要

域外人中國行紀的書寫源遠流長，及至近代，臻於鼎盛。它見證了當時旅行者眼中的目的地和沿途的風景，與文字本身描繪的「異鄉」形象相比，「余域外人，與中人異所見」背後反映出的作者對於「異鄉」的思考尤顯重要，值得作爲「異鄉」的中國反躬自省。岡千仞（1833～1914）是活躍於日本幕末明治時期的儒學者和漢學家，與眾多晚清文士有過交往。1884 年至 1885 年曾踏訪禹域，歷時三百餘日。1886 年記錄其遊華經歷的《觀光紀遊》在日本出版，成爲明治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漢文中國行紀之一。上世紀的中國研究以西方觀念爲標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研究，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亞洲、返回中國」。本書以岡千仞《觀光紀遊》爲主要研究對象，運用綜合與比較的研究方法，探討其視野下的晚清。從外國對中國的研究出發進入中國，再返觀外國，最終迂迴地求諸己身，回歸中國。嘗試通過異域之眼，即「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期望「從周邊看中國」，將研究視角由西方轉向東亞，以不同的角度論述，深入挖掘材料，更好地認識晚清。岡千仞遊華前後均以在野文人的身份自居，從其與中土友朋的交往來看，他們之間的關係大多溫情脈脈、親密友善，而非國家層面那樣緊張尖銳、針鋒相對。

本書爲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
青年項目「幕末明治漢文中國行紀整理與研究
（1862～1912）」（16GZGX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目次

導　言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價值

「域外人」即異域人、異邦人，歷史上不乏他們親訪中國並記錄見聞感受的著述，本書即以此作爲主要研究對象。關於此類文獻，學界的命名不一，紛紜複雜，如「朝天錄」、「燕行錄」、「燕行文獻」、「中國旅行記」、「中國遊記」，等等。但以上名稱或者政治意味較強，或者涵蓋範圍有限，本書不予採用。張伯偉提倡使用「中國行紀」的概念。筆者以爲，此種提法不僅頗爲公允，而且在文體上能夠涵蓋本書所涉文獻，因而以「中國行紀」統稱之。本書中「近代」一詞含義較爲寬泛，主要指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的百年時間。具體到「晚清」，則異於《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年》〔註1〕關於「晚清」的界定，本書的「晚清」僅指代十九世紀中後期。之所以選取這個時間段，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社會政治歷史層面。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原本嚴守閉關鎖國政策的滿清被迫對外開放，這不僅給西洋人瞭解神秘的東土提供了契機，也讓中國的鄰國朝鮮、越南與日本對中國產生了新的認識。二是文學文獻層面。域外人的中國行紀爲數眾多，體裁多樣，源遠流長。及至近代，則出現了前此未有之局面，社會政治歷史的變革直接導致了該時段西方人中國行紀書寫的臻於鼎盛與朝鮮人、越南人中國行紀傳統的歷史斷裂。而對於身處東方同時又欽羨西方的日本人來說，大規模中國行紀的

〔註1〕〔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2 月版。

書寫則方興未艾。日人岡千仞的《觀光紀游》是他 1884 至 1885 年間在華遊歷時所作，於 1886 年刊行問世。本書所涉時間範圍大致是以《觀光紀游》內容之反映及撰寫與成書的 1880 年代爲中心，前後約三十年的時間段。

岡千仞（1833～1914），號鹿門，仙臺人，日本幕末明治時期的儒學者和漢學家，與中國眾多晚清文士交往甚密。1884 年曾赴華遊覽，翌年回國，歷時三百餘日，1886 年記錄其遊華經歷的《觀光紀游》在日本出版。《觀光紀游》「格調高雅」〔註 2〕，與竹添進一郎的《棧雲峽雨日記》（1876）及山本憲的《燕山楚水紀遊》（1897）並稱爲明治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漢文中國遊記。〔註 3〕全書長達十萬字，不僅在明治三大遊記中部頭最大，而且可以代表同時代甚至其後日本人的中國遊記。〔註 4〕但與「滿懷欣喜」〔註 5〕、寄情山水的《棧雲峽雨日記》相異，《觀光紀游》更多流露出一種「冷靜觀察」〔註 6〕背後的失落感與幻滅感，同時還有作者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濟世良方。

岡千仞曾求學於昌平黌，服膺儒術，青年時期流連於史書和詩文裏憧憬的中國，對禹域心嚮往之。他與晚清赴日的中國官員與民間人士交好，尤其是折服於著有《扶桑遊記》的王韜。正是與王韜的交往，使他決心遊華。但來華以後一系列的觀感使其幻想破滅，骯髒、混亂、不堪與落後的現狀令其想像中的美好中華形象蕩然無存。

〔註 2〕張明傑《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日〕岡千仞著，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5 月版，第 10 頁。

〔註 3〕《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總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 頁。類似論述更早見於「明治年間，我邦漢學界之耆宿，而客遊中國，留下著名遊記者有三人。一是《棧雲峽雨日記》之竹添光鴻，二是《觀光紀游》之岡鹿門，三是《燕山楚水紀遊》之山本梅厓。」〔日〕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東京：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昭和十一年（1936）版，第 198 頁。〔日〕《對支回顧錄》下卷，東京：原書房，1968 年版，第 198 頁。轉引自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第 64 頁。

〔註 4〕張明傑《明治漢學家的中國遊記》，《讀書》，2009 年第 8 期，第 85 頁。

〔註 5〕〔日〕町田三郎《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12 月版，第 67 頁。此文最初題作《關於岡鹿門〈觀光紀游〉》，發表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3 年版，第 69～86 頁。

〔註 6〕《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明治的漢學家》，第 68 頁。

岡千仞的看法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份開禁後來華日本人的心態，即想像的美好與現實的衰弱形成巨大反差，「中國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堪稱墜落崩塌」〔註 7〕。此外，日本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在鴉片戰後亦害怕有朝一日會和中國一樣被西方國家所吞併。同時，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可以學習先進的西方，考察中國才能救本邦於生死存亡的危難之中，才能發展壯大自身實力。以上這些都可通過岡千仞此書加以闡發。

旅行是對既往想像的印證，是對於未知事物的發現，是自我與他者的對話，更是精神觀念的豐富。「中國行紀」的字面之義即記述到中國的旅行，屬於遊記文學。遊記文學是文學中一個重要的門類，古今中外皆然。作爲旅行體驗的直接文字記錄，遊記見證了旅行者眼中的目的地與沿途的風景。對於域外人的中國行紀而言，與文字本身描繪的「異鄉」形象相比，「余域外人，與中人異所見」〔註 8〕背後反映出的作者對於「異鄉」的思考尤顯重要，值得作爲「異鄉」的中國反躬自省。

本書旨在從異域之眼的角度，即「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註 9〕，通過對同一時期在華域外人所撰中國行紀文字材料的梳理，探討其視野下的晚清鏡像，並運用綜合與比較的研究方法，分析鏡像背後反映出的內在聯繫與外在差異。從外國對中國的研究出發進入中國，再返觀外國，最終迂迴地求諸己身，回歸中國。〔註 10〕期望「從周邊看中國」〔註 11〕，以不同的角度論述，深入挖掘材料，更好地認識晚清。

〔註 7〕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7 月版，第 283 頁。

〔註 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0 頁。

〔註 9〕《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總序》，第 2 頁。

〔註 10〕關於迂迴與進入的思想，參見《迂迴與進入》(*Le Detour et l'accès*)（〔法〕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著，杜小眞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2 月版）與《(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法〕弗朗索瓦・于連、狄艾里・馬爾塞斯（Thierry Marchaisse）著，張放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版）。

〔註 11〕此說法最早由葛兆光先生提出，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6 月版。

第二節　研究述評及拓展之可能

目前在國內外，對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研究正處於初始階段，研究尚未完全展開。從文學文化、歷史思想與跨學科等多個層面可以突破現有研究格局。

一、中、日學界關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研究述評

目前中、日學界研究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與思想方面，略微涉及文學角度，可以歸納爲如下幾個方面：

（一）探討岡千仞之生平與學術

館森鴻（袖海）爲岡氏弟子，曾親撰回憶先師的文章，從中可對岡千仞生平與學術略窺一斑。〔註 12〕竹林貫一《漢學者傳記集成》中「岡鹿門」條主要依據館森鴻之文寫成。中國學者中，李慶亦曾概述性地介紹過漢學家岡千仞的生平與學術。〔註 13〕

（二）析論岡千仞與中國文士的交往

學界主要關注岡千仞與王韜的往來，亦涉及他與黃遵憲、上海書院士子等其他文士的交流。中田吉信《岡千仞與王韜》〔註 14〕詳細介紹王韜、岡千仞之生平與學術，討論二人的交流，文中所揭史料頗具價值。香港學者鄭海麟《關於王韜與岡千仞——跋東洋文庫藏王韜致岡千仞書稿》〔註 15〕與《岡千仞與黃遵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學術思想性的一章》〔註 16〕分別從未刊書稿與《藏名山房集》（今均藏東洋文庫）入手，論述明治前期岡千

〔註 12〕《館森袖海翁談岡鹿門先生（附松本奎堂、松林飯山）》，〔日〕三浦叶《明治の碩學》，東京：汲古書院，平成十五年（2003）版，第 224～235 頁。原刊於《東洋文化》第 159 號，昭和十三年（1938）第 1 期。

〔註 13〕李慶《日本漢學史》第 1 部《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57～258 頁。

〔註 14〕《岡千仞と王韜》，《參考書志研究》第 13 號，1976 年 8 月刊，第 1～21 頁。

〔註 15〕蘇晨主編《學土》卷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2 月版，第 196～207 頁。

〔註 16〕蘇晨主編《學土》卷二，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版，第 124～147 頁。後收入王曉秋、陳應年主編《黃遵憲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2～58 頁。亦載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十九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82～200 頁。

仞與王韜、黃遵憲的學術交流，發掘其中的思想性。易惠莉曾注釋點校《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晚清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註 17〕並發表過兩篇相關論文：《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註 18〕與《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註 19〕。前文主要對岡千仞在滬筆談史實進行析論。後文則考察岡千仞與王韜，進而擴展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日文士的交流，認爲當時主要由於兩國士人在精神境界上的差距，導致中日知識界的交流只能限於傳統文化情趣層次，無法向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方向發展，該論文史料翔實，分析到位，有引導之功。

（三）探析《觀光紀游》之成書與版本

《觀光紀游》成書方面，據筆者寓目，學界甚少涉及，僅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與《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二文曾在腳注中做過初步探討。〔註 20〕《觀光紀游》採用日記體撰寫，與岡千仞 1884 至 1885 年間的遊華同步進行，早在 1884 年 6 月 19 日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即以《上海近況》爲題刊出岡千仞自上海寄回的見聞報導集萃，此後分別刊載見聞報導集萃剩餘內容與岡千仞《支那漫遊日記》等文。

版本方面，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爲《觀光紀游》初版於 1886 年，但《魯迅全集》注釋中以爲此書於 1885 年自費刊印，〔註 21〕嚴紹璗、易惠莉與福井智子則稱此書直到 1892 年才付梓〔註 22〕。

〔註 17〕《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第 8～13 頁。

〔註 18〕《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第 64～69 頁。

〔註 19〕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十二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68～243 頁。

〔註 20〕《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65 頁注 2；《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1 頁注 3。

〔註 21〕魯迅《「皇漢醫學」》，《三閒集》，《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42 頁注 7。

〔註 22〕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版，第 286～287 頁；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2 頁注 3；〔日〕福井智子《岡千仞と清仏戰爭》，《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7 年第 16 期，第 15 頁。

（四）研究《觀光紀游》之思想價值與史料價值

早在 1884 年《觀光紀游》尚未成書時，岡千仞在華接觸到的日本人，甚至是日本學界應曾對此書進行過探討，只是筆者限於學力，目前尚未查知。筆者所見最早日人論述爲依田學海《學海日錄》第七卷明治十九年（1886）十二月二日「讀岡鹿門遊歷中國日記」（岡鹿門が支那に遊バし時の日記をよみ）。〔註 23〕依田氏詳細介紹《觀光紀游》，闡明岡千仞所謂「六經之毒」當指科舉之學。

1884 年中國行之前，岡千仞在本土即已與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及民間人士等有過以筆談爲主要形式的密切接觸。而岡氏遊華期間所著《觀光紀游》提及的中國人多達兩百餘位，其中包括李鴻章、盛宣懷、俞樾、張煥綸等中國近代史上的政界要人與著名文士。與此同時，《申報》分別在 1884 年 6 月 15 日及 12 月 18 日以《文士來遊》與《日事客談》爲題報導岡氏「中國山水之遊」，文辭間滿是讚譽之義，許多岡氏結交的中國友人對他也有詩文酬贈。中土不乏對岡氏及其中國見聞錄《觀光紀游》的濃厚興趣。清末士人對岡千仞本人的評價當始自王韜《扶桑遊記》（1879）及黃遵憲題批岡氏《藏名山房集》（1880）與《北游詩草》（1881）。而對其《觀光紀游》的引述亦早在 19 世紀 80 年代即已出現，以張德彝《隨使德國記》（一名《五述奇》，1887）與黎庶昌《題藏名山房文鈔》（1889）爲嚆矢。他們大多與岡千仞有過親交，對此書的評價較後人更爲原始而眞實。從此時直至清末，中國士人多贊同岡氏及其《觀光紀游》中維持中日親善的穩定關係，聯手對抗列強的思想。張裕釗認爲兩國「輔車唇齒之誼，而愈益相固結。患則相恤，敗則相救，安同其福，危同其憂。」〔註 24〕即使是在甲午戰後不久，王韜也感歎道「欲維持亞洲之大局者，其盍於中日輯和加之意哉？」〔註 25〕章炳麟更是強調「今則日本，非有深怨於我也」〔註 26〕，「非得日本，誰與同命。以一時之怨視之，乃

〔註 23〕部份原文爲《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轉引，《明治的漢學家》，第 56～57 頁。

〔註 24〕〔清〕張裕釗《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任訪秋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 3 集·第 11 卷·散文集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37 頁。

〔註 25〕王韜《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6 月版，第 145 頁。

〔註 26〕〔清〕章炳麟《上李鴻章書》（1898 年 2 月），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版，第 54 頁。

不如白種，是猶兄弟爭室而授逵之人以狐父之戈也。」〔註 27〕

甲午戰後，倍感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以先進國家爲標杆，尋求民族復興之路。日本成爲中國學習的主要國家，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亦屢屢見諸宋恕、蔡元培、魯迅、周作人等學者筆下。如蔡元培 1899 年 7 月 26 日日記摘引《觀光紀游》中批判「八股毒」的文字後稱「十年前見此書，曾痛詆之，其時正入考據障中所忌耳」〔註 28〕，這「表明了元培迴心的思想過程」〔註 29〕。岡氏《觀光紀游》對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們思想觀念的演進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大抵是出於政治原因，民國中後期，尤其是日本侵華後，直到中日恢復邦交（1972）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研究在中國學界幾乎銷聲匿跡。筆者目前查知的僅有汪向榮的《記〈觀光紀游〉作者岡千仞氏：六十年前日本人的中國觀》〔註 30〕。汪氏對此書充滿了敬意，佩服其中的先見之明與藥石之語。但與此同時，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並未中斷，仍集中在歷史思想領域。實藤惠秀約於 1943 年作《日人岡千仞的中國論》，作者以後出的歷史事件驗證岡千仞的預言，突顯岡氏對於歷史發展的敏銳嗅覺與精當判斷。〔註 31〕竹內實最初對《觀光紀游》「原懷有反感」，後來想法才發生變化，在 1963 年稱此書的特點在於「其中有作者與中國人關於時局的爭論，並最終說服了他們」。〔註 32〕

如前所述，以往學界的相關研究集中於思想層面的探討。當代中日文史學者一方面延續傳統，探討此書的思想性。如福井智子《試論〈觀光紀游〉中之「疾病」與「治療」》〔註 33〕指出《觀光紀游》中希望療治中國的「藥石

〔註 27〕《上李鴻章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 55 頁。

〔註 28〕蔡元培著，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26 頁。

〔註 29〕楊際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典範的轉換——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變化爲線索》，《浙江學刊》，2002 年第 4 期，第 50 頁。

〔註 30〕《新生命》，1944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18～25 頁。

〔註 31〕〔日〕實藤惠秀著，陳固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第五章，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1 年版，第 120～131 頁。

〔註 32〕〔日〕竹內實著，程麻譯《日本人心目裏的中國》，《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8 頁。

〔註 33〕《〈觀光紀游〉に見る「病」と「治療」》，《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9 年第 18 期，第 17～28 頁。

之語」，認爲「該書可以說在推進中國社會改革運動上起到了一些『療效』」〔註34〕。嚴紹璗《岡千仞的中國之行與其中國觀的分裂》認爲《觀光紀游》與《棧雲峽雨日記》呈現出迥異的形態，主要是「由當時日本漢學自身所處的境遇決定的」，「漢學家們必須在前途問題上作出抉擇」，岡氏親見中國後徹底失望，其中國觀出現分裂。〔註35〕另一方面，當代學界亦在傳統基礎上有所開拓創新。這主要體現在從史料價值、文學文化與地域文化三個角度研究《觀光紀游》。

1. 史料價值

杉村邦彥《楊守敬之回國——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註36〕將《觀光紀游》當作記載楊守敬返華的珍貴材料，爲研究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與書法交流史另闢蹊徑，旨在認識兩國間資料的差異與誤解。福井智子《岡千仞與中法戰爭》稱「《觀光紀游》無論在史學上的資料價值，還是作者考察力的深刻性方面均超過了其他遊記，究其原因可以說正是由於經歷了中法戰爭。」〔註37〕《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1884～1885）》〔註38〕主要以《觀光紀游》爲主體史料，以岡千仞的遊蹤爲綱，從歷史角度討論岡千仞遊華期間與各地中國士子的筆談及與在華日本人的交往，認爲「相較於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岡氏的觀念可謂先進」。〔註39〕

2. 文學文化

町田三郎在《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註40〕中認爲，岡千仞遊華途中即有出版遊記的意念，行文內容仔細推敲斟酌過。因撰寫時年歲的差異，主要是時代的變遷，《觀光紀游》表現出與《棧山峽雨

〔註34〕《〈觀光紀游〉に見る「病」と「治療」》，第17頁。

〔註35〕《日本中國學史》第六章第三節，第287頁。該書以《日本中國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9月版）之名再版時，此節已刪。

〔註36〕《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書道文化》，2007年第3期，第15～37頁。

〔註37〕《岡千仞と清仏戰爭》，《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7年第16期，第15～26頁。

〔註38〕朱寒撰，易惠莉指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註39〕《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1884～1885）》，第59頁。

〔註40〕《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明治的漢學家》，第51～68頁。此外，町田氏《明治漢學史論》亦論及鹿門《觀光紀游》（收入《明治的漢學家》，大陸馬振方、馬小立譯作《明治漢學紀要》，分作上下篇，陸續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2期、第3期。）

日記》的不同。岡千仞筆下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似乎沒有憧憬與感動，但這種對於清朝末期政治與社會現象的冷靜觀察尤顯貴重。王曉秋《日本人眼裏的晚清社會——以 1884 年岡千仞訪華爲中心》從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對《觀光紀游》進行解讀，總結出其中對於晚清社會煙毒與科舉毒兩大弊端的批判，揭示岡千仞來華前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同時也認爲「岡千仞很重視近代中國人所寫的海外遊歷筆記」。〔註 41〕張明傑有《明治漢學家的中國遊記》〔註 42〕、《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註 43〕與《明治前期的中國遊記——關於岡千仞〈觀光紀游〉》〔註 44〕三篇專文，均從文學角度切入，論述頗有創見。第一篇論文比較了明治時期的三大遊記，探析從竹添進一郎到岡千仞再到山本憲，日本對華觀由親善到斥責再到失望的轉變。後兩篇則聚焦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與前文觀點類似。〔註 45〕

3. 地域文化

香港學者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有專節論述《觀光紀游》，主要討論此書對當時香港的描寫。〔註 46〕小島晉治《曾根俊虎與岡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交流與論爭》涉及《觀光紀游》卷二至卷三的「蘇杭紀遊」，將岡千仞此行與當地文士的論爭界定爲「互不失禮，不傷情感」。〔註 47〕

〔註 41〕《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86～293 頁。王曉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話》中《岡千仞與〈觀光紀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版，第 181～187 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七章第二節《禹域觀光陳時弊》（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8 月版，第 223～230 頁）中相關内容與此文類似。

〔註 42〕《讀書》，2009 年第 8 期，第 82～89 頁。

〔註 4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3 頁。

〔註 44〕《明治前期の中國遊記：岡千仞の〈觀光紀游〉について》，*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Vol.1(2005), pp.26～40.

〔註 45〕除上述文章外，亦有王曉平《明治文學家的漢文學趣味》（《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第七章第六節，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0～151 頁）、陳華《從〈觀光紀游〉看岡千仞眼裏的中國》（《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 7 月刊，第 73～78 頁）陳淑玲《〈觀光紀游〉、〈中國遊記〉與〈我的留學記〉中的中國情》（蔡春華指導，福州：福州師範大學，2011 年碩士論文）等介紹性文章，不一一述評。

〔註 46〕第三篇第四節《岡千仞的〈觀光紀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 年版，第 206～215 頁。

〔註 47〕〔日〕小島晉治著，呂順長譯，見王勇主編《中國江南：尋繹日本文化的源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年 11 月版，第 239～244 頁。

劉建輝探討岡千仞的上海行，認爲他「通過對上海的體驗，進一步加強了『興亞』的決心」〔註 48〕。福井智子《岡千仞的上海經歷》〔註 49〕、《岡千仞的「燕京」遊歷——以〈燕京日記〉爲資料》〔註 50〕主要以《觀光紀游》爲中心，在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背景下，探討岡千仞在上海、燕京等地的遊歷，「考察千仞作爲『異域之人』的眞情實感」〔註 51〕及其親見中國後中國觀的改變。福井氏的論文觀點新穎，方法得當，富於啓發性。

目前學界雖已有論文對《觀光紀游》專門研究，但數量較少，尙未形成專著，研究角度與深度也較爲局限，有待挖掘。岡千仞是明治年間著名的儒者，著述大多以漢文形式呈現。作爲岡氏本人在中國親身體驗的自撰文字，《觀光紀游》是域外人對晚清中國認識的第一手資料，其重要性毋庸贅言。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其人其書進行更爲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二、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研究的拓展

根據以上對於學界研究實績的述評及其存在的問題，筆者以爲，要突破以往對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研究格局，可嘗試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文學文化層面的開拓

學界多集中於在史學層面探析《觀光紀游》的史料價值。但作爲一本撰於明治時期，出自日本漢學家之手的漢文遊記，缺少文學文化層面的研究，未免爲憾。

首先，岡千仞本人尙未得到充分重視。《觀光紀游》以日記體形式呈現，具有明顯的自傳性特點。孟子嘗言「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張伯偉以此爲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方法。〔註 52〕「現今甚少研究岡鹿門其人其事」〔註 53〕，

〔註 48〕劉建輝著，甘慧傑譯《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4 頁。

〔註 49〕《岡千仞の上海體驗》，《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6 年第 15 期，第 17～28 頁。

〔註 50〕《岡千仞「燕京」への旅——〈燕京日記〉を中心に》，《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8 年第 17 期，第 17～30 頁。

〔註 51〕《岡千仞の上海體驗》，第 17 頁。

〔註 52〕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5 月版。

〔註 53〕《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明治的漢學家》，第 52 頁。

部份學者不僅混用其姓名、字號，甚至將其身份誤判爲畫家、和尚〔註54〕。不知其人，何以逆其志，知其事？釐清岡氏本人生平與學術的相關問題，當是著手研究《觀光紀游》的當務之急。

其次，《觀光紀游》成書與版本問題依然模糊不清。這看似只是基本的文獻學課題，實則至爲關鍵。《觀光紀游》屬於近代文學範疇，其成書與版本問題本不複雜，然現今學界的論述卻存在矛盾牴牾之處。該問題與《觀光紀游》的流傳與接受息息相關，亟需釐清，下文將闢專節討論，茲不贅述。

此外，可從中日文人交流角度入手，拓寬文學文化層面對於《觀光紀游》的研究。岡氏不通華語，他與中國文士之間主要通過筆談與詩文酬贈等方式相互交流。現今留存的這些文字材料與當時報紙的報導以及《觀光紀游》等都是見證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晚清文士的序跋等相關記載，也是本課題將要重點研究的對象。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不僅映照出域外人心目中的異鄉，也反射著作者對於本國的思考，它與中外各國均有錯綜複雜的關聯，是從屬中外文學文化交流的一部份。筆者擬對這些材料進行輯錄，並從文學文化交流的角度進行初步分析，聯繫時代背景，研究域外人撰寫中國行紀前後整體思想觀念的調整與更新。

（二）歷史思想層面的挖掘

歷史層面是目前學界著力探討的領域，筆者以爲其中仍存在繼續挖掘的可能性。

《觀光紀游》是岡氏親自體驗中國後的產物，其本人也因是「域外人」而無任何中土人士的顧慮，可以直筆、完整地書寫見聞與感想，暢所欲言，故此書更具歷史眞實性。

岡氏卒於1914年，距其1884年遊華與1885年返回日本約三十年，可聯繫其間發生的甲午戰爭與清廷覆滅等歷史事件，根據《觀光紀游》對晚清中國時況及歷史走向的判斷，研究岡氏來華前後思想觀念的轉變，探討其思想特點。

〔註54〕如「1885年7月，日本畫家岡千仞翁在中國杭州訪遊時，將自己親耳所聞記錄在他程度《觀光紀游》卷二（蘇杭日記上卷）中」，張昇餘《明清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頁；又如「（八指頭陀）與日本和尚岡千仞遊玲瓏岩」，謝秀蓮《八指頭陀詩研究》，釋慧開、周益忠、劉昌佳指導，國文學系，高雄：高雄師範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第206頁。

另外，可採取宏觀與微觀、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研究《觀光紀游》。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域外人中國行紀寫作的重要轉折時期。一方面，東方的朝鮮、越南已進入中國行紀寫作的尾聲階段；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長，湧現出大量有關中國的行紀。較爲特殊的是日本，此時其近代中國行紀的書寫正處於起步期。因爲日本雖然地處東方，但長期實行鎖國政策，直到 1862 年「千歲丸」訪華之後，才出現近代首部中國行紀。此外，近代域外人的中國行紀，若不論藝術形式，單就其中反映的觀念，則亦紛繁複雜。不僅存在東、西方之異，而且僅以東方爲例，日、朝、越諸國之間亦各自有別。可借鑒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錢鍾書、范存忠、陳受頤等先生對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中國鏡像的論述，〔註 55〕在對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整體面貌進行概述的基礎上，探討同一時期其他域外人眼中的中國，揭示《觀光紀游》的特色與歷史定位。

第三節　研究理論與方法

筆者以爲，進行本課題研究時，應根據中國行紀本身的文學特性，選擇最合適的方法解讀材料。本書涉及的材料主要可分爲東方與西方兩部份。朝鮮人、越南人與日本人同屬漢文化圈，其「內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觀念、知識結構等，往往是根據某種基本原則（如儒家思想）而展開」〔註 56〕。研究他們筆下的中國，應該主要使用類似中國古代文學的批評方法。〔註 57〕特別是岡千仞的儒者身份在漢文化圈中最爲典型。但一方面，本書並不意在做純文學的研究，而是希望運用綜合與比較的方法，在文本材料表層差異的背後，分析造成差異的原因，還原歷史語境。同時，中國東亞近鄰的描寫，特別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西洋人中國行紀的

〔註 55〕Edited by Adrian Hsia,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其中錢鍾書先生的論文爲其 1935 年至 1937 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學士時所寫，題爲《十七、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收入《錢鍾書英文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2～280 頁。）

〔註 56〕《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第 284 頁。

〔註 57〕中國古代文學的批評方法以「以意逆志」、「推源溯流」及「意象批評」最爲典型。其中，「以意逆志」法偏重於文學的外部研究，後兩種方法偏重於文學的內部研究，參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

書寫本身就是西方文學的一部份，自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歐洲文學中關於中國形象的描寫，最大量、最集中地存在於其遊記文學之中。」〔註 58〕孟華認爲遊記具有跨學科書寫、自傳色彩、文化選擇（修改、重寫）與跨文化書寫等跨越文化的特性。〔註 59〕因此，本書對於域外人中國行紀的解讀亦會參照前人研究成果，借鑒其他西方理論。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一書雖是研究中國人的域外遊記，以中國文學爲研究對象，但其中對西方理論的運用新穎而貼切。作者在「緒論」中就明確其研究理論主要爲旅行理論及鏡像與觀視。

「從西方旅行理論來看，遊記主要記載著旅人自我與他者的相遇過程。」〔註 60〕周憲研究近代中國人的域外遊記，將旅行界定爲「一種他者眼光與陌生現實的遭遇」，同時伴隨有時空交錯的糾結，「較之於其他文學形式，旅行文學的時—空間的轉移和變化，極易產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識和歷史的比照玄想」。〔註 61〕旅遊的本質就是體驗，在近年國內旅遊學研究中，旅遊體驗迅速成爲熱門研究領域〔註 62〕，遊記作爲旅遊體驗的直接文字材料，可運用旅行理論加以探討。

鏡像與觀視則出自拉康（Jaques Lacan）關於主體形式的理論，本書選取以「鏡像」爲題，除了受到「vision」一詞的影響外，亦與鏡像理論有關。主體認證產生於鏡像階段，〔註 63〕「兒童是通過一個潛在性的東西認識自己的同一性的」，旅行者就像鏡像階段的兒童，通過旅行發現了他者，「陌生他者的存在是一面域外之鏡，藉由旅行儀式的開啓，旅人通過他者而完成建構自

〔註 58〕葉向陽《「歐洲遊記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國際研討會日前在北大召開》，《中華讀書報》。〈http://www.gmw.cn/01ds/2001-09/19/10-C0D9BCD46E24C2A948256ACC0001432C.htm〉，03/26/2011 available.

〔註 59〕Meng Hua, *Visions de l'Autre: Chine, France: Textes Extraits des Conférences et des Séminaires Prononcés à l'Étranger*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孟華：《他者的鏡像：中國與法蘭西——孟華海外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

〔註 60〕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1 月版，第 10 頁。

〔註 61〕周憲《旅行者的眼光與現代性體驗——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社會科學戰線》，2000 年第 6 期，第 115～120 頁。

〔註 62〕謝彥君《緒論：旅遊體驗研究的意義、方法與方向》，《旅遊體驗研究——走向實證科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10 年 1 月版，第 1 頁。

〔註 63〕張海蓉《拉康的主體認證理論》，《哈爾濱學報》，2004 年 6 月刊，第 18 頁。

我的歷程。」〔註 64〕此外，「旅人觀看他者，也成爲被他者觀看的對象、以及被觀看景觀中的一部份。」〔註 65〕正如卞之琳《斷章》中的詩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註 66〕，看與被看帶來了視域融合，形成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弔詭關係」〔註 67〕。在凝視的過程中，既存在印證期待視野中相似性的認同感，亦伴隨背離心理預期的離異感。

最值得關注的是形象學（Imagologie）理論。文學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運作過程中對異國看法的總和。」〔註 68〕「文學形象學的定義是研究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異國。」〔註 69〕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爲作者所屬社會的集體想像物所支配，或多或少都受到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思想的雙重影響，社會集體想像物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遊記在塑造異國形象中有特殊功能，不僅能「折射出社會集體想像」，而且還能「創造出新形象」，使之進入社會集體想像之中。〔註 70〕中國在外國的國家形象，或者說外國對於中國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域外人中國行紀塑造的集體想像。反之，社會集體想像物亦是「理解、詮釋一個文本、一個作家所塑造的異國形象的關鍵」〔註 71〕。

社會集體想像物中有一類「單一形態和單一語義的具象」〔註 72〕稱爲套話（stéréotype），即刻板印象。比如中國近現代文學中的「洋鬼子」、「浪漫法

〔註 64〕《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第 14 頁。
〔註 65〕《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第 16 頁。
〔註 66〕卞之琳《十年詩草（1930～1939）增訂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第 24 頁。
〔註 67〕《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第 17 頁。
〔註 68〕〔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形象》，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第 154 頁。
〔註 69〕〔法〕讓－馬克・莫哈（Jean-Marc Moura）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L'Imagologie Littérature: Essai de Mise au Point Historique et Critique*），《比較文學形象學》，第 17 頁。
〔註 70〕孟華《試論遊記在建構異國形象中的特殊功能》，《中華讀書報》，2002 年 9 月 18 日。
〔註 71〕孟華《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比較文學形象學》，第 186 頁。
〔註 72〕〔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De l'Imagerie Culturelle à Imaginaire*），《比較文學形象學》，第 126 頁。

蘭西」，又如西洋語中國行紀中常出現的「pigtail」。〔註73〕這類「傳播了一個基本的、第一和最後的、原始的形象」〔註74〕已經從一個符號變成了一個信號，固著於集體無意識之中。套話的形成往往是文學文本中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運作的結果。「西方觀察家通常不是將中國視爲『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註75〕「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遊記裏，後人總是在不斷重言、重寫前人的描述」，〔註76〕研究外國語境下中國套話的形成，「互文性」不失爲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互文性」亦體現在「文史互證」方法的運用上。可將《觀光紀游》的記載與中國人所撰詩文、筆記進行對讀，在印證史實的同時尋找被遮蔽的眞相。

此外，還可將「『文學』形象與其他平行的、同時代的證據（報刊、副文學、圖片、電影、漫畫等）進行比較，「將文學思考重新置放於對一個或多個社會的文化進行的總體分析中」〔註77〕，印證或補充十九世紀中後期域外人中國行紀中的晚清鏡像。

第四節　文獻資料基本概況

現存文獻資料是本書所涉時段的主要依據。十九世紀中後期既是朝鮮、越南中國行紀寫作的尾聲階段，又是日本與歐美人士此類文獻寫作的鼎盛階段。歷史上，朝鮮與越南長期隸屬於中國，並對華朝貢，朝鮮使華的燕行使與越南使華的北使都留下了豐富珍貴的中國行紀資料。然而晚清以降，以朝

〔註73〕關於「洋鬼子」與「浪漫法蘭西」，可參孟華《中國文學中一個套話化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探析》與《從艾儒略到朱自清：遊記與「浪漫法蘭西」形象的生成》，載氏著《中法文學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04～239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戰後，日本亦流行以「豬尾巴」或「豚尾奴」的綽號羞辱中國人，見〔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84～185頁。

〔註74〕《形象》，《比較文學形象學》，第159頁。

〔註75〕〔美〕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版，第iii頁。

〔註76〕孟華《從艾儒略到朱自清：遊記與「浪漫法蘭西」形象的生成》，孟華等《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377頁。

〔註77〕《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比較文學形象學》，第120頁。

貢制度爲基礎的「天朝禮治體系」〔註78〕與「宗藩關係」在西方列強與日本的衝擊下支離破碎，朝、越兩國使臣中國行紀的書寫傳統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終結。日本則與朝鮮、越南相異，由於長期實行海禁的緣故，直到1862年「千歲丸」的訪滬才拉開了東瀛客近世大規模中國行紀書寫的序幕。西方的情況則以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爲轉捩點，鴉片戰爭後西洋人的中國行紀大量湧入文壇。對於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的大規模整理肇始自清人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書》及其《補編》、《再補編》與《三補編》。王氏此書堪稱輿地叢書的空前之作，囊括了1537種清末中外人士的重要輿地著作，其中所收清末域外人赴華時撰作的中國行紀數量可觀。〔註79〕而當代國內外學界對朝鮮、越南、日本與歐美中國行紀資料的整理在近年日趨興盛，其基本概況如下：

一、朝鮮

較大規模的有《燕行錄選集》（上、下冊）〔註80〕、《國譯燕行錄選集》（12卷）〔註81〕、《朝天錄》（4卷）〔註82〕、《燕行錄全集》（100冊）〔註83〕、《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3冊）〔註84〕與《燕行錄選集補遺》〔註85〕，等等，它們收錄了朝鮮王朝時期（1392～1910）使臣來往燕京（北京）的燕行材料，是「七百年積累的形象學資料」〔註86〕。

二、越南

香港學者陳荊和據戴密微（P. Demiéville）所藏孤本，編注《阮述〈往津

〔註78〕「天朝禮治體系」是以中國爲中心，以禮儀爲主要形式的一種國際形態，參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註79〕見吳豐培《王錫祺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其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第92～98頁。

〔註80〕〔韓〕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社，1962年版。

〔註81〕〔韓〕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年版。

〔註82〕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版。

〔註83〕〔韓〕林基中編，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註84〕〔韓〕林基中、〔日〕夫馬進編，首爾：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年版。

〔註85〕〔韓〕林熒澤編，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版。

〔註86〕劉順利《半島唐風：朝韓作家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97頁。

日記〉》，此書以日記體裁記錄阮述 1883 年的第二次使華。〔註 87〕中越合編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25 冊）〔註 88〕涵蓋了自 1314 年至 1884 年 53 位越南使臣或民間人士遊歷中國時的 79 部作品，「以燕行記、北使詩文集和北使程圖等爲主要形式」〔註 89〕。

三、日本

日本學界整理了《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20 卷）〔註 90〕，收錄文久二年（1862）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部份日本人的中國行紀，岡千仞《觀光紀游》即位列其中。中國學界方面，陳捷曾評介過記載岡田篁 1872 年遊華的《滬吳日記》〔註 91〕與上田休 1875 年所撰《上田休中國旅行日記》〔註 92〕等未見收於《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的日人中國行紀。此外，張明傑主編有《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12 冊）〔註 93〕。

四、歐美

近代西洋人的中國行紀在鴉片戰爭後大量湧現，以《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資料叢書》（200 冊）〔註 94〕爲例，1840 年以後有關中國的資料明顯增多，其中又以西方人所撰中國行紀最爲豐富。語言以英語爲主，也有法語、德語、荷蘭語、西班牙語及瑞典語等。而在作者國籍方面，則主要爲英國（大不列顛，包括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士）、美國、法國與德國（普魯士）。除韓國出版的《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資料叢書》以外，據筆者寓目，中國學界也有《「親歷中國」叢書》（10 冊）〔註 95〕、《「西方的中國形象」譯叢》（10 冊）〔註 96〕、

〔註 87〕陳荊和編注：《阮述〈往津日記〉·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版。

〔註 88〕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5 月版。

〔註 89〕《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一冊，序二（鄭克孟）第 1 頁。

〔註 90〕〔日〕小島晉治監修，ゆまに書房，平成九（1997）年十月版。

〔註 91〕《岡田篁の〈滬吳日記〉につぃて》），《日本女子大學人間社會學部紀要》，2001 年 3 月第 11 號。

〔註 92〕《一位日本武士眼中的中國——上田休的中國旅行記》，載佐藤保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日文史交流論集：佐藤保先生古稀紀念》，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第 53～85 頁。

〔註 93〕北京：中華書局，2007～2009 年版。

〔註 94〕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年 11 月～2004 年 10 月版。

〔註 95〕耿昇、〔美〕李國慶主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2010 年版。

《「走近中國」文化譯叢》〔註97〕、《「西方人看中國」文化遊記叢書》（11 冊）〔註98〕、《「中國研究」外文舊籍彙刊・中國記錄・第一輯》（10 冊）〔註99〕等相關成果。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主要內容

本書除導言外，正文共分三章，首先總論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的整體面貌，然後在此基礎上展開對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探討，最後分析《觀光紀游》與近代中日文士之間的交往。期望通過「異域之眼」反觀晚清，從中國出發進入外國，最後返回中國，建構全面的綜合性研究。

第一章爲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由於中國行紀書寫傳統特點與發展態勢的不同，本章分三節展開論述：十九世紀中後期朝鮮人與越南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千歲丸」上海行後日本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與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洋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旨在爲第二、三章討論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提供文學與歷史背景。

第二章爲岡千仞與《觀光紀游》。第一節簡述岡千仞之生平與學術，據筆者搜集到的岡氏著作補充前人未曾深入涉及之處；第二節再探《觀光紀游》成書與版本問題，進而聯繫其接受與流傳等相關問題；第三節通過《觀光紀游》的相關記載，呈現岡氏筆下的晚清社會，討論岡千仞遊華前後思想，主要是中國觀的轉變。

第三章爲《觀光紀游》與近代中日文士交往。第一節從書籍搜購與酬贈的角度探討岡千仞與清人的交往；第二節根據近代中國文士與晚清傳媒尤其是《申報》的相關記載，刻畫出他人眼中的岡千仞中國行。

餘論爲異域之眼：借他者之鏡反躬自省，本書研究岡千仞《觀光紀游》等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的目的是反觀中國，更好地認識晚清。

附錄爲資料彙編，總共包括五個部份。一是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

〔註96〕黃興濤、楊念群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7 月版。（增訂重印時事出版社《西方視野裏的中國形象》叢書與光明日報出版社《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

〔註97〕錢林森主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版，2010 年再版。

〔註98〕張子清主編，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010 年版。

〔註99〕〔美〕李國慶主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

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二、三是主要版本《觀光紀游》的文字校勘，四是岡千仞與中國文士交往資料彙編，五是《申報》對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相關記載。

第一章　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第一節　十九世紀中後期朝鮮人與越南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歷史上，朝鮮與越南長期受到漢文明的薰染，先後對中國朝貢，接受中國皇帝冊封，成爲「天朝禮治體系」的一部份。〔註1〕他們與中國的讀書人「有著類似的道德觀念、知識結構和感受方式，形成了大同小異的文明」〔註2〕。朝鮮人與越南人在用漢字記錄本國歷史的同時，也描繪著對於中國的想像。出於對漢文化的嚮往與對本國國威的考慮，朝鮮與越南歷次赴華朝貢使均由文采卓著的文士擔任。他們以漢字記錄入華後的見聞感受，留下了形式多樣、體裁豐富的中國行紀，是中外交流史上的寶貴財富。但隨著 1885 年《中法會訂越南條約》與 1895 年《馬關條約》的簽訂，越南、朝鮮與中國間以朝貢制度爲基礎的宗藩關係破裂，中國行紀的撰作因而也在近代終結。十九世紀中後期是封建時代朝鮮人與越南人中國行紀書寫的尾聲階段。以朝鮮、越南使臣的眼光爲切入點，從周邊看中國，觀察危如累卵的晚清，可以一窺東亞同文諸國心目中曾經的「大中華」如何在歷史變革期做出艱難抉擇。

〔註1〕《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前言》，第1頁。

〔註2〕張伯偉《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與變遷——以文學與繪畫中的騎驢與騎牛爲例》，載氏著《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9月版，第53頁。

一、十九世紀中後期朝鮮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一）朝鮮人中國行紀概說

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經常遣使中國，歷次赴華使臣留下了總數多達約五百種的中國行紀。〔註3〕目前學界公認高麗時代赴元進賀使李承休的《賓王錄》爲最早的朝鮮人中國行紀。李承休之後，朝鮮人中國行紀的寫作逐漸增多，並以明清兩朝最爲興盛。明代朝鮮使臣無論出使南京或北京，均以「朝天錄」命名其中國行紀。清代則多以北京爲使行目的地，其中國行紀稱作「燕行錄」。清代朝鮮使臣亦有往使瀋陽、天津等其他城市的經歷。「清代的中朝宗藩關係仍不同於明代以前的中朝宗藩關係，區別在於朝鮮最終認同清國只是『大國』，而非『天朝』」。〔註4〕「燕行」從字面上看是使行北京，廣義講是使行中國。張伯偉認爲，以「燕行」代替「朝天」反映出的不僅僅是字面上目的地的轉換，其深層含義應該具有政治意味，因爲在朝鮮人心目中，清朝是落後的蠻夷，無法代表天朝，只有朝鮮才是中華文明的正宗。

派往中國的朝鮮使團社會成分不一，但出於外交場合賦詩言志、彰顯國威的需要，正副使及書狀官都具備較高的文學素養，這爲他們撰作中國行紀提供了可能性。1392 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取代高麗王朝，明太祖朱元璋賜國名「朝鮮」，朝鮮半島從此進入朝鮮時代，這也是朝鮮人寫作中國行紀的高峰期。朝鮮人的中國行紀包括紀行詩、紀行文與紀行圖。總體上，紀行詩更具文學特色，紀行文在史料價值上較爲突出，紀行圖則於輿地之學頗多裨益。相對而言，「明代『朝天錄』以紀行詩爲多數，而清代『燕行錄』則更多是紀行文」〔註5〕。「使行歸國一行，國王召見三使。書狀官把途中見聞記錄稟報國王。……不少正使以下正官以及隨從人員也私撰燕行錄之類。」〔註6〕清代紀行文常採用日記體，逐日記事，鉅細靡遺，有些甚至近似流水帳。但作爲記錄朝鮮使臣親身遊華經驗的第一手材料，多數紀行文在文

〔註3〕「燕行錄據推測大約保留有500餘種」，林基中《領導朝鮮朝的知識人的北京紀行見聞錄》，《燕行錄全集》第100冊，第322頁。

〔註4〕劉爲《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序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8頁。

〔註5〕楊雨蕾《燕行與中朝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頁。

〔註6〕〔韓〕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載氏著，〔韓〕全善姬譯《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84頁。

采經營方面的缺失恰恰很好地被其直筆、完整的特性彌補。使臣們不受中國官方的干涉，沒有政治方面的顧忌，自由地記錄使行途中的社會活動與見聞感受。與此同時，清朝與朝鮮王朝間「華夷秩序」的張力突顯。清初朝鮮士人普遍認爲明朝因「壬辰倭亂」時出兵相助而亡國，自感有愧前朝，設立大報壇〔註7〕，尊明反清〔註8〕，對滿清充滿敵意，徑以「小中華」自居，反視中國爲蠻夷。但在滿人的逼迫下，朝鮮不得不接受對清朝的朝貢關係。清初朝鮮與中國新生政權之間的緊張關係，隨著殘明勢力的徹底敗亡在康乾時期得到緩解，這在當時朝鮮使臣所撰中國行紀中可見一斑。現以李正臣之《燕行錄》爲例說明清代朝鮮中國行紀的價值與特點。

（二）清代朝鮮人中國行紀——以李正臣《燕行錄》為例

李正臣（1660～1727），字邦彥，號櫟翁，又號松蘗堂，歷顯、肅、景、英四朝。系出延安，爲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公號楞軒諱石亨八世孫。六十二歲官戶曹參判，以謝恩副使赴燕，撰有《燕行錄》。自著《櫟翁遺稿》，爲其後人所編，以抄本傳世。韓國古典翻譯院據首爾大學校奎章閣藏本爲底本，由李承昌標點，成百曉監修，於2008年12月影印出版，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續第53冊。其中卷一錄李氏所作燕行詩，卷七至八即其《燕行錄》。李氏《燕行錄》之內容以此本最爲詳細。

《燕行錄》記錄李正臣於景宗元年（1721）辛丑三月至七月以副使身份與正使趙泰采、書狀官梁聖揆往使中國之見聞。三月初四日離漢城，三月二十九晦日渡鴨綠江，進入中國。四月三十日抵京，留京三十七日，閏六月初八日始返。七月十四日再渡鴨綠江，離開中國。「大抵日記，義州渡江後遂停之」，而全書提及之最後時日爲「七月二十八日，到平山府」。具體路程，則自弘濟院至北京共三千十六里。整個燕行歷程，正如李氏詩中所謂「龍灣以北二千里，三月含綸七月回」（《龍灣枕上有懷》）。

使行人員流連中土美景、美文與美人。李氏觀景覽勝，「如人在畫圖中行」，於題壁、碑刻等多所載錄，具有重要文獻及藝術價值，顯示其對禹域正

〔註7〕可參于彤《大報壇與明清之際的中朝關係》，陳尚勝等《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註8〕關於李朝的「尊明反清」政策，可參楊昭全、何彤梅《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585～592頁。

統漢字文化之認同與傾心。而見及「小年凝妝」之「玩景唐女」，則「鄭致道、崔翊明魂奪神迷」。李氏學養豐厚，於楊貴妃塑像、安祿山院堂自有評價。入觀昌黎廟，因面態、氣色斷言廟中之像「決非昌黎像」，亦可見中國傳統人物於朝鮮士人心目中之形象。中土所見異物，李氏亦頗多好奇，《燕行錄》載有槖駞、訓鸚鵡者、幻術等事。

但他們亦不時流露出對本國的民族自豪，對明朝的敬意與對清廷的不滿。如「安市城，即高勾麗安市城將大破唐太宗之六師，而城上拜天子處也」，敘及高麗擊潰唐人的往事，得以之情自顯。「崇煥在時，不敢復侵」，「皇明遂有再造之恩」，充滿了對前明的崇敬之情。「況百餘里之間，無一人家，平原廣野，無非沃土膏壤，而盡皆荒廢，成荊棘之場，極可惜也」，生發出對清朝統治下大片土地荒蕪情形的惋惜。

《燕行錄》史料頗豐，書中所錄多件文書，敘康熙帝立廢太子事及其十四子征伐西韃之事甚詳，爲見證清初重大事件之原始史料。李氏以諺文爲北京城山西商人之叫賣聲記音，記錄與清人之對話，以爲「清言以二爲乙」，「清言以三爲山」，皆可作研究其時語言之史料。另外，此書所載使臣於互市、八包、後市曲折之見解，可作爲經濟史料，略窺李朝燕行所涉之貿易政策。

從李正臣《燕行錄》可以看出清代朝鮮人中國行紀的敘述視角。他們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著意於中土保留的漢文化遺跡，並用以印證來華前的想像。他們在雜錄聞見的同時，偶而也流露出對明朝的回憶，對清廷的不滿以及對現實的想像，而這些記憶與想像的背後，「攜帶了太多的歷史，隱含了太多的情感」〔註 9〕。朝鮮燕行使臣在出發點、觀察角度與寫作自由度上異於中國人，它是域外人對他們眼中異國的描述，這使朝鮮人的中國行紀具有突出的史料價值，可以彌補相關中國文獻與朝鮮文獻記載的不足，還原當時的歷史與社會語境。

（三）近代朝鮮人中國行紀——從金允植四部中國行紀說起

近代以來，隨著日本的步步緊逼與西洋文明的介紹引入，李朝與滿清間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1876 年，日本迫使李朝簽訂《江華條約》，加快對其經濟滲透與軍事控制。李朝多次求助於清廷，清廷亦數次出兵援朝，以解「壬午軍亂」（1882）與「甲申政變」（1884）之圍。十九世紀中後期，朝鮮對於

〔註 9〕 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書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從周邊看中國》，第 476 頁。

中國的依賴程度與日劇增，再次突顯其事大的傳統心理。這裡援引金允植數部中國行紀說明此時朝鮮人眼中的晚清。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號雲養，歷憲、哲、高、純四朝，卒於日據時期。系出清風，爲文毅公金湜、文貞公金堉之後。十六歲從學於樸珪壽、俞莘煥，三十歲進士及第。四十七歲奉高宗之命以領選使赴天津，第二年還朝。後因事曾歷兩次流配，共十九年。日據期間，授封子爵。八十歲刊行自編詩文集《雲養集》。〔註10〕金氏一生熱心洋務，努力推進朝鮮的現代化進程，但因曾導向日本勢力，成爲親日派領袖，充滿爭議，類似滿清之李鴻章。〔註11〕

金允植於辛巳（1881）年至癸未年（1883）出使天津，關於此次往使經歷，他撰有《析津于役集》〔註12〕、《領選日記》〔註13〕、《天津談草》〔註14〕與《陰晴史》〔註15〕四部中國行紀。

《析津于役集》爲辛巳年（1881）九月西行時與「行中諸人唱和」及「與清國人贈答」之詩，使行返國後曾輯爲一卷，後大多散佚，今所見者爲三十年後金氏所錄之「其可記者」。

《天津談草》錄辛巳年（1881）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壬午年（1882）十月

〔註10〕以上有關金允植生平的介紹主要參考其門人李斌丞所撰《雲養先生略傳》，〔韓〕趙昌來標點，梁鴻烈監修《雲養集》，《韓國文集叢刊》第32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年12月版，第223頁。

〔註11〕參劉順利《朝鮮王朝「領選使」金允植的中國歌詠》，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十一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79～380頁。

〔註12〕本書所引《析津于役集》見收於金允植《雲養集》卷三，第273～276頁。

〔註13〕本書所引《領選日記》見收於《〈燕行錄選集〉補遺》中冊，第411～805頁，底本爲筆寫本，不分卷，原藏於韓國銀行知識情報室。《韓國漢文燕行錄選編》第30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研究院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版）亦收錄此書。

〔註14〕本書所引《天津談草》見收於《燕行錄全集》第93冊，第205～402頁。據《天津奉使緣起》文末「不肖曾孫周龍謹書」，則此本當爲金允植之曾孫金周龍抄本。

〔註15〕1955年韓國國史編輯委員會曾編輯魚允中、金允植《從政年表・陰晴史》，其中《陰晴史》單獨計頁。劉順利以此爲底本，著有《王朝間的對話——朝鮮領選使天津來往日記導讀》（以下簡稱「《王朝間的對話》」），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此外，韓國歷史資料檢查網站有《陰晴史》電子本，〈http://db.history.go.kr/url.jsp?ID=sa_006b〉，8/12/2011 available. 經筆者仔細比勘，劉氏書中引文實爲《陰晴史》之漢文全文與注釋，並將底本中諺文注釋翻譯爲漢文。

十四日金氏在天津與中外人士筆談之資料。卷首《天津奉使緣起》文末云：

錄底稿於行歷中，其與他人晤談，非汗漫說話者亦載之。壬辰季夏，謫居無事，屬印君東植移謄行歷中談草，匯爲一冊，命之曰《天津談草》。〔註 16〕

則金氏使程中已錄筆談底稿，此書爲壬辰年（1892）印東植謄抄原件而成。〔註 17〕

《領選日記》卷首錄辛巳年（1881）二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七日部份日記，主體爲金氏辛巳年（1881）九月十二日至癸未年（1883）六月晦日所撰日記的彙編，末附《承使官金晚植光緒九年（1883）六月十二日周玉山談草》。金允植自幼父母雙亡，爲叔父金益鼎收養。金晚植乃其叔父四子，爲金允植從兄。壬午年（1882）八月至十一月以修信副使兼全權副官出使日本，甲申年（1884）至乙酉年（1885）以冬至兼謝恩使燕行。〔註 18〕

《陰晴史》爲辛巳年（1881）九月初一日至癸未年（1883）八月二十五日金氏之日記與筆談，不僅涵蓋《天津談草》與《領選日記》絕大部份內容，且更爲詳細，多出大段附加信息，疑兩書自《陰晴史》中摘出，而《陰晴史》定本成於兩書之後。中國學者認爲《天津談草》是「很有現場感的史料」〔註 19〕，《領選日記》「是一份更爲原始的手稿」〔註 20〕，而經過本人及後入多次整理的《陰晴史》則「充滿了『文本間性』」〔註 21〕，值得深入探討。

金允植往使天津是李朝史上極爲特殊的一次使行，這種特殊性表面上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使行目的地。此次使行以天津爲終點，不同於清代絕大多數往使北京的燕行。

〔註 16〕《燕行錄全集》第 93 冊，第 211 頁。

〔註 17〕關於《天津談草》成書、版本與內容的介紹，可參薛瑞東《〈天津談草〉探微》，內蒙古師範大學 2010 年碩士論文。

〔註 18〕此據金允植《從氏翠堂公諡狀》，《雲養集》卷十三諡狀，第 470～471 頁。關於金益鼎之生平，可參金允植《叔父清恩君家狀》，《雲養集》卷十三行狀，第 464～465 頁。

〔註 19〕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書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第 478 頁。

〔註 20〕王鑫磊《帝國斜陽下的親密接觸：論朝鮮官員金允植的天津領選》，《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第 26 頁。

〔註 21〕《王朝間對話・導言》，第 8 頁。

其次是使行身份。李朝高宗早在1881年初即已定此行使號領選使，由趙龍鎬擔任。《高宗太皇帝實錄》卷十八載：

> （辛巳年二月二十六日）諸條磨練節目書入，而使號稱以領選使……（以）趙龍鎬爲領選使。〔註22〕

金氏《陰晴史》辛巳年十二月初一日日記云：

> 據司直李應濬呈稱，初以趙龍鎬派差，起呈以閏月二十日爲定。前期幾日，龍鎬意外身故，更以金允植改差。〔註23〕

則高宗因趙龍鎬行前身故而改派金允植。「（辛巳年閏七月十五日）以金允植爲領選使」。〔註24〕傳統上，朝鮮使者主要分爲節使、謝恩使、奏請使、進賀使、陳慰進香使與問安使。〔註25〕金允植被委任爲領選使，其身份在李朝史上尚屬首次，這與此行的目的，根本上與圍繞中朝兩國時局的變動有關。《高宗太皇帝實錄》卷十八載：「（辛巳年九月十九日）（以）金允植爲參議」〔註26〕，使行之前，金氏照例被加封爲參議。

再次是使行規模。《高宗太皇帝實錄》卷十八載：

> （辛巳年九月二十六日）召見領選使金允植、從事官尹泰駿、官弁白樂倫，辭陛也。（領選使率學徒六十九名赴天津，分派機器、製造兩局，查照前次議定章程規條，學習技藝，期以速成）」〔註27〕

「原則上，大部份的使行包括兩名使臣（正副使臣各一人）、一名書狀官、三名大通官、二十四名押物官，共有三十名正官。」〔註28〕此次使行只包括領選使一名，從事官一名以及官弁一名，共三名正官。雖然官員數量遠遜通常，但金允植所帶領的隊伍規模不小。《高宗實錄》稱其中學徒身份者「六十九名」。而據《領選日記》辛巳年（1881）十月二十五日日記所載學徒、工匠名單計之，共三十八人，包含正官、譯官、醫員等在內「共六十九人」，壬午年（1882）三月二十五日日記中《東局總辦詳報朝鮮學徒勤慢草》亦云「共成

〔註22〕《高宗實錄》（二），〔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高宗純宗實錄》中，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58年版，第3頁。

〔註23〕《王朝問對話》，第81頁。

〔註24〕《高宗實錄》（二），第18頁。

〔註25〕參《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第28～34頁。

〔註26〕《高宗實錄》（二），第23頁。

〔註27〕《高宗實錄》（二），第23頁。

〔註28〕《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中韓關係史論集》，第186頁。

六十九員名之數」。〔註 29〕《陰晴史》所載人數同於《領選日記》。〔註 30〕則《高宗實錄》所言以金允植上呈名單之學徒數代稱總人數。金氏此日日記末稱「此外學徒等私帶隨從，以備使喚者，亦多有之」，〔註 31〕則使行總人數估計在一百左右。

最爲特殊的是使行目的。官方記載的書面理由是派金允植率領諸學徒至機器、製造局「學習技藝，期以速成」（參前引）。《天津談草》卷首《天津奉使緣起》的分析更爲透徹：先敘本國及其周邊之時事概況，次議本國應取政策，當吸取安南、緬甸、琉球「專仗一國」之教訓，採李鴻章聯美親中之策，是朝鮮傳統「事大論」思潮的延續。中及此次燕行「借學生赴津爲名，迅選曉事大員來津商辦」，表面上以派遣學徒掩人耳目，實則與中國商討朝鮮今後對外政策，締結朝美條約，且此事極爲機密，「必須慎密，勿使他鄰知之」，「他鄰」似特指日、俄。〔註 32〕金氏往使天津不僅表面上學習近代技藝的目的不同以往，而且根本地，旨在倚仗中方的建議做出今後何去何從的抉擇，此行關係到朝鮮的未來政策走向，實在是朝鮮近代史與近代中朝關係史上至爲關鍵的轉折點。〔註 33〕

另外，金允植的中國行紀還見證了他在變局面前的力挽狂瀾。《陰晴史》的時長跨度接近三年，完整地記錄了金允植從領命出發離開朝鮮，到抵達天津執行使命，再到使程結束返回朝鮮的全過程。三年的行旅並非一帆風順，金氏一行從剛開始就背負著推動國家經濟與外交近代化的沉重使命。壬午年（1882）六月初九日，朝鮮發生兵變。〔註 34〕表面上只是由於士兵不滿上層貪腐發動軍變，但實質上卻由於日本勢力的介入而變得複雜。藤田大生認爲：

〔註 29〕《領選日記》，《燕行錄選集補遺》中，第 613 頁。

〔註 30〕然《陰晴史》在學徒與工匠具體名單上異於《領選日記》：《領選日記》載學徒 12 人，工匠 26 人；《陰晴史》載學徒 25 人，工匠 13 人。參《領選日記》，《燕行錄選集補遺》中，第 421～422 頁；《王朝間對話——朝鮮領選使天津來往日記導讀》，第 27～28 頁。

〔註 31〕《領選日記》，《燕行錄選集補遺》中，第 422 頁。

〔註 32〕《天津談草》，《燕行錄全集》第 93 冊，第 206～211 頁。

〔註 33〕「1881～1882 年朝鮮對美開國的交涉是近代中朝關係的轉折點」，「對朝鮮來說，1881～1882 年是逼使其選擇守舊還是開化的關鍵時期，是朝鮮近代史的轉折點」，見林學忠《近代中韓關係的再編——朝鮮開化官員金允植的視角》，《從周邊看中國》，第 363、365 頁。

〔註 34〕關於兵變的細節，可參《高宗實錄》壬午年六月初九日、《清史稿·朝鮮列傳》與《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等書的相關記載，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爲了構成和敍述東亞的歷史，對於日、中、朝三國來說，壬午軍亂「可以成爲眺望其相互關係的立足點」。〔註35〕

壬午軍亂本身屬於朝鮮本國王妃閔玆映與大院君李昰應之間爭奪執政權的內鬥，前者代表主張西化的改革派，而後者則「衛正斥邪」，屬於閉關鎖國的保守派。而軍變期間，日本駐朝使館遭圍困，死傷數名，日方借機進軍朝鮮，搶奪對朝的控制權。而清廷一直視朝鮮爲屬國，尤其是在失去琉球之後，對朝更爲重視，閔妃又是中國「以夷制夷」與「洋務運動」的堅定推行者，最終決定派吳長慶率軍赴朝。在促成清軍出兵援助上，金允植起到了至關重要而不爲人知的作用。閔妃在軍亂中偷逃出宮，險些亡命，更無從聯繫金允植。請求援兵是金氏自己的主張，他也是最早提出者。這一史實在《高宗實錄》與《清史稿》中均不見載，只有通過金氏所撰中國行紀方可略窺一二。金允植壬午年（1882）六月十八日日記首次提及軍變：

海關署又專伻送書言，今見日本駐京黎星使電報云，本月初九日，貴國亂黨將花房公使館人，打死一名，傷數名。花房逃去仁川。貴國復派兵圍阻。花房上英舶，到長崎。日本已派兵船三號前往說禮云云。〔註36〕

有候補通判朱姓人，浙江杭州人，自日本領事館取來。余問其詳。朱云，電音簡略，未得詳知。大略貴國人三百餘名，突入日本公使館。驅出花房公使以下，至仁川。載之貴國船，推送中流，任其所之。遇英國船，附搭還國云。〔註37〕

想來兩處電報皆同，斷非虛言。不知何許亂黨，弄出事來。半晌精神索然。〔註38〕

金允植最初從海關署得知駐日公使黎庶昌發回的電報消息時幾乎不敢相信，再次求證後陷入沉思，雖然他沒完全理出事情的頭緒，但由於牽涉日本，顯然他已開始擔心事件的嚴重性。此後金氏日記的記載較以往更爲頻繁、詳細：

〔註35〕〔日〕藤間大生《壬午軍亂與近代東亞世界的成立》（春秋社，1987）（《東亞世界的形成》第三部），轉引自〔日〕山根幸夫、中村義、藤井昇三、太田勝洪編，周啓乾監譯《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臺北：金禾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9頁。

〔註36〕《王朝間對話》，第330頁。

〔註37〕《王朝間對話》，第330～331頁。

〔註38〕《王朝間對話》，第331頁。

十八日得知消息後即與周馥在海關署筆談，明言「逐送日本公使」事非高宗本意，擔心日本「藉端要挾」；十九日偕魚允中再次與周馥筆談，首次提出希望清廷派兵，極爲迫切，「乞即派兵船幾隻，載陸軍千名，星夜東駛。毋在日人之後。機會甚急，恐不可緩」；二十日繼續筆談，稱「欲專雇一船，往探於仁川」，刻不容緩；二十一日夜接海關署來信，知「日本已派水師七百、陸軍七百前往」，往海關署，覓書「申乞火速出兵之意」；二十二日送別先行回國的魚允中後，金允植返回海關署與周馥筆談，認爲「若中國兵出，不至打仗，自有善處之道。他國則不能也」，而周馥表示「已派兵船十號」。《北洋大臣公文至海關道爲箚飭事》云：

> 准派三品銜候選道馬建忠、統領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酌帶兵船駛赴朝鮮查探……如有拒捕頑抗，肆其猖狂，即乃飛速馳報本署大臣。當奏明調撥大兵，乘輪値渡，討除群醜，以綏藩服。〔註 39〕

清廷最終決計出兵朝鮮，雖然主要是基於自身宗主國的地位與保護藩屬國的責任，但金允植的努力斡旋亦功不可沒。滿清政權在當時已經遭受到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打擊，不僅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主權喪失，而且由宗藩體制維繫的天朝上國地位受到鄰國日本的挑戰而岌岌可危。如果沒有金允植條分縷析地闡明利害與堅持不懈地奔走求援，清政府極有可能失去出兵朝鮮的最佳時機，陷入被動，從而也許會使朝鮮提前亡國，同時也將改寫晚清中國的歷史。因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金允植在「壬午軍亂」事件中起到了力挽狂瀾的關鍵作用。

二、十九世紀中後期越南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一）越南人中國行紀概說

秦漢至宋初是越南的「北屬時期」，受中國直接統治。〔註 40〕公元 968 年，萬勝王丁部領（Đinh Bộ Lĩnh）建立「大瞿越」，史稱先皇帝，越南進入「自主時代」。公元 972 年，宋太宗遣使封其爲交趾郡王。自此以後，越南「恪守向中國朝貢之禮」〔註 41〕。中越兩國間的宗藩關係亦始於是年，而止於 1885

〔註 39〕《王朝間對話》，第 340 頁。

〔註 40〕關於這段時間的越南歷史，可參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 1 月版。

〔註 41〕〔越〕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 12 月版，第 60 頁。

年李鴻章與巴德諾（Jules Patenotre，1845～1925）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越南完全淪爲法國殖民地，歷經中國的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註 42〕與朝鮮一樣，作爲藩屬國的越南不定期遣使中國，向宗主國求封、進貢、謝祭、告哀，等等。

越南是東南亞地區唯一曾經眞正融入中華文化圈的國家。〔註 43〕越南在社會各個層面上效法中國，其中就包括科舉取仕，它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廢除科舉制的國家。「越南歷朝都曾以科舉狀元領北使之職」，派往中國朝貢的使臣大多經歷過科舉制度的選拔，「是越南國內最優秀的學者和詩人」，屬飽讀詩書、經綸滿腹的文士，「有著與中國士人相當的漢文化素養」。〔註 44〕歷代燕行的北使們以文字記錄使程的見聞感受與記憶想像，留下了豐富的中國行紀資料，主要包括大部份以漢文形式撰寫的燕行記、北使詩文，以及繪製的使程圖。

《越南漢喃目錄提要》是「目前學術界關於漢喃文獻著錄最全面、體例最完備的集大成之作」〔註 45〕，其史部專列「燕行記」一類，共收 8 種燕行記〔註 46〕；史部地理類「地圖」下錄 8 種使程圖〔註 47〕；集部「北使詩文」載北使詩文 80 部〔註 48〕。《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共 25 冊，以下簡稱「《集成》」）是學界首次對越南中國行紀進行的大規模整理，由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編纂完成。〔註 49〕《集成》以照相方式原文影印了 1314 年至 1884 年五百多年間 53 位越南作者的 79 部燕行作品。這些中國行紀現在均收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作者以北使中國的越南使者爲主，也包括來華遊歷的民間人士，其中越南陳朝（1224～1400）1 人 1 部、後黎朝（1428～1789）13 人 19 部、

〔註 42〕其中 1406 至 1428 年越南爲明朝統治。

〔註 43〕韓東育《「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内情》，《從周邊看中國》，第 79 頁。

〔註 44〕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7 月版，第 338 頁。

〔註 45〕《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第 10 頁。

〔註 46〕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目錄提要》，0289～0296，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版，第 60～62 頁。

〔註 47〕《越南漢喃目錄提要》，1537～1539、1543～1547，第 303～304 頁。

〔註 48〕《越南漢喃目錄提要》，4017～4096，第 747～764 頁。

〔註 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5 月版。筆者曾撰寫書評評介此書，見拙作《域外人中國行記整理的新成果——〈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書後》，《書品》2011 年第 4 輯，第 56～66 頁。

西山朝（1778～1802）6 人 9 部、阮朝（1802～1955）33 人 50 部，時間跨度相當於中國的元、明、清三朝。據筆者詳細統計，79 部中國行紀中包括 13 部燕行記、4 部使程圖及 62 部北使詩文集。〔註 50〕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創作形式的劃分僅是相對而言，不可過於絕對。部份文獻存在兩屬的情形，例如，潘輝注《輶軒叢筆》雖定爲燕行記，但書中《子產廟》、《洛河》兩則，亦分別錄作者自撰之五律、七絕一首；又如裴樻撰、佚名繪《燕臺嬰語》以裴樻所作七言敘事長詩《燕臺嬰語》開篇，其後則爲使程圖；再如，阮輝（人瑩）《奉使燕京總歌並日記》總體上屬於北使詩文集，但此書從題名上即可看出附錄有燕行記。

（二）越南人中國行紀的價值

越南中國行紀內容豐富，時空跨度巨大，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史料價值、文學價值與文化價值三個方面。

首先是史料價值。作爲越南人的中國行紀，《集成》所收漢文材料主體是相當於中國清朝時期的燕行實錄。阮忠彥《介軒詩集》爲陳明宗大慶元年（中國元延祐元年，1314）奉使元朝所撰，馮克寬《使華手澤詩集》、《梅嶺使華手澤詩集》與《旅行吟稿》爲後黎朝光興二十年（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出使明朝所作。除此以外，其餘各書均是清朝行紀，集中反映了越南文士眼中的清朝，是異鄉人親歷滿清的眞實寫照。目前，學界正致力於《清史稿》的修訂工作，《集成》部份材料能起到補正史之闕的作用。比如潘輝注《輶軒叢筆》就載有道光皇帝牙齒鬆落的情況，這是中國史官所諱言而不敢入諸史書的。又如阮輝（人瑩）於北使驛館中存簡去繁地節抄了所見《名勝全志》，寫就《北輿輯覽》，而前書現已亡佚，《北輿輯覽》的史料價值不言而喻。再者，不同使臣筆下同一次北行的記錄不全相同，歷史往往就存留於各記錄間

〔註 50〕13 部燕行記爲阮公基《使程日錄》（第 1 冊），黎貴惇《北使通錄》（第 4 冊），阮輝（人瑩）《北輿輯覽》（第 5 冊），黎（人囧）《北行叢記》（第 6 冊），潘輝注《輶軒叢筆》（第 11 冊），范世忠《使清文錄》（第 14 冊），李文馥《使程志略艸》、《使程括要編》（第 15 冊），阮文超《如燕驛程奏草》（第 17 冊），黎峻、阮思僩、黃竝《如清日記》（第 18 冊），阮思僩《燕軺筆錄》（第 19 冊），范愼遹、阮述《建福元年如清日程》（第 23 冊）及佚名《北使佳話》（第 25 冊）；4 部使程圖爲分別收錄於第 24 冊與第 25 冊的阮輝（人瑩）等《燕軺日程》，范文貯《如清圖》，裴樻撰、佚名繪《燕臺嬰語》及裴文禩等《燕軺萬里集》；其餘屬北使詩文集。

差異的對讀上。武輝瑨《華程後集》對於光中三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北行所冒國王之事間有所指，與同行潘輝益《星槎紀行》、段濬《海煙詩集》、《海翁詩集》的語焉不詳相比，更能保存歷史的眞相。

文學方面，越南中國行紀亦存在重要價值。從《集成》各書中可以看出漢文化圈文學交流的盛況。近世以來，朝鮮、越南、琉球等國長期隸屬於中國，逐漸形成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冊封體系。使臣在這一體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們出使行爲背後代表的是國家形象。東亞國家間的外交從某種角度講可稱爲詩賦外交，爲彰顯國家實力，使臣一職通常由本國學養豐厚與才思敏捷的文士擔任。《集成》各書均爲越南使臣或著名文人所撰，其筆下多載有越南文士與中國官吏、文人等贈答酬唱的資料，其詩作中往往能反映中越兩國士人間的深厚友誼。最典型的要數阮朝裴文禩與清朝接件使湖北護貢官楊恩壽在湖北期間唱和酬答之作的合集《雉舟酬唱集》。有些書載有賀中國皇帝萬壽與禪位登基的詩文，如馮克寬《梅嶺使華手澤詩集》賀明萬曆帝壽，潘輝益《星槎紀行》賀清乾隆帝壽，阮偍《華程消遣集》賀清乾隆禪位、嘉慶登基，吳時位《枚驛諏餘》、丁翔甫《北行偶筆》賀清嘉慶帝壽，潘輝注《華軺吟錄》、《華程續吟》賀清道光帝壽，等等。越南使臣在中國境內亦以漢文詩歌疊韻唱和，以此爲旅程的主要娛樂活動，如阮（人收）《星軺隨筆》與阮文超《方亭萬里集》均載有阮朝兩批使臣的酬唱之作。所有這些都在文字層面上體現出漢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之深，越南人對於漢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以及越南使臣出使中國的頻繁。此外，某些中國行紀中有越南使臣與在華他國使臣之間詩賦往來的材料。其中馮克寬《使華手澤詩集》最早記載了越南與朝鮮、琉球使臣的漢文交流。其後，此類材料屢屢見諸後世越南使臣筆下，甚至漢文能力成了越南使臣自豪、驕傲，進而誇耀的資本。最明顯的例子是詩文出眾的段濬，其使清途中，「但凡越南使團與清朝官員或其他藩屬國之間有詩文酬答，多由其代爲做詩應和」〔註 51〕。其《海煙詩集》收《次韻柬朝鮮判書徐翰林李》詩四首，前兩首作：

> 箕子賓岡大□東，陟源□□□條通。波澄海□逢槎□，雲集山莊藏路同。復東竊窺鸞彩霈，□跡□隔馬牛□。假教□氣氣相應，試調新弦皎月中。

〔註 51〕王鑫磊所撰《海翁詩集》提要，《全集》第 7 冊，第 49 頁。

徒倚衡茅桂海南，偶陵徵節□征驂。天垣秋淨星辰共，在世喜多雨露譚。自是殊方逢乃會，子無半席挹高談。〔註52〕

其一以「箕子」指稱朝鮮起首，「雲集山莊藏路同」與後半「天垣秋淨星辰共」均表現出兩國地理上相鄰、文化背景與心理上相類的體認。末句「試調新弦皎月中」含蘊深遠，引人深思。其二則以「自是殊方逢乃會，子無半席挹高談」收束全篇。「殊方」強調兩國和而不同，「子無半席挹高談」則化用賈誼之典，稱無可「挹高談」之「半席」，表面上看似爲實寫，實則暗貶對方的文化水平。其二詩末小注稱「朝鮮□詩云：『甚，□甚，好詩，好詩，數日奉和』，竟不見動靜，覆詩催之」〔註53〕，亦可證明作者在朝鮮使臣面前自視甚高。

作爲新近被整理出的域外人中國行紀資料，《集成》在文化上體現出複雜多元的價值。一方面，聯繫《集成》前後各書，可以初步鉤稽越南燕行使臣的世族譜系與家族觀念。據筆者粗檢，《集成》諸書作者有以下血緣聯繫：父武輝珽，子武輝瑨；祖潘輝益，孫潘輝泳；外祖潘輝益，孫阮（人收）；兄阮偍，弟阮攸；兄吳時任，弟吳時位；舅父吳時位，侄潘輝注；兄潘輝湜，弟潘輝注。另據《大南實錄二十・大南正編列傳二集》查得，潘輝湜，子輝泳，從弟輝注。〔註54〕結合二者至少可以推斷，潘氏家族及其親屬在越南燕行使節中堪稱望族，按輩分與血緣親疏排列，這一家族包括第一代潘輝益，第二代潘輝湜、吳時任、吳時位，第三代潘輝湜、潘輝注、阮（人收）與第四代潘輝泳。從最早於1790年使華的潘輝益，到1853至1855年北行的潘輝泳，在越南燕行史上可謂淵源有自，瓜瓞綿綿。另一方面，其中的家族觀念亦值得細究，此舉二例。一是武輝瑨《華原隨步集》中多次提及「家尊」武輝珽，使行途中不僅將其《華程詩》奉作旅行指南，更以此精神支柱支撐西山朝開國，試圖與清朝修好的艱難使命。二是潘輝注《華程續吟》中《寺壁見舅氏舊題肅感》一詩注文提及，潘氏使華途中得見舅父（吳時位）所題舊章，因時過境遷，物是人非，而有感以作。另一方面，綿延數百年的越南中國行紀本身就是內容豐富的形象學（Imagologie）資料。胡士棟《花程遣興》卷末同僚慶賀作者使華的壯行詩與越南皇帝的御賜詩，裴樻《燕行總載》書前的餞

〔註52〕《全集》第7冊，第29頁。

〔註53〕《全集》第7冊，第30頁。

〔註54〕卷十八，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六年（1981）九月版，第211頁（總第7799頁）。

行詩文都包含了越南人未入禹域前對中國的想像。吳時位《枚驛諏餘》批評了清朝太平盛世下隱藏的諸多社會弊病，在實歷中國的同時展現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李文馥《粵行吟草》中有《登洋人博物樓》一詩：

注：西洋人最□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

卻怪心思巧，能令耳目憐。骨枯人挺立，翼斃鳥飛旋。風物重樓上，煙波八月天。紛陳奇崛意，欲問更誰傳？〔註55〕

李氏所遊之地澳門爲中土較早接觸西洋文明的地方，此詩是東亞人士對於「洋人博物樓」的較早記載之一，李氏詠歎人像標本的栩栩如生反映出西洋現代文明的東傳，同時也見證了一種漢文化圈他國人士的認知方式，即通過中國瞭解西方的先進之處。而李文馥所編《仙城侶話》對「寒暑表」即溫度計的記載，范愼遹、阮述《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對火輪機、鐵炮、洋槍、胡椒等新事物的記載，都是上述認知方式發生作用的結果。此外《集成》中亦載有中國人士親見域外人的反應。比如鄭懷德《艮齋觀光集》中《確山夜發》「越軺長往迷紅路，趙女偷窺濕翠鬟」句注曰：「凡使部一路行止於某時日，起程地方官先報前途預整供頓夫站。故雖夜發而居人皆知，簇擁街巷爭看」〔註56〕，清人對於異邦來客充滿了好奇，此種景狀頗類清朝張德彝訪歐、日人岡千仞遊華時歐人與華人爭相觀看的情形。旅行者在觀看「異鄉」的同時，也被「異鄉人」所觀看，裝點著自己所看到的風景，觀看與被看帶來了視域融合，形成了自我與他者的「弔詭關係」。在凝視的過程中，既存在印證期待視野中相似性的認同感，亦伴隨背離心理預期的離異感。

（三）近代越南人中國行紀——以《往津日記》、《建福元年如清日程》為例

1802 年，阮福映（Nguyễn Phúc ánh，1762～1820）統一全越。1804 年清帝遣使冊封其爲國王。1806 年阮福映即位，成爲阮世祖，越南進入近代。此後，越南國力日益昌盛，在接近鴉片戰爭的時候達到頂峰，明命帝甚至採用「懷柔遠人」的政策對待周邊的緬甸、老撾等國與外洋各國，逐漸形成以本國爲中心的小型「華夷秩序」：

〔註55〕《全集》第 13 冊，第 79 頁。
〔註56〕《全集》第 8 冊，第 326 頁。

緬甸附近則卻之，萬象有難則救之，多漢、南掌、火舍、慕愛義來臣，勉之以保境安民。至於樣外諸夷，如英咭唎、富浪沙、於清、暹素所傲視者，亦皆聞風而臣服。〔註 57〕

上文在討論越南中國行紀的價值時曾提到，《集成》所收漢文材料主體是相當於中國清朝時期的燕行實錄。也就是說，從現存文獻來看，越南人中國行紀的撰寫在清朝最爲興盛。這種現象的產生既與越南自身國勢的隆興有關，亦受近代世界時局劇變的影響。進入清朝以後，中越之間的關係因法國入侵越南而發生變化，「致使中國在越南之舊有統治及影響力完全消失」〔註 58〕。阮世祖即位以前，越南處於內亂之中，互相攻殺，而清政府從未干涉過，因而越南「對中國之進貢請封亦未按期舉行，兩國政府間往還亦未加強」〔註 59〕。但晚清以降，法國勢力侵入越南。1862 年法軍乘攻陷天津之餘威，以武力強迫越南簽訂《西貢條約》，佔領南圻三省。1874 年第二次《西貢條約》簽訂，「實際上越南已將主權付與法國」〔註 60〕，法國覬覦北圻之心昭然若揭。越南有識之士尋求兩種途徑以求救亡圖存：「其一廣與國交，其二內附中國請援」〔註 61〕，前者「被法國監視而中止」，越南遂只能向中國請援。〔註 62〕由是，越南對中國遣使、朝貢日益頻繁，中越關係日益密切。在外交上，清政府一方面明言越南自古即爲屬邦，不承認《西貢條約》；另一方面派遣曾紀澤赴法抗議。與此同時，清廷亦著手調兵援越，並鼓勵越王自力圖強。這一階段爲越南及中越關係史上的關鍵節點，除《清史稿》與《大南實錄》等官方史書外，此時期越南赴華使臣所撰中國行紀記錄甚詳，頗具價值。現以《往津日記》及《建福元年如清日程》說明之。

《往津日記》僅存孤本，上世紀四十年代爲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在河內發現並收藏，現有陳荊和編注本。〔註 63〕作

〔註 57〕〔越〕潘叔直輯《國史遺編・明命政要・柔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1965 年版，第 312 頁。轉引自《「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從周邊看中國》，第 82 頁。

〔註 58〕陶鎔《中越關係史略》，陶鎔、陳以令等《中越文化論集》，臺北：「國防研究院」出版部，1968 年 7 月版，第 28 頁。

〔註 59〕《中越關係史略》，《中越文化論集》，第 29 頁。

〔註 60〕劉伯奎《中法越南交涉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 1 月版，第 17 頁。

〔註 61〕《中法越南交涉史》，第 17 頁。

〔註 62〕以上法越間史事，主要參考《中法越南交涉史》。

〔註 63〕《阮述〈往津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版。此本由饒宗頤從

者阮述（Nguyên Thuât，1842～？），字孝生，號荷亭，廣南醴陽人，阮道之子。《大南實錄二十大南正編列傳二集》卷四十二「阮道」條稱其「子述有文名」，戊辰（1868）科乙榜及第，贊其「達分知足」。〔註64〕

1880年阮述第一次使清。《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三載：

> （庚辰嗣德三十三（1880）年六月）遣使如清（歲貢）。吏部右侍郎充辦閣務阮述改授禮部銜，充正使。
>
> 述臨行，帝製詩並遠行歌，御書以賜之。辰又以清匪未靜，乃具邊情疏文，命述遞到廣西，祈爲題請派出營弁防勦。〔註65〕

則1880年6月阮述以歲貢正使身份如清，皇帝餞別賜詩，足見其期望清廷援越以禦外侮之心。途中越皇囑託阮述請求廣西官員出兵剿匪。兩年後阮述還朝，旅途不順，改道回京。《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七載：

> （壬午嗣德三十五年（1882）夏四月）如清使阮述等回，先是，使部回抵涼山，帝以河城未靜，且住歇涼省，察報無礙方可起行，嗣述回至北寧，乃請改道往山，由美德、寧平上路，回清化省，至是抵京。〔註66〕

此次使行爲「阮朝向清朝之最後一次朝貢」〔註67〕。阮述曾撰《每懷吟草》記錄之。〔註68〕嗣德三十六（1883）年十一月阮朝欲「奉遣貢使，爲法官要

戴密微處攜回香港，並撰寫提要，「戴氏爲之譯成法文，並著其事於《遠東學報》（B.E.F.E.O.），題爲《遠東學院研究員饒宗頤先生一九七四年的工作》（*Travaux de M. Jao Tsong-Yi, Memb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Année 74*）」。陳三井《阮述〈往津日記〉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價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第四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1年版，第156頁）關於以此孤本爲中心展開的中法學術因緣，可參龔敏《阮述〈往津日記〉引發的學術因緣——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戴密微、饒宗頤往來書信爲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3期，第43～49頁。

〔註64〕第499頁（總第8087頁）。

〔註65〕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五年（1980）六月版，第247頁（總第7073頁）。

〔註66〕第328頁（總第7154頁）。

〔註67〕《阮述〈往津日記〉·解說》，第7頁。

〔註68〕見收於《全集》第23冊。

我必絕清好，乃不復遣」〔註 69〕。

《往津日記》記錄的是 1883～1884 年阮述的第二次北使。〔註 70〕另一記載此次使行經歷的中國行紀是《建福元年如清日程》，見收於《全集》第 23 冊，文字內容與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往使天津日記》相同。〔註 71〕《往津日記》卷首有葦野老人《阮荷亭先生〈往津日記〉序》，全書敘述始自嗣德三十五年（1883）臘月八日，止於嗣德三十六年（1884）十二月廿九日。《建福元年如清日程》爲「建福元年（1884）二月初日，臣范愼遹臣阮述奏」，屬范、阮二人合撰。此書所錄爲：

> 嗣德三十五年（1883）十二月日，臣等奉往天津公幹，至去年十二月底，公回。所有途間見聞，及公與清官交接往來款贈，並臣等行走居住，各等情，具有日記，謹奉精繕，進呈候奉。

據此可見二書在撰作目的上相異：《往津日記》屬私人著述，較多抒發個人感情；《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則以資御覽，頗類公文，末附「上海圖」、「香港圖」與「天津府城圖」三幅手繪簡圖及「中朝定制」，述及清朝皇上、太后、軍機處、諸臣、官制、兵制、外國諸欽使館、天津糧食、武夷之茶、高麗參、火炮之法、火輪船與朝鮮概況等內容。其中「兵制」與「外國諸欽使館」間抄錄《醒睡錄》所載同治帝時之史事，故稱其爲「今上」〔註 72〕。在敘述時間上，《往津日記》稍早於《建福元年如清日程》，這與阮朝嗣德帝諭旨的變更有關。《往津日記》云：

> 嗣德三十五年臘月八日，欽奉上諭，述以本銜充欽派，帶同黎登貞、阮籍、杜富肅，偕清官唐景崧、馬復賁往香港、廣東公幹，先期至廣南沱汎，俟有輪船搭往。
>
> ……
>
> 初十日，午正啓行。〔註 73〕

〔註 69〕《大南實錄十九·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卷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五年（1980）九月版，第 23 頁（總第 7249 頁）。

〔註 70〕關於史書中對此次使行的陳述，詳參《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三、卷六十八的相關記載，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註 71〕參華蕾《〈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提要》，《全集》第 30 冊，第 173 頁。另外，劉玉珺關於《往使天津日記》、《往津日記》與《建福元年如清日程》的論述有待商榷，《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第 312 頁。

〔註 72〕《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全集》第 23 冊，第 287 頁。

〔註 73〕《阮述〈往津日記〉》，第 19 頁。爲便行文，引文減省官銜及部份小注。

《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曰：

嗣德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欽奉諭准臣范愼遹充爲欽差正使，臣阮述充爲欽差副使，前往天津備問，臣阮（番頁）充爲欽派，前往廣東留住，以便寄遞書信，等因。是日臣范愼遹臣阮（番頁）奉於文明殿拜命。(由臣阮述已於是月初十日，奉准齎遞國書前往廣東呈候。〔註74〕

《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八謂：

（壬午嗣德三十五年十二月）命刑部尚書范愼遹充欽差大臣，侍郎加參知銜阮述副之，往清國天津公幹；辦理户部阮（番頁）充欽派，駐廣東以遞信報。〔註75〕

嗣德帝原以阮述爲欽派，領另三位越使赴香港、廣東偕同清官公幹。然十數天後，嗣德帝更以范愼遹爲欽差正使，阮述副之。原先阮述欽派的任務由阮（番頁）代之。而阮述「臘月八日」奉使廣東直至一事當以《往津日記》所載最詳，《建福元年如清日程》以注釋言及，《大南實錄》中則全無痕跡。只有從《往津日記》與《建福元年如清日程》中方可窺知范、阮二人往津之初並非同途。啓行當天，阮述「回憶三年使路，辛苦備嘗，四牡才歸，重洋又泛，造物何勞人至此？」〔註76〕此行距上次使返僅八月，故阮氏感歎使程之艱辛也屬自然。直到嗣德三十六年癸未（1883）正月初八日阮述方知使命已變：

接在港招商局信報，唐應星自我國回，偕我國刑部尚書范望山、（即愼遹）户部辦理阮珥南（即（番頁））到港。又接二公來書，敘范公奉充欽差正使，而述副之，同往天津，候李伯相備問，並商議決國事。珥南則充爲欽派留粵遞信云。〔註77〕

初十日，廣東善後局整飭逢源書院爲使館，而阮述「以范、阮二公未來，因辭不往」〔註78〕。十三日，阮述移住使館，當晚，范愼遹、阮（番頁）與隨派人員等亦到達。〔註79〕此後，范愼遹、阮述等人偕行往津。

〔註74〕《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全集》第23冊，第178頁。
〔註75〕第348頁（總第7174頁）。
〔註76〕《阮述〈往津日記〉》，第19頁。
〔註77〕《阮述〈往津日記〉》，第25頁。
〔註78〕《阮述〈往津日記〉》，第25頁。
〔註79〕《阮述〈往津日記〉》，第26頁。

此次使行距上次歲貢僅八個月，且不同以往，並非朝貢。嗣德帝改變詔令，主要是應清廷的要求：「尋接李伯相電音，邀我國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詢問並商議法國之事，乃命愼遹等奉國書以行」〔註 80〕，李鴻章要求越方派人，以備資詢。此事在當時尙屬機密，阮述最先從唐景崧處得知：「清官接東督來函，報以接李中堂電音，使唐應星要我國大臣前往天津備問之款密以相告」〔註 81〕。越方此行的目的亦很明確，即以藩屬國身份向宗主國清王朝求援。但此時的清廷國力日衰，早已今非昔比。不僅在西方列強的侵擾下，主權受辱，甚至是曾經的屬國琉球也亡於日本。清廷對周邊藩屬國家的涉外問題頗多留意，如出兵化解朝鮮在「壬午軍亂」中遭受的日軍挑戰，旨在努力維護風雨飄搖的朝貢體系，故出面干預瀕臨亡國的越南。此次法越事件的發生客觀上加強了中越兩國官方之間十分平淡、幾乎斷絕的聯繫。然法方援引前約，否認中越宗藩關係，拒絕中方調停，赴法之曾紀澤亦抗議未果。嗣德三十六年（1883）七月十六日嗣德帝駕崩，建福元（1884）年正月廿九日，范、阮一行無功而返。

從這兩部中國行紀可以看出，往津之前越南使臣對清廷的援助寄以極大期望。但清廷當時確已自顧不暇，在處理屬國問題上處於矛盾之中，而在津期間又逢國君崩殂，越使在哀歎時局不順的同時，難掩對於清朝官員以至清廷的失望。但范、阮一行對自強新政亦較感興趣，「或可反映在外患日亟下之越南當局，頗有師法中國，奮發圖強之意」〔註 82〕。另外，此次使行往返途經香港、廣州、上海、天津、煙臺等地，使臣與當地文士的酬酢往來以及他們眼中中國近代諸城市的眾生相都是頗具價值的。

第二節 「千歲丸」上海行後日本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國行紀概說

如果說朝鮮與越南是「天朝禮治體系」下最爲典型的朝貢國，那麼日本則相對而言更爲特殊。儘管它曾出於某些利益需要，間斷地接受過「冊封—

〔註 80〕《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三，第 348 頁（總第 7174 頁）。

〔註 81〕《阮述〈往津日記〉》，第 20 頁。

〔註 82〕《阮述〈往津日記〉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價值》，《第四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 174 頁。

朝貢」體系的方式，但依然游離於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之外。〔註 83〕近代以前的中日關係也許應該算是「準朝貢關係」〔註 84〕。

中日文化交流發軔於上古時期，中國大陸文化的東傳促進了日本列島從蒙昧走向文明。〔註 85〕公元 57 年，東漢光武帝接受日本朝貢，賜以「漢委奴國王」印綬，標誌著倭國與東漢正式建立「朝貢—冊封」關係，成爲藩屬國。隋唐與宋元時期，中日雖未建立明確的外交關係間，但通過遣使、僧侶與商人的往來，兩國間的交流穩步發展，一度高潮迭起。

「日本的紀行文學又稱旅行記、道之記」，「是日本古典文學的最主要的形式和題材之一」。〔註 86〕日本人中國行紀的大規模撰寫始於隋唐時期赴華的學問僧，以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爲代表，它與《大唐西域記》及《東方見聞錄》並稱爲「東方三大旅行記」〔註 87〕。其後圓珍的《行歷記》及入宋僧成尋的《參天台五台山記》、奝然的《巡禮記》、戒覺的《渡宋記》、道元的《寶慶記》等中國行紀的內容涉及唐宋時期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方方面面。

明朝初期，日本爲了經濟的需要與中國維持朝貢關係，發展堪合貿易。但與此同時，明至清中期出於安全考慮，均實行嚴格的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日本在江戶幕府亦厲行禁海，僅以長崎作爲對外交流的惟一窗口。日本人因而在兩百多年間無緣踏訪禹域，中國行紀的撰寫隨之銷聲匿跡。

二、近代日本人中國行紀——從「千歲丸」見聞錄到《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德川幕府政府被迫開禁，與西方國家簽訂一系列條約，建立起外交與貿易關係。此後來華的日本人逐漸增多，中國行紀的書寫也在一段時間的沈寂之後開始復蘇，拉開了歷史上第二次高潮

〔註 83〕《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序論》，第 3 頁。

〔註 84〕「準朝貢關係」介於「朝貢關係」與「非朝貢關係」之間，詳參《韓中關係史導論之二·中國與韓國》、《朝中朝貢關係概觀——朝中關係史鳥瞰》，載《中韓關係史論集》。

〔註 85〕王曉秋、〔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1 月版，第 60～75 頁。

〔註 86〕劉春英《日本紀行文學的興隆成因及其演變》，《日本學論壇》，1990 年第 1 期，第 42 頁。

〔註 87〕〔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8 月版，第 1 頁。

的序幕。

（一）「千歲丸」見聞錄

在 1854 年開國後，江戶幕府於 1862 年派遣「千歲丸」號輪船駛往上海，這是日本鎖國時代實行禁航政策以來首支赴華的航船。千歲丸於文久二年壬戌（1862）四月二十七日從長崎出發，五月六日到達上海。〔註 88〕在上海停泊兩個月後，千歲丸於七月一日離滬返日，七月十四日抵達長崎。〔註 89〕此次訪滬的人員幾乎均爲男性，「大小官吏及僕從總計五十一名」，另「雇英國人十五名，荷蘭人一名，但英國人中有婦人一名」〔註 90〕。從身份上看，既有除船員、官吏及其僕從外，亦有醫師、翻譯與商人等。〔註 91〕千歲丸「於八年前於英新造，此番以洋銀三萬四千元購之，其大小約爲長二十步，寬三步半」。〔註 92〕1862 年千歲丸上海行是奉君命，〔註 93〕表面上「意在恢復寬永以前之朱印船」〔註 94〕。而其眞實目的旨在推進明治維新，重新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中斷了兩百年的外交關係，發展對中國「主動前往的『出貿易』，或稱『派遣貿易』」〔註 95〕。高杉晉作即明言：

> 蓋此行，幕府欲渡支那爲貿易……官吏皆拙於商法，因使英人及蘭人爲其介，官吏惟觀商法形勢，爲他日之謀而已……其餘英人十四名乘船，皆關運用之事。〔註 96〕

之所以選擇上海，也是基於經濟、社會與地理因素的考慮。上海於 1843 年開埠，不僅是近代西方人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中心，而且也深受西洋社會與

〔註 88〕此據〔日〕峰潔《航海日錄》、《清國上海見聞錄》，見收於《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1 卷。

〔註 89〕此據〔日〕名倉予何人撰，皮細庚譯《海外日錄》（全稱《官船千歲丸海外日錄》），載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國觀察》（以下簡稱「《「千歲丸」上海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10 月版。

〔註 90〕《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5 頁。

〔註 91〕《海外日錄》、《上海雜記》（〔日〕納富介次郎撰，劉柏林譯，載《「千歲丸」上海行》）及《遊清五錄·航海日錄》（〔日〕高杉晉作撰，李雪梅點校、翻譯，載《「千歲丸」上海行》）均載有「千歲丸」上主要人員的詳細名錄。可參馮天瑜對上述三書的整理稿，《「千歲丸」上海行》，第 54～55 頁。

〔註 92〕《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5 頁。

〔註 93〕《遊清日記五錄序》，《「千歲丸」上海行》，第 438 頁。

〔註 94〕《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4 頁。

〔註 95〕《「千歲丸」上海行》，第 46 頁。

〔註 96〕《「千歲丸」上海行》，第 439 頁。

文明的影響，又靠近長崎，航運交通亦方便。幕府想通過上海學習西方強國發展商業的方法，爲今後本國經濟的展開做好相應準備。

但千歲丸上海行在主要想進行的經濟貿易活動方面並不成功，入不敷出，只得在上海僅僅停留兩個月後便匆匆返回。〔註 97〕此行最大的收穫應該是在實地接觸與交流體驗後，日本人對於中國看法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日人所撰中國旅行記上。

關於這次航渡上海，不少日本人記錄了自己在中國的親身體驗與感受，這就誕生了德川幕府海禁以來的首批中國見聞錄。據筆者所知，此番日人所撰中國行紀主要包括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日比野輝寬《贅肬錄》、《沒鼻筆語》，（以上收入《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 卷）峰潔《航海日錄》、《清國上海見聞錄》，松田屋伴吉《唐國渡海日記》，名倉予何人《海外日錄》、《支那見聞錄》，（以上收入《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1 卷）中牟田倉之助《上海行日記》、《上海滯在中雜錄》等，（收入《子爵中牟田倉之助傳》）〔註 98〕與高杉晉作《遊清五錄》（《航海日錄》、《續航海日錄》、《上海淹留日錄》、《內情探索錄》、《外情探索錄》、《崎陽雜錄》，譯文收入《「千歲丸」上海行》）。執筆者均爲從臣藩士，而無官吏。「千歲丸」訪滬遊記都以日文撰成，在形式上主要是日記，亦不乏雜錄及與中國文士筆談的彙編。下文主要以名倉予何人《海外日錄》爲例，著手分析這批中國旅行記觀察的重點。〔註 99〕

由於中日兩國長時間的閉鎖與海禁，日本人已沒有辦法像前人一樣親歷中國，直接瞭解禹域的風土人情與社會萬象。藩士來華前基本只能從書面材料中瞭解中國事物，對中國的印象主要停留在間接的想像層面。因而對於此次中國之行，他們內心充滿了期待：「參與此行者皆有奇異之思，豈非一大快事」〔註 100〕。作爲從臣的藩士不僅無法像八名官員那樣享受住在漂亮船室的待遇，只是住在炎熱窒息的船艙之中〔註 101〕，而且遇到暴風雨時，「風雨愈烈，

〔註 97〕關於此行日人在貿易方面的活動可參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8 月版，第 113 頁。

〔註 98〕《「千歲丸」上海行》，第 58 頁。

〔註 99〕下文引文除注出者外，主要出自《「千歲丸」上海行》一書所附「『千歲丸』乘員上海紀行文選輯」之《海外日錄》。

〔註 100〕《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4 頁。

〔註 101〕〔日〕日比野輝寬撰，劉柏林譯《贅肬錄》（上），《「千歲丸」上海行》，第 329 頁。

船體傾側動搖甚劇，舟中什物旋轉，無不暈船嘔吐」〔註 102〕，旅途極其疲憊。這一系列惡劣的條件依然無法掩飾他們初見禹域時的激動心情和夢幻感覺：「在官船，終日立於船頭，四顧眺望，觸目之處一草一木皆見珍奇，人皆疑爲在夢中」〔註 103〕。

進入上海後，在日人以驚奇的眼光觀察中國的同時，中土士人亦以濃厚的興趣打量著眼前的近鄰。中人尤喜索要日人墨寶，而日人民族身份感強烈，對於以日語交談的中人感到親切，且不願被誤認作琉球人或高麗人。

（五月初八日）捨轎，徘徊於街坊，所到之處，觀者如堵。

（五月十一日）余於館門小立，唐人群集觀余，向余寫字，有人問曰「琉球人歟？」實爲可笑。……內有唐人曾至吾長崎、橫濱等處，見吾輩，以吾邦語問曰：「你何時到來」，甚爲親昵。

（五月十四日）此日余於館門小立，有視余爲高麗人者，余於唐人之掌戲題數字，此人爲之歡喜，不洗其字而歸。

（五月十五日）此日，余徘徊街坊，稍有佇足，則人群聚觀，其炎氣難堪。

此外，日人在上海對前所未見的西洋事物頗多留意，滿是好奇。

（五月十二日）（法蘭西館）館內看法人賣物，皆極爲奇觀。

（六月初十日）巡歷夷場，處處有炮臺。

（六月廿日）昨夜至鄰館（法國之旅館也），看西人之歌舞。一人彈胡弓，有二三人唱。又，舞者皆兩人成對，攜手，但見腳動。

日人亦注意中土的太平天國戰事，一方面根據《上海新報》（五月初九日、十三日、五月十五日）、《粵匪紀略》（六月初五日）與《金陵癸申摭歌》（六月初六日）瞭解，稱呼太平軍爲「賊匪」。另一方面記述親歷太平戰事之影響，包括中國官方與外國使館之防備，中土人士之逃難及土地之荒蕪。

（五月十五日）過英人駐防之所，虜兵戒嚴甚緊，此乃爲征伐長賊之備也。……出至薛家浜，過江邊，見有逃難攜妻子住於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幾千百艘，其愍然豈可堪耶。

（六月初四日）晚步，見黃江之水涯小舟櫛比，大抵係避難之

〔註 102〕《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6 頁。

〔註 103〕《海外日錄》，《「千歲丸」上海行》，第 417 頁。

人。

（六月初九日）或僅有巍然之門，其內皆田塍，實乃亂世之光景，不堪愍然。

雖然日人大體上還能在上海找到中國文化的遺存，但他們對中土的衰頹之感還是無法抑制。

（六月初三日）余觀之（文廟），其結構甚宏麗，大成殿等之匾額猶存（「聖像現移於南門內也」是園之小字頁也），然曬英虜之白衣，各堂之腥風獰氣難堪（但聞文廟乃爲英人之臨時防所，西門內另建駐防之所，待告落成，則轉移之。然其光景實可見支那之衰世、國勢萎靡不振之一端焉。）

在惋歎中土每況愈下的同時，日人也觀察禹域的同時反思本國，對前景充滿信心。

（六月十七日）夫今以支那之弱兵，且以舊來之拙劣之火器，與西虜戰而亦有取勝之時，何況以本朝武勇之兵，採用西虜之猖獗並軍艦之制，此所謂如虎添翼，則西虜之猖獗不足深憂也。

千歲丸訪華給航滬的年輕藩士帶來很大的觸動，這批見聞錄的「主旋律總體上來說是對統治上海的西方列強的警戒感和對那種統治採取容忍態度的中國人的輕蔑」〔註 104〕。他們不僅開始轉變自己的中國觀，而且反躬自省，對本國的現狀有了更爲清醒的認識，特別是高杉晉作等人回日後組建奇兵隊，開展尊王攘夷的倒幕維新運動〔註 105〕。

（二）《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

1862 年千歲丸上海行引發此後踏訪禹域、親歷中國的日本人與日俱增，成爲大規模撰作中國行紀之風的嚆矢。千歲丸後，幕府另有三次派船航渡上海，分別是元治元年（1864）的「健順丸」、慶應元年（1865）的「壬戌丸」以及慶應三年（1867）搭乘英商船「恒河號」前往上海。1868 年，德川幕府徹底垮臺，明治新政府成立。1871 年，明治政府與清王朝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設使館。從此以後，日本不再是對華朝貢的宗屬國，而是取得與中國地位平等的條約國地位，這也爲日本人進入中國提供了

〔註 104〕〔日〕橫山宏章《1862 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長崎派遣船「千歲丸」隨員們的中國觀》，《檔案與史學》，2004 年第 12 期，第 62～63 頁。

〔註 105〕《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 125 頁。

便利。日本的明治時代（1868～1911）與本書定義的晚清在時間上基本相同，這一期間日本人所撰中國旅行記的部份作品見收於《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與《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這些中國行紀主要出自個人之手，作者身份各異，〔註 106〕造訪的地區已從上海擴展至北京、湖南、四川、雲南、臺灣等地，並且從寫作目的上看，大多不同於傳統的遊記，而是頗類考察記。其中，竹添井井《棧雲峽雨日記》是目前日本明治時期三大漢文中國行紀中時間最早的一部，頗具參考價值。

竹添井井（1842～1917），諱光鴻，字漸卿，號井井，肥後天草人，幼名滿，後改名進一郎。〔註 107〕明治八年（1875），隨駐華公使森有禮（1847～1889）到中國，翌年（1876）五月至八月遊歷中國，寫成《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此書最初於明治十二年（1879）三月刊印後，在日本國內甚爲流行，竹添氏也藉此名聲大噪。〔註 108〕

《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是竹添氏中國旅行記的書名，而其初印本〔註 109〕上魚尾則題「棧雲峽雨稿」，下魚尾題「奎文堂藏」。此書共上、中、下三卷，包括《棧雲峽雨日記》（上、下）二卷與《棧雲峽雨詩草》一卷。

從《棧雲峽雨日記》可以看出，此次遊歷中國，竹添氏於明治九年（1876）五月二日從北京啓程，五月六日進入河北境內，五月十五日進入河南境內，五月二十七日到達關中地區，六月九日開始過棧道，六月十七日進入漢中地區，六月二十一日進入四川境內，七月十七日抵達重慶，七月二十九日下三

〔註 106〕據張明傑總結，主要有如下類型：官僚或政治家，學者及記者、編輯，作家或藝術家，教習及留學人員，軍人或所謂大陸浪人，實業家或商人，宗教界人士，儒學者及民間人士。《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總序》，〔日〕岡千仞著，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5 月版，第 5～8 頁。美國學者傅佛果則主要分爲五類：教育者、學者與學生，職業遊記文學家，記者與政治家，商人與軍人，小說家、詩人、批評家與藝術家。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美〕傅佛果《從遊記文學看日本人對中國的再發現：1862～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

〔註 107〕〔日〕竹林貫一編《漢學者傳記集成》，東京：名著刊行會，昭和五十三（1978）年版，第 1376 頁。

〔註 108〕張明傑《關於竹添進一郎及其〈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日〕竹添進一郎《棧雲峽雨日記》，〔日〕股野琢《葦杭遊記》，張明傑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 月版，第 5～6 頁。

〔註 109〕初印本影印見收於《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

峽，八月三日開始從宜昌到上海的旅途，八月二十一日乘船至上海，結束旅行。「是行爲日百十有一日，爲程九千餘里」〔註 110〕，竹添氏的旅行歷時三月，幾乎縱向穿越了整個中國。《棧雲峽雨詩草》的主體部份是竹添氏巴蜀之行的詩作，附錄則包括《乘槎錄》、《滬上游草》及《杭蘇遊草》。然就筆者寓目，明治廿六年（1893）五月再版印行時，下卷卷末諸家識跋後較初印本多出《燕京遊草》，其中包括《遍遊西山，遂宿碧雲寺，是日驟雨，途上熱甚》、《宿碧雲寺》、《燕京中秋對月有感》、《滿庭芳（燕京重陽）》《將遊北山前一夜書感》、《九月十一日出城輕暖如春》、《十二日大風宿南口》、《居庸關》、《十三陵》、《長陵》、《湯山》、《題殷少司農煙波釣廬讀書圖》、《讀廬忠烈公草書歌》等十三首詩作與詞作，天頭亦附諸家批語。則《燕京詩草》應是竹添氏自上海北上後，於九月間遊覽北京時的題詠。馮歲平詳細比較了初版與再版中《棧雲峽雨日記》的文字異同，「說明竹添親自校勘過初版本」〔註 111〕，並論證認爲「《燕京遊草》當爲竹添於明治十三年三月來華交涉『分島改約』之後寫就的」〔註 112〕。

《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上卷卷首有藤實美（三條公）題字（1878）、伊藤博文題辭、李鴻章敘（1878）、俞樾序（1877）及鍾文蒸序（1877）。中卷卷末錄甕江川田剛評（1878）、重野安繹批（1878）、土井有恪批、海南藤野啓（1877）、高心夔記（1877）、楊峴跋（1877）、強汝詢記、李鴻裔記（1877）、吳大廷跋（1877）、齊學裘初跋（1877）、薛福成跋（1878）、曾紀澤跋、井上毅跋（1877）、方德驥跋、海丹勝安芳跋（1878）、中村正直後序（1876）及甕谷岡松辰書後。下卷卷首載護美題詩、副島種臣題詩及中村正直序（1876）。下卷卷末書大槻崇評（1876）、楊峴跋、吳大廷跋、雪門跋、劉瑞芬識、李鴻裔跋（1877）、高心夔識及徐慶銓識（1878）。〔註 113〕此外，通卷天頭亦有重野安繹、俞樾等中日諸家文士的批語。由此可見，《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在中日政界與學界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竹添氏與中日文士均保持著良好的關

〔註 110〕《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第 163 頁。

〔註 111〕馮歲平《明治初期日本學者眼中的中國——關於竹添井井及其〈棧雲峽雨稿〉》，〔日〕竹添井井著，馮歲平點校《棧雲峽雨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 11 月版，第 21 頁。

〔註 112〕《明治初期日本學者眼中的中國——關於竹添井井及其〈棧雲峽雨稿〉》，《棧雲峽雨稿》，第 23 頁。

〔註 113〕張明傑整理本《棧雲峽雨日記》僅著錄李鴻章敘、俞樾序及鍾文蒸序，其餘序跋、批語均未提及。不如此前馮歲平點校之《棧雲峽雨稿》完備。

係。同時從這些序跋與批語頁可以看出此書的價值所在。

> 故其文含咀道味，瑰辭奧義，間見迭出；其詩思騫韻遠，擺脱塵垢，不履近人之藩，豈非以所閲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耶？夫亦其襟抱廓然，異於人人。（李鴻章敍）〔註 114〕

> 乃經世大文章，莫作一部遊記看。（重野安逸批）〔註 115〕

李鴻章與重野安繹，一爲清廷重臣，一爲東瀛大儒，但都分別以序言與批語的形式道出了此書的重要性不止停留在文學上，更多地體現在其中反映的思想上。而竹添氏的《自序》則勾畫出撰寫中國行紀的目的，直陳中土的弊病，提出善意的忠告。

> 方今之時，謀富強之術，蓋莫善焉。〔註 116〕

> 但舉業囿之於上，苛斂困之於下，以致萎靡不振。譬之患寒疾者爲庸醫所誤，荏苒彌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猶未至衰羸，藥之得宜，霍然而起矣。〔註 117〕

這也基本體現了竹添氏的中國觀，他雖然親身感受到中國存在的弊病，但仍充滿信心，期待中土早日復興。

竹添井井是活躍於幕末明治時期的著名外交官與漢學家。他的漢學素養極高，在退出政界後，擔任過大學教授，並曾以《左氏會箋》受到學士院嘉獎，獲得文學博士稱號。同時，他詩文兼善，聲名遠播。清人俞樾《東瀛詩選》錄其詩四十餘首，並稱「此一集中已美不勝收矣」〔註 118〕。今人程千帆、孫望《日本漢詩選評》收其於河南新鄉與漢中樊河所作二詩，孫先生對前詩有「一片亂後景象，更添異國他鄉之感」〔註 119〕的評語，程先生則稱後詩「論史別具手眼，造語亦磊砢英多，佳作也」〔註 120〕，推崇備至。

《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一書文字優美，感情眞摯，其中流露出的是竹

〔註 114〕《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第 23 頁。
〔註 115〕《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第 168 頁。
〔註 116〕《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第 37 頁。
〔註 117〕《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19 卷，第 38 頁。
〔註 118〕俞樾撰，〔日〕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卷三十五，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第 481 頁。
〔註 119〕程千帆、孫望選評《日本漢詩選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77 頁。
〔註 120〕《日本漢詩選評》，第 378 頁。

添氏對曾經魂牽夢縈的文化中國的脈脈溫情。它是近代日本人中國行紀的代表，後世很多日人中國旅行記（如股野琢及其《葦杭遊記》〔註 121〕、內藤湖南《燕山楚水》〔註 122〕等）的撰作均曾受其影響。

第三節　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洋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

一、從西海到中土——西方的中國形象

中西間的交流雖然不及鄰邦那樣源遠流長，但也可稱是歷史悠久。西方的中國形象最早出現於 1250 年前後〔註 123〕，傳教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橋樑，正如同古代僧人在中國與印度、日本等鄰國間推動文化傳播那樣發揮作用。基督教早在唐代即已傳入中國，並在元朝與明清再次掀起高潮。〔註 124〕13 世紀中葉柏朗嘉賓的《柏朗嘉賓蒙古行記》與魯布魯克的《魯布魯克東行記》描述了「契丹」。而明清兩朝耶穌會士入華產生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激烈撞擊，並給中西匯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出現了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西方傳教士相繼來華，同時拯救靈魂的盛況。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在感受異域風情的同時，創作了大量的中國行紀。〔註 125〕而且與以往通常只會英語或本國語言的前人相比，不少明清耶穌會士已熟練掌握漢語，甚至撰寫與編譯了眾多漢語文獻。〔註 126〕與此同時，

〔註 121〕參張明傑《關於股野琢及其〈葦杭遊記〉》，《葦杭遊記》，第 129 頁。

〔註 122〕參〔日〕町田三郎《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一）——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明治的漢學家》，第 50 頁。此文日文版題作《「棧雲峽雨日記」について》，發表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9 年版，第 709～729 頁。

〔註 123〕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前言》（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版，第 2 頁。

〔註 124〕基督教 3 次入華高潮分別發生在 6～9 世紀、13～14 世紀、17～18 世紀，詳參耿昇《從基督宗教的第 3 次入華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國觀的形成》（代序），〔法〕謝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譯《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

〔註 125〕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所撰中國行紀的文獻資料主要保存在〔法〕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編，鄭德第、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全 6 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 年版。

〔註 126〕如《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荷〕杜鼎克（Adrian Dudink）主編，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年 4 月版，

由於耶穌會士本身具備各種突出才能與道德品質，1692 年康熙帝甚至詔令全國，允許他們在華建堂傳教。西方傳教士與中國人的交往更爲密切，「始終力求深入到更內部的中國領土」〔註 127〕。他們在中國行紀中對中國的描寫與分析也更爲充分透徹，「是眾多的記述之中材料最爲翔實的」〔註 128〕。

除了播撒福音的傳教士以外，歷史上亦不乏眾多其他身份的歐洲人，特別是商人、旅行家、探險家等踏足禹域。柏朗嘉賓、魯布魯克東行後不久，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馬可·波羅亦隨叔父沿「絲綢之路」遊訪蒙元。儘管學界仍對歷史上是否確有馬可·波羅其人其事聚訟紛紜，但無法否認《馬可·波羅行記》在親歷中國方面的價值。英國著名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1831～1904）在 1898 年實地考察長江流域與川藏地區，寫下《揚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區》（*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1898），被譽爲「十九世紀末，一本最耀眼，徹底證明中國價值的書」〔註 129〕。此外，隨著中西之間接觸的加強，歐美勢力開始在中國大規模擴張，其他身份的西洋人得以進入中國。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林德賽（Hamilton Hugh Lindsay，1802～1881）的《乘 Lord Amherst 船航渡中國北部港口的報告》（*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1834）、英國醫生芮尼（David Field Rennie）的《北京與北京人》（*Peking and the Pekingese*，1861）、蘇格蘭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的《中國與中國人的形象》（*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3～1874）、美國工程師柏生士（Parsons William Barclay，1859～1932）的《一個美國人工程師在中國》（*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 1900）、法國海軍上校綠蒂（Pierre Loti，1850～1923）的《在北京最後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0～1901）、奧地利作家何熙—渥特格（Ernst Von Hesse-Wartegg，1851～1918）

全 12 冊 98 種）與《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比〕鐘鳴旦、〔荷〕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臺北：方濟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版，全 5 冊 37 種）兩套叢書所收均爲西方天主教傳教士的漢文著述。

〔註 127〕〔法〕米麗耶·戴特麗著，唐睿譯《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國之歐洲」的演進》，樂黛雲、〔法〕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第 28 輯，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 7 月版，第 265 頁。

〔註 128〕《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國之歐洲」的演進》，第 265 頁。

〔註 129〕〔英〕伊莉莎白·伯德著，卓廉士、黃剛譯《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前言》，武漢：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版，第 5 頁。

的《在東亞的數日》（*Öst-Asien I Vara Dagar*, 1904）、英國路透社駐滿洲里特約通訊員布魯克（Lord Brooke）的《親見滿洲里》（*An Eye-Witness in Manchuria*, 1905）、英國畫家利德爾（Thomas Hodgson Liddell，1860～1925）的《帝國麗影》（*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 1910）、法國外交官昂古夫龍（Louis G. Angouvlant）的《亞洲地帶：印度支那——中國、滿洲里——朝鮮與跨西伯利亞》（*Étapes Asiatiques, Indochine-Chine, Mandchourie-corée, Transsibérien*, 1930）等分別從公司職員、醫生、攝影師、工程師、軍官、作家、記者、畫家、外交官等的不同角度描述對於中國的見聞感受，他們也成了 19 世紀以後西方中國行紀撰寫者中的新興力量。

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一直以世界之正統自居，但外國對中國的看法卻迥然相異，且處於不斷變化之中。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就曾以「變色龍」形容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看法的變幻不定。〔註 130〕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歷了從文化類同到文化利用的歷史過程，〔註 131〕「西方觀察家通常不是將中國視爲『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註 132〕「神秘」成了眾多西方人有關中國的刻板印象（cliché/stéréotype）。法國學者艾田蒲（Rene Etiemble）在以《從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爲題總結其《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註 133〕，這也恰當地概括了歐洲人中國行紀中哲學思想的發展趨勢。中國學者周寧則認爲 1450 年前後「是中西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註 134〕，1750 年前後是西方的中國形象一個「分界點」〔註 135〕，分別以「大陸的可汗」、「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對應 1250～1450、1450～1650、1650～1750 三個時段不斷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註 136〕

〔註 130〕見〔英〕雷蒙・道森著，常紹民、明毅譯《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7 月版。

〔註 131〕〔美〕史景遷講演，廖世奇、彭小樵譯：《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5 月版。

〔註 132〕〔美〕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版，第 iii 頁。

〔註 133〕〔法〕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下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0 月版，第 382 頁。

〔註 134〕周寧《風起東西洋・前言》，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年 7 月版，第 3 頁。

〔註 135〕周寧《世界之中國：域外中國形象研究・前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第 6 頁。

〔註 136〕周寧《「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叢書總序》，周寧著、編注《契丹傳奇》，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5 月版，第 16 頁。

西洋人根據親身體驗寫成的中國行紀爲在爲歐洲文學注入新的發展動力與借鑒資源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之間改變著西洋人的中國觀。19 世紀大量中國行紀在西方出版，這證明當時西洋人對中國的態度並非「漠不關心」，而是充滿好奇，而這種好奇心正是有賴於眾多遊華的歐美人而得以滿足。〔註 137〕

二、近代西洋人中國行紀——從《中國總論》到《在北京最後的日子》

「19 世紀是歐洲人到中國旅行的重要世紀」，〔註 138〕中國成了西方人擴張領土與勢力範圍的目的地。進入中國的西洋人日漸增多，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將中國的大門徹底轟開以後，來華歐美人在數量上的變化甚爲明顯。與此同時，西方中國行紀亦層出不窮，並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19 世紀以前，其作者幾乎均爲西方白人男性，而此後的同類作品則發出了其他種族與性別的聲音。比如 19 世紀中期哥倫比亞人唐可·阿爾梅洛的《穿過鴉片的硝煙》（*Viaje de Nueva Granada a China y de China a francia*）、英國阿奇博爾德·立德夫人（Bewicke, Alicia Helen Neva，1845～1926）的《我的北京花園》（*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1900～1902）與法國「奇女子」亞歷山塔麗雅·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薩漫記》（*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1927），等等。上節也提到，19 世紀中國行紀作者在身份上較以往更爲豐富。這些種族、性別與身份上的多元性也使西方中國行紀具備令東方人所撰中國行紀無法媲美的特色。

從目前保存的文獻上看，近代西洋人的中國行紀在鴉片戰爭後大量湧現，以《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資料叢書》（200 冊）爲例，1840 年以後有關中國的資料明顯增多，其中又以西方人所撰中國行紀最爲豐富。語言以英語爲主，也有法語、德語、荷蘭語、西班牙語及瑞典語等。而在作者國籍方面，則主要爲英國（大不列顛，包括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士）、美國、法國與德國（普魯士）。除韓國出版的《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資料叢書》以外，據筆者寓目，中國學界的相關成果（《「親歷中國」叢書》（10 冊）、《「西方的中國形象」譯叢》（10 冊）、《「走近中國」文化譯叢》、《「西方人看中國」文化遊記叢書》（11 冊）、《「中國研究」外文舊籍彙刊·中國記錄·第一輯》（10 冊），等

〔註 137〕《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國之歐洲」的演進》，第 266 頁。
〔註 138〕《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國之歐洲」的演進》，第 263 頁。

等）收錄的西洋人中國行紀均成書於 19 世紀以後，其中大部份作品主要是反映 1840 年之後的中國。下文將從衛三畏《中國總論》、丁韙良《花甲憶記》與綠蒂《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等書入手對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西洋人中國行紀的特點略作分析。

（一）衛三畏《中國總論》

衛三畏（Wells Samuel Williams，1812～1884）是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之一，其《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是美國漢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全書共 23 章，詳細描述了中國社會生活與歷史的各個方面，不只是一部簡單的遊記，而是融入了作者對中國相關問題的思考。

該書初版於 1847 年，並於 1883 年修訂再版，可見作者認眞的寫作態度。再版時並未收入初版的序言，〔註 139〕但根據《初版序》到《修訂版序》變化可以考察時代風氣以及作者對於中國看法的變化。在《初版序》中，作者認爲有必要在德庇時爵士《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1836）出版 10 年之後，再寫一本綜述中國的書。

> 即使我國公眾都讀過，而人們對中國的興趣仍不減，甚至更加濃厚，現在的中國人比當年更容易接近；經過一場引人注目的爭衡，迫使中國不得不打開長久關閉的大門，其中原因和後果究竟如何，這是人們樂於瞭解的。〔註 140〕

35 年後對初版進行修訂時，作者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材料，認爲中國雖然在社會習慣與政治原則上保持穩定，但在政治與思想方面的發生了劇變。

> 在新的政權下，中央政府對各省統治者的權力急劇增長，在這幾年中對各省施加比過去更嚴的控制。再者，帝國建立了對外關係，在妥善理解的基礎上派出外交使節。……逐漸改造社會面貌的影響力正在起著強大的作用。〔註 141〕

可以看出，衛三畏寫作《中國總論》原本意在向西方人呈現鴉片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滿足他們對於瞭解遙遠東方的好奇心，並「要爲中國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經常地加予他們的那些奇特的、幾乎無可名狀的可笑印象」

〔註 139〕見〔美〕衛三畏著，陳俱譯《中國總論》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註 140〕《中國總論・初版序》，第 3 頁。

〔註 141〕《中國總論・修訂版序》上冊，第 1 頁。

〔註 142〕。再版時，衛三畏加入了自己對於時局的獨特見解，力圖論證與展示作品在資料眞實度上的權威性與學術研究上的專業性，從而突破此書作爲一般意義上遊記的價值定位。他在提供豐富的新信息的同時，表現出一種深具洞察力的觀察觸角，並對中國生活的種種面貌懷有一種普遍的關懷。

衛三畏心目中理想的中國人來自廣東：

> 近 30 年來，成千上萬的廣東人移居海外，在外國人看來這個省成了中國的代表；還要指出的是，他們適應性強，有進取心，節儉，有航海習慣，成了整體的範例。〔註 143〕

而他在概括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時也常常以廣東人爲例，比如：

> 「番鬼」一詞，廣州人對所有外國人一律這樣稱呼，表明了普遍的看法，歲月漸添，也增添了所表達的蔑視和敵視，不但在廣州，而且遍及全國，因此在認識外國人之前就懷有惡意。〔註 144〕

「番鬼」也就是「洋鬼子」的意思，中國人以此稱呼西洋人，或是西洋人以此稱呼自己的例子在 19 世紀中後期的西方中國行紀中屢見不鮮：

> 就在回到南京後不久，我受到了中國人的一次突然襲擊，激動的人群朝我投石子，用竹竿追打我，幸而我騎的馬跑得快，才擺脫了追打，沒有受傷。過去了很長時間，激動的人群發出的吼叫聲「打死洋鬼子」、「打死他這個外國佬」還一直在我的耳邊迴響。〔註 145〕

> 他們想看這個「洋鬼子」奇怪的頭髮，看他穿的衣服，看他捋那極不平常的小鬍子，看他用從未見過的玻璃杯喝不認識的東西——「啤酒」。〔註 146〕

> 或是認爲一個洋鬼子不值得引起他們的注意。〔註 147〕

> 我們經過其中一個被眾多小河道分割開來的城市，河道上架著各式各樣的橋樑，第一個看見我們的孩子喊了一聲洋鬼子，並且跑

〔註 142〕《中國總論・初版序》上冊，第 1 頁。

〔註 143〕《中國總論・修訂版序》上冊，第 2 頁。

〔註 144〕《中國總論》下冊，第 911 頁。

〔註 145〕〔德〕駱博凱著，鄭壽康譯《十九世紀末南京風情錄——一個德國人在南京的親身經歷》，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 年 7 月版，第 6 頁。

〔註 146〕《十九世紀末南京風情錄——一個德國人在南京的親身經歷》，第 242 頁。

〔註 147〕〔法〕奧古斯特・博爾熱著，錢林森、張群、劉陽譯《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9 月版，第 14 頁。

著跟在我們後面；應著這一警報似的喊叫，男人們和孩子們紛紛出現在與河流垂直的每條街道的出口，然後又跑到一大片房子後面，在下面一條街道上再次出現。〔註 148〕

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強烈的好奇神情，他們都想看看路過的洋鬼子。〔註 149〕

兩百年前中國作者所寫《魔毯》:「在明朝的時候，紅番船來到了我們南方的一個港口。番鬼們要求得到貿易的准許……後者劍拔弩張，佔領了整個城市。」〔註 150〕

當我們上岸時，有一大堆人圍著我們喊:「番鬼，番鬼！殺頭，殺頭！」〔註 151〕

他（麥嘉締）曾經給一位因白內障而失明的人做手術，那人重見光明的時候歡呼道:「我從沒有想到外國人會長得像這樣！」這顯然是指麥嘉締醫生。他失明已經七年了，總是聽見人們談論「紅毛」或者「鬼子」。〔註 152〕

甚至有些西洋人的中國行紀徑以「番鬼」命名，比如法國人老尼克的《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註 153〕與美國人亨特的《廣州「番鬼」錄》〔註 154〕等書。「番鬼」或「洋鬼子」都是中國人對於西洋人的刻板印象，從形象學上看就是「套話」，「是形象的一個最小單位，它濃縮了一定時間內一個民族對異國的『總的看法』」〔註 155〕。

衛三畏在華生活 40 餘年（1832～1876），曾主編《中國叢報》（*Chinese*

〔註 148〕《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第 25 頁。

〔註 149〕《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第 44 頁。

〔註 150〕〔美〕丁韙良著，沈弘、惲文捷、郝田虎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 月版，第 5 頁。

〔註 151〕《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7 頁。

〔註 152〕《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141 頁。

〔註 153〕〔法〕老尼克著，奧古斯特·波爾傑插畫，錢林森、蔡宏宇譯《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5 月版。

〔註 154〕〔美〕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註 155〕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翻譯、研究札記》，《比較文學形象學》，第 12 頁。另可參孟華《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與《中國文學中一個套話化了的西方人形象》二文，載氏著《中法文學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6 月版。

Repository），並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代辦，回國後被耶魯大學聘爲該校首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也是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這種經歷是很多其他西方中國行紀作者無法企及的。因而，《中國總論》不同於普通遊記類似觀光指南那樣浮光掠影式的介紹，在內容與哲思上顯得更爲深入。其英文名爲 *The Middle Kingdom*，從字面上看，是中間帝國的意思。但衛三畏如此命名的原因並不只是對「中國」二字的簡單翻譯，更主要地，這也代表了他的中國觀：「中國人介於文明與野蠻之間——中國在現存的制度和文學方面，是最文明的異教國家」〔註 156〕。

（二）丁韙良《花甲憶記》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曾被清政府聘爲北京同文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在華生活近 60 年，1916 年去世後葬於北京。曾譯惠頓（Henry Wheaton，1785～1848）《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等書，岡千仞以其爲「洋人在中土譯西籍者」〔註 157〕第一。此外，丁氏亦撰有《漢學菁華》（*The Lore of Cathy*）〔註 158〕、《中國覺醒》〔註 159〕等漢學論著。

丁韙良將 20 世紀以前自己在華生活的經歷寫成自傳性作品《花甲憶記》。此書初版於 1896 年，1897 年、1900 年二版、三版，內容基本相同，再版與出版內容相同，只是多出了再版序言。作者撰寫此書，「並非意在做一個歷史年表，而是描寫我所見到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社會政治生活」〔註 160〕。此書英文名爲 *A Cycle of Cathy*，即「中國一個甲子年」的意思。在新版序中，作者解釋了「甲子年」的含義：

> 中國達到完全開放，與西方平等交往，經歷了五場戰爭，歷時六十多年」，並且斷言中國在 20 世紀前期就會崛起。〔註 161〕

〔註 156〕《中國總論·初版序》上冊，第 3 頁。

〔註 15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1 頁。

〔註 158〕〔美〕丁韙良著，沈弘等譯《漢學菁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 9 月版。

〔註 159〕〔美〕丁韙良著，沈弘譯《中國覺醒》，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9 月版。

〔註 160〕《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序》，第 1 頁。

〔註 161〕《花甲之終結（新版序）》，《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327 頁。

在《花甲憶記》中，丁韙良透露了許多中國正史中並未記載的珍貴史料。比如，清廷嚴禁教授洋人文言文，因此西方人都是在私下裏偷偷學習漢語，條件極爲惡劣，甚至環境恐怖。

> 第一位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所聘請的漢文教授身上總是帶著毒藥，以便在清朝官員以重罪之名懲治他時用於自盡。這種恐怖氣氛後來稍微得到緩解。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博士所請的漢文教師來去時手裏總是拿著一隻舊鞋，隨時準備在緊急關頭裝扮成一個修鞋匠。〔註 162〕

又如，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也有受到中國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觀念的影響。

> 只有義憤跟利益結合起來，才能最終促使英國採取行動。
>
> 但是當欽差大臣林則徐像對待藩屬那樣對英國女王發號施令，並且採用令人無法接受的暴力手段來對待英國臣民時，這個問題（筆者自注：走私鴉片）就另當別論了。〔註 163〕

作爲傳教士，丁韙良在對待鴉片問題上的態度有著基督教悲天憫人觀念的影子。他痛心於鴉片的毒害，同時希望中國能夠向近鄰日本學習，控制鴉片的蔓延。

> 假如英國得到適當的賠償後，在條約中加入一個禁止鴉片的條款，中國無疑將能躲過一場可怕的浩劫。英國的鴉片政策和它反奴隸制的法令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註 164〕
>
> 假如顧盛先生（《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者）當時在條約中明令禁止可惡的鴉片走私，並且促使法國也這麼做，那將會在倫理道德上起到很好的效果。〔註 165〕
>
> 抽鴉片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詛咒。我並不想證明抽鴉片是否比西方人的酗酒更壞。但這兩種惡習所造成後果的對比是非常鮮明的。……雖然買鴉片的費用合計起來數目驚人，但跟吸鴉片後肯定會隨之而來的壽命和精力的喪失簡直不能夠同日而語。〔註 166〕

〔註 162〕《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5 頁。
〔註 163〕《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6 頁。
〔註 164〕《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6 頁。
〔註 165〕《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7 頁。
〔註 166〕《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53 頁。

我見過許多聰明伶俐的學者因吸食鴉片而喪命。……起初煙槍只是被視爲一種能給人帶來快活，或激發情慾的方式和工具，到了後期，它便成了解除痛苦的手段。

「鴉片之毒甚巨。吃旱煙則一手多空，吃水煙則兩手皆忙。至吃鴉片而全身皆囚也，廢時失業，敗壞身家，而昏迷不醒。」

假使清朝的官員們能夠精誠合作，協同一致，那麼在鴉片進口合法化以後，他們本來是可以抑制這種罪孽的，但他們從未採取過任何聯合行動來保護公眾的利益。現在再要禁止鴉片則爲時已晚。〔註 167〕

發人深省的是，日本嚴格禁止鴉片在國內使用，因爲它眼前有中國這麼一個活生生的教訓。〔註 168〕

但同時他從自己作爲西方人的立場出發，對於地處東方的日本有著調侃式的論調。

我恭賀他（伊藤博文）說：「日本對中國的影響超出任何西方國家，恰似與遙遠的太陽相比，月亮會掀起更高的浪潮。」侯爵聽了大悅，其實這句讚揚暗諷日本借了西方的光。〔註 169〕

《花甲憶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丁韙良經常將與中國與中國人看作是有待開化的、見錢眼開的與野蠻勢利的對象，他按照這樣的價值定位批判中國的船民、盆景、佛教、斗牛，等等。

那些船民總是半裸著身體——他們看上去就如食人生番一般野蠻和兇狠。〔註 170〕

傳教士包爾醫生因翻船掉進了河裏……但那些貪婪的船民沒有一個願意救他，直到他們逼他答應支付二十美元的報酬。究竟這是出於敵意還是貪婪，我想還是留給讀者去判斷吧。〔註 171〕

一排排被扭曲成鳥獸形狀的常綠植物使我們首次見識了中國特

〔註 167〕《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54 頁。

〔註 168〕《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55 頁。

〔註 169〕《花甲之終結（新版序）》，《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325 頁。

〔註 170〕《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7 頁。

〔註 171〕《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7～8 頁。

有的一種陋習。〔註 172〕

但很難期望以此爲戒律的和尚能在智力上達到很高的水平。一般來說，和尚們面無表情，目光呆滯。他們大多數都是文盲，背誦經文是他們惟一的職責。佛教已經不再做任何事來使中國社會變得強盛或振興；相反，它就像青藤般依附著一座搖搖欲墜的高塔，從腐朽的塔身上汲取自身所需的營養。〔註 173〕

不消說在這個慈善目標背後的動機就是賭博的刺激性，因爲中國人是不顧一切的賭徒。他們迫使各種好鬥的動物來爲他們爭鬥，而自己就可以藉此賭博。〔註 174〕

以西方文明爲標杆，通過中西對比，作者進一步強調中國的落後。

其（科舉）主要特徵值得讚賞，但它也需要（注：而且將來也必定會）用西方思想加以接種，以便使它能適應現代生活已經改變了的狀況。〔註 175〕

美國的考試題目專業性很強，而中國科舉考試的缺點就在於缺乏專門的適應性。〔註 176〕

我注意到那些人頭上都長著骯髒的短發，跟我們在香港所見閃亮的光頭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它（纏足）的殘暴性超過了西方任何一種變態趣味，包括對蜂腰和扁頭的嗜好。西方的惡習只是偶發性的，或僅限於某一部落，而纏足在中國卻是全民性的。〔註 177〕

因而，他認爲西方有必要再次入侵以促進中國的開化與發展：「他們現在似乎需要另一次教訓。」〔註 178〕

「《花甲憶記》忠實記述了作者在華長期生活過程中的各種經歷和親身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的外部生活。」〔註 179〕丁韙良在其中表現出的中國觀不同於

〔註 172〕《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11～12 頁。
〔註 173〕《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18 頁。
〔註 174〕《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61 頁。
〔註 175〕《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20 頁。
〔註 176〕《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21 頁。
〔註 177〕《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8 頁。
〔註 178〕《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 8 頁。
〔註 179〕《漢學菁華·前言》，第 1 頁。

同胞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中的看法。儘管他不時以宗教的精神關懷著筆下的中國，抱之以同情心，提出自己對於鴉片在中國蔓延問題的見解與解決對策。但更主要地，或者根本地，他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將中國視作文明世界的對立面，而只有西方才能推動中國走向文明。同時，丁韙良在總體上還是希望見到中國的復興。他判斷中國在新世紀前期就會崛起，而這種預言後來被證明是基本符合歷史走向的。

（三）綠蒂《在北京最後的日子》

皮埃爾·綠蒂原名朱利安·韋奧（Julien Viaud，1850～1923），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曾作爲海軍軍官周遊列國，長達 40 餘年。著有《阿姬亞黛》（*Aziyadé*，1879）等小說和《吳哥的進香者》（1911）等遊記。〔註 180〕

1900 年與 1911 年綠蒂兩次以海軍上校身份應召入侵北京，以日記的形式記錄這段經歷，寫下《在北京最後的日子》。書中體現著他「作爲『文人』和『武夫』的雙重情感」〔註 181〕，爲中西方讀者塑造了一個獨特的中國形象。

綠蒂從作家的眼光出發，將中國視作異國情調的源泉，體現出對於東方文明的好奇與親和。

> 此時，早晨的太陽已經灼熱起來，遠山的頂峰呈現美麗的紫色，陽光普照，像我們的普羅旺斯地區。〔註 182〕
>
> 我們要經過一條兩邊種著枝葉纖弱的樺樹和柳樹的沙路去往那裡。秋天染黃了那裡的花園和果園，這個情形如同在我們國家的一樣。此外，還有一些完全與我們的果園相似的園子。〔註 183〕
>
> 有些畫卷美妙絕倫——我們發現了歐洲人想像不出的中國藝術，這種藝術至少堪與我們的藝術相媲美，儘管它們根本不同。〔註 184〕
>
> 皇太子陪著我們。他騎著一匹像卷毛狗樣毛髮散亂的蒙古小馬；他那紅綢長袍和天鵝絨的鞋子與我們比較古板的軍裝和蓋滿灰

〔註 180〕錢林森《中譯本序》，〔法〕皮埃爾·綠蒂著，馬利紅譯《在北京最後的日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9 月版，第 1～2 頁。

〔註 181〕錢林森《中譯本序》，《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4 頁。

〔註 182〕《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9 頁。

〔註 183〕《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0 頁。

〔註 184〕《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97 頁。

塵的靴子形成鮮明對照。〔註 185〕

> 當風漸漸平息，迷眼的灰塵落定時，就好像法國北部的原野，到處是麥田，榆樹和柳樹叢。我們忘記了自己深（筆者疑當作「身」）處中國腹地，在地球的另一邊。〔註 186〕

綠蒂此前並未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瞭解，頂多也只停留在從文字材料的介紹上。但他用本國讀者熟悉的環境類比陌生的中國，使筆下的異鄉似乎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親切感。他甚至把中國當成了理想中的烏托邦。

> 與此相比，我們歐洲城市的鳥瞰圖呈現的卻是一個多麼蠻荒的醜態——一堵堵醜陋的山牆，粗糙的瓦片；煙囪林立的肮髒的屋頂，此外還有縱橫交錯的黑壓壓的恐怖的電線網！在中國，人們肯定是過份不注重修築道路。相反，凡是高舉入空的建築——那些不停飛行的保護神的場所——卻是無可挑剔的。今天，這座空蕩蕩、死氣沉沉的帝王們的巨大巢穴，在傍晚的這個時分，爲我一人展示著它那琉璃瓦頂的異乎尋常的美態。〔註 187〕

> 沒有一座西方的都會有這樣的設計，規劃得如此恢宏且齊整；尤其是沒有這樣的主導思想——極力渲染儀仗的華美，烘托帝王駕臨的威儀。〔註 188〕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名軍人，不由自主地從軍官的角度審視中國，將中國與中國人看作文明世界的對立面，異樣的眼光中流露出輕蔑與冷漠。

> 給我們搖船的中國人全都穿著襤褸的衣衫，髒兮兮，呆頭呆腦且非常冷面。〔註 189〕

> 最後，還到遣使會教士那裡招募了一個中國人負責其茶倒水——就是少年杜，十四歲，長著貓樣的面孔和一條及地的長辮。〔註 190〕

> 爲我們帶路的這個人是一個多麼奇怪的造物！她踮著那雙令人難以置信的小腳一路踉踉蹌蹌地走著。她的頭髮是灰色的，別著長

〔註 185〕《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88～189 頁。
〔註 186〕《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90 頁。
〔註 187〕《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33～134 頁。
〔註 188〕《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36 頁。
〔註 189〕《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30 頁。
〔註 190〕《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23 頁。

長的簪子，鬢角的頭髮緊緊地攏向腦後的髮髻，以致眼睛都弔起來了。〔註 191〕

他們年紀輕輕，卻沒有一點年輕人的面貌；無可救藥的老態寫在臉上，還伴著一種我說不清的神秘的遲鈍；他們的眼神彷彿來自最遙遠的年代。〔註 192〕

我不知道人們用了怎樣神秘的培育法，竟能使這些魚生出像昨天的長龍一樣凸出的巨大而嚇人的眼鏡。中國人折磨女人的腳；給樹木整形，使得它們保持矮小、虯曲的樣子；讓水果看上去像動物，而讓動物長成他們夢幻中的離奇怪物。〔註 193〕

在中國停留一段時間後，綠蒂開始習慣用「黃」指代中國或與之相關的事物。如稱皇城北京爲「黃城」〔註 194〕、皇太子爲「黃太子」〔註 195〕，形容皇太后的特使是個「黃臉」〔註 196〕，並將沙塵暴比作「黃風」〔註 197〕。如果與 1898 年希爾（Matthew Phipps Shiel, 1865～1947）小說《黃禍》（*The Yellow Peril*）的發表聯繫起來，這一字眼的使用應該帶有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話語色彩。

因此，綠蒂不得不以複雜、矛盾的心態對待自己曾經魂牽夢縈而現在又必須入侵的地方，文字中總是帶著些許憂鬱的情緒。

沒有一點雲翳的天空顯得格外憂傷，而且乍看上去，那憂傷像是從我們即將長期加盟的那個集合中擴散出去的……〔註 198〕

下船的士兵赤腳站在海灘上，用各種語言愉悅地相互打著招呼，好像在嬉戲。這就是今天他們所謂的「和平佔領」，好像是世界性的大融合。然而，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在天津和北京的另一邊卻是一片廢墟，屍骸遍野。〔註 199〕

那鄉野曾是恬靜的，幸福的，而這兩天以來，隨著歐洲侵略者

〔註 191〕《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24 頁。
〔註 192〕《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06 頁。
〔註 193〕《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92～193 頁。
〔註 194〕《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33 頁。
〔註 195〕《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220 頁。
〔註 196〕《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220 頁。
〔註 197〕《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211 頁。
〔註 198〕《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6 頁。
〔註 199〕《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0 頁。

的靠近，人們驚慌逃散，已經空無一人了。

瞧！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的一幕！〔註200〕

這空曠的國度，人在異域，在夜幕慢慢圍攏時，會有一種切膚的悲涼襲上心頭。〔註201〕

我們這些褻瀆者踏上這條「御道」，我們的皮製鞋底摩擦著巨龍背上那精緻的白色鱗甲。〔註202〕

綠蒂常用「巴比倫」譬喻當時的北京城，意在展現其死氣成成與毫無生息：他將八國聯軍佔領下的中國比作「聞所未聞的巴比倫塔」〔註203〕，描述長城「有著巴比倫的外貌」〔註204〕，稱皇城「外圍首先是巴比倫式的黑色城牆」。他對於曾經「恬靜的，幸福的」鄉野如今「空無一人」而感到「心碎」，而眼前的這一切正是以他爲代表的「歐洲侵略者」一手造成的，他對自己的行爲有「一種褻瀆的感覺」〔註205〕。

綠蒂的矛盾心理還體現在對待鴉片的態度上，儘管他在書中大聲疾呼應該禁煙，但他的言行並不一致，他不僅吸食鴉片以排遣作戰期間的無聊與寂寞，進入醉生夢死的逍遙狀態，而且還寫到日記中，表明這麼做是出於文學創作的需要。

叫副官拿來鴉片，這種東西有助於我們有點困倦和麻木的想像，不幸的是我們的這種想像已經開始。

不用說，這是一種極品的鴉片。小小的煙圈快速旋轉上升，立即使得整個房間的空氣香氣逼人，沉重起來，並一步步引我們進入到中國式的消魂、忘懷、快慰，莫測和青春時代。〔註206〕

鴉片的煙霧使得我們很晚仍不能寐，那是一種既清醒又混沌的狀態。我們從不曾像今晚這般理解中國的藝術，眞的，今晚如頓悟了一般。〔註207〕

〔註200〕《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11頁。
〔註201〕《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36頁。
〔註202〕《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63頁。
〔註203〕《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26頁。
〔註204〕《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48頁。
〔註205〕《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86頁。
〔註206〕《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118頁。
〔註207〕《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119頁。

而在描述同爲侵略者，同時也是中國人鄰居的日本兵時，綠蒂略帶嘲諷的論調，頗耐人尋味。

> 小日本並們穿著嶄新的歐式軍服，那整齊的儀表令人格外吃驚。〔註 208〕
>
> 這些日本兵總是笑眯眯的，尤其是對我們法國人。〔註 209〕
>
> 我並不想說別人壞話，但這些勇武的小個子兵們（日本兵）眞像從前的野蠻部隊一樣到處燒殺搶掠。〔註 210〕

綠蒂在中國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無法對中國進行細緻深入的觀察，因而《在北京最後的日子》裏很多表述與思考僅僅停留在問題的表層。但綠蒂的經歷代表了許多十九世紀中後期來華的西洋人，他們遊訪前對中國所知甚少，而且在華期間只是短暫停留，匆匆一瞥，沒有條件進一步接觸。這些人在中國行紀中表現出的觀感最爲直接，是異鄉人對於中國的寄託，又存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強烈批判。

〔註 208〕《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9 頁。
〔註 209〕《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13 頁。
〔註 210〕《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第 39 頁。

第二章　岡千仞與《觀光紀游》

1884 年，東瀛文士岡千仞應王韜之邀，以在野宿儒的身份踏訪禹域。1885 年因爲染病而被迫東歸。此行「爲日三百五十日，所經殆八九千里」〔註 1〕，北極燕京，南達香港，縱貫了整個中國。而且當時的晚清政局動盪，岡氏就曾直接或間接地遭遇朝鮮甲申事變與中法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岡氏一直有逐日記事的習慣，他將途中的見聞感受訴諸文字，並在歸國後的第二年以《觀光紀游》爲題結集出版。此書發行後立刻受到當時眾多中日文士的追捧，風靡一時。岡千仞在書中從儒者的眼光出發，直陳時弊，暢論己見，見地深刻。《觀光紀游》不僅保留了見證晚清時事的直接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對中國近代，特別是民國期間知識分子的思想轉型起到了一定作用，思想價值亦頗爲突出。

第一節　岡千仞生平與學術考論

岡千仞生活在幕末明治時期，是當時日本社會的名人。他在 1884 年遊訪中國，並與兩百餘位中外士人有過交往。但大約一百三十年後，即便在日本，知道他名字的人也已經不多。〔註 2〕孟子嘗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知人論世」方能「以意逆志」，它們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最爲基本的方法。〔註 3〕研究《觀光紀游》，對作者岡千仞必須

〔註 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4 頁。

〔註 2〕《江幡武與王勤謨的書信來往》，王勤謨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齋》，寧波：寧波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版，第 115 頁。

〔註 3〕詳參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5 月版。

有所瞭解，但目前學界對於岡氏只有較爲零星的介紹，因而筆者擬在本節綜合前人研究成果，較爲系統地考論岡千仞的學術與生平。

一、岡千仞之生平

岡千仞，幼名慶輔，七歲在養賢堂改名啓輔。「成長（約十五歲）後，自名棣，字子文。遊學（二十歲）後，改名修，字天爵。」〔註4〕「維新以後，廢通稱」，〔註5〕據西晉左思《詠史》詩之「振衣千仞岡」改字振衣，名千仞。因居所靠近鹿門山，故以「鹿門精舍」命名其居，改號鹿門。〔註6〕另據今東京祐天寺《鹿門岡千仞墓》之碑文，岡氏改號鹿門是由於萬延元年（1860）遊訪京阪之際，遵從大槻盤溪的指示，紀念早逝的叔父岡清治。〔註7〕筆者以爲，「鹿門」之號取漢末龐德公、唐人孟浩然之事，表明岡氏歸隱之意。

天保四年癸巳（1833）十一月二日，岡千仞生於仙臺下級藩士之家。父名藏治，時四十一歲；母姓佐藤，時三十四歲，岡千仞爲二人第五子。岡氏八世祖爲福島縣縣尹岡村，五代至七代世役書記。〔註8〕少時喜好讀書，被稱作讀書家。七歲進入藩校養賢堂，學習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等。當時藩校之風爲諳記《四書集注》，但他卻因有另一種看法而沒有諳記。岡千仞認爲能諳誦經文已經很不容易了，況且還有長篇注文需要記憶，那就顯得更加困難。如果能在記住經文的同時亦能理解大義，那就很好了，連《集注》都諳記的方法不太明智。因此他一參加考試就落第，連續三次考試，連續三次落第，爲眾人所嘲笑，差點沒有卒業。然而石澤遠臣老師卻很欣賞岡氏之才，私下裏褒揚其對於諳記《集注》做法的另解，並且認爲在藩校中做學問很困難，鼓勵他去江戶。因爲是大槻盤溪的弟子，所以岡千仞造訪他的住處，表示希望去江戶昌平黌學習。大槻盤溪向昌平黌教官安積艮齋推薦，岡氏獲批入學。

〔註4〕〔日〕岡千仞《在臆話語》，轉引自〔日〕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岡廣，昭和五十年（1975）12月版，第10頁。

〔註5〕岡千仞《禺於日錄・緒言》，《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四年（1881）版。轉引自《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168頁。

〔註6〕《漢學者傳記集成》，第1342頁。

〔註7〕轉引自《鹿門岡千仞の生涯》，第12頁。

〔註8〕《鹿門岡千仞の生涯》，第7頁。

《觀光紀游》1884 年 11 月 2 日云：「余弱冠時，遊昌平黌，實爲嘉永壬子。」〔註 9〕嘉永五年（1852），二十歲的岡千仞前往江戶，進入昌平黌學習，師從安積艮齋與古賀茶溪，尤爲羽倉簡堂所喜愛。剛入學時，岡氏沒有其他朋友，只有仙臺藩的森文之助始終幫助他。就連結髮入浴這種瑣事，岡千仞都是在森氏指導下完成的，但森氏並不以爲麻煩，因爲他們是同鄉同藩之人，彼此格外親切。在黌中，岡千仞與重野成齋、水本樹堂、南摩羽峰、中村敬宇、秋月韋軒、松本奎堂、高橋古溪、原五軒、松林飯山等互相磨勵，交往密切。他與奎堂、飯山還被並稱作「三才子」。其中，重野年紀最長，對岡氏提攜亦最多，教授其文章寫作之法。岡氏的每篇文章，重野都至少修改兩次，如此持續兩、三年後，岡氏終於學會撰寫文章。岡千仞曾向重野請教，寫文章應該使用怎樣的風格。重野答道：「沉著痛快之文最好」。因此，岡氏每時每刻都在考慮如何努力實現這一標準。模仿此類風格時，重野是讀歐、蘇之文，岡千仞則是讀陳龍川之文。龍川曾言「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註 10〕，雖然美艦來到浦賀引起騷動，但是同志者卻稱其不知風痺痛癢。因此，重野所謂「沉著痛快之文」應該就是讀龍川之文。當時大家都有此類閱讀喜好：松本奎堂喜讀魏冰叔，隄靜齋喜讀壯悔堂。松本飯山曾勸誡岡千仞道：「你讀陳龍川之文雖可寫出沉著痛快之文，但卻有流入疏宕之風的危險，所以這樣是不行的，稍微讀下壯悔堂或許更好。」〔註 11〕在昌平黌求學期間，重野、水本及岡氏三人曾共遊房總地方。當時各人均撰有紀行文，岡千仞之文以《禺於日錄》爲題出版。他與重野及水本親如兄弟，與水本的關係尤其親密。尊攘之論紛然而興之際，昌平書生議論尤盛，這應該是岡氏後來倡導尊王攘夷論的誘因之一。

岡千仞曾擔任昌平黌舍長，長達七、八年之久。後來很長時間徒起不平之氣，如「幕府許米國入下田、函館二港通例」〔註 12〕之際：

〔註 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8 頁。

〔註 10〕陳亮《又甲辰秋書》，〔宋〕陳亮《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12 月版，第 280 頁。

〔註 11〕《館森袖海翁談岡鹿門先生（附松本奎堂、松林飯山）》，〔日〕三浦叶《明治の碩學》，東京：汲古書院，平成十五年（2003）版，第 226 頁。此文原刊於《東洋文化》第 159 號，昭和十三年（1938）第 1 期，第 226 頁。

〔註 12〕《尊攘紀事》卷一，東京：甘泉堂、博聞社、鳳文館，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版，第 12 頁 a。

> 余在昌平黌，與同窗諸友連署上書，大意謂祖宗法度不可不遵，外夷陸梁不可不懲。幕府世職徵夷，三百列藩，八萬麾下，固備外夷之侵寇也。彼係軍艦要開港，跡既不恭，事固無名，以全國敵愾之公憤漏之一二，軍艦固未爲無算也。〔註13〕

安政六年（1859），岡千仞退學還鄉，途經江戶時，曾拜訪齋藤拙堂、廣瀨旭莊、家裏松疇、藤本鐵石等人。其後，與昌平黌時代的密友松本奎堂、松林飯山在大阪開設雙松岡塾，以育成後進。

此後，岡千仞進入京都。在大阪判斷天下形勢時，斷言日本將處於輦轂之下。枝吉平左衛門（號神陽，佐賀人，副島蒼海伯之兄）來訪，岡千仞以此人與某公卿交好而發表自己的尊攘意見，望爲公卿所採，並詢問其時世論。不久，高杉晉作來訪，與岡氏一道游說公卿，以致公卿也對尊攘論產生興趣。薩長二藩率領侯兵入朝，岡千仞懷揣意見書進京請詣，謁見諸公。他與薩長人士夜夜登樓相聚，共倡尊攘大義，侃侃而談，熱烈議論。

與此同時，仙臺藩官員聽聞岡千仞年少輕狂，喜好議論，擔心波及藩方，而嚴命其返回仙臺。回鄉後，岡千仞售賣書畫器玩，以其資築廬鹿門山下，名曰「藏名山房」，意在歸隱著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岡氏亦建「草私史亭」塾舍，由飯山書牌額，其名表示記錄逸聞之義，今日猶存殘跡。

仙臺藩分爲佐幕與勤王兩派。勤王家多以假面示人，佐幕黨勢力強大，便以佐幕派自居；勤王派抬頭，則自稱勤王家。昨日與今日之論自相牴牾。有人批判白石奧羽六藩聯盟以抵抗官軍，岡千仞擊節歎賞，贊其眞率，而投身執政家之列。

明治改元，王政復古令下，敕召諸侯。仙臺藩爲首之東北諸藩成立反明治政權之奧羽越列藩同盟。〔註14〕岡千仞上書，申論尊王大義：

> 聖上親政，將一變國體，廢幕府，復朝威隆赫之舊，天下誰不仰其盛事？而我公觀望時勢，依倚不前。謂天下何？《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今我公辱徵命，遷延亙三月。在平日猶不可，況今賊臣犯闕，輦下蹀血？天下洶洶，此臣子急於赴命效命之時。

〔註13〕《尊攘紀事》卷一，第14頁a。

〔註14〕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十二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頁。

我公擁百萬提封，位居三百諸侯之上，與加薩諸大藩，繫天下安危，三百餘年矣。而今如此，將何以答天下之望，盡藩屏之責乎？〔註15〕

上文出自《請藩公奉敕入朝書》，岡氏主張藩邦顧全大局，效命主上，攘除外夷，共鑲盛事。朝廷以九條澤醍醐諸公爲鎮撫使，由參政三好清房護送，諸公令討會津。岡千仞與同志五十餘人會於藩祖廟，計劃先據白河城。天皇允之，命岡氏視察羽越諸藩之情勢，岡氏從此堅定勤王論信念。岡千仞於會津米澤對佐幕派稱，天下形勢晦暗，定會出現勤王。在仙臺，勤王論者以阪本大炊、後藤孫兵衛、三好監物等爲翹楚，但三人先後卒於戰事。岡千仞亦因主張尊王攘夷之勤王論不爲本藩所採而被投入獄。

愈御一新平定天下後，岡千仞被赦出獄，移居東京。岡氏被舉爲公子侍讀兼參機務，開設麟經堂，講授《春秋》、《左傳》，明之以名分大義。明治二年（1869）八月，任新設東京府立中學教員。明治四年（1871），因該校廢止而被免職。翌年（1872），出仕文部省十一等，於編修僚編纂教科書。同年爲太政官錄用，於正院內歷史課從事國史編纂。明治八年（1875），歷史課改名修史局，明治十年（1877）一月更迭爲太政官修史館，因政府機關調整，岡氏再度被免。然不久文部省創設之東京書籍館改由東京府管理，岡千仞於明治十二年（1879）四月九日接替二橋元長就任東京府書籍館幹事（即東京圖書館館長）。〔註16〕其時，岡氏除撰著《尊攘紀事補遺》外，亦交結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等其他在日本華人，並受邀踏訪禹域。

明治十三年（1880）七月，東京府書籍館重歸文部省管轄，岡千仞「乃移病辭職」〔註17〕，「其實作爲深層原因與他對藩閥政治不滿大有關係」〔註18〕。此後岡千仞不再擔任公職，潛心教書育人、雲遊四方。於愛宕下仙臺屋敷開設私塾綏猷堂，教授生徒前後三千餘人，知名者包括原敬、片山潛、尾崎紅葉、北村秀谷、館森鴻、吳秀三、小越平陸等人。

大正二年（1913），岡千仞辭世，享年 82 歲，葬於東京目黑祐天寺，戒

〔註15〕〔日〕岡本黄石等著《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築摩山房，昭和五十八年（1983）八月版，第 263 頁。此材料由大阪大學文學院合山林太郎老師提供，謹致謝忱。

〔註16〕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 2 版，第 154 頁。

〔註17〕岡千仞《北游詩草》卷一，《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版，第 1 頁 b-2 頁 a。

〔註18〕《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 頁。

名松岩譽千仞居士。楊守敬爲仙臺榴岡《鹿門岡先生碑銘》題寫「晚歲猶存鐵石心」七字。〔註 19〕此後館森鴻協助出版《藏名山房文初集》三冊六卷。〔註 20〕

二、岡千仞之學術

竹林貫一評價岡千仞爲人「志氣雄爽恢闊，治身謹嚴」〔註 21〕，這與岡氏信奉程朱理學密不可分。他的身份首先是儒學者與漢學家，學問除以經史爲主外，亦觸類旁通，著述頗豐。同時，他也在收藏書籍方面頗多用力，就連遊訪中國時仍不忘購書攜回。從著述與藏書可以略窺岡千仞學術之一斑，筆者將從此兩方面分別論述之。

（一）岡千仞之著述

岡千仞一生筆耕不輟，據張明傑調查，僅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徵購文庫」收藏其「著述（含未刊）就多達五十種，二百九十八冊」〔註 22〕。經筆者搜集，現所寓目之岡氏主要著述（包括譯介），除《觀光紀游》等中國行紀資料外，共 13 種 27 冊 72 卷，下文擬以提要形式介紹各書。凡一書有多版者，取其相對完備者論之，未經寓目者則不涉及。此外，岡氏亦曾對他書進行過訓點、序跋與校閱，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1.《米利堅志》二冊四卷（1875 年以後）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W335-9。全名《格堅勃斯原本米利堅志》，宮城縣仙臺岡千仞、河野通之同撰，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二冊四卷，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二，第二冊爲卷三至卷四。扉頁云「明治六年（1873）十

〔註 19〕《鹿門岡千仞の生涯》，第 195 頁注 17。

〔註 20〕以上對岡千仞生平的敍述，主要譯自《館森袖海翁談岡鹿門先生（附松本奎堂、松林飯山）》，《明治の碩學》，第 224～235 頁。此文原刊於《東洋文化》第 159 號，昭和十三年（1938）第 1 期。同時亦參考〔日〕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日〕竹林貫一《漢學者傳記集成》、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版）、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張明傑《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日〕杉村邦彥《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書道文化》2007 年第 3 期，第 15～37 頁）、《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東京：岩波書店，1983 年 10 月版）等。

〔註 21〕《漢學者傳記集成》，第 1342 頁。

〔註 22〕《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 頁。

二月光啓社、博聞社刊行」。卷首有明治七年（1874）二月甕江川田剛，明治六年（1873）臘月上澣敬宇中村正直，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1874）孟冬中華天文算學掌教李善蘭所撰《美利堅志序》，卷末有海南藤野《美利堅志跋》。其中，李善蘭序後附錄岡千仞誌，落款爲明治八年乙亥（1875）三月。則此書最早在 1875 年後方才印行。卷內目錄題作《翻譯米利堅志》，版心題作「米利堅志」，下魚尾題作「光啓社刊行」，鈐「立憲民政黨政務調查館昭和 11・11・29 購入」印，則此書於昭和十一年（1936）十一月二十九日購入。另鈐「東京府圖書館藏書印」，東京府圖書館爲國立國會圖書館前身之一，岡千仞曾任該館幹事，即館長。

《米利堅志》原爲美國人 George Payn Quackenbos（1826～1881）所著〔註23〕，主要介紹 1492 年至 1860 年 368 年間的美國歷史。據明治四年辛未（1871）十二月岡千仞所撰《例言》，河野通之精通洋文，此書的翻譯源於其備課時所譯。通之每一譯出，即付岡氏潤色，「反覆塗抹」，至於完成。河野首譯此書，因美國爲日本「通交海外」之「嚆矢」。二人原計劃再譯英、法等國史。翻譯中，通之因 Quackenbos 所著過略而參取以《瀛環志略》、《聯邦志略》、《萬國公法》、《格物入門》等書。岡千仞提出翻譯應通曉明暢，斥責洋學者譯述不堪卒讀的弊端：

> 譯述洋籍，務照原書，則其文鬱嗇晦澀，或至不可解。是書先得其大意，而後下筆。原書前敘者，或舉之後，詳敘者特提其略，專要使讀者易了其全域。譯述之體，固宜如此。……近時洋學者，專事譯述，刊行書不知數。而一書前後數篇，零丁破碎，漫無體裁。是書雖僅僅四卷，自米國草昧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治亂大略，歷歷無遺。此所以與近時譯書異其撰也。

〔註23〕李慶稱「他還和河野通之合譯了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的《美利堅志》。而慕維廉則是王韜的朋友。這中間的關連是不難推知的。王韜稱其譯作『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殆是有所增補。」（《日本漢學史》第1部《起源和確立》，第 257 頁）此觀點有待商榷。張斯桂《法蘭西志序》稱「英人慕維廉譯《英吉利志》」。檢王韜原文，《扶桑遊記》云：「鹿門會〔曾〕著《米志》、《法志》，於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諸掌。近又譯《英志》，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據日本東京「報知社」印本（明治十二年出版上卷，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整理，長沙：嶽麓書社，1985 年 3 月版，第 412 頁）則張氏、王氏均言慕維廉所譯當爲《英吉利志》，而非《米利堅志》。

川田甕江於序中贊岡千仞「好學能文，所見超流俗」，稱「善讀斯書，則能知米之所以爲米，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中村正直與藤野海南亦分別在序跋中闡述此書在介紹西方民主政體上對於日本的借鑒意義。李善蘭之序則強調「天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稱美、中皆有非常之人，日本「一以西國爲法，蓋亦非常之人也」，以爲「譯此書者亦別有微意乎」。岡千仞對李序最爲留意，不僅於天頭注曰：「按譯者『微意』一句，不知何所指，將質之」。而且其李序後附加誌語，大意謂此書刻成後曾託赴華大臣寄於駐華公使柳原，「請諸名流評閱」，柳原轉交丁韙良，丁氏囑其友李善蘭作序。岡氏自豪之前溢於言表：「區區陋著猶辱支那名流賞鑒，不特陋著之榮，抑亦東亞藝文日盛之兆」。

岡千仞於卷四「布堪南爲大統領」條末有「論曰」諸語，作爲全書結語。旨在以儒家傳統的孔孟之道揭示美國由富民強邦、文明開化的崛起之路，讚歎華盛頓的功績，「孟子頌舜德曰『立賢無方』，如頓（華盛頓）其殆亦孟子所謂無方者也歟？」

筆者寓目之其他版本如下：

A.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特 31-628，和裝，全二冊四卷。扉頁印「明治六年（1873）十二月光啓社刊行」，下魚尾與上本同。卷內鈐「東京府圖書館藏書印」、「文部省圖書印」，卷首無李善蘭序。

B.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9-04765。與上本同版，和裝，全二冊四卷。昭和十二年（1937）十月五日購求。卷內鈐「長崎藏書」、「早稻田大學圖書」印，卷首有李善蘭序，但李序後岡千仞誌之落款未標時間。

C.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9-05028。與 A 同版，和裝，全二冊四卷。昭和二十七年（1952）三月十二日入藏。卷內鈐「存誠堂記」、「早稻田大學圖書」印，卷首無李善蘭序。

2. 《法蘭西志》二冊六卷（1878 年）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9 04693。封面署「猶裏氏原稿《法蘭西志》，高橋二郎抄譯」，扉頁云「明治十一年（1878）五月刻成，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猶裏氏原稿〈法蘭西志〉》，露月樓上梓」。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二冊六卷，洋紙，有蟲損。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三，第二冊爲卷四至卷六。卷內版心題作「法蘭西志」，正文前署「千葉縣高橋二郎譯述，宮城縣岡千仞刪定，鹿兒島縣重野安繹、愛媛縣藤野正啓批評」。卷內

鈐「二階堂氏藏書」、「早稻田大學圖書」印。卷首有大清光緒四年歲次丙寅（1878）八月四明張斯桂《法蘭西志序》，光緒四年戊寅（1878）孟秋大清出使隨員正五品陝西候補直隸州知州姚江沈文熒梅史敘，省軒龜谷行所撰、半嶺中根聞所書序及日本明治十年歲次丁丑（1877）冬至前一日南總來里高橋二郎《附言》，卷末載明治十年（1877）八月木原節夫《法蘭西志後序》。

《法蘭西志》譯自法國史學家 Victor Jean Duruy（1811～1894）的論著。譯書分六卷，卷一爲「美魯萬的氏紀，自紀元前四百八十一年至紀元七百五十二年」，卷二爲「甲盧萬的氏紀，自七百五十二年至九百八十七年」，卷三爲「前加頒的氏紀，自九百八十七年至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卷四爲「後加頒的氏紀，自一千三百二十八年至一千五百九十年」，卷五爲「布羅本氏紀（附共和），自一千五百九十年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卷六爲「勃那巴氏紀（附共和），自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

據張序可知，此書爲東亞國家首次對法國國史的譯述，「拿破崙」之名或亦爲其首次提出。張氏亦以爲法國「君明臣良，代有其人」，評價此書敘述、描寫「杼軸從心，褒貶得體」，「讀之令人眉飛色舞」。沈敘稱譯者「岡君振衣，東國之良史；高橋氏，夙學法語，通大義」，對於原著「補其不備，正其謬誤」，強調「內而帷幄之臣，外而玉帛之使」，「通曉其情，洞識其勢」方能「安社稷」，「爲強國」。 龜谷序則言此書突出那翁（拿破崙）之功績，但也對以眾多法律維持的法國文明表示懷疑。高橋《附言》交待此書譯自 Duruy 的《法國史要》（*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es jusqu'à Nos Jours*）、《近古史略》（*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s, depuis 1453 jusqu'à 1789*）與《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三書，並「提其大要」，由岡千仞刪定而成。此外，「書中論贊，繫於鹿門氏筆」，又由於高橋氏「適病廢筆硯」，岡千仞取其底本，「參考諸家譯書」，補充勃拿巴氏之傳記。稿成後，又請重野、藤野等人撰寫評語。高橋亦稱西洋史篇在「兼記民間事情」上優於東洋史書。木原後序謂此書「欲警勵人之意可謂勤矣」。卷內天頭錄有重野安繹、藤野正啓、野口之布等人批語。

此書涵蓋公元前 481 年「克魯味王建法蘭西國」至 1852 年「侖（拿破崙）三世即帝位」共 2333 年間的法國歷史，規模、篇製均較前譯《米利堅志》更爲宏大。每篇文末由岡千仞撰寫的論贊可以印證、補充《米利堅志》其對待西洋史學的態度與思想觀點。岡氏於卷六末篇「侖終於聖尼勒那島」條末「論

曰」部份總結拿破崙一生，與「禹之行水」相比較，得出「古來英雄用兵立木功於天下者，必用諸於不得已者也」的結論，並以此解釋拿破崙征伐全歐之必然性，條分縷析，層次分明，使讀者頗爲信服。同時又以「秦並六國」、「晉並三國」說明拿破崙之敗「皆由用兵不得其道」。最後稱日本豐太閤與拿破崙「異其成敗者，無他，其經營四方，先智略，而後用兵也」。這也是岡千仞協助譯述此書的用意所在，與其尊攘之意相關，以區別於通行洋學者。天頭批語中引述其語可佐證之：

> 天爵草是篇，以稿本示余，疑引豐公頗不倫。天爵笑曰：「我苦心點出豐公，以結是篇，亦尊內賤外之意，不然何異尋常洋學者流？譯洋書者，亦可以知用心細密也。」

對於《法蘭西志》，岡千仞尤爲得意，於其所著，特標此書，引以爲傲，意在揭露法國之野心，警示主政者：

> 弟著漫然無足觀，唯法史首下筆。……異日生事東洋者必法也。……五強國中首譯法史，將使是責者所警也。〔註 24〕

岡氏編寫《法蘭西志》極爲用心，頗費苦功。書成之後，「爲之設小宴」〔註 25〕，請求沈文熒等人賜序以「生光」〔註 26〕。在與黃遵憲筆談時稱：

> 於此書刻苦，殆一夜髮白者。爲岡本氏《萬國》一樣之看，抹殺多少苦心者，有眼者必知之。〔註 27〕

黃氏亦「曾語紫詮以翻刻」，並盛讚岡氏所著「文筆雄深，若吾國有翻刻本，必當不脛而走」〔註 28〕。而此書對晚清西學研究影響頗深，特別是王韜聽從黃遵憲建議後編撰《法國志略》時便以其爲主要來源，列爲「其間改析原書者六卷」之首。〔註 29〕

其他版本：

〔註 24〕《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6 月版，第 502 頁。

〔註 25〕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34 頁。

〔註 26〕《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4 頁。

〔註 27〕《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9 頁。

〔註 28〕《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9 頁。

〔註 29〕王韜《法國圖說序》，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6 月版，第 123 頁。

A.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9-01446。與上本同版，和裝，洋紙，全二冊六卷，明治三十年（1897）二月十二日內田銀藏寄贈。卷內鈐「田村訥藏書印」、「內田氏所藏圖書之記」、「早稻田大學圖書」印。卷首無張斯桂序，卷內天頭有本書收藏者朱色眉批，或爲內田銀藏所撰，亦不可知。

3. 《東旋詩紀》一冊不分卷（1880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2-132。仙臺岡千仞振衣撰，岡氏門人福島縣管野彌吉、宮城縣安原逸平同校，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一冊不分卷。扉頁云「明治十三年（1880）秋七月刊成」。卷內版心題作「東旋詩紀」，下魚尾題作「藏名山房雜著」，鈐「東京圖書館藏書之印」、「帝國圖書館藏」印，東京圖書館、帝國圖書館均爲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前身。卷首有光緒六年庚辰（1880）夏月浙東桼園王治本序與明治庚辰（1880）七月岡千仞《緒言》，卷末附明治己卯（1879）冬日社弟小山朝弘跋。則此書當成於 1880 年。

書名「東旋詩紀」四字爲岡氏請友人楊守敬所題。楊守敬，字惺悟，號鄰蘇，清末民初著名書法家與藏書家。光緒五年（1879）受清朝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赴日，後與黎庶昌合作刊印《古逸叢書》。光緒十年（1884）與岡千仞同船返回中國，並曾爲之導遊。

王治本，字維能，號桼園，又作漆園，別號夢蝶道人，浙江慈谿人。〔註 30〕光緒三年（1877）作爲清朝首屆駐日公使館隨員赴日，岡千仞在東京任職期間，二人多有筆談交流。〔註 31〕岡氏亦曾爲王氏《新潟新繁昌記》（1888）作序。此書王序稱《東旋紀遊》「其音彌艾，其志良苦」，並贊鹿門其人「意其豪雄，學大博洽」。小山朝弘跋則謂此書「洵一部好詩史」。

卷內天頭錄有日人木原元禮、向山榮、青山延壽、堤正勝與小野湖山等人詩評。而清人沈文熒、黃遵憲批語則以雙行小字形式入於正文。

岡氏《緒言》明言其「平生不作詩」，撰寫此書意在存史，書成後曾爲沈文熒、黃遵憲、龜谷省軒等人所閱。

〔註 30〕關於王治本之生平及其赴日活動，可參《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七章第三節《漫步覽勝蓬萊島》，第 230～239 頁）、王寶平《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文獻》，2009 年 10 月第 4 期，第 173～184 頁）等。

〔註 31〕可參鄭海麟《清季名流學士遺墨》（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十一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2～304 頁）、《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等相關內容。

《東旋詩紀》所收爲岡千仞己卯（1879）十月廿日至十一月十七日自東京「航海東旋」之詩。當時東京「疫疾大行」，故舉家東遊。而「途中遭兵亂，百年城郭，蕩爲丘墟」，岡氏「不覺慨然，乃擬杜甫《北征》，作長短若干首以紀遊」。然其詩作不僅與杜詩迥異，而且文學價值不高，屢屢出現「攜帶全家上汽車」(《十月廿日，發東京投横濱》)之類寡無詩味之語，有「史」無「詩」。客觀言之，此書史學價值更高。

4. 《北游詩草》一冊二卷（1881 年）

日本北海道大學北方資料室藏，請求記號：別 895.1-Oka。仙臺岡千仞振衣撰，岡氏門人福島縣依田盛庸、鹿兒島縣森友諒同校。收入《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草私史亭出版。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一冊二卷。卷內鈐「北海道帝國大學圖書印」、「北海道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1883・5・6」印，則此書於 1883 年 5 月 6 日入館。卷首有明治辛巳（1881）春分日下東作所題書名，明治辛巳（1881）猶清和月近江中村鼎五（士訓，1832～1897）敘，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薩摩小牧昌業序及明治辛巳（1881）六月岡氏《緒言》，卷末附明治辛巳（1881）穀雨節蒲生重章子闇氏於青天白日樓南軒下所撰跋。

卷內天頭有日人蒲生重章、野口之布、龜谷省軒、鈴木大亮、木原元禮、小牧昌業、肝付兼武、大須賀履與中人黃遵憲、黃錫銓、王治本等所撰批語，亦有岡氏自注、自評。

此書爲岡氏遊覽北海道時所撰詩作之彙編。中村氏與岡氏「同官於史館」，二人亦同時去職。其敘贊此書「鬱勃雄奇」，「使讀者如親遊其地」。哀歎岡氏其人「無所用於當世」，故「窮探僻遠要塞之地，以文詩，泄其所鬱積」，「其所作，拔出時流也」。並且透露岡氏「將航海遊漢土」，期待其新作。小牧氏之序贊「其詩豪放奇恣，驚心駭目。蓋其胸中所蓄積，觸所遇事物而發，自然成聲」。岡氏《緒言》謂「是遊日課一詩」，「歸京後，請諸友評正」。據卷一詩前導言，知己卯（1879）夏日，鈴木書記邀遊北海道，庚辰（1880）八月八日岡氏與其侄文二乘坐玄武艦往遊。

5. 《尊攘紀事》四冊八卷（1882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2-48。宮城縣岡千仞振衣撰，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東京甘泉堂、博聞社、鳳文館出版，定價金一圓二十五錢。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四冊八卷，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二，第二冊爲卷三

至卷四，第三冊爲卷五至卷六，第四冊爲卷七至卷八。卷內版心題作「尊攘紀事」，鈐「東京圖書館藏書之印」、「帝國圖書館藏」印。卷首有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下浣重野安繹士德甫、明治壬午（1882）六月三等編修官藤野啓所撰序文及明治壬午（1882）一月岡氏《自敘》與明治辛巳（1881）十二月岡氏《緒言》。卷末附明治壬午（1882）四月念（廿）日下野森保定跋。

岡氏早年著力於尊王攘夷之事，此書爲闡述其勤王思想之最重要文獻。重野《尊攘紀事敘》稱「今之夷非昔之狄」，以當時大勢爲「尊王之實舉，而攘夷之名廢」。藤野啓《尊攘紀事序》則贊此書「敘述詳確，文辭雄快」，盡悉「勤王諸士百折不撓」以成「復古偉業」之事。森保定跋謂此書爲岡氏郵寄送閱，稱其「擬《紀事本末》、《保建大記》等」，「可供人臣勸誡」，與《米》、《法》二志「異撰同工」，且「縱橫如意，優過二志」。岡氏《自敘》現實其史學觀念爲「天地間，本有自然之大勢，循環于寊寊之間」，他熱心時事，「出平生所手錄」，「以抒所見」。岡氏《緒言》則謂此書輯錄刪削「米艦來航以來事」，爲「在史館時私編」，附以泛論，後曾參補原仲寧之《督府紀略》。

卷內天頭錄有日人重野成齋、內藤恥叟、水原節夫、河野通之、野口之布、川路當時能叟、森保定、佐田白茅、藤野正啓、蒲生、昌谷千里、安達清風、川島梅坪、川鳩、星海、井地知等人批語與作者自注、自評。此外，部份篇章亦有本書收藏者眉批，然其身份待考。

在全書記錄之具體時限上，重野安繹序稱「癸丑至丁卯十又五年」，森保定跋則謂「自嘉永米使航渡，至慶應將軍還政，凡二十年」。《緒言》稱共收共四十篇，然據目錄計之，凡三十五篇。全書應始於嘉永六年（1853）六月之《米國軍艦入浦賀》，止於慶應丁卯（1867）正月之《幕府奉還政權》，凡十五年。從內容上看，此書主要涉及日本幕末時期朝廷與諸藩攘擊美、俄、荷、英等國之事。岡千仞此書仿紀事本末體，各篇分爲兩段，前段敘述史實，記錄時事；後段則抒以己見，頗具春秋筆法，岡氏之史學思想亦集中體現於此。現以首篇《米國軍艦入浦賀》爲例說明之。是篇之中，岡千仞首敘嘉永六年（1853）美國海軍提督彼理率艦隊進入浦賀，要求日本開港之事及此後日方所做回應。作者圍繞美艦入浦賀這一中心事件，按時間順序編寫史實，有利於完整反映該事件的全過程。岡氏於次段對此事件加以評論，首先稱「歐米人接踵我邦，始於此」，明確此事件的歷史定位。其次結合自己在浦賀的見聞感受，以爲「我邦孤立東海，竟不免此患」。最後揭示美艦入浦賀與其後「天

下大亂」之間的歷史聯繫，痛斥幕府用人不善，「自壞萬里長城」，導致其速亡的結局。敘、論之間哀歎水戶前中納言遭遇之不公。岡氏之論不僅感情充沛，而且邏輯清晰，重野成齋更是評作「淋漓痛快，論得當日情形宛然在目」。

筆者寓目之其他版本如下：

A.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5-00432。與上本同版，和裝，全四冊八卷，扉頁印「東京龍雲堂」，卷內鈐「同攻會之印章」，天頭無本書收藏者眉批。

B.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5-00698。與上本同版，和裝，殘三冊（第一至第三冊）六卷（卷一至卷六）。扉頁印「東京龍雲堂」，卷內鈐「新清堂」、「早稻田大學圖書」印，天頭無本書收藏者眉批。

6. 《涉史偶筆》三冊六卷、《涉史續筆》二冊七卷（1882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67-133。仙臺岡千仞振衣撰，《涉史偶筆》爲岡氏門人宮城縣亙理篤治、岡山縣片山管太郎同校；《涉史偶筆》爲岡氏門人高知縣濱田源之助、岡山縣片山潛同校。《涉史偶筆》明治十五年（1882）五月於東京出版，定價四十五錢；《涉史續筆》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於東京出版，定價三十五錢。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涉史偶筆》全三冊六卷、《涉史續筆》全二冊七卷。《涉史偶筆》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二，第二冊爲卷三至卷四，第三冊爲卷五至卷六；《涉史續筆》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三，第二冊爲卷四至卷七。《涉史偶筆》扉頁印「明治十五壬午歲（1882）六月上梓，草私史亭」，卷內版心題作「涉史偶筆」，下魚尾題作「藏名山房雜書」；《涉史續筆》扉頁印「明治十六癸未歲（1883）七月上梓，草私史亭」，卷內版心題作「涉史偶筆」，下魚尾題作「藏名山房雜書」。二書卷內均鈐「東京圖書館藏書之印」。《涉史偶筆》卷首有慶應丙寅（1866）孟春月肥前大村藩松林漸《序》及壬午（1882）一月岡氏《緒言》，卷末附明治壬午（1882）季春靜齋隄正勝《後序》；《涉史續筆》卷首有岡氏《自序》、大清光緒九年（1883）夏四月上海姚文棟撰於江戶使署《敘》，卷末附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下野小山朝弘東京今川橋西無悶室《後序》。《涉史偶筆》卷內天頭錄有木原節夫、中村確堂等人批語與作者自注、自評。此外，個別篇章亦有本書收藏者眉批及圈批，然其身份待考。《涉史續筆》卷內天頭錄有作者自注、自評。

書名「涉史偶筆」爲光緒壬午（1882）莫春楊守敬所題，「涉史偶筆」爲明治癸未（1883）仲夏小笠原東陽所題。《涉史偶筆》中，據松林序可知岡氏

撰寫背景：此書撰於明治政府成立前，時值幕府統治最爲黑暗之時，倡導勤王的岡千仞「不得已而東歸，沉沒於東僻」，其「論古即所以論今也」。岡氏《緒言》交待史源爲「諸氏史乘家譜」，原編爲十卷，現抄出織田、豐臣、德川六卷付梓，「每紀分爲上下二篇」，「猶外史正紀外設前後紀」。隈正勝《後序》首稱岡千仞爲仙臺文學三士中著作最盛者，承齋藤拙堂、大槻盤溪而「益張大也」。然隈氏最重岡氏者，當屬其戊辰之亂時「不以死生枉其操」之立身大節。《涉史續筆》中，岡氏《自序》言此書「分幕府、家門、譜第、列藩四目，列序德川秀忠、家光二代間事」，德川爲治三百年之盛世，「皆由國初立法盡得其宜也」。姚敘歎岡氏之「究心於域外大勢」，「尤服其有良史才」，稱此書與青山延壽「《明徵錄》相類」，岡氏撰之以「抒其無聊不平」。小山《後序》則謂此書「使德川氏無前偉績，傳乎萬世而不墜」，而贊岡氏「鉛槧之業」。

《涉史偶筆》、《涉史續筆》二書所敘於補充賴山陽之《日本外史》最爲有益。《涉史偶筆》中上篇紀織田、豐臣、德川三氏事蹟，下篇紀「諸雄與三氏同時者及屬三氏任方面之寄者」，均以筆記體呈現，類似札記彙集。《涉史續筆》分類細緻，校前書更顯結構緊湊、邏輯縝密。

7.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二冊四卷（1884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2-48。宮城縣岡千仞振衣撰，明治十七年（1884）五月東京鳳文館出版，定價金六十錢。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二冊四卷，第一冊爲卷一至卷二，第二冊爲卷三至卷四。扉頁云「東京鳳文館」，卷內版心題作「尊攘紀事」，鈐「東京圖書館藏書之印」、「帝國圖書館藏」印。卷首有大清光緒九年癸未（1883）二月遵義黎庶昌所撰《尊攘紀事序》、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初五日小野湖山序及明治甲申（1884）五月岡氏《緒言》，卷末附明治七年甲申（1874）春三月東京蒲生重章子闇跋。

此書是對《尊攘紀事》的訂補，亦爲闡述岡氏勤王思想之重要文獻。黎序點出《尊攘紀事》訪《通鑒紀事本末》之例，稱「尊王之局」的形成，「雖曰人事，實亦天運使然」，稱讚岡氏「文詞健快」。 小野亦曾有作書記事之志，故讀此書時常「拍案稱快」。 蒲生跋則謂岡氏「當代董狐」，「效《宋史紀事本末》」，「使讀者如身在其時，與其事慷慨切齒不自己」。岡氏《緒言》言此書爲《尊攘紀事》編成後所得異聞之彙集，意在續補以至「無一遺漏，而後嚴加筆削爲完書」，並交待資料來源。這顯示出岡氏求眞、求實與求全的學術旨趣。

卷內天頭錄有日人森保定、小野湖山、木原節夫、重野成齋、安達清風、河野通之、鈴木大亮、及清人姚文棟等人批語與作者自注、自評。

全書始自嘉永六年（1853）六月之《米國使艦入浦賀》，止於《將軍慶喜奉還大政朝廷置三職議德川氏處分》，共十六篇，體例同於《尊攘紀事》。所涉十六篇，主要爲《約俄國唐太悉仍舊貫》、《俄人蠶食唐太》等新加入者，部份則爲前書內容基礎上之補訂。以首篇《米國使艦入浦賀》爲例，岡氏於《緒言》交待「此編紀米使要請，取彼理日記」，說明訂補所據史源。《尊攘紀事》本題作《米國軍艦入浦賀》，改「軍艦」爲「使艦」似乎能從細微之處說明作者對待洋事外務的態度由充滿敵意到平和對待的變化。文中補充了前書未刊細節，如增加最初問詢美艦之二吏分別爲香山、中嶋，彼理答覆較前書亦更爲詳細，等等。至於議論部份，首句原作「歐米人接踵我邦，始於此」，此處改爲「海外各國，以通信使交商，要請我，始於此」，字裏行間所見心胸眼界更爲開闊。且論述在行文結構上較前文更爲緊湊，更能突出重點，如木原節夫便曰：「『尊攘』二字實出於水戶，此篇以烈公起論，此作者三致意者」。

筆者寓目之其他版本如下：

A.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5-00432。與上本同版，和裝，全二冊四卷，卷內鈐「同攻會之印章」。

B.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リ 05-00698。與上本同版，和裝，全二冊四卷，卷內鈐「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8. 《訥耳遜傳》一冊六卷（1887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23-4。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東京土屋書店出版，扉頁云「英國羅業叟梯原撰，日本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軍人必讀訥耳遜傳全》」。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一冊六卷。卷內目錄題作「訥耳遜傳」，鈐「東京圖書館藏」印。卷首有《告白》、明治二十年（1887）一月上澣熾仁題辭、明治廿年（1887）二月海軍大佐肝付兼行序、明治十九年丙戌（疑當作「戌」，1886）岡氏自序、明治廿年（1887）二月內田成道引及明治十九年歲次丙戌（疑當作「戌」，1886）岡氏《凡例》。

《訥耳遜傳》原爲英國史學家 Robert Southey（1774～1843）所著，主要介紹英國皇家海軍著名將領 Horatio Nelson 伯爵從 1758 年出生到 1805 年戰死沙場的一生。

《告白》言伊藤少將序待補，並以勘誤表訂正書中訛誤。熾仁題辭云：「偉

勳盛功，一出忠赤」，強調訥耳遜將軍的功績與忠心。大佐將軍之序對其滿是溢美之辭：「英國訥耳遜之爲將也，專重信義，待下以仁惠，事上以忠盡，戒文弱，尚武勇，務實學，不談空理」。岡氏自序則結合自己遊華所聞法軍來襲之事，稱「今論兵者，皆稱歐洲兵制爲精練無雙，固無須我言也，而至論其精練所以至此，則或未之知也」，而日本海軍「一仿英國軍制，而不知其所以致精練」，譯述此書之目的即爲通曉其精練之因，旨在強盛本邦海軍。內田之引交待此書之文字潤色爲岡氏於「養病芝廠峰公園禪院」時完成。

岡千仞此前曾譯《米》、《法》二志，對歐美歷史瞭如指掌。此書雖非國史，而爲自傳，但岡氏年前曾赴華遊覽，觀念一變，書中見地亦更爲深入。卷一正文前有導言，稱英國海軍強於法俄，爲天下稱道，而其又「以訥耳遜爲第一」。書中各篇前有譯者所加標題，較原著更爲明晰。篇末所附「譯者曰」則爲岡氏「泛論時事」，從中可見岡氏之用心。卷六「遜戰死」篇末「譯者曰」總結全書，岡氏認爲「凡物有抵抗力，而後可以神其功用」，「天降訥耳遜於英國」與拿破崙抵抗，「於是以大海爲用武之地，以大艦巨炮爲決雌雄之具」。

9.《日本詩軍》一冊不分卷附《烏合集》全一冊不分卷（1895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特 66-917。出村收吾編，東京新進堂明治廿八年（1895）六月出版，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一冊不分卷。《日本詩軍》後附刊《烏合集》全一冊不分卷。扉頁云「烏玉山人戲著，《日本詩軍》，東京新進堂發兌」，卷內鈐「東京圖書館藏」、「明治・二八・六・二五・內交・圖」，則此書或於 1895 年 6 月 25 日因內部交換入館。

此書所錄皆爲狂詩，其刊記僅有編者姓名，作者則闕如。卷首有烏玉先生乙未（1895）夏日題辭曰：「百口撰芳」。此後有如下文字：

> 烏玉先生字黑人，自誇出鱈目相新。狂言綺語何來矣？不負魂從三子春。

上述烏玉先生簡介後爲《日本詩軍題詞》：

> 筆鋒銳利一壇開，偏頌王師連勝來。日本詩軍誰克敵，風前燈火彼堪哀。漫言下里巴人曲，仰見青蓮居士才。斗酒百篇何自在？凱歌聲裏笑聲堆。
>
> 高政　　謫天情仙

上述文字對於日本軍隊得勝凱旋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作者所謂字「黑人」，字裏行間的戲謔文風，再加上扉頁所云「烏玉山人戲著」，似乎都表明作者不

願公開身份。目次後有明治二十八年（1895）五月，日清媾和條約批准成之後三日，於千早振神田書樓烏玉山人識，稱此編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七絕、三言「凡一百首，專敘日清事件之顛末」，此書「命曰《日本詩軍》」因其「愛國敵愾之心，勃勃然自笑門生矣」。其後附耕□所繪版畫一幅，圖中一人腰間佩刀，坐於桌前，手執「大腕」，一侍女欲爲其倒酒，桌旁有一落魄者伏地伸手乞討。正文卷首署「第一詞壇長岡四位著」，則作者認爲自己冠絕詞壇，亦自稱爲「岡四位」。卷內諸詩按時間順序排列，內容均爲頌揚軍國主義日本侵略中朝二國之事，分別於第10頁、第40頁、第72頁另插入版畫3幅。卷末錄《戰地概覽》以簡表形式逐日標出日軍侵略地點。

《日本詩軍》後附刊《烏合集》（全）。《烏合集》卷首有乙未（1895）夏日烏玉山人識，附注曰：「本集稿成，乃用謫天情仙所贈日本詩軍題詞韻，漫然成章，以代小引」，其中「謫天情仙所贈日本詩軍題詞韻」即上文所引。正文卷首署「烏玉先生輯，鴬金公子校」。卷內諸詩出自多人之手，亦有烏玉先生之作，疑其所署撰者姓名均屬筆名、化名，各詩篇末附載烏玉先生、散錄子詩評。

綜合以上情況，則《日本詩軍》作者爲烏玉山人，字黑人，亦稱岡四位，自詡爲第一詞壇長。《明治期刊行圖書目錄》著錄此書爲「岡鹿門（烏玉山人著）」〔註3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NDL）書目檢索系統檢索結果與之相同〔註33〕。上述兩處將《日本詩軍》的作者定爲岡千仞，或許是受了「岡四位」的影響。然「岡四位」的日語音讀當爲「ぉかしぃ」（可笑しぃ），表示奇怪、可笑之意。以「岡四位」爲名，應當是狂詩署名時慣用的一種方法。烏玉山人指佐藤六石，謫天情仙、鴬金公子指野口寧齋，二人均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漢詩人。〔註34〕綜合以上，筆者判斷《日本詩軍》當非岡千仞之作，作者另有他人。

10.《仙臺志料》三冊首一卷十八卷（1897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M30。仙臺岡千仞振衣纂輯，明治三十年（1897）四月宮城刊印，非賣品。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三冊首一卷

〔註32〕《明治期刊行圖書目錄》第四卷，第824頁，轉引自〔日〕中田吉信《岡千仞と王韜》，《參考書志研究》第13號，1976年8月刊，第16頁。

〔註33〕〈http://opac.ndl.go.jp/recorded/000000517338/jpn〉，31/12/2011 available.

〔註34〕〔日〕齋田作樂《狂詩書目》，東京：青裳堂書店，平成十一年（1999）1月版，第166頁。

十八卷。上冊爲首一卷及卷一至卷五，中冊爲卷六至卷十一，下冊爲卷十二至卷十八。卷內鈐「東京圖書館藏」、「明治・三十・四・二三・內交・圖」印，則此書或於 1897 年 4 月 23 日因內部交換入館。卷內版心題作「仙臺志料」，下魚尾題作「藏名山房雜書」。

卷首有明治二十五年壬辰（1892）一月於東京僑寓硯癖齋岡千仞自序，稱此書「錄伊達氏藩屏我東奧以來逸事」，哀歎於伊達公後代自相殘殺，強調「人有所忍，而後可以濟其所不忍。公之所不忍，固亡於叔侄之義與姻婭之好也」。第一冊首卷爲伊達家世系，此後十八卷每卷均由諸單篇組成，各篇多以人名作標題，彙集仙臺地方史料。

11.《山寺攬勝志》一冊不分卷（1901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116-153。岡千仞撰，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一月山形保砬會出版。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一冊不分卷。卷內鈐「帝國圖書館藏」、「明治・三四・四・內交，圖」印。則此書或於 1901 年 4 月因內部交換入館。

卷首有象山人題辭、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青萍迂夫謙澄《山寺攬勝志序》、山寺照片若干、青萍迂夫《遊寶珠山》序並詩二首及明治己亥（1899）七月岡氏自序。

霞山人題辭爲「山光澄我心」，旁署「近衛公爵御染筆」。按，近衛公爵當爲時任貴族院公爵議員的近衛篤麿，他提出了「東亞保全論」，主張建立日清同盟，並創建東亞同文書院。青萍序謂「按舊記所襲藏者，敘由來與形勝，經千仞岡翁潤澤」而成此書。請萍序後附寶珠山、千手院、馬行等寫眞（照片）十二張。青萍《遊寶珠山》序痛斥「近時有斧劊山上石作石材而鬻者」，其《絕壁上所見》與《前溪所見》二詩皆爲紀遊文字。岡氏自序交待此書在其師芳田卓錫舊稿基礎上刪削而成，「以便攬勝」。

正文包括「創始」、「名稱」與「勝蹟」三部份，而於「勝蹟」最詳，其下又分細目，介紹具體景點。此書並無太多岡氏私人撰述成分，從性質上看，更似旅行指南類手冊。

12.《欽仰錄》一冊不分卷（1908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番號：M41。據刊記所載，本書著作兼發行者爲末廣清次郎，明治四十一年（1908）十二月東京三省堂書店出版。漢文，和裝，一冊不分卷。卷內所鈐印已漫漶難辨。卷首標題後有一青年著軍服站立

照。次爲丁未（1907）秋日元昭敬題辭「標秀」及明治四十年（1907）馨題辭「聰以知遠」。次爲明治四十年（1907）十月時習舍長大郁德敏所撰、玉木享敬所書敘，大郁敘後載民部卿爲家日文題詞。卷末附丁巳（疑當作「丁未」，1907）六月八日夜於鵠沼海莊燈下道人千仞跋。

大郁敘謂因欽仰北白川宮輝久王，而「錄其行狀一斑，以使在舍生有所矜式」。道人千仞跋亦頌其「懿德純行，以立上人」。按，此北白川宮輝久王即小松輝久，此人繼承家系，授封侯爵，在侵華戰爭中擔任日軍高級將領，1947 年被中國國民政府指控爲重要戰犯。《欽仰錄》中有如下介紹：

> 北白川宮輝久王殿下，故能久親王第三子也。明治三十五（1902）年三月十四日，入時習舍，時年甫十四，班學習院中學第二年級。殿下在舍凡四年，拮据勉勵，不敢一日懈。學藝之茂，品行之嚴，眾仰爲模範，咸曰：「若殿下，自有此舍以來，未嘗見之」。可以知其爲人矣。

本書正文卷首並無作者名，僅正文結尾賦「道人千仞」識語。據此，「道人千仞」當爲本書實際作者，刊記所署「末廣清次郎」應爲編者。岡氏曾於書法作品中自謂「鹿門道人」〔註 35〕，「道人千仞」與之類似，疑即爲岡千仞本人。正文第 2 頁云：「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舉開校之式，而岡百世……爲之教授」。按，岡百世爲岡千仞長子。此外，《帝國圖書館和漢圖書書名目錄》著錄此書爲「末廣清次郎編（岡千仞著）」，〔註 36〕《明治期刊行圖書目錄》著錄爲「岡千仞著，末廣清次郎編」，〔註 37〕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NDL）書目檢索系統檢索結果與之相同〔註 38〕。並且，東京府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之岡千仞舊藏目錄中亦有此書，番號爲「特 3559」。〔註 39〕

13. 《藏名山房文初集》三冊六卷（1920）

仙臺岡千仞振衣著，男岡百世、侄岡濯、受業館森鴻同校。大正九年（1920）

〔註 35〕參附錄一之「〔書 0344〕岡鹿門 四言 楷書 紙本未裝 壬子孟夏鹿門道人 // 著」。

〔註 36〕《帝國圖書館和漢圖書書名目錄・第三編》，第 261 頁。轉引自《岡千仞と王韜》，第 16 頁。

〔註 37〕《明治期刊行圖書目錄》第一卷，第 748 頁。轉引自《岡千仞と王韜》，第 16 頁。

〔註 38〕〈http://opac.ndl.go.jp/recordid/000000435342/jpn〉，31/12/2011 available.

〔註 39〕〈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 aspx〉，31/12/2011 available.

二月東京刊印，非賣品。全三冊六卷，上冊爲卷一至卷二，中冊爲卷三至卷四，下冊爲卷五至卷六〔註 40〕。卷五載傳記、墓誌、碑誌、銘文，卷六錄題贊、序跋。卷末附慶應乙丑（1865）閏夏大村藩松林漸、大正八歲己未（1919）十月侄濯跋。

松林氏爲岡氏密友，二人及松本士權是「詩酒相從，肝膽相投」的知己，其跋感歎岡氏「坎坷蹭蹬爲俗議所困，不得試其才之萬一，而欲託文字以表見於後世」。岡濯爲岡千仞之侄，岡氏待其視若己出，不僅取「振衣千仞岡」之下句「濯足萬里流」賜其名，亦曾攜之同遊漢土，楊守敬甚至誤以二人爲父子〔註 41〕。濯跋謂千仞之文「裒然山積」，此書校訂自其手定之稿。

另據《國書總目錄》等書所載，岡氏亦著有《岡氏筆記》七冊（1845～1861）、《望雲紀程》一卷（1852）、《奉歡紀行》一卷（1855）、《有方遊記》一卷（1857）、《西遊日錄》一冊（1860）、《啓輔記》一冊（1860）、《雪泥鴻爪》三卷（1860 或 1861）、《藏名山房雜著》八冊（1881）、《硯癖齋詩稿》三冊（1890）、《在臆筆話》三十卷（1910）等書。〔註 42〕

（二）岡千仞之藏書

岡千仞學富五車，著作等身，這與其自幼酷愛讀書，一生結緣文字密不可分。在廣泛閱讀、增長見聞的同時，他亦在藏書方面頗多用力，這根據《觀光紀游》所載即可略窺大概（詳下文）。關於岡千仞藏書的規模，藏書印的使用等信息，筆者目前囿於資料，尚無法完全掌握，但能從一些學者的相關論述中找到線索。夏曉虹曾提及岡千仞舊藏的一部《芝山一笑》，現藏於東京大學圖書館，其「首頁上端」鈐有「鹿門靜定藏書印」。〔註 43〕另據陳捷介紹，岡千仞辭世後，其生前著述與藏書主要由長子岡百世珍藏。

> 二戰結束前，東京大學即將遭遇空襲時，爲防民間貴重文獻受災，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當時）緊急收購東京都內個人藏品，

〔註 40〕下冊由金程宇老師購自日本寄回，謹致謝忱。

〔註 41〕楊氏於其《鄰蘇老人年譜》嘗云「即於五月同岡千仞父子及書估王惕齋至上海」，楊守敬撰，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一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9 頁。

〔註 42〕《補訂版國書總目錄・著者別索引》，東京：岩波書店，1991 年 1 月版，第 156 頁。

〔註 43〕夏曉虹《芝山一笑》，載氏著《舊年人物》，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78 頁。

其中包括岡百世所藏岡鹿門藏書一部、岡鹿門日記、雜錄、稿本類及一部抄本。這些書物現在「特別買上文庫」藏有一部份，被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室收藏。〔註44〕

岡千仞的舊藏書大部份爲岡百世所有，後寄贈給其母校東京大學，現收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其中包括岡千仞中國遊歷之際攜回的東西。〔註45〕

岡千仞的舊藏目前主要保存在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室「特別買上文庫」與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兩家機構。東京都立圖書館（Tokyo Metropolitan Library）現已公佈其「特別買上文庫」中屬於「岡千仞舊藏」部份的目錄（細目詳參附錄）。而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書中漢籍部份的目錄也已出版，即《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註46〕。據其《凡例》，則館內圖書已「混配排架」，對於各藏書的來歷，《目錄》每條最末會以「舊藏文庫名、寄贈者姓名的簡稱表示」，其中以「岡」代表舊屬岡千仞之「岡文庫」〔註47〕。

附錄一所載資料中，除小部份岡百世的撰述與藏書外，主體上都與岡千仞直接相關。它可以補充上文未提及的岡千仞著作，如〔特1683〕《鹿門日記》（岡氏自筆）、〔特2281〕《岡鹿門雜輯》（安政-明治寫本，岡氏自筆）、〔特4018〕《英國史殘稿》（千村芝溝譯，河野通之編，岡氏校，明治寫本）、〔特4041〕《皇朝地志略》（岡氏著，明治寫本）、〔特4741〕《書書生僚名簿後》（岡氏明治自筆）、〔特 4744〕《綏猷堂位置移轉願》附《東京府知事認可證》（岡氏明治18（1885）年自筆）、〔特4745〕《綏猷堂宛學事年報調查文書及回答控》（岡氏明治27（1894）年自筆），等等。另有五種目錄在勾稽岡千仞藏書面貌方面尤顯珍貴：《石鼓亭藏書目錄》、《硯癖齋藏書提要》、《（岡鹿門所藏）圖書目錄》、《鳩居齋藏書目》及《岡百世氏寄贈書目錄》。可惜限於條件，筆者暫時無法查閱，但此問題通過附錄一亦可略窺一二。首先，雖然岡氏藏書涉及各個領域，但從四部分類上看，相對集中在經史方面，略涉子部與集部。其次，附錄一所載古籍大抵爲和刻本，中國刊印者僅有六部，而經學論著占到三分之二：〔特6140〕《禮記覺言》（明嘉靖11（1532）跋刊）、〔特6150〕《二禮集

〔註44〕《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第95頁。

〔註45〕《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第139頁注48。

〔註46〕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編，東京：株式會社東京堂，1995年4月版。

〔註47〕《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凡例》，第6頁。

解》（明嘉靖 16（1537）常州府刊）、〔特 6292〕《漢碑引經考》（清光緒刊）、〔特 6294〕《新學僞經考》（清光緒 17（1891）康氏萬木草堂刊）、〔特 6442〕《山中讀書印》（明張鼐刊）及〔特 8292〕《（欽定）全唐文》（清嘉慶 19（1814）序刊，殿版）。最後，附錄一末尾十條資料的番號分別以「書」、「拓」開頭，屬於藝術類文獻，其中〔書 0672〕孫詒讓與〔書 0673〕孫詒澤屬清人書法作品，而〔拓 0270〕《輞川圖卷》（軸裝）則可確定爲岡氏遊訪燕京時張裕釗（濂亭）所贈。

從生平與學術上看，岡千仞首先是一位史家，在史學方面成就顯著，不僅留意本朝故事，著書存史，而且關注海外大勢，合作譯介。同時他又是一位儒學者，對四部中的經學情有獨鍾，不斷收集相關資料。並且，他還是一位行者，努力實踐先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念，縱情山水，付諸文字。

第二節　《觀光紀游》成書與版本問題再探

關於《觀光紀游》成書問題的研究，據筆者寓目，學界甚少涉及，僅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與《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二文曾在腳注中做過初步探討。〔註 48〕而版本方面，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爲《觀光紀游》初版於 1886 年，但《魯迅全集》注釋中以爲此書於 1885 年自費刊印〔註 49〕，嚴紹璗、易惠莉與福井智子則稱此書直到 1892 年才付梓〔註 50〕。

《觀光紀游》成書與版本問題依然模糊不清，各種論述仍存矛盾牴牾之處。此書屬於近代文學範疇，其成書與版本問題本不複雜，看似只是基本的文獻學課題，實則至爲關鍵，它與《觀光紀游》的流傳與接受息息相關，亟需釐清。

〔註 48〕《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第 65 頁注 2；《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1 頁注 3。

〔註 49〕《「皇漢醫學」》，《三閒集》，《魯迅全集》第四卷，第 142 頁注 7。

〔註 50〕見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版，第 286～287 頁；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2 頁注 3；〔日〕福井智子《岡千仞と清仏戰爭》，《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7 年第 16 期，第 15 頁。

一、《觀光紀游》之成書

岡千仞有逐日記事的習慣，「即使是一天而已，亦有二、三回的記述」〔註51〕。他在1884至1885年間的遊華過程中也以日記體形式完成《觀光紀游》的撰寫。關於本書的寫作過程，《觀光紀游》共有五處文字提及。

其一，6月24日，在蘇州訪問李梅生（鴻裔）：

> 問草遊記否，且曰：「遊記不易草。竹添井井著《棧雲峽雨日記》，中人呼爲東洋鬼。」余曰：「僕幸免此目。但僕非衛玠之美，市人擁觀，殆爲渠所看殺。」〔註52〕

其二，11月4日，於盛京：

> 訪朱容生（一新），請余示近作。余曰：「方草日記，不暇稿詩。」求觀日記，余曰：「日記，日錄所見聞，余域外人，與中人異所見，此間不可輒示人。」曰：「唯異所見，此僕所以強請。」余以其言切，諾之。〔註53〕

其三，11月6日：

> 容生來訪，余示日記，大悦。〔註54〕

其四，11月9日：

> 訪容生，子培來會，酒出。余曰：「日記略書所見，果無大誤乎？」容生曰：「大概善。余尤惜中土無行子大策者，謂奉醇恭二邸使於法國也。」又曰：「琉球一事，余與經甫。」余曰：「此非經甫一人之論，中土之輿論也。僕所論日東之國論，非僕一人之言。」容生笑曰：「所謂士各爲其國者。」〔註55〕

其五，1885年2月17日，岡氏所患病症加重，赴香港求診於英醫哈亞底柬：

> 町田領事來視，觀余肉脱聲嗄，驚甚。余戲曰：「僕爲斯文舉斯遊，今死斯遊，猶死斯文者。」領事曰：「子畏死乎？」余掉頭曰：「使余畏死，始不舉斯遊。」領事笑爲屈〔倔〕強。〔註56〕

〔註51〕《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明治的漢學家》，第65頁。

〔註5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8頁。

〔註5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20頁。

〔註5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21頁。

〔註5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24頁。

〔註5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6頁。

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岡千仞初抵漢土時並無撰寫、出版遊記之意，數月後在友人朱容生（一新）的懇求下方才呈示日記，並得到其「大概善」的肯定。町田三郎據此稱，在友人的鼓勵下，岡氏大概旅行途中「即有出版遊記的意念」〔註 57〕。筆者以爲，最後一處文字是岡氏在中國之行晚期對於全程的總結，雖爲戲言，但「爲斯文舉斯遊」，而且能上升到生死的高度，足以顯示遊記本身在岡千仞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輔證町田氏的推論。

《觀光紀游》的撰寫與岡千仞 1884 至 1885 年的遊華同步進行。在「類次日錄中」〔註 58〕的同時，岡千仞亦曾將部份材料發表在本國媒體上。據此書所載，岡氏於明治十七年甲申（1884）5 月 29 日由東京啓程，6 月 6 日到達上海，6 月 21 日開始遊訪蘇杭，8 月 21 日返回上海，9 月 27 日北上燕京，12 月 3 日再返上海，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1 月 8 日前往粵南，4 月 10 日離開中國，4 月 18 日回到日本。上海是岡氏初抵中國時的目的地，他在上海的停留時間最長，往返次數亦最多，堪稱其中國行的大本營。

清人朱一新也許算得上是在中國本土首位一睹《觀光紀游》的文士。福井智子認爲，「岡千仞以作品取材地中國的意見作爲基準衡量《觀光紀游》的價值」〔註 59〕。但大約半年以前，當時居住在日本的讀者便已接觸到岡氏的中國旅行記。最早在 1884 年 6 月 19 日，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即以《上海近況》爲題刊出岡千仞自上海寄回的見聞報導集萃，並配發署名爲報知社社長藤田茂吉的按語。藤田氏對岡氏此行充滿期待，主動約稿：

> 以先生之翰墨加此壯遊，有王氏之周旋而探奇訪勝，必有驚世之文辭，望先生收之筐底，歸來之後割愛出之以示世人，以先生之意傳之於世，而我以報紙助其事。〔註 60〕

其見聞報導集萃分 6 月 19 日、20 日兩次刊載完成。6 月 20 日「文苑雅賞」第一次刊出岡千仞《支那漫遊日記》（6 月 6 日～6 月 8 日），7 月 1 日續刊（6 月 10 日～14 日）。7 月 5 日刊出岡千仞與上海文人的唱和詩作，7 月 9 日至 11 日「文苑雅賞」又以《筆話》爲題分三次刊出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談

〔註 57〕《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明治的漢學家》，第 66 頁。

〔註 58〕《觀光紀游・例言》，《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 頁。

〔註 59〕〔日〕福井智子《岡千仞「燕京」への旅——〈燕京日記〉を中心に》，《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8 年第 17 期，第 29 頁。

〔註 60〕《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65 頁。

錄。〔註 61〕《郵便報知新聞》雖爲日文日報，但其所設「文苑雅賞」爲漢文專欄，岡氏在其中發表的文稿均屬漢文作品。

這些資料中，《筆話》曾由華師大易惠莉教授點校發表〔註 62〕，她也在論文中提及「《支那漫遊日記》與《觀光紀游》中相應部份不盡相同，互有增略」〔註 63〕。但岡千仞遊華期間發表於《郵便報知新聞》的其餘文稿尚未被發掘。作爲原始材料，它們早於此後出版問世的《觀光紀游》，代表了岡千仞剛到上海時的第一印象，未經反覆修改的文字能更爲直觀地呈現其對中國的初步觀感，現以三例比較說明《郵便報知新聞》與《觀光紀游》的相關記載。

其一，《支那漫遊日記》1884 年 6 月 11 日記錄參觀鴉片館時，岡千仞描述煙民：

> 昏昏酣睡，僋然如死者。〔註 64〕

同日《觀光紀游》則謂吸食者：

> 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註 65〕

其二，翌日即 6 月 12 日，岡千仞攜侄岡濯共赴晚宴，其間見王韜吸食鴉片，有感而發：

> 室奥陳阿片煙具，兩客連床臥吃。煙禁屢下，而官人富家皆以煙爲豪具。一般風習，恬不爲怪，無復如之何者，紫詮以一方名流猶爲之，噫。〔註 66〕

而此日《觀光紀游》所載有兩處提及王韜：

〔註 61〕上述信息及下文所引《郵便報知新聞》內容均出自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與《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二文，特此說明。

〔註 62〕《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晚清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第 8～13 頁。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附錄部份亦收入《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整理者稱「根據《郵便報知新聞》所載原文加以整理」（第 317 頁注 1）。但易惠莉點校稿較後者多出《郵便報知新聞》書影、《龍門書院圖》與張煥倫肖像及詳細注釋，更具價值；且以數字隔開，分作三段，更爲明晰。

〔註 63〕《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65 頁注 2。

〔註 64〕《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1 頁注 3。

〔註 6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 頁。

〔註 66〕《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1 頁注 3。

晚與濯赴紫詮之邀。劉子良、袁翔甫、姚賦秋、倪耕劬、錢昕伯來會。翔甫實隨園先生孫。問小倉山房，曰已火。問《隨園三十種》，曰大版已亡。隨園一代泰斗，名藉海外，而未三世，子孫飄零，遺著散逸，此爲可歎。紫詮有詩，與坐賓和答。〔註67〕

其三，6月9日和6月15日岡千仞先後兩次與上海書院士子進行筆談。筆談文稿即上文所謂《筆話》，《郵便報知新聞》按語稱：

左筆話一篇，係鹿門岡先生在上海與彼士人孫照、姚文枏、葛士濬、坎本禮、張煥綸等相語者。〔註68〕

當時姚文枏與葛士濬在龍門書院，張煥綸、坎本禮及孫照三人都在正蒙書院。而《觀光紀游》兩日所錄則主要是概括《筆話》大意，僅提及兩處細節：

談及洋煙流毒中土。余曰：「聞紫詮亦近吃洋煙。」子源（筆者注：葛士濬）曰：「洋煙盛行，或由憤世之士，借煙排一切無聊，非特誤庸愚小民，聰明士人亦往往嬰其毒。」（6月9日）〔註69〕

經甫（筆者注：張煥綸）憂蒙養無法，設書院，待來學者。生徒百餘名，彬彬向學。學舍新築，樓上舍生徒，樓下爲講堂。嚴立學規，率之以躬行。（6月15日）〔註70〕

綜合上述三段文字，筆者以爲，《觀光紀游》作爲岡氏中國旅行記的最後定本，與其初稿相比改動較大。這些變化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修辭，定本較初稿更具文采，如第一段文字中《觀光紀游》的描述比《支那漫遊日記》更爲生動，細緻地刻畫出煙民吸煙時醉生夢死的狀態。二是文意，在刊印出版《觀光紀游》前，岡千仞經歷過深思熟慮、反覆修改日記及相關原始資料的過程。《觀光紀游》並不是對作者遊華期間「日錄所見聞」的簡單疊加，作爲學養深厚、用筆甚勤的漢學者，他必須對全書進行通盤考慮，務必使其整體敘述詳略得當，張弛有道。岡氏的做法主要是撮略大意與刪削旁枝，而在《觀光紀游》中得以保留以及被剔除的細節值得探討。在第三段文字中，《筆話》所涉範圍廣泛，信息豐富，上海士子關心岡氏著作及海外大勢、日本概況等問題，岡氏則詢問王韜、倪鴻等人近況。但《觀光紀游》在概述的同時，則

〔註6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9頁。

〔註68〕《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8頁。

〔註6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頁。

〔註7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0頁。

只突出王韜「吃洋煙」與張煥綸「設書院」二事。這些細節的保留足以說明作者本人對於兩次筆話的關注之處。煙毒是岡氏書中極力痛斥的滿清社會弊病，而書院則代表其此行對於中土文風盛行的社會氛圍的豔羨。其次，《觀光紀游》中並未出現孫照的名字，但其個中原因卻或未可知。〔註 71〕此外，第二段文字的變化也很引人注意。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中對紫詮的敘述稀鬆平常，毫無異樣，對初稿《支那漫遊日記》中所載王韜吸食鴉片並有感而發一事絕口不提。最早關於岡氏得知王韜染毒的記述出現在《觀光紀游》6 月 8 日條，邦人岸田吟香稱：

> 紫詮數說頭痛，如不勝坐者，恐癮毒。〔註 72〕

雖然書中並未著錄任何岡千仞在聽到這個消息後的感受，但王韜是其海外知己與遊華邀請人，岡氏一定不會對這個消息無動於衷。翌日（6 月 9 日），他即向上海書院士子詢問王韜近況，並將葛士濬含蓄確認其昨日所聞寫入書中，但亦無文字記錄其當時心情（參上文所引）。作爲原始記錄，《筆話》中岡氏詢問王韜近況的部份如下：

> ◯：紫詮先生自謂日東詩祖，先生許之否？
>
> 岡：往年一見《普法戰記》，推服不置。先生之東遊，實弟等之所聘致。先生妙於詩文，敏捷實爲無前，而猖狂自肆，自棄於繩墨之外、禮儀之表，甚似晉宋間之人。先生以爲如何？
>
> ◯：此人乏里閭之譽，即以猖狂自肆之故。
>
> 岡：想先生不得志於當世，徒以林下縱飲泄鬱鬱不平乎？來此聞先生吃毒煙，如此貴重性命，亦不甚惜乎？
>
> ◯：今人之吃鴉片煙，亦往往由放廢無聊，而藉此以資排遣，初不問性命之貴重與否也。
>
> 岡：在他人猶不可解，以王先生之特達明敏猶爲之，煙毒之誤人一至此，僕始聞之，愕然！
>
> ◯：惟聰明人最吃煙。
>
> ◯：東國禁煙之令舊日頗嚴，未知今日禁令尚能遵行否？〔註 73〕

〔註 71〕易惠莉稱「但不知何故，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中將孫照名字完全隱去」，《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8 頁。

〔註 7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 頁。

《筆話》可以補充《觀光紀游》限於篇幅，無法著錄的筆談全貌。通過上述引文可以發現，當日筆談最先說起王韜的並非岡千仞，而爲清人。岡氏對王韜《普法戰記》及其詩文不吝讚美，而上海士子則頗多微詞。儘管預先有心理準備，但在得到對方關於傳聞的確證後，岡氏還是表現得很驚訝，以「愕然」形容自己的感受，十分不解通曉事理的知識人王韜會「吃毒煙」。而整個談話中，岡千仞對王韜的態度悄無聲息地經歷了由推崇備至，到大惑不解，再到異常驚愕的變化過程。但《觀光紀游》當日所錄僅爲敘述策略上的概要提及，即使加入了作者留意的筆談重點，但依然無法細緻地表現這一微妙的情感變化，當時的日本讀者只有通過《郵便報知新聞》才能瞭解到個中詳情。而這裡也涉及適應不同文字載體的問題，作者本身善於作文，尤其長於史論，清楚應該隨物賦形，在不同媒介上發表時對文稿作相應處理。《筆話》發表於《郵便報知新聞》的「文苑雅賞」上，此欄「注重在有漢文學修養並留戀漢文學傳統的社會群體中吸引讀者」〔註 74〕，這恰恰符合岡氏在日本社會倡導、延續漢學學風的初衷，因而敘述不僅充分完整，而且細緻生動。而《觀光紀游》作爲一本書，則必須統籌安排，剪裁得當，顧及篇幅詳略。

但聯繫初稿與定本之間的差異，還可發現岡氏改動、增刪原文的深層原因並非上述所能完全囊括。初次聽到王韜染毒的消息時，岡氏感到非常震驚疑惑，並將這種最爲直接的感受反映在當天的日記中。但回國後對原稿加以修改出書時，熟悉中土風俗的岡氏會有人情世故方面的顧慮。王韜不僅是其異國知音，而且是此次中國行的推手，岡氏必須顧及到此書傳入中國後對方的閱讀感受。這一點除了反映在第三段文字之外，更爲明顯的是可從第二段文字看出。岡氏在定本《觀光紀游》「1884 年 6 月 12 日」條下所記晚宴，雖交代出席人員，並感歎袁枚的身後寂寞，但卻對初稿《支那漫遊日記》中王韜吸煙一事隻字未提。岡氏做出這種處理，並非敘述策略上的考慮，而是轉移焦點，刻意迴避。不僅如此，通觀整部《觀光紀游》有關作者與王韜直接交往之處〔註 75〕，岡氏從未流露出任何因其染毒而痛心疾首或嚴厲批判的情緒。相反地，涉及此類事件時，作者的敘述往往於平和之中略顯偏袒。可以

〔註 73〕《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10～11 頁。

〔註 74〕《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第 65 頁。

〔註 75〕全書共 13 處明確記載岡千仞與王韜在上海的交往，詳參《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1884～1885）》，第 19 頁。

說，他在書中對於滿清社會煙毒盛行的問題上執行了雙重標準：談論他人時毫不留情、直筆痛斥，而述及王韜時則立場偏頗，有失公允。甚至在王韜與岡氏邦人爭論遏制煙毒時，他都不惜爲好友的戲言辯護：

> 望南（筆者注：寺田望南）觀諸人就床吃洋煙，訝甚，曰：「洋煙果不可遏乎？」紫詮曰：「遏之極易。」問之，笑曰：「吃者殺之莫赦。」又曰：「洋煙何害？人故有以酒色致病至死者，以酒食之樂有甚於生者也。其死於煙毒，何異死於酒色？」此言雖戲，有一理。（12 月 23 日）〔註 76〕

此外，岡千仞對原稿的改動亦牽涉到《觀光紀游》的版本問題，而該問題的產生也是圍繞其成書過程出現的。

二、《觀光紀游》之版本

當代學者對於《觀光紀游》出版時間的討論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儘管大多數學者都認爲此書初版於岡氏回國後的第二年，即 1886 年，但《魯迅全集》注釋中以爲此書於 1885 年自費刊印，〔註 77〕嚴紹璗、易惠莉與福井智子則稱此書直到 1892 年才付梓〔註 78〕。傅雲龍光緒十三年（1887）曾經訪日，並於十月十六日記有如下文字：

> 岡千仞弟子館森鴻以其師所著《觀光紀游》一書見求，改其文數首。〔註 79〕

易教授認爲，由此可見「岡千仞在該書出版間題上的躊躇與愼重」，同時她「不清楚《觀光紀游》的出版是否與王韜 1890 年出版《重訂法國志略》有關，也不清楚岡千仞 1892 年間是否讀過《重訂法國志略》。」〔註 80〕

〔註 7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4 頁。

〔註 77〕魯迅《「皇漢醫學」》，《三閒集》，《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42 頁注 7。

〔註 78〕見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版，第 286～287 頁（該書以《日本中國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9 月版）之名再版時，此節已刪）；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2 頁注 3；〔日〕福井智子《岡千仞と清仏戦争》，第 15 頁。

〔註 79〕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餘紀》前編上，傅訓成整理《傅雲龍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 7 月版，第 80 頁。

〔註 80〕《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第 242 頁注 3。

據筆者寓目，現今較爲完整的《觀光紀游》主要包括以下三個版本：

其一見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1 年出版。（以下簡稱「《叢刊》本」）此本屬原文影印本，無刊記，僅於卷首扉頁注明：

本書承木下彪教授惠借影印，特此致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其二見收於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20 卷，日本東京ゆまに書房平成九年（1997）十月出版。（以下簡稱「《集成》本」）此本亦屬原文影印本，據卷末刊記，則此書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一月再版」，岡千仞爲「著者兼發行者」。〔註 81〕

其三爲張明傑整理，收入《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北京中華書局 2009 年 5 月出版。（以下簡稱「整理本」）張明傑稱此本據 1886 年 8 月初版本整理。

値得一提的是，此外尚有三個《觀光紀游》散頁或節本：

其一，杉村邦彥在《楊守敬回國——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一文中曾貼出《觀光紀游》書影，據其刊記，則此本於「明治十九（1886）年八月出版」，岡千仞爲「撰者兼出版人」〔註 82〕。（以下簡稱「杉村所引本」）

其二見收於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五帙，杭州古籍書店 1985 年 11 月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二十年（1894）、二十三年（1897）上海著易堂印本縮印出版。（以下簡稱「《叢鈔》本」）

其三，王稼句編纂點校《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註 83〕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選》下收錄《觀光紀游》中部份與蘇州有關的文字。（以下簡稱「《初編》本」）

上述所列六個版本中，整理本與杉村所引本所據版本均爲 1886 年初印本，《集成》本所據爲 1892 年再版本，《叢鈔》本與《初編》本均非《觀光紀游》原本，只有《叢刊》本所據版本闕疑。此本十卷三冊，以「一」、「二」、「三」隔開。第一冊扉頁有丙戌（1886）七月海南藤野所題「觀光紀游」；目次後、卷一正文前有丙戌（1886）之夏錢梅□□所題「航滬日記」；卷二首錄明治丙戌（1886）清明後三日相陽半澳原東陽所題「蘇杭日記」。第二冊卷四

〔註 81〕岡千仞《觀光紀游》，《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20 卷，第 327 頁。

〔註 82〕《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第 19 頁。

〔註 83〕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年版。

首錄雲外人所題「滬上日記」；卷五首錄南摩綱紀所題「燕京日記」。第三冊卷七首錄大澥所題「滬上再記」；卷八首錄左龢所題「粵南日記」。以上題名僅見於《叢刊》本。

筆者目前尚未親見初印本之全貌，但張明傑曾對其作過介紹：

> 《觀光紀游》出版於岡千仞歸國後的第二年，即 1886 年 8 月，1892 年再版印行。十卷三冊，活版印刷。初版版式爲四周雙邊，版心尺寸爲 97*146mm，中縫印有「石鼓亭藏版」五字。竪排繁體，每頁 11 行，每行 30 字，注文雙行，另附有日式訓點、句點。扉頁及各卷首多有名家題名（再版時略去）。〔註 84〕

光緒十三年（1887），館森鴻受其師所託，奉書傅雲龍，則此時《觀光紀游》很可能已經成書。此外，岡千仞 1887 年致函王韜，寄出三十部《觀光紀游》，託其在中國代爲銷售。〔註 85〕張德彝《五述奇》戊子（1888）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記引《觀光紀游》文字一則，內容與整理本基本一致。這些都可從側面證明《觀光紀游》的初版刊印當在 1886 年。

《集成》本爲 1892 年再版，雖亦十卷三冊，但以「上」、「中」、「下」隔開，且未刊載諸家題名。《叢刊》本之版本信息與張明傑所述完全吻合，且加利福尼亞大學數字化時，以此爲 1886 年版〔註 86〕，此本或即初版本。張明傑雖稱「據初版本整理」〔註 87〕，但經筆者詳細校勘，整理本書字與《集成》本大致相同，而《叢刊》本則在多處地方與二者存在差異。筆者以爲，《集成》本與整理本當爲岡千仞修訂過的定本。關於《叢刊》本與另外兩本的差異，除了修辭方面的需要外，主要是書中卷四、卷五部份文字對王韜的稱呼不同，《叢刊》本稱「紫翁」，而另外兩本皆稱「紫詮」。同時，《觀光紀游》卷一起始敘述爲岡千仞送行的人員名單時，《叢刊》本也與另外兩本也有出入。〔註 88〕從「紫翁」到「紫詮」，並不是簡單的稱呼差異，其中也暗含作者本人對王韜態度的微妙變化。而送行人員名單的增刪則反映岡千仞作

〔註 84〕《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 頁。
〔註 85〕張志春編著《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1 月版，第 172 頁。
〔註 86〕〈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8%A7%80%E5%85%89%E7%B4%80%E9%81%8A.html?id=MqcGAQAAIAAJ〉，19/01/2012，available.
〔註 87〕《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 頁。
〔註 88〕關於《叢刊》本與《集成》本、整理本之間的文字校勘，詳參《附錄二》。

爲史學家在學術上嚴謹求眞的務實學風。

此外，經過仔細對校《叢鈔》本與《集成》本，筆者發現前者爲後者的節錄本。〔註 89〕大陸的《初編》本書字源於《叢鈔》本，編者在整理時未能採用更爲完整的底本，頗以爲憾。至於《叢鈔》本的具體刪節部份，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情況。（其中所舉例證均見於附錄三）

一是便於排版，節省紙張。此種情形出現於某日日記末尾剩餘行格較少之時，所刪內容字數較少。例如第 25 條刪去「李中堂喪母，此人議止官僚賻金，以故忤中堂云」；又如第 26 條刪去「中人好大言，雖古猶然」。

二是刪去大段對話、引文或軼事。例如：第 1 條刪去「乃書曰：『有爲之士，不留心末藝。今見伯相書，不似今能書人，慕晉仿唐，此伯相所以爲伯相也歟？』或曰：『世多伯相書，多出門客手。』」；又如第 4 條刪去「余曰：『觀察、布政，任地方疾苦，超任此職者，必散萬金開花園。蘧園、怡園、留園，無園不然。中土大官，固如斯乎？』笠庵默然」；

三是刪去其他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及涉及清廷高層政治的敏感內容。例如：第 7 條刪去「館人出李中堂書，求余言。乃書其後曰：『中堂書不合法，豈英雄不善書歟？』其人不滿」；又如第 10 條刪去「痛論中人不達外情」；

岡千仞對於當時的滿清社會可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在《觀光紀游》中一針見血地直陳時弊，毫無保留地坦白心跡，故而書中有許多逆耳忠言。王錫祺《叢鈔》本編纂於《觀光紀游》初版印行後不久，這反映出中國人最初對《觀光紀游》的接受態度。從以上所舉例證可以看出，《叢鈔》本所刪內容主要是《觀光紀游》原書中岡千仞引以爲豪的「藥石之語」。以歷史的眼光看，這些「藥石之語」恰恰是本書最具價值的部份。

首先是岡千仞對於中國社會的不滿及其後提出的解決方案。岡千仞自幼接受漢文教育，陶醉在對於禹域的美好憧憬之中，但親訪中國之後，對於現實的失望與不滿溢於言表。在其筆下，現實中的滿清不僅民生凋敝、社會混亂、骯髒不堪，而且士人頹廢、國力衰微、積貧積弱、遭遇外侮。岡千仞由失望以至痛心，但無論在想像中，還是在實際裏，中國畢竟是其文化意義上的「母國」，他在與中國文士的交往中多次建言獻策，提出自己對於療治社會弊病的「藥石之語」，極力希望清廷加以採納，挽回時局，改變現狀。因此可以說，《觀光紀游》中此類不滿言辭及後續建議的出發點是爲中國考慮，屬於

〔註 89〕關於《叢鈔》本與《集成》本間的文字校勘，詳參《附錄三》。

善意的提醒。但如果站在當時大部份中土文士的立場看，這些負面評價有損皇清的大國顏面，甚至可從民族主義角度將它們理解成是對中國的惡意貶低與歪曲。而無論是作爲編者，還是作爲讀者，王錫祺將《觀光紀游》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時，出於照顧民族情緒的考慮都必須剔除此類內容。

其次是關於李鴻章的某些看法。李氏在當時是位高權重的朝廷要臣，因而至少在公開場合，大多數清人都對其尊敬有加，幾乎無人敢評頭論足，更遑論施以妄言。但在此次中國行全程中，岡千仞都以「域外人」與「野人」自居，他沒有中土士人或是外國政客在身份上的束縛，可以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觀光紀游》中與李鴻章相關的記載反映出岡氏對其的眞實看法。《叢鈔》本所刪部份的相關內容表明他不僅對李氏評價不高，而且頗多怨言。但作爲傳統的晚清文士，王錫祺在編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時必須對於本國的高層時政有所顧忌。在他看來，岡氏對於李氏的批評或不滿屬於異族人的妄語，如果繼續保留，勢必會給自己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因而《叢鈔》本刪去大段對於李鴻章的負面言論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從刊印上看，上述前兩種情形都是爲了減省空間，節約紙張。但在便於排版的同時，這種處理也有文字思想方面的考慮。比如所刪第 1 條是「鶴田姓請余（岡千仞）跋李中堂書」的內容，實際暗含對於李鴻章文辭藝術價值頗低的嘲諷。第 16 條刪去曾國藩日記的相關內容，岡氏引文的目的在於指斥「士大夫貪婪無行」導致「天之方蹶」，民生凋敝。第 18 條刪去岡氏與清廷府尹的對話，觀其內容，則岡氏所言切中肯綮，絲絲入扣，讓府尹甚爲窘迫。第 31 條刪去大段科舉考試中有關《說文》的試題及其後岡氏所發議論，而作者所要表達的正是「科舉誤天下」的觀念。

《叢鈔》本的刪節內容在通過域外之眼，從周邊審視、還原眞實的晚清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們不僅體現出域外人眼中的晚清，還能反映晚清文士對於本國時局的態度。比如所刪第 6 條，岡千仞請求張煥綸（經甫）「姑退左右，使僕終其說」，並且取得對方應允，這實際上爲二人間的交流創造了保密性極強的環境。而此時張氏的如下言論引人注意：

> 曰：「中堂任重寄廿年，糜國財不知幾百萬，而富強之功，茫乎捕風，如吾兄所見。朝廷特以其平粵匪攻打，不敢加鐵鉞而已。其所任用，皆奔競小人，輕儇俗吏，人心日離，國事日非。今日之事，

皆此人之所爲。」〔註 90〕

張氏所言大膽直露，振聾發聵，一針見血地切中問題要害。此類言論絕少見於晚清，尤其是在李鴻章主政之時，可謂擲地有聲。但在佩服張氏深刻洞察力的同時，不可忽視其發表言論的場合——「私人空間」〔註 91〕帶給其發時人所未發的勇氣。這也從側面說明晚清知識分子群體對於李鴻章更爲眞實的看法。

雖然《叢鈔》本的刪節有編者自身的現實考慮，但這些內容是《觀光紀游》不可或缺的部份，王錫祺的做法實際上是抹殺了此書的價値，破壞了它的完整性。而《初編》本在輯錄《觀光紀游》文字時錯誤地以《叢鈔》本爲底本，令人遺憾。

第三節　《觀光紀游》與岡千仞的中國觀

作爲行程八九千里、歷時三百餘日〔註 92〕的中國旅行記錄，《觀光紀游》敘述了岡千仞沿途的見聞感受及與中國官民、文士階層的交往，最爲直接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眼中的晚清，本節擬通過岡千仞筆下的文字探討他是如何看待中國的。

一、中國行之前岡千仞的中國觀

關於這一問題，首先應分析其來華前的知識儲備與期待視野。1884 年訪

〔註 9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2 頁。

〔註 91〕在文學領域，「私人空間」（private space）最初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討論中國中唐士大夫時提出的概念，「乃是映現的場所，以微型尺度重現事物的形象」（〔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1 月版，第 72 頁）。此處借用這一概念，但討論的顯然是不同的問題。本書的「私人空間」特指只有兩個或少數人參與、不被外人知道或打擾的、私密性得到很好保護的場合。晚清時期的不乏日本士人利用私人空間刺探情報，爲本國政治軍事服務，例如宮島誠一郎曾充分利用與清國駐日使臣的私交關係，將所獲的清廷有關琉球交涉的最新情報，迅速傳達給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等明治高官，成爲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動態的主要線索之一。詳見劉雨珍《〈宮島誠一郎文書〉中的琉球交涉史料》，載中國史學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黃遵憲研究新論：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5 月版，第 352～365 頁。

〔註 92〕館森鴻《後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5 頁。

華時，岡千仞已逾知天命之歲。在學術方面，他曾翻譯《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並著有《東旋詩紀》、《北游詩草》、《尊攘紀事》（及《補遺》）、《涉史偶筆》等書，單從書名上便可以看出，其興趣偏向於域外大勢、旅遊及歷史。岡千仞生於仙臺下級藩士之家，少好讀書，被稱作讀書家，先後在養賢堂與昌平黌學習中國經典，接受漢文薰陶，日後著述也均以漢文呈現。他曾因提倡勤王大義而被佐幕派逮捕入獄，也由於尊王攘夷而被赦出獄，於 1878 至 1880 年任職東京府書籍館，「總書籍館務」〔註 93〕，並交結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與中國民間人士。在本國與他們的交往使岡千仞對中國的認識有所加深，從以往的書本層面進入更爲眞切的人際層面。清廷文士在東瀛廣受歡迎，日本士子皆以與之交遊爲榮，岡千仞也不例外。〔註 94〕中日文士間口語不通，但由於都通曉漢字，筆談成爲雙方的主要交流方式。從形象學（Imagologie）上講，筆談是比作者詩文集更爲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關於岡千仞與以清國公使館員爲中心的在日中國知識分子群之間筆談的材料，現存主要包括岡氏自己整理的《蓮池筆譚》、《清讌筆話》〔註 95〕及一部份與黃遵憲筆談的原件〔註 96〕，同時《大河內文書》〔註 97〕等相關文獻中也有岡千仞參與筆談的記錄。〔註 98〕按筆談時間先後排列，當時參與交流的清人主要爲使官黃遵憲、沈文熒、何如璋、張斯桂、黃錫銓、梁居實、黃遵楷、何蔬蓀及商人王治本等，他們都屬於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岡千仞認爲，筆談作爲交流方式具有口語對話難以比擬的優越性。他在《跋芝山一笑》中

〔註 93〕《清代首居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8 頁。

〔註 94〕可參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版）與王韜《扶桑遊記》的相關記載。

〔註 95〕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藏《岡鹿門雜輯》第二九四冊，全文附錄於陳捷《岡千仞と來日した中國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蓮池筆譚〉〈清讌筆話〉などの筆談錄を通して》（《日本女子大學紀要》（人間社會學部）2001 年第 12 期，第 137～159 頁）。

〔註 96〕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藏《岡鹿門雜輯》第二九二冊的後半部份，岡氏在筆談後有所添加、整理，部份內容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版，第 786～796 頁）。

〔註 97〕大河內輝聲等人與在日中國人的筆談錄，今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及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鄭子瑜、〔日〕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 年版）曾整理過其中部份內容。

〔註 98〕目前，關於以上筆談錄最詳細的整理本爲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居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一編與下冊第四編的部份內容。

談道：

凡舌所欲言，出以筆墨，縱橫自在，不窮其說則不止。〔註 99〕

他在筆談中暢所欲言，直接表達自己關心的問題。另外，在筆談結束後，他還精心整理謄抄原稿，足見其對於筆談的重視。

筆談至晡，得十數紙。乃略次其前後，使勿剿攙之妨。〔註 100〕

根據以上筆談資料，可以初步判斷岡千仞與中國文士交談時意在瞭解的重心有兩點：詩文與科舉，而這兩點又是相互聯繫的。首先，在詩文方面，岡氏自幼學習中國典籍，有機會與中國文士直接交流時，當然十分關心對方的文學理念，尋求文章正宗。例如，他坦言「余輩在海外學中華文章」，向清人詢問「不知僕輩下手學文自何地」〔註 101〕，並稱「如西洋人皆陸續遊學中華」〔註 102〕。岡千仞長於作文，但短於作詩，自稱「僕不能作詩，唯好論詩」〔註 103〕。對於本邦文學，於詩重其時之梁星巖；於文則「除山陽（賴襄）外眼中無人」〔註 104〕，以賴襄爲維新之嚆矢，究其初衷，主要因爲賴氏「史學文章，學問淵源，實冠邦人」〔註 105〕，而岡氏之學術興趣亦集中於史學方面。岡千仞以中國標準衡量東人詩文，謙稱「我邦人詩不入大雅正調」〔註 106〕，不知其文「中中華矩度否」〔註 107〕。即使是賴氏，「文章到底日本人之文，豈可以冰叔（魏禧）擬乎」〔註 108〕。其次，關於科舉，他在 1880 年 5 月 26 日與王治本的筆談中進行了詳細瞭解。王氏是科舉場上的失意人，屢試不順，「不得不八十老婆婆再抱兒棚也」〔註 109〕，對科舉也頗多怨言，如稱「此其中蓋有命焉」，「考試全不在才學也」，感歎「黃（黃遵憲）、沈（沈文熒）之得中舉人，亦幸矣。若僕則幾終老青衫者，其謂之何」〔註 110〕。事後證明，王氏的這些觀點對岡千仞有較大影響。與此同時，岡氏出於文章學的考慮，將科舉

〔註 99〕《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25 頁。
〔註 100〕《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29 頁。
〔註 101〕《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0 頁。
〔註 102〕《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1 頁。
〔註 103〕《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2 頁。
〔註 104〕《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2 頁。
〔註 105〕《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2 頁。
〔註 106〕《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0 頁。
〔註 107〕《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3 頁。
〔註 108〕《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3 頁。
〔註 109〕《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0 頁。
〔註 110〕《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0 頁。

話題延伸至取仕所用八股文。王治本稱八股之無用「實出於才之無用，非八股之害也」〔註 111〕，岡氏則不解其用，且中人「凡百題跋論記，皆出八股……陋邦人從來無爲之者」，欲向其「學作八股文」〔註 112〕。以下這段話可以代表岡千仞關於八股文的態度。

僕常怪中華人士費全身精神學八股文，成業之日，八股果爲何用？僕東人，不慣中華風俗。八股文就各集中而觀之，唯觀其可厭而不知其成何用，不知人士登任家國大用，果有所用於八股文否？〔註 11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筆談錄體現出岡千仞以中國爲文化母國的預設立場。他將自己看成是中國的一部份，東亞諸國皆同文同種。

吾雖非禹域人，同是禹域人種中一人。〔註 114〕

東洋各國，如朝鮮安南及陋邦，皆用漢字以爲國體風俗，猶洋人活用羅甸語。〔註 115〕

這一立場不僅表現在他請求中國文士爲自己的作品評點、作序，而且他還處處以中國及中國文章爲典範正則，視作榮幸。

天地間禹域爲最古國。如歐土，耶蘇已前皆荒昧野蠻。〔註 116〕

夫子之大德至聖，萬國仰其澤者。〔註 117〕

先生賜一高詠，實此花之榮。〔註 118〕

四六貴邦人士所易爲，如陋邦人，唯爲神人伎倆，非人力所及之者而已。〔註 119〕

僕東陬一窮儒士，且病沉廢業，學業日退。若閣下收在交友數中，何幸如之！〔註 120〕

〔註 111〕《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0 頁。
〔註 112〕《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2 頁。
〔註 113〕《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1 頁。
〔註 114〕《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6 頁。
〔註 115〕《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8 頁。
〔註 116〕《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6 頁。
〔註 117〕《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 638 頁。
〔註 118〕《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376 頁。
〔註 119〕《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3 頁。
〔註 120〕《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426 頁。

另外，他明確將王韜當作自己的天涯知己。

唯（王）先生懇懇至此，（眞）知己。〔註 121〕

二、中國行期間岡千仞的中國觀

明治 17 年甲申（1884）5 月 29 日早晨，岡千仞從東京新橋停車場啓程，開始自己的中國行。乘火車到達橫濱後，中日友人設宴送行，詩酒唱和。岩谷修（一六）曾次韻描述當時的情形：

《岡鹿門將遊清國，同人餞飲墨上，時清人黃君吟梅亦將內遊我國，同日與會，即飲次贈鹿門韻兼贈兩君》

歌舞紅樓墨水東，歌如鳴鳳舞遊龍。豪懷須盡十分醉，餞二名流一席中。〔註 122〕

據岩谷氏詩題，則知此日適逢清人黃吟梅將要遊歷日本內地。黃吟梅，名超曾，吟梅乃其號，江蘇（現上海）崇明人，1884 年奉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之命遊歷日本各地，在實地考查的同時亦交結各處日本書人學者。〔註 123〕此詩末句云「餞二名流一席中」，當爲實寫，因齋藤一馬所撰《燕京日記序》亦言：

華賓楊惺悟、姚子梁、黃吟梅以下，會者八十餘名，一馬亦陪席末。〔註 124〕

關於此次宴飮，內村資深云：

先生發有日，諸名士壯其志，張宴於墨上水閣，資深亦陪席末。〔註 125〕

此外，岡千仞初抵上海時，清國駐日使館館員姚文棟亦曾致函言及「黃君今遊甲斐」〔註 126〕，當即指黃吟梅內遊日本一事。而岡千仞當日日記則爲：

至橫濱，楊君所設祖席關帝祠，會送客重野（安繹）、岩谷（修）、日下部（東作）、二橋（元長）、濱村（大澥）、小牧（昌業）、鈴木

〔註 121〕《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第 380 頁。

〔註 122〕黃超曾編，陳洙重選《同文集》，《房山山房叢書》本，民國九年（1920）版，第 3a 頁。

〔註 123〕《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 237 頁。

〔註 124〕《觀光紀游》卷五《燕京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0 頁。

〔註 125〕《觀光紀游》卷八《粵南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3 頁。

〔註 126〕《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69 頁。

（大亮）、華客陳理事（允頤）以下二十二人。〔註 127〕

雖然《觀光紀游》並未提及黃吟梅即將內遊之事，但此次「楊君所設祖席」除送別岡千仞外，亦有歡送黃吟梅的目的。

岡千仞行前，諸友贈序。淺田惟常以司馬遷之遊相提並論；元田直贊其「天下之奇文」可以「濟天下之大用」〔註 128〕；高銳一期望此遊使中土士大夫「惕然有警」〔註 129〕；高橋剛稱此行開日人觀覽中土風俗制度之先河；齋藤一馬慨歎「世淺視先生」〔註 130〕；龜谷行謂其可向俞樾、張裕釗等人詢問文法；內村資深預計「彼土人士，亦將眴然愕然，避其鋒且不暇」〔註 131〕。岡氏高足濱田源之序則力倡其師之聯中抗歐說。上述各序，側重不一，亦可見諸人對岡氏中國行的不同預期，涵蓋社會、學術、政治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三處可以反映岡氏自己的設想與憧憬：

> 先生惕然不敢當，曰：「僕奧羽鄙人也。……僕此遊，一目中土文物之盛，宮闕之宏，江河之大，嵩華之崇，以少遣遲暮之感而已。子期僕以漸卿之榮達，非特僕所不勝，抑亦僕之所敢不爲，敢辭。」〔註 132〕
>
> 曰：「余將航海，泛洞庭，登黃鶴樓；上泰山，觀日出，過鄒魯之鄉，謁宣聖之廟；遂入北京，以觀文物之盛。」〔註 133〕
>
> 先生此遊，南航香港，視英佛之跳樑，北至幽燕，目俄虜之蠶食，過上海、福州諸港，視彼所以待我東洋者，必有悲憤鬱積，不能自禁者。〔註 134〕

〔註 12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0 頁。

〔註 128〕《觀光紀游》卷一《航滬遊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 頁。

〔註 129〕《觀光紀游》卷四《滬上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7 頁。

〔註 130〕《觀光紀游》卷五《燕京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0 頁。

〔註 131〕《觀光紀游》卷八《粵南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2～163 頁。

〔註 132〕《觀光紀游》卷五《燕京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0 頁。

〔註 133〕《觀光紀游》卷七《滬上再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0 頁。

〔註 134〕《觀光紀游》卷八《粵南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前兩段爲友人序中所引岡氏之語，強調在野身份及對中土「文物之盛」的嚮往。第三段是弟子的蠡測，亦頗具代表性，意在航遊中國港口城市，窺探西洋「所以待我東洋者」。

岡氏此遊所撰《觀光紀游》共十卷，由《航滬日記》、《蘇杭日記》、《滬上日記》、《燕京日記》、《滬上再記》與《粵南日記》組成。本擬前往洞庭、曲阜、福州等地則因戰爭等現實原因而被迫取消。故筆者試圖從城市印象、重大事件與社會問題入手，分析岡千仞中國行期間的中國觀。若按城市印象劃分，則以上海相、蘇杭相、燕京相及粵南相爲中心。若自重大事件言之，則包括琉球處分、甲申事變與中法戰爭。若從社會問題考慮，則體現在對煙毒、科舉與貪毒的批判及作爲應對策略與解決方案的「藥石之語」上。

（一）城市印象

1. 上海相

5 日 29 日晚，岡氏乘坐「東京」艦離開橫濱，經神戶、長崎、黃浦江，於 6 月 6 日午時抵達上海，正式踏足中土，同行清人除楊守敬（惺悟）外，亦有馮鑿（耕三）、王仁乾（惕齋）等。

岡氏此行是應知己王韜之邀，原先以香港爲目的地：

> 是遊擬航香港，見王紫詮（韜），而後歷遊四方。會紫詮書告移居滬上，乃航上海。〔註 135〕

王韜於 1879 年 5 月至 8 月間東渡日本，與岡氏交往甚密。9 月 16 日王韜返回香港，雖自我推薦，也有丁日昌、何如璋等人幫忙引薦，但他始終受到太平天國事件的牽連，因流亡在外、「通賊」的欽犯身份不爲清廷所用。1884 年 3 月，「王韜從香港移家滬上，結束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註 136〕因此，岡氏隨之改變，以上海爲航渡首站。

由於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歷史與現實上都具有文化親緣關係的中國成了日本「接收外來先進文化的惟一通道」。〔註 137〕而在 1862 年「千歲丸」

---

164 頁。

〔註 13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 頁。

〔註 136〕《王韜年譜》，第 158 頁。

〔註 137〕潘建國《晚清上海崇明黃超曾所輯日本漢詩集〈同文集〉》，《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 年第 3 期，第 57 頁。

訪華後，上海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了「資本主義」、「近代化」等新名詞的最前線，是距離西方最近的「入口」，吸引許多日本志士前往。〔註 138〕岡千仞將其當作整個中國行的大本營，他的蘇杭、燕京與粵南之旅都以上海作爲中轉站。8 月 21 日他重回上海，因「在杭州，聞雞籠之變，倉皇返棹」〔註 139〕，「留月餘日」〔註 140〕。12 月 3 日「歸自燕京，小留迎歲」〔註 141〕。岡氏在《觀光紀游》中分別以《航滬日記》、《滬上日記》與《滬上再記》敘述三個不同時段在上海的經歷。

《航滬日記》正文前的岡氏小序反映出遊歷前其腦海中上海的形象：

> 西連長江，負蘇杭，東南控閩越，萬艦旁午，百貨輻輳，爲東洋各埠第一。〔註 142〕

尤其是後半句最能突顯其心目中上海商業都市的繁華特性。

關於岡千仞親歷上海後的城市印象，福井智子《岡千仞的上海經歷》一文已經做了充分地探討。福井氏詳細探討了岡氏筆下上海存在的「二元對立」：

> 千仞筆下的上海，既有壯大、精緻、華麗，充滿了自然美，以租界爲代表的西洋文明，也有部份士大夫文化以外，擁擠狹窄、充滿惡臭的中國百姓的生活空間，以及鴉片流行造成的社會頹廢，在其中很容易看出「西洋」與「東洋」、「近代」與「前近代」的二元對立。……岡千仞站在「異域人」的立場上，沒有任何顧忌地生動刻畫出「進步的西洋」與「落後的中國」。〔註 143〕

的確，岡氏上海日記中不乏中西、中日以及士民之間二元對立的話語表述：

> 馬車洋制，人車東制。……中土市街，不容馬車，唯租界康衢四通，可行馬車。〔註 144〕

> 文夫來話，曰：「我邦軍艦大炮操練，航海測量，不雇一外人。

〔註 138〕劉建輝著，甘慧傑譯《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 頁。

〔註 13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8 頁。

〔註 14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2 頁。

〔註 14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2 頁。

〔註 14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 頁。

〔註 143〕〔日〕福井智子《岡千仞の上海體驗》，《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6 年第 15 期，第 21 頁。

〔註 14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 頁。

中土軍艦，機關運轉，一雇外人。」〔註145〕

轉觀也是園。垣壁崢嶸，堂階秩序，廻以池沼，蔭以卉木，望以樓閣，接以橋樑，沉沉富貴之相，與門外隘陋，夐然別天地。蓋中土士大夫與閭閻小民，貴賤懸隔，不止雲壤。〔註146〕

劉建輝也指出，茶館、妓館與煙館林立的上海凸顯了上海作爲魔都的「魔性」，其「近代」裝飾的華麗外表下是「華洋雜居」的混沌現實。〔註147〕

一方面，岡氏在刻畫上海繁華的商業文明、士人文化時，與既往的閱讀記憶、本國經驗互相印證。

王夢薇紀上海殷賑，曰：「連街車馬，達旦笙歌，海水爲沸」。眞盡其狀者。〔註148〕

（龍門書院）有泉石之勝，竹樹瀟灑，亭臺雅潔，略似我邦禪刹。〔註149〕

次演《寡婦次子》、《嫖漢嫠婦》，略同我邦雜劇，唯服飾華麗，珠玉燦爛，我邦所不及。〔註150〕

另一方面，岡氏通過親眼所見，發現許多繁華背後的衰敗與凋敝：煙室裏吃煙客醉生夢死；中土「尤重婚葬，互誇資贈之侈。葬儀之盛，往往破產」〔註151〕；所見士人「語及外事，茫如霧中」〔註152〕，「輕浮」，「言不足恃」〔註153〕；「豪戶巨商，徒自封殖，不復思興公益，開民利」〔註154〕。尤其是其筆下反覆提及上海城市的混亂與不堪，與洋租界形成巨大反差。城內「市廛雜沓，街衢狹隘，穢氣鬱攸，惡臭撲鼻」〔註155〕，「市街隘陋不潔」〔註156〕。特別是在岡氏首次於中國跨年後的第二天，他與友人寺田望南往觀城內。從

〔註14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0頁。
〔註14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59頁。
〔註147〕《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第76頁。
〔註14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6頁。
〔註14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1頁。
〔註15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72頁。
〔註15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9頁。
〔註15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78頁。
〔註15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53頁。
〔註15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59頁。
〔註15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9頁。
〔註15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1頁。

新北門開始，丐徒百結，「臭氣撲鼻，時見僵屍」。友人「愕然」，「變色」，岡氏則答以「未足爲異」，似乎對這一場景習以爲常，並將衣冠文士與鄉閭小民分作兩個世界看待：

> 望南失望，疾步而歸曰：「今日始觀動物博覽場。」不覺失笑。中人以衣冠文物自負……此士大夫，千百居一二者。若夫閭閻小民，眼無一丁，鄙猥醜穢，卑污賤陋，自海外人而觀之，與蠢狉野蠻，相距一間。望南遊學歐土，其一見稱爲動物博覽場，亦宜矣。〔註157〕

上述議論充滿鄙夷貶抑，其中還暗含了西洋文明與中國落後的價值立場，雖不無誇張，但多少卻爲實寫，而這是其從以往的書本閱讀中無從知曉的。

《觀光紀游》中塑造的上海在近代文明的光輝下掩藏著衰敗凋敝的現實，徒有其表，華而不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整個城市都籠罩在「輕浮」的氛圍之中。

2. 蘇杭相

6 月 21 日岡千仞抵達蘇州。他此行原意先赴福州，前往蘇州是聽從楊守敬建議的結果。

> 是遊本擬首抵福州見何子峨，而後遊四方。會楊君惺悟將遊蘇杭，曰：「子盍先蘇杭而後福州？」余曰：「從名士爲勝地之遊，百年難復得者。」〔註158〕

岡氏對於蘇杭之行的設想是探幽覽勝，重在文化考察。〔註159〕

蘇杭遊涉及蘇州（含崑山）、紹興、寧波（含餘姚、慈谿、鄞縣）、杭州（含蕭山、金華）與嘉興等江浙城市。岡氏於 7 月 20 日由上海進入蘇州，8 月 13 日因日本公署有命「速歸上海，避危難」而「雇舟」自杭州「返棹上海」〔註160〕，8 月 20 日復歸。《蘇杭日記》卷末總結此行：

> 是遊自上海至寧波，往復四五千里，一資舟楫，不勞寸步，天下豈多有此陸海形勝之地乎？唯中人不講富強之實政、格致之實學，居今世而行古道，騖虛文而忽實理，其爲彼所輕侮，抑有故也。

〔註15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9 頁。

〔註15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5～26 頁。

〔註159〕青木茂夫有《岡千仞〈蘇杭日記〉》一文，惜筆者未能親見。〔日〕青木茂夫《岡千仞〈蘇杭日記〉》，《浙江文化研究》第 25 號，昭和十八（1943）年 3 月刊。

〔註16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0 頁。

廣業洋行，樓面大江，左右馬路，輪蹄絡繹，不分晝夜。花氈玻窗，椅案臥榻，具極精良，頓爲入別境之念。〔註161〕

這段敘述也代表了岡氏遊訪結束後對於蘇杭的城市印象：相比上海洋行林立的繁華別境，蘇杭更能代表傳統中國的士人生活，勝在人文底蘊與歷史積澱的深厚，但同時也帶有不順應時代發展的虛華特徵。

此行有楊守敬、王仁乾等清人結伴導遊。6月30日，楊氏「以官有程期」而不得已就此作別，期以訪其黃州寓所，日夜以待。辭行前，他又爲其「作書，紹介輦下名人」〔註162〕，給岡氏此後行程帶來方便。王仁乾爲浙江人，熟悉家鄉人事，得盡地主之誼。王氏爲慈谿大族，家底殷實，結構龐大。岡千仞造訪時，「舉族歡迎，如親兄弟」，這使其得以「觀王氏家廟」〔註163〕，一窺「士大夫屋宅」〔註164〕，詳細考察中國鄉土宗族社會網絡。王氏極重科舉，「族人登科第者，皆書聯額揭壁」〔註165〕。士大夫房屋凸顯文人之氣，「堂設炕床、案桌、椅子、揭名人字畫，文房器具，燦然照座」〔註166〕。宴客時菜品紛繁，豪華奢侈。

眞正讓岡氏感到驚豔的是蘇杭地區的園林。在中土文士的協助下，他先後觀覽了蘧園、留園、怡園、徐、馮（一梅）諸氏小曲園及應敏齋花園等私人名園，印象深刻，感慨良多。6月24日「雇轎訪李梅生（鴻裔）」，遊其蘧園，發出「余行天下所未目」〔註167〕的感歎；兩天後，「（王）惕齋導觀盛氏留園」，相較前見蘧園時的「愕然」，觀此園時更是「嗒然自失」，稱讚「中土大國，奇偉壯麗，何所不在焉」〔註168〕。6月27日赴李鴻裔之邀，見其寶物「皆人間有數者」，宴客時「鳳炙鶴羹，極海山之珍」，他用「實爲可驚」表達自身感受。岡氏返歸寓所時「過顧艮庵（文彬）」〔註169〕，主人「導觀其所僻怡園」，得見「奇卉異草」、怪石珍禽，「未知洛陽名園有此壯麗否」〔註170〕。

〔註16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65頁。
〔註16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33頁。
〔註16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45頁。
〔註16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46頁。
〔註16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45頁。
〔註16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46頁。
〔註16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8頁。
〔註16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30頁。
〔註16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30頁。
〔註17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31頁。

四天內親訪三園的經歷讓岡千仞最大限度地直接感受到蘇州園林的魅力：

> 乾隆帝南幸三次，常曰：「身爲天子，不及蘇杭十萬富翁快樂自由。」余歷觀留園、蘧園、怡園，始徵是言。〔註 171〕

「留園、蘧園、怡園」的順序並非按時間先後排列，應爲以建制規模與驚豔程度言之，故而「廣四五百畝，樓臺重疊，亭榭迤邐」〔註 172〕的留園居於首位，岡氏對其印象尤爲深刻，當時曾題寫「我遊先自吳門始，且向留園暫小留」〔註 173〕的詩句。此後在天津與盛宣懷筆談時，他亦稱「留園之觀，弟今猶在目，杭蘇之遊，第一驚目者爲留園」〔註 174〕。德國作家海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曾說「旅遊就是豔遇」〔註 175〕，所謂「豔遇」，其實就是旅途中的新發現帶給旅行者的全新體驗。如果用這句話形容岡千仞，那麼他蘇杭之行的豔遇就是發現了這些園林。

作爲「以文章爲性命者」〔註 176〕，岡氏在蘇杭之行中最引以爲豪的是與俞樾的交往。來華前，友人龜谷行贈序冀望其向俞樾問學，詢作文章之法。6 月 24 日，岡氏在楊守敬的陪同下首次拜訪俞樾，稱：

> 先生長考據，富學殖，文章著述，爲一世之泰斗。嘗撰《東瀛詩選》，故於我邦撰著無所不涉。〔註 177〕

這是岡氏對於俞樾的第一印象，視其爲博聞強識的大儒，屬於文壇巨擘、學界宗師。而數天後，俞樾竟然親自造訪，這讓岡氏受寵若驚：

> 蔭甫先生來報。余一窮措大，而先生名位德望，冠絕一世。〔註 178〕

俞樾教導，爲學應講求門徑，論文當多讀古書，岡氏奉作至理名言，「皆閱歷這裡甘苦之語」。6 月 30 日，岡氏辭別俞樾，期以「反棹日，受教門下」，拜

〔註 17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1 頁。

〔註 17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0 頁。

〔註 173〕《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3 頁。

〔註 174〕《盛宣懷與岡千仞、岡千（誤衍，當刪）濯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13 頁。

〔註 175〕轉引自〔英〕虹影《異鄉人手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8 月版，第 102 頁。

〔註 176〕《觀光紀游》卷七《滬上再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0 頁。

〔註 17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8 頁。

〔註 17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2 頁。

其爲師，不意竟爲二人最後一次見面。岡氏呈送所著，而從日後（8 月 11 日）岡氏與俞氏弟子王夢薇的交談中可知，俞氏對其著亦讚賞有加。另外，1884 年俞樾在《致日本人竹添進一》中稱：

> 岡鹿門來，得手書，並承惠《玉篇》一冊，高句驪參二斤，足見在遠不忘之意，感謝之至。〔註 179〕

1876 年竹添氏遊華期間曾與俞樾有過交遊，俞樾亦爲其《棧雲峽雨日記》撰寫序言。1884 年，竹添井井在岡氏臨行前曾託其向舊友俞樾致信、送書、贈物，但《觀光紀游》中並未提及此事。

岡千仞在蘇杭遍遊覽勝的同時，也勾起腦海中曾經的閱讀記憶。《蘇杭日記》涉及吳淞江（蘇州河）、周太僕祠、聖廟、滄浪亭、獅子林、圓妙觀、寶帶橋、杉青園、龍王廟、武穆祠、龍光橋、武林（虎林）、西湖、海潮寺、慈谿會館、七星岩、石佛寺、蘭亭、禹陵、横河壩、文成廟、王氏家廟、天童山、城隍廟、天峰塔、補（普）陀洛山、酌議亭、慈谿湖、大善寺、清田湖、柯山、錢塘江、彌勒寺、鎮海門、子胥廟、飛來峰、朱家蕩等眾多人文古蹟，並徵引左思、柳宗元、王安石、蘇軾、陸游、范成大諸家詩文名篇。即使是經歷了太平軍戰火的侵擾，也無法掩飾蘇杭人傑地靈的特點。

3. 燕京相

岡千仞一直憧憬著燕京之旅，他「在國日思天津、北京，茫爲千萬里外之念」〔註 180〕。行前，友人內村資深贈序提及：

> 先生此遊……觀南北二京，考政教風俗之污隆。過燕趙之郊、吳楚墟，觀古英雄所成敗興亡。〔註 181〕

「考政教風俗之污隆」與「觀古英雄所成敗興亡」也成了岡千仞燕京之旅的主要活動。9 月 27 日，岡千仞乘「武昌」號自上海北上，作燕京之旅。10 月 4 日在芝罘港（煙臺）換乘「重慶」號赴天津，10 月 14 日抵北京小留。11 月 11 日返，經保定府迴天津，12 月 2 日乘「風順」號復歸上海，爲時兩月有餘。

關於岡千仞的燕京之旅，福井智子曾撰《岡千仞的「燕京」遊歷——以〈燕京日記〉爲中心》一文，詳加討論，主要觀點是「岡千仞以科舉弊害、

〔註 179〕鄭逸梅、陳左高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 9 集·第 23 卷·書信日記集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8 頁。

〔註 180〕《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3 頁。

〔註 181〕《觀光紀游》卷七《粵南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2 頁。

鴉片煙毒爲中國社會『內憂』的主要原因」〔註182〕。

如果說晚清時期上海爲商業中心，蘇杭屬文化中心，則地處北方的國都燕京當仁不讓地佔據著政治中心的頭銜。燕京之旅中，岡千仞與多位身居要職的清廷政治人物見面，其中以李鴻章官位最高。

10月10日，岡氏與李鴻章首次見面。下午四點，他在門客朱舜江引導下往謁李鴻章。蘇杭之旅中，岡氏於餘姚結識朱舜水族裔朱弢夫，10月7日，他在天津與其堂弟朱舜江相遇，引以爲奇遇。李鴻章原在京城爲官。光緒九年（1883）八月移官天津。次年（1884）八月，母喪「服闋，授大學士，直隸總督，兼通商大臣」〔註183〕。

李氏首先詢問1876年所交舊友竹添井井之近況，然岡氏則表示不甚瞭解：「此人小人一再面，今不知何狀」。這一回答前後矛盾，應當是岡氏有意爲之的託辭，他不僅對竹添氏頗爲不屑，而且十分在意其《棧雲峽雨日記》。齋藤一馬所撰贈序云：

> 有起而言者曰：「往年竹添漸卿遊漢土……著《棧雲峡雨記》，紀此遊，李中堂及俞蔭甫先生序之，中外傳播，名籍一時。朝廷擢任外務省，攝朝鮮公使，擁節旄，從輿馬，駐箚韓京，士林榮之。今先生以文章氣節自任……以是技，遊中土，中土士大夫待先生，有加漸卿，而無不及也。他日東歸拜高爵，列膴仕，徘徊廟堂之上，如於漸卿今日也必矣。」先生愓然不敢當，曰：「僕奥羽鄙人也。往年奥羽抗六師，僕在其藩，已不能畫一策以靖其亂，又不能棄一命止其逆。今也龍興，群賢彙進，盛節偉業，意氣如雲。僕亦曾讀書，略知廉恥，縱令薄技有可錄，爲二三巨公所拔擢，復何言污朝官，塞賢路，恬然自安乎？……子期僕以漸卿之榮達，非特僕所不勝，抑亦僕之所敢不爲，敢辭。」嗚呼！先生豈以區區利祿爲心者乎？〔註184〕

上述文字中，「起而言者」詳述竹添井井之近況，岡千仞當亦了然於胸。從回答可以看出，遊華前他已絕意仕進，以民間身份自居，此行意在與數年前竹

〔註182〕《岡千仞「燕京」への旅——〈燕京日記〉を中心に》，第22～23頁。

〔註183〕李書春《清李文忠公鴻章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4月版，第33頁。

〔註184〕《觀光紀游》卷五《燕京日記・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89～90頁。

添氏之旅有明確區別。另外，上文在討論岡千仞與俞樾在蘇杭的交往時也提到，岡氏並未將竹添井井託付致信俞樾一事寫入日記，應亦屬有意爲之。

李鴻章調侃岡千仞所著故服「古貌古心」，「語帶諧謔」，進而詰問其「知時務乎」。這引起岡氏的不悅，鋒芒畢露地諷刺回擊，讓李氏尷尬「默然」，藉口他時再晤結束對話。岡千仞則顯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小人歸途，將出齊魯之郊，拜曲阜廟，再晤不可復期」，作揖告退。二人初次見面就充滿了火藥味，硝煙彌漫。兩天後，經盛宣懷之口透露了李鴻章「深感子志」〔註 185〕的態度，但積重難返，暫時「無可下手」〔註 186〕，岡氏則以其未盡人事。

在北京停留一段時間後，岡氏返回天津。11 月 21 日，他請朱舜江「介謁中堂李公」，第二天則被告知「中堂公公務鞅掌，無暇延見」〔註 187〕。11 月 26 日再赴總督署，李鴻章親自出迎，這也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李氏稱讚其《尊攘紀事》「敘事有法，議論雄偉」〔註 188〕，岡氏亦頗爲誠懇地寄望於李氏：

> 方今中外，皆屬望相公，切望乘是機，建大策，運大勢，轉禍爲福，變危爲安。〔註 189〕

而從李氏的回答中則可窺探其無奈與束縛的感覺：

> 老夫意以爲非經五年，則不可有爲。老夫叨蒙大用，任大責重，欲請間自便，而不可得。切羨足下絕念當世，漫遊域外，以遣其壯志。〔註 190〕

這道出了李鴻章雖然位高權重，但卻無法一任其志，自由施展的矛盾心理。談話結束的當晚，岡氏即作書朱舜江，強調中土欲求自強當先以自治爲本，期以此語轉告中堂。

雖然岡千仞與李鴻章僅有兩次交談，但每次見面他都非常重視，有禮有節。謁見之前，他都請求其門客代爲稟告，而且均提前到達。一開始，岡氏對中堂之書法不無微詞。6 月 19 日，跋李中堂書曰：

> 「有爲之士，不留心末藝。今見伯相書，不似今能書人，慕晉

〔註 18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9 頁。
〔註 18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00 頁。
〔註 18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3 頁。
〔註 18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5 頁。
〔註 18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6 頁。
〔註 19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6 頁。

> 仿唐，此伯相所以爲伯相也歟？」或曰：「世多伯相書，多出門客手。」〔註 191〕

11 月 25 日書李中堂書後，曰「中堂書不合法，豈英雄不善書歟？」〔註 192〕，使中人頗爲不滿。雙方首次交談也由於中堂的出言輕佻及岡氏的寸步不讓最終不歡而散。岡氏對於中堂的印象充滿矛盾：8 月 21 日與張煥綸密談時表示自己在處置朝鮮亂徒一事上「尤所服於中堂公」〔註 193〕，11 月 9 日日記云「廷臣用事者，皆醇王黨，與中堂水火不容」〔註 194〕，11 月 24 日介紹好友周馥時稱「李中堂喪母，此人議止官僚賻金，以故忤中堂云」〔註 195〕。第二次見面則讓雙方對彼此的態度有所改變，岡氏將自己的眞實想法告訴中堂，事後又作書將「藥石之語」向中堂和盤托出。

1 月 19 日，岡千仞在廣東府與陳喬森交談時稱：

> 小人前日遊北京，其所耳目，大異讀書史所講究。私以爲從來論者，皆不達中土大勢。……（北京）泥古而不通今，拘常而不知變，不可與論當世之事。〔註 196〕

以上是岡氏結束遊覽後的感受，失望之清溢於言表。筆者以爲，在燕京之旅中，岡千仞不僅進入了中國的政治中心，而且接觸到高層的政治人物。他不滿於循規蹈矩、食古不化的舊有政治格局，因而將整個燕京也看成是頑固守舊的化身。不過岡氏此行也並非一無所獲，至少他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李鴻章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4. 粵南相

1885 年 1 月 5 日，王韜建言「閩粵暖地，宜冬遊者」，岡千仞遂決計「究閩粵諸勝，而後舉長江之遊」〔註 197〕。1 月 8 日乘「高升」號離滬，1 月 11 日抵港。1 月 14 日乘「保安」艦，翌日至廣東府，停留近月。2 月 12 日，因病返港休養。4 月 10 日乘「底卑蘭」艦東歸。4 月 18 日達横濱，「乘汽車入都」〔註 198〕，日語汽車乃火車之義，即岡氏最後乘火車回東京。

〔註 19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2 頁。
〔註 19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6 頁。
〔註 19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2 頁。
〔註 19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5 頁。
〔註 19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5 頁。
〔註 19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1 頁。
〔註 19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60 頁。
〔註 19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4 頁。

2月11日，岡氏因病離開廣東前稱：

> 廣東大府，人有氣概，且喜文士。極爲可遊之地。唯戎馬倥偬，閫外萬緒，加之韓事爆發，到處嫌疑。余遊非其時也。〔註199〕

他對廣東印象頗佳，尤其滿意與當地文士的交往，目其爲學術氛圍濃厚之地。但因甲申事變的影響，此遊未能盡興。岡氏初抵珠江口，便看到軍艦雲集、炮臺環列的戰備景象，再加上普通民眾受政府影響，「忌外人如虺蛇」〔註200〕，常存戒備提防之心，故其以爲「遊非其時」。但他的論見在與文士的對話中得到充分發揮，並且引起共鳴。特別是在1月19日與陳喬森的談話中，岡千仞吐露了此次中國行的感受，稱燕京之旅所見所聞與「讀書史所講究」迥異，得前人未得之中土大勢。他認爲

> 北地氣候高寒，人民貧陋，物產鮮少，地性犖确，衣食百物，皆仰東南數千里外之地，非帝王置都府之地。……今也北京，以地勢則北鄙，以形勝則散地，以氣候則高寒，以人户則寥落，以道程則遼遠，絕非帝王奠鼎之地。〔註201〕

「泥古」、「拘常」的北京不適宜定都，岡氏言論之大膽連對方都「怫然」〔註202〕。並且，他所見街道四通八達，商貿活動豐富頻繁，繁華程度可以媲美上海、香港。

岡千仞的粵南之旅爲時三月有餘，大部份時間在香港養病。陳湛頤曾專節討論中法戰爭陰影下的香港，並稱其「服藥靜臥」期間所記不外兩者，一爲病情變化與英醫診治，一爲輯錄新聞報導或引述來訪言談。〔註203〕究其得病之因，主要是赴宴時過於貪食，「恐負厚意，強食終饗」〔註204〕，再加上不適應廣東「霧雨不時，寒溫屢變」的「卑濕」〔註205〕氣候，導致其罹患瘴毒。又由於中醫姚蕉石的誤診，岡氏的健康每況愈下，「病勢日加」。岡氏對中醫的印象一落千丈，以爲「庸醫淺術，不可託性命，乃決航香港，請洋醫之治」

〔註19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4頁。
〔註20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0頁。
〔註20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1頁。
〔註20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1頁。
〔註203〕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209頁。
〔註20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5頁。
〔註20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9頁。

〔註 206〕。李文田診斷後稱「若託治歐醫，萬無生理」〔註 207〕，此後英醫哈亞底東亦云「病發日，施良治，不必至此」，更證明姚氏醫術不精，耽誤病情。岡氏邦人北村虎吉亦有洋藥勝於中藥的看法，「洋劑固勝漢藥，唯千年慣習，不能俄變」〔註 208〕。兩個多月後，岡氏在哈亞氏的調理下逐漸恢復，但沒能按照預期「舉長江之遊」，而是接受哈亞氏「日東風氣適人體，宜待稍復，直航東歸，從事於湯藥」〔註 209〕的建議回鄉繼續休養。中醫與西醫的效果在岡千仞身上產生了鮮明的對比，也印證了其對於外洋事物的偏好。但病痛並未影響岡氏對於粵港地區良好的城市印象，他經常批判的中土陋俗「至廣東，語言風俗漸脫頑陋習氣」〔註 210〕；他數言中土矇於外事，交往不暢，而稱香港「一歸英手，東西交際，日盛一日，非特利英國一國」〔註 211〕。粵南之旅中，岡千仞對於中國的認識進一步加深，形成了南方，尤其是粵港更爲開放，東西交流更爲繁盛的印象。相應地，作爲清朝政教中心的燕京地區在其話語體系中逐漸淪爲落後與保守的同義詞。

（二）重大事件

1. 琉球處分

明清兩朝，琉球一方面持續向中國朝貢，另一方面又與日本薩摩藩保持聯繫。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改琉球王尚泰爲琉球藩主，否認與清朝的關係。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對於琉球問題的基本態度是「琉球表面上屬於中國，實質上屬於日本」〔註 212〕，而民間則基本盛行琉球獨立的論調。明治七年（1874），日本又藉口琉球漂民在臺灣被殺，出兵征臺，實際上將琉球劃歸本國所有。〔註 213〕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廢除琉球藩，設立沖繩縣，以廢琉置縣的方式處理琉球問題，史稱「琉球處分」，日本的這一國策是牽涉近代

〔註 20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1 頁。
〔註 20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3 頁。
〔註 20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5 頁。
〔註 20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3 頁。
〔註 21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2 頁。
〔註 21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0 頁。
〔註 212〕〔日〕安岡昭男著，胡連成譯、王曉秋審校《明治前期日中關係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第 28 頁。
〔註 213〕〔日〕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爲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 月版，第 13 頁。

中日關係的重大事件。〔註 214〕

來華前，岡千仞關於琉球處分問題的態度主要體現在明治丁丑（1877）八月爲邦人伊地知貞馨《沖繩志》（一名《琉球志》）題寫的序言之中。他將琉球視作日本西南方向的重要屏障，但近來俄、美等國對日本已有覬覦之心，且琉球同時又受中國封拜，「一島兩屬，名號不正」〔註 215〕。因而日本政府冊封琉球島主爲藩王，將其納入本國體系之中的舉措實際是利於東亞抵抗外侵的良策。

琉球處分是岡千仞此行十分關心的社會事件，他在與中國文士交談時曾經涉及。1884 年 7 月 10 日，他在杭州首次提到：

> 晚間章、馮二姓來話，曰編《琉球志》。余因問源爲朝王琉球、島津氏略琉球二事，不能答。豈二人故託言編著，以試余答如何乎？〔註 216〕

章爲章魯泉，馮爲馮則成，昨日曾陪其共遊海潮寺。岡氏選擇的兩件史事都是歷史上日本曾經統治琉球的證據，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而從其對於二人無法回答的反應上看，此時岡氏關於琉球處分的話題還是心存戒心的。結束蘇杭之旅回到上海後，岡氏初次表達自己的琉球處分觀點。8 月 21 日，他在看到張煥綸爲姚子梁《琉球志》所撰序文中「痛擯我縣琉球之爲無名」之後，以英法百年之役爲例，希望中日兩國協力對抗歐美，但卻以自己的民間身份作爲藉口迴避了張序提出的疑問，中人亦一笑了之：

> 「……於是兩國解怨，協心戮力，西其鋒，則歐米各國無一足懼者。此可以雪東洋積年之辱也。僕林下人，不知縣琉球之何故，唯一目東洋威武震歐土，則足矣。」眾皆大笑。〔註 217〕

12 月 14 日，岡千仞在上海讀到了與自己意見類似的《興亞策》五篇，作者李鍾玨主張中國不如把琉球讓給日本，聯合對付歐美列強。岡氏附論其後，稱中日兩國唇齒輔車，不能因屬於「末界微事」的琉球處分影響內部團結，讓

〔註 214〕關於琉球處分的展開及日清提攜的政策，詳參〔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關係史の研究》，京都：東京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 年 2 月版，第 296～308 頁。

〔註 215〕〔日〕伊地知貞馨著，重野安繹校《沖繩志・序》（一名《琉球志》），東京：有恆齋，明治十年（1877）三月版，第 3b 頁。

〔註 21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40 頁。

〔註 21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9 頁。

他國有可乘之機：

若中土積區區之微嫌，目敝邦爲有異圖，責以匪衷之語，則東洋之多事源於此。《傳》不言乎？鋌而走險，不可不戒焉。〔註 218〕

中國行期間岡千仞主要是站在本國立場上討論琉球處分事件，延續了來華前的觀點，他關於「琉球處分」的看法較爲曖昧，在其《觀光續紀》中並未專門設立有關琉球的條目，在《觀光紀游》中，他也盡量避免涉及關於日本佔領琉球合法性的辯護，而是從現實中抵禦外侮的角度進行考慮，冀望中國能夠放棄琉球，擱置爭議，與日本和好，齊心協力，共同對抗西方列強。

2. 中法戰爭

關於岡千仞與中法戰爭，福井智子曾有專文討論，其主要觀點爲

《觀光紀游》無論在史學上的資料價值，還是作者考察力的深刻性方面均超過了其他遊記，究其原因可以說正是由於經歷了中法戰爭。〔註 219〕

通過中法戰爭可以提供對其「興亞」思想的認識。〔註 220〕

上文在分析《往津日記》與《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時曾經對晚清中法兩國在越南問題上的交涉有所研析。1884 年，法軍在中國南方的福建、臺灣等地與清軍交戰，岡氏遊訪的上海、芝罘（煙臺）、天津、香港等地幾乎均爲沿海城市，都籠罩在中法戰爭的陰影之下。出於安全考慮，岡氏不得不改變預定行程，變更線路，無法盡興優遊蘇杭勝地，想要前往福州等地的願望亦未能達成。中法戰爭涉及東亞國家如何應對西洋列強入侵的問題，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中反覆加以討論。

途經各地海港時，岡氏十分留心軍艦、炮臺等武器設施，注意觀察清軍的備戰情況。初至上海，6 月 12 日他在平野文夫的引領下參觀本國扶桑艦，詳細描寫其大炮、電燈、蒸汽器械等裝備，稱：

中法構難以後，各國發軍艦，巡視中土各埠。〔註 221〕

6 月 16 日又隨平野氏、武田秀雄考察美艦、法艦，尤其是後者

〔註 21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0 頁。

〔註 219〕〔日〕福井智子《岡千仞と清仏戰爭》，《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7 年第 16 期，第 15 頁。

〔註 220〕《岡千仞と清仏戰爭》，第 25 頁。

〔註 22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 頁。

陳大炮十五門，瑩然如新發硎。陳野戰炮無數。〔註 222〕

9 月 27 日從上海出發北遊時，岡氏看見

炮臺亙十數里，面海一方，雞籠變後所增築。不見一軍艦，曰移繫長江口，以備法虜。〔註 223〕

11 月 27 日途經大沽，稱「兩岸炮臺，比來時壘壁加壯」。12 月 1 日返程至吳淞口時，亦見

兩岸新塡大石，餘江心二十五丈間，爲船舶通路。此前時所無，其急於防備可知也。〔註 224〕

從上述岡千仞所作描述可以看出晚清中國沿海地區戰事氛圍之濃厚，戰爭陰影之強烈，大戰當前，一觸即發。《觀光游草》收《走艦入珠江，法寇方急，候臺森列大炮，備禦極嚴》一詩，詩題即點明珠江口如臨大敵、戰備森嚴的景象。1885 年 2 月 12 日乘輪艦返香港休養時，以「縮遠鏡遠望」，觀得虎門炮臺全貌，憶及松村將軍之事，表明自己「逍遙兵間，無一戒心」〔註 225〕。

8 月 6 日與沈孳梅（瘦生）談及中法戰爭，岡氏稱「不戰，則中土國威不振，戰則百萬糜爛」〔註 226〕。8 月 13 日及 14 日在杭州，僧人無適以《申報》消息相告，大意謂法艦已攻陷臺灣雞籠，清軍防守不力，痛遭貶斥。岡氏詳細表達對於中法戰爭的看法：

余每逢士人，說法事，多笑爲過慮。臺灣，東洋要地，一旦歸彼手，東洋多事，始於此。〔註 227〕

此語外人讀之，猶且憤懣，況隸其土籍，食其土毛者乎！抑英人取略取彈丸黑子香港，猶能網東洋貿易大利。臺灣大島，一朝屬法手，據中日之上流，制控禦之權，此東洋局面一變者。〔註 228〕

他不贊成清人對「法事」掉以輕心的態度，尤其是他立足東亞，從地理位置、戰略地位、經濟貿易等角度綜合考慮臺灣，而不是割裂開來，只是簡單地從中國方面看待，透視出問題的緊迫性與嚴重性。岡氏不僅見地深刻，目光長

〔註 22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 頁。
〔註 22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1 頁。
〔註 22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8～139 頁。
〔註 22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4 頁。
〔註 22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7 頁。
〔註 22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0 頁。
〔註 22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1 頁。

遠，而且從東亞近代史看，這種先見之明充分發揮了其作爲史學家的史識與史才。再聯繫到他在 8 月 14 日日記中附載往年搜集的臺灣沿革材料，可以看出岡氏以上言論並非信口開河，而是經過長期觀察後的有的放矢。《觀光紀游》的記載亦從側面反映出中法戰爭陰影下中國的社會狀況。9 月 25 日，渡邊告知北京現狀，云「法人生事，當路洶洶，唯閭閻間不異平時」〔註 229〕，則中法戰爭對於中國高層政治的衝擊可想而知，但民間社會則未受太大影響。

因爲自身具有深厚積累的底氣，所以岡氏在談及中法戰爭時常能有針對性地批判清人的觀點。關於中法戰爭，王韜的觀點是

> 中土六省皆面海，不可一一備軍艦、築炮臺。今日之事唯有待彼上岸，而制勝野戰耳。〔註 230〕

對於上述言論，邦人松村少將謂「彼安知兵」，詳加駁斥，稱「火器制於內地，不如購之洋外」。岡千仞稱松村氏

> 見極透矣。而今開四所機器局，謂我已有彼長技，悍然起與之交鋒，此未爲得焉。〔註 231〕

他認爲清廷開局之舉僅是表面工夫，遠未達到可與法軍抗衡的地步，揭示出機器局的實質。7 月 12 日，慈谿王表卿在眾族人面前表示應當前必須與法一戰，方能樹國威，岡氏則以爲「士人瞶焉無主見，漠焉如無聞」〔註 232〕。8 月 16 日，面對丁立誠等人在「法事」上的危激言辭，岡千仞以爲：

> 中土人構虛文，好大言，無一堅忍人。……中人並在不得外情。〔註 233〕

這是他站在域外人立場上較爲公允的評價。岡氏不只是傳統的漢學家，他曾翻譯《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洋書，熟悉域外大勢，因而能發表此類見解，亦足見其對於東亞事務之用心。8 月 29 日，他與姚文枏（子讓）、垘本禮（蠡泉）、朱莘田筆談時表示：

> 以強敵強而後，曲直爲老壯，若以弱敵強，雖直亦老。……今中土募無賴惡少，不敢齒人者爲兵，以是敵歐兵，此雖直亦老者。〔註 234〕

〔註 22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6 頁。
〔註 23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0 頁。
〔註 23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1 頁。
〔註 23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47 頁。
〔註 23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2～63 頁。
〔註 23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2 頁。

這段話以事實爲依據，理由充分，大膽直白，道出了清軍自身素質低下的客觀事實，因而說得三人啞口無言。11 月 17 日與蓮池書院生員討論中法戰爭，一士子亦要求大舉「征討剿絕」法虜，以揚國威。這種觀點是民族主義情緒與書生意氣雜於一體的典型產物。岡氏則反問士子：

> 諸君盍以講八股之餘力，旁讀譯書，以講究彼所以日致富強，橫行宇內，策所以一變千年之陋習迂見？〔註 235〕

巧妙地與自己對科舉制度的批判結合起來，發人深省。

岡氏在日記中常著錄報紙所載戰事，並於其後發表評論，類似史書寫法。8 月 23 日，忽接日報，得知當日午間法艦在閩重創炮臺及造船局。8 月 24 日引述日報戰事，法艦重創福建海軍，岡氏稱：

> 左元帥之督閩浙……投鉅萬創是局……頗爲巨構……而今付一炬，眞可惜者。〔註 236〕

12 月 6 日稱「曾謂英法匹也」，其後引述《申報》所載「法人流丕義勇入安南始末」的大段報導，他對於中法越南問題的態度是越南疏於軍備，自招侵擾，而中國派軍保護越南則師出無名。

> 安南自安僻陋，忽防備，啓法人逞虜之心，固無足爲怪。且中土爭藩屬之義，未爲得矣。蓋中土大國，故四鄰小國，恐其併呑，爭先朝貢，請藩屬虛名，自謀保全。〔註 237〕

2 月 18 日引述日報所載「法兵取諒山事」，以爲安南歸法，方爲「百世之利」。關於中法戰爭，媒體的報導多有出入，甚至是大相徑庭，岡千仞則有自己的選擇標準。8 月 7 日，顧良鵬示以《申報》，岡氏因其「語多矜伐」，以爲「不實」〔註 238〕。2 月 25 日，關於法兵追擊中艦於斯波島一事，岡氏以爲本邦《郵便報知新聞》較中國之《申報》、《滬報》、《循環報》更「似得其要」，而摘引其報導。3 月 9 日，菅川氏述以西字日報所載，岡千仞則不以爲然：

> 西字報亦揣摩臆說耳。法事興後，訛言四起，日刊諸報，譸張誇大，悚動人聽。一犬吠實，萬犬傳虛，往往是類。〔註 239〕

他對於報導並不盲從，而是在進行獨立價値判斷後自我選擇。

〔註 23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0 頁。
〔註 23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0 頁。
〔註 23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6 頁。
〔註 23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7 頁。
〔註 23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6 頁。

岡氏對於中法戰爭十分關心，留意從邦人處探知消息。8 月 8 日，詢問本源寺僧心泉，答云「已開戰端，未知勝敗如何」，岡氏從事理上考慮，恐其爲「訛傳」〔註 240〕。9 月 16 日再次與平野、武田會面，提出「公法不行東洋」〔註 241〕。9 月 18 日一聽見曾根俊虎「歸自福州」，立刻「往見問戰事」〔註 242〕，得出清軍「漫無紀律」的印象。第二天，載松村之言，有云：

> 中艦懈備如斯，宜其取大敗。……勝敗速決如此，實古今史乘之所未曾載記。〔註 243〕

尤其是 1885 年 2 月赴香港養病期間，由於行走不便，出門困難，岡氏有關中法戰爭的信息除源於報刊報導外，主要聞自邦人之口。2 月 13 日，島村千雄告知「法兵陷安南諒山」，福州、上海等港均已戒嚴的消息。2 月 16 日，川村由義自安南來投，言 11 日以來，「安南境內，無復一中兵」〔註 244〕，岡氏感歎「法人窺安南久矣」，法據越南，則日本亦受威脅。2 月 22 日，町田領事結合自己久居中國的經歷談道：

> 東洋各國……其能獨立維持國勢者，唯有中土及我邦而已。蓋我千年風化，皆出於中土，不特同文教，人情嗜好，亦如合符節。……而邦人或以臺灣、琉球、朝鮮事變懷嫌忌，以最近親鄰國，爲我異趨舍者，謬亦甚矣。〔註 245〕

町田日中提攜的、睦鄰友好、協同抗敵的主張與岡氏如出一轍，因而他非常贊同，表示「此言獲我心矣」。3 月 3 日，川村由義呈示法人入安南始末書，岡氏節錄內容，並於其後論曰：

> 安南至此僅領七州，東南沃土皆屬法。不弔於天，一至此。於無邦國盡瘁之歎乎？〔註 246〕

他將法人入侵看作是安南自身戒備疏忽的緣故。3 月 11 日，菅川氏示法人略臺灣狀之書，岡氏撮其大義，文末形容

> 而中土決志防戰，每經一敗，四募義勇，兵眾日加，譬猶痿痺

〔註 24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8 頁。
〔註 24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1 頁。
〔註 24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0 頁。
〔註 24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1 頁。
〔註 24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6 頁。
〔註 24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8～189 頁。
〔註 24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3 頁。

病夫，以針灸衝動活潑元氣，法人亦無如之何。此亦可以爲佳兵不戰者之戒也。〔註 247〕

他以中醫之針灸作比，說明清軍新募之兵亦能重創法軍。

岡氏對於中法戰爭最詳細的表達出現在 9 月 21 日他與張煥綸的密談中。岡氏希望李鴻章能「奉醇邸若恭邸，使於法國，以霹靂手段，出彼意料之表」〔註 248〕。這一建議建立在其多年來對於本國國情的體認上：

僕在日東，目擊歐米事興以來，治亂興廢之故，略知東洋所以致今日之難。……竊以爲凡事皆有機會，唯一二見幾之士，乘擾亂之機，投風雲之會，奏廓清之功，如敝邦承積弊之餘，一掃立國三千年之陋習，建明治中興之基也。然則法人開是變，天實降一大幸運於中土也。……中土大病，在在上大臣，矇於域外大勢，知中土爲禮樂文物之大邦，而不知域外禮樂文物之大邦，如中土，鄰並相望。〔註 249〕

岡氏此語是設身處地地爲中國考慮，利用本邦經驗爲清軍迎敵出謀劃策。尤其別具新意的是他將中法戰爭看作是「千歲不再來之機」，中國若能好好把握，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必能到達日本當年一掃千年積弊的效果。中國由於社會長期處於平穩安定的狀態，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均有所懈怠。因此，他建議清廷遣使歐美，學習其格致實學，文明政法，如此亦能加強東西方的聯繫與理解，避免戰爭的爆發。這是基於中國國情的中肯之言，也是對洋務運動徒學西洋器物之表的批判。除了引以爲知己的張煥綸以外，類似的言論亦見於岡氏與其他滿清政要交流的場合。10 月 10 日與天津海關道道臺盛宣懷筆談時稱：

太平之久，文恬武嬉，弊竇百出，致其有今日，固不足怪焉。〔註 250〕

他認爲「異日生事東洋者必法也」〔註 251〕，隨後陳述本邦「幕府衰替之極，致今日之中興」，建議清廷「策所以變禍爲福，轉危爲安」〔註 252〕。10 月 17

〔註 24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8～199 頁。
〔註 24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3 頁。
〔註 24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4 頁。
〔註 25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8 頁。
〔註 251〕《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2 頁。
〔註 25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8 頁。

日拜訪總理衙門行走鄧鐵香，鄧氏希望中日「戮力」抗法，挫其「凶鋒」，要求嚴懲法虜，「一戰以奮起士氣」。岡氏則駁其謬見，主張

一得彼要領，辨曲直，仗名義，以講和，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固可爲東洋各國吐氣也。〔註 253〕

使原本「變色」、「沉吟愈苦」的鐵香「顏始和，氣始降」。但即便是岡氏也對所論心存疑慮，懷疑數千年都「夷視他國」的中國能否朝自己預期的方向發展。11 月 27 日辭別盛宣懷時，面對盛氏以日本協助法軍傳言的試探，岡氏以堂奧門戶比喻中日兩國「相須爲一家」、「輔車相依」的關係，本國斷不會乘人之危，而是與中國協力謀事，共振亞洲。1885 年 1 月 12 日謁見廣東布政使龔易圖時以英法喻東洋，謂「法與安南，猶英於印度」〔註 254〕，今日之事，實可以轉禍爲福，易危爲安。當然，清人中亦有頗存顧忌，不願談及中法戰爭者。10 月 2 日，方汝翼來訪，面對岡氏如何看待「法虜猖獗」一事的疑問，方氏卻沉吟良久，託言公事，提前離去。岡氏以爲：

豈嫌與外人談時事，害國體乎？要不解事體者。〔註 255〕

岡氏並非意在刺探情報，而是尋求應對之策，但方汝翼的身份爲煙臺海觀道道臺，具有官方色彩，且當時還有他人在場，因而他未做應答，也屬情有可原。

3. 甲申事變

上文曾通過金允植的燕行錄討論他在「壬午軍亂」時期的力挽狂瀾。這一變局最終導致日朝《濟物浦條約》與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的簽訂，中日兩國同時在朝鮮駐紮軍隊。而從實際結果看，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在 1876 年《江華條約》的基礎上逐步加強。1884 年朝鮮爆發甲申事變，表面上是其「國內獨立黨與事大黨爲爭奪政權而引起的內訌」〔註 256〕，實質上「係日本利用朝鮮親日派所釀成之政變，目的在剷除當政之事大黨，以推翻中國之宗主地位」〔註 257〕。1884 年 12 月正值中法激戰之際，部份派駐朝鮮的清兵被

〔註 25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04 頁。

〔註 25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3 頁。

〔註 25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4 頁。

〔註 256〕彭澤周作，李永熾譯《甲申事變與日法關係》，《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臺北：大陸雜誌社，1970 年 9 月版，第 220 頁。

〔註 257〕王信忠《甲申事變始末》，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等編纂《第一次中日戰爭》，

抽調以對抗法軍，金玉均等人遂趁機暗中勾結日、美突然發動政變，幸賴金允植密告清廷駐將袁世凱，後者及時控制局勢，妥善處理，最終掌握局面。1885 年 4 月，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簽訂《中日天津條約》，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而中國對朝鮮的控制實際被削弱。

12 月 13 日，岡千仞從大義內英處得知 12 月 7 日中日駐軍戰於朝鮮王城一事，「未得其要」，「意不自安」，樂善堂光本氏告以詳情，此時岡氏的態度是

> 余以爲中法構兵，申之以韓土，東洋多事一至此。意愈不安。〔註 258〕

他從東亞整體考慮，認爲中日的關係是「唇齒輔車」，擔心即將到來的動盪，而不只是僅僅顧及本國利益。當日附論《興亞策》五篇後稱聽聞甲申事變後「通宵不寐」，足見其對於中土大勢的牽掛。《觀光游草》中有《聞韓地變驚賦》一詩，云：

> 韓王與我盟兄弟，手書求援一何急。……行知東洋日多事，東望眼穿嗟何及。〔註 259〕

在強調日本與朝鮮情同手足的同時，又表現出東洋此後將進入多事之秋的憂慮。12 月 30 日，岡氏在聽說三菱郵船入港後，立刻前往領事館，翻閱日報，求得甲申事變的詳細報導，並輯錄入書中，於其後附論「韓土多事，年甚一年，時勢不得不然者」〔註 260〕。

一方面，岡氏面對中土文士的質疑，不得不再次申論自己「興亞」的理論。12 月 15 日，黃夢畹稱

> 日人幸中土多故，故生事端，其謀可知。〔註 261〕

岡氏以黃氏所言爲「臆推揣摩」，邦人「無一人不聞法事而切齒」，本國公使爲中國費盡苦心，總是與清廷及時溝通。12 月 18 日，他又在本願寺談及甲申事變當屬「暴徒所爲」〔註 262〕，希望中日兩國親爲一家，化干戈爲玉帛，和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六冊，臺北：正中書局，1957 年 4 月版，第 127 頁。

〔註 25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0 頁。

〔註 25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99 頁。

〔註 26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8 頁。

〔註 26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0～151 頁。

〔註 26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1～152 頁。

平化解矛盾。1885 年 1 月 6 日在與狀本禮的交談中，他強調日方不會乘中土危難之際而施以不義之舉，此爲突發事件，並非出自兩國政府的本意。1 月 20 日面對「語漸犯人」的文廷式，岡氏以爲甲申事變「不足爲異」：

> 朝鮮蕞爾小國，勢不能自立。自今而後此等變，旦暮接踵，亦不可知。〔註 263〕

其潛臺詞是中日兩國不能因此末界微事破壞長久以來彼此的良好關係。1 月 27 日面對徐賡生「疑我邦通謀法人」的質疑，岡氏「答書痛駁」，不僅批判中土士人矇於外事，亦提出必須盡快自強的解決方案：

> 中土方今急務，在大仿歐米，謀富強之術，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註 264〕

另一方面，他也詢問國人對於甲申事變的看法，而他們所言往往貶低中兵，偏向本邦，崇尚武力，認爲竹添公使之舉屬於揚威海外：

> （山吉氏）中兵無紀律，爲韓人所厭，今又助亂黨，愈失韓人之望。英美諸公使，亦同我兵避亂濟物浦。中日曲直，各國公使明知之。〔註 265〕

> （寺田望南）仗義奮鬥，以二百精兵，敵千百環攻之中兵，有死而無退，以揚我武於域外，雖敗猶榮者。今觀中兵群進，付國王亂兵，狼狽遁去，貽笑海外，殆辱公使職者。〔註 266〕

相比而言，岡氏的評價更顯公允：

> 日人曲中，中人曲日，自是人情。唯事出匆卒，非出二國政府之意，不必害中日交際。〔註 267〕

他不只是從本國利益出發思考問題，而是通盤考慮，以其爲突發事件，盡可能縮小影響，努力維繫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1885 年 3 月 5 日，田邊書記來問，岡氏重申其在上海期間之言論，稱

> 事涉域外，彼此情實，互相齟齬，故致此變。若大臣奉使命，通兩國之情，則歡然歸無事。〔註 268〕

〔註 26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2 頁。
〔註 26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6 頁。
〔註 26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1 頁。
〔註 26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4 頁。
〔註 26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1 頁。
〔註 26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4 頁。

他還是希望中日雙方能夠加強對話，互相溝通，將甲申事變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岡氏對於中法戰爭、甲申事變的相繼爆發深感痛心，極爲憂慮。3 月 20 日，在閱覽日報後感歎：

> 安南、朝鮮爲中日門户，門户已毀，不得不累及堂奥者。〔註 269〕

同時他又因自己的建議不爲清人理解而鬱鬱不平，甚至在香港期間因此耽誤了病症康復的進程：

> 中土不諒我所論，則百萬糜爛，此不快尤大者。病夫非有所職，而每念至此，悒鬱覺病苦愈重。〔註 270〕

他雖然已非政治人物，沒有官方色彩，但卻深明大義，從政治外交角度對中國問題進行長遠考慮，主要是因爲他潛意識裏將中國當作文化母國，思考時的預設與立場也在中日之間游離。

（三）社會問題與「藥石之語」

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例言》中曾云：

> 是書記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議其過甚。顧余異域人，直記所耳目，非有意爲誹謗。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爲藥石之語乎？〔註 271〕

來華前，他對踏訪禹域滿是憧憬，但來華以後，其所見所聞卻與行前的種種設想形成巨大反差，失望之情溢於言表。《觀光紀游》中有不少對於中國弊病的批判，而且用語直白，言辭激烈，不留情面。這些社會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風俗等各個層面，其中以煙毒、科舉、貪毒最爲突出，在岡氏筆下反覆被強調。「藥石之語」則是岡千仞社會現狀出發，爲中國根除弊病，擺脫落後局面，與日本攜手共振亞洲而提出的中肯建議。

1. 煙毒

煙毒是岡氏來中國後遇到的首個也是此行中最爲頻繁提及的社會問題。本章第二節在討論《觀光紀游》之成書時曾經述及初抵上海時，岡千仞對於好友王韜吸食鴉片的看法，雖然與初稿相比，定本稍顯委婉，但仍可感其痛惜之情。

〔註 26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3 頁。
〔註 27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9 頁。
〔註 27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 頁。

岡千仞筆下，中土鴉片盛行，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鄉閭平民，其所到之處，皆受鴉煙毒害。在《觀光續紀》「鴉片」條下，岡氏稱「清人嗜鴉片甚食色」，「鴉片爲日用必須物」，「全國薰染煙毒之中，自不知其非」〔註 272〕。《觀光游草》中有《煙店歌》一詩：

> 中土煙毒盛行，不特小民嗜之，士大夫亦湎之；不特庸愚者溺之，聰明人亦泥之。人人明知其毒人，不敢自拒絕，無謂甚者，賦此以諷。
>
> 滬上繁華千萬户，中有煙館擁大路。……沉湎煙能移人性，憔悴煙能縮人命。此事坐視不敢問，泄泄誰謂國有政？嗚呼，蚩蚩之民有何罪？嗚呼，蚩蚩之民實無罪。〔註 273〕

根據詩中所敘，上海煙館林立，盛況空前，岡千仞詳細描寫館內煙客抽食鴉片時醉生夢死、精神恍惚的狀態。無論是在閭閻小民，還是在聰明文士中，鴉片都風靡流行，即使中人明知其會「移人性」、「縮人命」，卻依舊樂此不疲，無所抗拒。岡氏並不只是批判普通士民，而且將矛頭對準高官貴族。7 月 1 日晚在蘇州松陵鎮，「鄰座有貴官，吹毒煙，妖臭紛然，終夜不絕」〔註 274〕。不獨滬蘇，杭州亦「一城業煙，不下千餘戶」〔註 275〕。8 月 18 日讀江順詒《呰窳子》，江氏竟因鴉片不可禁而要求「許民種罌粟，以防外至」，後亦聽聞「山西、四川諸省盛種罌粟，年增一年」〔註 276〕。

中土士子多沉溺煙毒而不自知，甚至逕自爲洋煙辯護。7 月 24 日，岡千仞出席慈谿王義寬所設饗宴，看到別室更設煙具，稱煙毒乃「有人心者，所不忍爲」。此語使王仁厚不悅，以洋煙之盛行「雖聖人再生，不可復救」。岡氏則引魏源所論煙害，對於中人沉溺煙毒大惑不解。7 月 25 日王仁厚復以洋務運動所購機器耗費資財，無一所成，爲其所論洋煙盛行辯護，岡氏以其雖爲「難得之才」，但「言及外事」，則執迷不悟。11 月 16 日，汀鷺詢問日本鴉片的情況，岡曾簡單介紹，「洋煙國禁，國人亦不知洋煙爲何物」〔註 277〕。明治政府對於鴉片明令禁止，與清廷的默許態度大相徑庭，這也讓矇於外事的

〔註 27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58 頁。
〔註 27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94～295 頁。
〔註 27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3 頁。
〔註 27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9 頁。
〔註 27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4 頁。
〔註 27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9 頁。

汀驚面露怪色，頗爲不解。12 月 7 日，岡氏赴王韜之邀，見聚豐園煙具齊全，「飲闌興旺」。王韜之婿昕伯數言吸煙之益處：

> 曰：「吃煙守度，不必爲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壽。」又曰：「吃煙過度爲癮，可畏，唯不受他病。」〔註 278〕

出於好友情面的考慮，岡氏此處並未痛加批駁，只是稱「此皆順爲之辭者」。但昕伯以吸煙爲長壽之道，以吸煙可永葆健康，皆屬謬見，其蒙昧還是顯而易見的。

2. 科舉

本節第一部份提到，岡千仞來華前關注的兩大重點，一是詩文，另一就是科舉。他在《觀光續紀》裏也用大量篇幅對中國的科舉取仕制度進行了介紹。〔註 279〕離開中國前，岡氏曾對科舉考試下過斷語，以其爲中土取仕四途中最爲榮耀者，但學非所用，屬積年陳弊之源：

> 考試者，四途中所榮，專事貼〔帖〕括八股，而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憂者不必舉，舉者不必憂，此爲中土百代之弊者。〔註 280〕

多數中土學士都極力強調科舉的重要性，認爲只有科舉才是學問。例如張之洞《書目答問》、《輶軒語》便以科舉爲「學藝之要，應試之方」，對此，岡氏以爲：

> 中土人論爲學之方，猶科舉以外無學問者。爲師者，以之率弟子；爲父兄者，以之則子弟。蓋國制自非科舉，不能立身成名，勢不得不然者。固無怪香濤是著也。〔註 281〕

重視科舉是整個國家的風氣。《觀光紀游》中首次提到科舉問題是 7 月 9 日，岡千仞由王仁乾導觀慈谿王氏家族聚居之地。王家「子弟至八九歲，必延師學業」，他結合在中國數月的經歷，揭示出科舉與洋煙兩大病源：

> 子弟知讀書有才氣者，專耗精神於八股之學。及其累試不第，漏不平於酒色，頹然自放，不役心世事，猖狂爲達，放誕爲豪，妄庸爲賢，迂疏爲高。或至溺洋煙，蕩資產，賣子女，縮性命，不自

〔註 27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6 頁。

〔註 279〕具體條目爲《觀光續紀》卷一之「國子監」、「歲科試」、「鄉試」、「會試」、「殿試」，卷二之「取人法」。

〔註 28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7 頁。

〔註 28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9 頁。

悔焉。余來此累月，略知中土之病源，附記於此。〔註 282〕

王家子弟中適合讀書者均全力準備八股取仕的科舉考試，如果一直未能考上，則放蕩不羈，自甘墮落，或是沉溺毒煙，藉以消愁，以至家破人亡。8 月 9 日，與邦人僧無適談及科舉曰：

> 中土士人奔競，科第爲第一。……耗有用精神於無用八股，黃口入學，白首無成。廖燕論是事，爲愚黔首之術，未爲無謂也。〔註 283〕

他不僅再次強調科舉耗費精神的毒害，還批判以此爲手段愚弄士人。尤其是 11 月 18 日岡氏在與蓮池書院生員交談時，以爲諸人「業科舉，腹中萬言，筆下千言」，但在面臨時代變革的時候，卻無法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因而「指斥科舉爲誤天下之本」，條分縷析，富於邏輯。12 月 25 日張煥綸來函「告赴松江試」，岡氏歎其「傑出偉才」，猶且從之，然「科舉學極不容易」，進而摘引順天府《說文》策題，證明科考之難，其後云：

> 答此等問，非專修《說文》，憂爲一家者，不能下筆，宜其黃口入學，白首無成也。抑《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一字，諳記無遺，何補於身心家國？先輩多論科舉誤天下，良有故也。〔註 284〕

此論意在顯示科舉考試的內容過於偏狹，機械死板，無法經世致用，反使士子頭腦僵化，見識短淺，從而阻礙了修養的提升與國家的發展。岡氏邦人在中國有過親身體驗者亦持類似的觀點。1885 年 2 月 9 日，小牧昌業即謂「蓋士人拘泥六經，遏抑天性，漸陷迂腐，而不自知」〔註 285〕。3 月 16 日，早年曾經遊學中土的櫻泉亦稱「士人講經藝，耗百年有限之力，於白首無得之舉業」〔註 286〕。

關於科舉之弊害，清人中亦有自發認識者。如 10 月 10 日，盛宣懷首次與岡千仞見面時便稱：

> 僕耗精神於科舉無用之學，後管開設電線雜事，不暇講究外事。方今時事一變，不知此後嚴格何所歸著。〔註 287〕

〔註 28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46 頁。
〔註 28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8 頁。
〔註 28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5 頁。
〔註 28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83 頁。
〔註 28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1 頁。
〔註 28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98 頁。

盛氏主動提出用心科舉使其無力研究洋學，因而面對變革時束手無策。又如，11 月 23 日徐琪來談，云：

六經所説，往往符歐説，唯病學者不知變通以適時用而已。〔註 288〕

徐氏從六經與西學具有相似性的角度論證變通六經適應時代發展的合理性。盛氏與徐氏的觀點在《觀光紀游》所載清人中較爲罕見，「中人說及此者，至寥寥」〔註 289〕，實屬難能可貴。

大多中土文士在得知岡氏以科舉六經爲毒害時並不理解，如 10 月 18 日蔡輔臣來訪，對話中岡氏「聞其好談外事」，便稱自己非常後悔將大量精力耗費在「無用經史」上，引起蔡氏不悅，遂云：

方今所急，不在於萬卷經史，而在於究格致之學，講富強之實。如經史，略涉大旨，詩文足達己意，可以已也。〔註 290〕

反覆解釋後，蔡氏之氣方才消退。岡氏強調的是文士應當順應時變，經世致用，尤其是在世界形勢發生巨大變革之時，更需要汲取洋學，通曉外事，而不能只是埋首經史，泥古不化。在批判中土科舉弊害的同時，亦有士子問及日本取仕之法，10 月 30 日岡氏在與馮芳緝的筆談中曾加以介紹，突出強調維新後廢除原先的封建世襲制，仿傚歐美，興辦學校，而這種制度才是滿清應當虛心學習採用的。

科舉有毒，不僅體現在中人矇於外事上，還表現爲文人從武，貽誤戰機，中法戰爭期間，何如璋、張佩綸等遭遇慘敗即是明證。10 月 30 日，袁爽秋來訪，語及張佩綸遭受彈劾之事。岡氏云：

兵，專門事業，非倉卒嘗試可能。彼以善八股，取巍第，入翰林，又弄筆舌，論時事，遂握兵權，當方面。兵豈可以筆墨口舌爲乎？其一旦變起，先眾遁去，固其當然。〔註 291〕

紙上談兵與上陣迎敵全然不同，類似張佩綸者雖長於科舉，得入仕途，但卻缺少實戰經驗。科舉取仕主要考察的是士子的文學與學術能力，因而選拔出來的人才縱使熟讀兵書，也並不具備作戰指揮的軍事才能。正如 1936 年 7 月

〔註 28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4 頁。
〔註 28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4 頁。
〔註 29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0 頁。
〔註 29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6 頁。

周作人在雜文《煮藥漫抄》中指出的那樣：

> 文人本來只能做詩文，一出手去弄政事軍務，鮮不一敗塗地者。〔註 292〕

岡氏亦流露出科舉誤導學術發展方向的思想。11 月 16 日，汀鷺來訪，稱其「少時殫心舉業，後始知金石考據爲學問之本」，岡氏則對以此爲代表的清代樸學頗爲不屑：

> 余常謂清一代竟説金石，斷碣敗磚，所得幾何？閻、錢萬卷，一半無用之言，況舐餘唾者乎？因舉歐事，規切學弊，少有悟色。〔註 293〕

閻若璩、錢大昕都是清代大儒，他們對於金石的考據釐清了許多前人含混的問題，在學術史上的貢獻毋庸置疑。岡氏認爲金石之學無甚價值，這是站在當時西洋實學立場上的評價，屬於其一家之言，較爲片面。邦人櫻泉亦與其觀點不謀而合，以爲：

> 名儒大家，負泰斗盛名者，日夜穿鑿經疏，講究謬異。金石、《說文》二學……其爲無用，百倍宋儒。〔註 294〕

當然，岡氏也並非認爲科舉一無是處，通過科舉考試而被選拔上來的士子均屬人材，必定有其可取之處。11 月 4 日，他稱翰林學士徐琪、朱一新、蔡世佐皆

> 腹中萬卷，任筆直書。科舉雖有僥倖，要非無才者所爲也。〔註 295〕

而他也以能與三人及沈曾桓之類的翰林名流交往而自豪：

> 輦下四方名士所輻輳，而四子爲翰林名流，不陋余，一見傾蓋，許以海外知己，此亦不負萬里一來者。〔註 296〕

11 月 9 日與駱亮甫對酌時，駱氏痛批科舉弊害，認爲「人才日降，風俗日偷」均爲科舉所致。岡氏則頗爲公允，而非意氣用事：

> 余以爲科舉不可俄改，若交格致、算數諸術取士，則稍知所向

〔註 292〕周作人著，止菴校訂《苦竹雜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第 31 頁。

〔註 29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9 頁。

〔註 29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1 頁。

〔註 29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0 頁。

〔註 29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1 頁。

也。〔註 297〕

岡氏對待科舉不是全盤否定，在理性分析後，他提出不可立即廢除科舉，應該拓寬取仕的科目，選拔實學方面的人才，以適應時代的需要。1885 年 1 月 19 日，徐賡升、文廷式在與岡千仞筆談時稱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能拋棄傳統的倫理綱常，岡氏贊成這種觀點，並以之爲東亞獨立於世的特質：

倫理綱常，聖人之所以繼天立極。我東洋各國之卓出萬國，實在於此也。〔註 298〕

3. 貪毒

岡千仞早年即對行賄貪腐之事深惡痛絕，〔註 299〕在華期間，他亦指斥中國的類似弊病。8 月 25 日，好友王韜來訪，岡千仞重申其「一掃煙毒與六經毒，振起中土元氣」之說，王氏則於其後再加「貪毒」：

更有一毒，並貪毒爲三毒。中土大小政事，成於賄賂。〔註 300〕

在好友的提醒下，岡氏增訂了自己的觀點，將煙毒、六經毒與貪毒並稱爲三毒，援以爲中土社會主要時弊，並注意在此後的遊訪過程中留心觀察。11 月 7 日見北京城內道路坍圮，宮殿隳頹，盜賊橫行，乞丐遍及，並聯繫《曾侯日記》感歎：

凡百惡弊，皆源於喪亂蔑資，公私困弊之餘者。特怪士大夫貪婪無行，居之無疑，尺寸之上，財賄之算，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者歟？〔註 301〕

一方面，社會上弊害橫生；但另一方面，士大夫卻貪婪無行，剋扣經費，收受賄賂，並且習以爲常。岡氏一語道出了貪毒的嚴重性，點明了中土社會癥結所在。而琉璃廠古董店中的名貴古玩，竟是用於行賄的物品。

見一雞血石，重匣珍襲，問價一百元。問何所用，曰多賄權貴。〔註 302〕

而由於貪毒橫行，一些富於才華的文士即使行賄也無法晉升，曾在駐日使館

〔註 29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4 頁。
〔註 29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0 頁。
〔註 299〕《館森袖海翁談岡鹿門先生（附松本奎堂、松林飯山）》，《明治の碩學》，第 232 頁。
〔註 30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0 頁。
〔註 30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3 頁。
〔註 30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3 頁。

工作的張斯桂便是一例。日本公使榎本武揚稱：

魯生（張斯桂）來京候補，五年於今，賄醇邸已三千金。彼老耄將何爲？〔註 303〕

「三千金」可謂鉅資，然張氏所賄並未如願，再聯繫上段之「雞血石」，可見晚清政壇之腐敗與黑暗。岡千仞與榎本武揚都是域外人，所以對貪毒問題看得更加清楚透徹。

4. 「藥石之語」

關於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中提出的「藥石之語」，福井智子稱：

作爲「藥石之語」的《觀光紀游》因岡千仞有不屈的精神，呼籲進行社會變革，而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註 304〕

誠如福井氏所言，岡千仞「爲中土抱杞憂實非一日。常欲一遊中土，逢有心人論此等事」〔註 305〕。《觀光紀游》在指斥中土弊病的同時，也從中國出發提出許多中肯的「藥石之語」，旨在改變社會現狀，使滿清重新富強。

岡千仞「藥石之語」的提出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與多方人士交流後逐步修補和不斷完善形成的。8 月 1 日與王仁厚辭行時，提出應對中土「拘儒陋生」矇於外事的解決辦法：

余私謂，非一洗煙毒與六經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苟信不可信者，流毒無所不至。黃公度……常曰：「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論當今之事者，不可無此見解也。〔註 306〕

他主張掃除煙毒與六經毒，同時向歐美國家學習。誠如依田學海所言：

鹿門之言，非一洗煙毒與六經之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煙毒指鴉片煙，六經之毒指科舉之學。然覺煙毒者可通，六經毒者不通之言。六經非有毒，由誤讀六經而生毒也。〔註 307〕

〔註 30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6 頁。

〔註 304〕〔日〕福井智子《〈觀光紀游〉に見る「病」と「治療」》，《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9 年第 18 期，第 28 頁。

〔註 305〕《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2 頁。

〔註 30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3～54 頁。

〔註 307〕明治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岡鹿門が支那に遊バし時の日記をょみ》，〔日〕依田學海《學海日錄》卷七，轉引自〔日〕町田三郎《明治初年的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載氏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12 月版，第 56～57 頁注 2。

8 月 22 日，岸田吟香來訪，岡千仞的一段議論亦可證明依田氏之觀點固有其理。

> 目下中土非一掃煙毒與六經毒，則不可爲也。六經豈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義，墨守陳言，不復知西人研究實學，發明實理，非爛熟六經所能悉。孟子不言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則六經之流毒，何異老莊之毒晉宋乎？〔註 308〕

此言實爲對所引上段文字的深入闡發。岡氏本義並非指謫作爲科舉教材的六經有毒。按照前引依田氏的解釋，六經乃先賢往聖的至理名言，岡氏批判的是中土士人誤讀六經，盡信盲從，沉溺不拔，以至眼界狹隘，充滿門戶之見，對於歐美西學一味排斥。岡氏此論令岸田氏拍案叫絕，深表贊同，並全然接受。9 月 14 日，他甚至以此爲玩笑調侃岡氏。

> 余（岡千仞）曰：「車並九軌，見於左氏，四墉百雉，見於毛詩。周時豈同今時隘陋乎？」吟香微笑曰：「子亦醉六經毒者。」不覺噴飯。〔註 309〕

面對吟香的調侃，岡氏亦覺可笑有趣。在與吟香的交談中，岡氏亦反覆申論「救漏船、轉禍爲福之策」。此後，盛宣懷有感於此策對中國大有裨益，希望岡氏和盤托出，珍視其「藥石之語」：

> 轉禍爲福，意可深長思矣。公有高見，或密告鄙人，或徑言於中堂，幸勿秘之，蓋有益於敝邦，即有裨於貴國也。〔註 310〕

10 月 30 日，岡氏在分析張佩綸臨陣脫逃的原因後，提出中土應該採取的應對之策。

> 余以爲……今日綜覈名實，唯有仿歐米，興各科學術而已。〔註 311〕

岡氏在此前與盛宣懷的筆談中已經提出「兵術非閱歷兵馬者，悉皆趙括談兵」。他認爲張氏之類只會紙上談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帶兵是專門的職業，與「文」對應，著重考察的是「武」的能力，故萬不能令儒生操之。盛

〔註 30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69 頁。
〔註 30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9 頁。
〔註 310〕《盛宣懷與岡千仞、岡千（誤衍，當刪）濯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7 頁。
〔註 31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6 頁。

宣懷深表贊同，以爲中土「以弓石取武士而攻戰無用」〔註 312〕，「狃於清議，不講武備，亦不重商務，故海上爭鋒，斷難得利」〔註 313〕。因而岡千仞強調應將名與實統一起來，效法西方學校制度，培養適應各類需求的專科人才。11 月 18 日，岡氏建議蓮池書院諸士子「以講八股之餘力，旁讀譯書」〔註 314〕，從而尋求民族富強之術，改變長久以來的陋見，這才是學問的正途，可謂醍醐灌頂，振聾發聵。雖然當時「議論紛然」，但第二天齊令辰主動表示「昨辱大教，終夜不寐」，登門求學，可見此論對士子觀念之觸動。岡氏介紹當時歐美各國均設大中小三級學校，「凡百工藝，彼駸駸日進高明」，正如鹽谷宕陰《六藝論》所謂「三代聖人之學，亡與中土，而存於歐米」〔註 315〕。張氏顯然很受觸動，當即表示出拜其爲師的意向。在如何向西洋學習，提升清軍戰鬥力方面，岡千仞也有自己的見解：

> 余以爲取歐米兵制，宜先建海陸兵黌，延洋人，講一切韜略。若徒學彼進退步武，雄視國內，或有之，未可與歐米接鋒。〔註 316〕

他認爲如果只引進歐美國家的先進武器裝備，那麼僅能得其表層，只有開設軍校，聘洋人講學，方能學其本質，獲其精髓，眞正接軌西方，實現富強。面對中國長久以來積貧積弱的疲敝現實，岡氏結合本國經驗提出應當「自強自治」，並以中醫術語開設藥方：

> 我邦小國，固不可以例中土，唯享今日之小康，實由大開歐學，事無大小，斟酌彼制，以一洗千年之陋弊也。顧中土承二百年太平，弊竇百出，與敝邦幕府末世一般。譬猶篤疾人，非溫補寬劑所能治，斷然大承氣湯之症也。〔註 317〕

日本幕府時期同樣存在千年流弊，但由於全盤西化，得以逐步富強，以致「今日之小康」。中國與日本當時的情況類似，如同患病多年的病人，體質虛弱，僅靠普通補品與常規藥物無法根除，必須加大劑量，徹底療救，方有治癒的可能性。12 月 12 日，岡氏與張煥綸筆談，張氏認爲應該學習西方，設立學舍，

〔註 312〕《盛宣懷與岡千仞、岡千（誤衍，當刪）濯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7 頁。

〔註 313〕《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5 頁。

〔註 31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0 頁。

〔註 31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1 頁。

〔註 31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2 頁。

〔註 31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4 頁。

講授格致實學。岡千仞深表贊同，但同時表示：

> 絕大急務，在一變國是，廢科舉，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習，振起天下之元氣矣。〔註 318〕

針對張氏之言，岡氏提出當前首要改革措施就是廢除科舉，變革政治與社會制度。這一主張在 1885 年 1 月 27 日駁斥徐賡升時被再次提出並加以引申：

> 中土方今急務，在大傚歐米，謀富強之術，建海外萬國不可得而軼之大基本矣。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註 319〕

中土社會改革的方法是首先仿傚歐美，然後自立自強，而且由於滿清弊害較深，問題很多，所以改革必須盡快進行。

但對於岡千仞的「藥石之語」，清廷權臣卻無力採納。11 月 26 日，在謁見李鴻章時，岡千仞對其充滿希望，期以抓住時機，徹底變革，救亡圖存。但保守的李氏卻藉口「非經五年，則不可有爲」，並且身不由己，這樣的託辭無異於不採取任何措施的「無爲而治」。岡氏對其表態頗爲遺憾，以爲「其忽自治如斯，欲求自強之功，茫乎不可得也」〔註 320〕。

〔註 31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9 頁。
〔註 31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76 頁。
〔註 32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36 頁。

第三章　《觀光紀游》與近代中日文士交往

第一節　從《觀光紀游》看岡千仞與清人的交往

岡千仞在《燕京日記》卷首自序云：

> 古人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余兀兀至老，所讀不下二三萬卷。此遊北窮幽燕，南及粵南。此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註1〕

小牧昌業《北游詩草序》引此古語，羡慕岡千仞「好學而喜遠遊」〔註2〕。岡千仞以異域儒者的身份踏訪禹域，其中國行兼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眞正實現了「遊」「學」並進。在華期間，他認識了眾多中國文士，僅《觀光紀游》中提到的清人名字便有兩百多個。而書籍搜購與酬贈不僅是雙方交流的方式之一，更是反映兩國學術風氣的重要切入點，但前人幾乎從未論及，本節擬從這一角度考察他們之間的交往。

岡千仞不僅瞭解和刻本中國古籍的刊印情況，能爲清朝文士訪書提供便利，而且具備相當的古籍版本素養。甲申年（1884）踏訪禹域，他與晚清著名藏書家楊守敬同船赴華，在神戶期間，曾「示《松崎慊堂匯刻書目》，楊君甚悅，曰：『訪書材料，不可少此書』」（1884年6月4日）〔註3〕。在上海，「過

〔註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90～91頁。

〔註2〕岡千仞《北游詩草》卷一，《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版，第16頁a。

〔註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4頁。

書肆掃葉山房。插架萬卷，一半熟書，偶閱生書，皆坊間陋本」（6月8日）〔註4〕，「與耘劬訪楊君，觀《古逸叢書》」（6月11日）〔註5〕。

岡千仞來華前曾攜帶不少自己的著述用於酬贈，而此次中國之行他也收穫頗豐，得到諸多中土文士的贈書：

> 余是遊，齎《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尊攘紀事》各五十部，《紀事補遺》、《藏名山房雜著》各一百部，以充贈遺。而諸人多贈珍籍，得書一百四十三種。（1月29日）〔註6〕

《觀光紀游》中有多處提及岡千仞曾向清人贈書。

1884年6月30日，於蘇州拜訪俞樾：

> 余曰：「小人好談當世，所呈法、米二《志》、《尊攘紀事》，是也。」〔註7〕

7月30日，訪楊泰亨：

> 推稱余《尊攘紀事》不已，曰：「光明磊落，在中土亦難得。」余悚然。〔註8〕

8月26日，抵上海田代客棧，三河靜修勸其一遊漢口：

> 余遊意勃然，乃約終北京、廣東二遊，則一帆溯長江。因付著書數部，令爲名士先容。〔註9〕

10月10日，抵天津道臺衙署訪盛宣懷（杏蓀）：

> 余曰：「此鄙人廿年前論尊攘之義時之見，已陳在昨所呈陋著《紀事》。」〔註10〕

10月29日，柳原公使告知岡氏，盛道臺屢屢對其稱讚不止：

> 余曰：「彼不涉洋事，余贈所譯法、米二史，故驚爲奇異而異。」〔註11〕

11月5日：

> 丁韙良來訪，盛稱《尊攘紀事》，曰：「余在中土，熟聞貴國沿

〔註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6頁。
〔註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頁。
〔註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8頁。
〔註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32頁。
〔註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52頁。
〔註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71頁。
〔註1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98頁。
〔註1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15頁。

革，今讀高著，歷歷指掌，使人忘倦。」〔註12〕

11月10日，前往衙署訪周家楣：

府尹稱余《紀事》、《雜著》爲作家。〔註13〕

11月26日，抵總督署訪李鴻章：

稱余《尊攘紀事》，曰：「敘事有法，議論雄偉。」〔註14〕

12月5日，再回上海由葉慶頤（新儂）陪同拜訪蜀詩人李士棻：

余贈《山房雜著》，芋仙一讀《東旋集》，頓致禮容，曰：「殆失名士。」〔註15〕

1885年1月16日晚致信彭元帥、張總督，「附著書各種，囑亦槎致之」〔註16〕。

1月21日夜，陳喬森（木公）來話：

曰：「昨見彭元帥，語及貴著，激賞不已，間日設筵請臨。」蓋渠讀《尊攘紀事》，有感目下之事也。〔註17〕

1月22日，在布政署與龔易圖（少文）交談時稱：

當呈法史，以請大政。此外紀米國要請以來所耳目，曰《尊攘紀事》，曩獻彭、張二公，若賜覽觀，於東洋大勢，或有所少補。〔註18〕

2月10日，蕉石前來探望岡氏病情，「遺銀八元及雜著，以謝」〔註19〕。

另一方面，書中所載清朝文士的贈書更是不勝枚舉。從東京出發之際，「張靜廬（沆）贈其父《濂亭先生文集》」（5月29日）。初抵上海，於龍門書院獲「贈劉融齋（熙載）著書六種」，「嚴凫香（文藻）贈家著數種」（6月17日），嚴芝僧贈《桐城縣志》「刻本三卷」（6月18日）。遊歷蘇杭期間，秦膚雨（雲）「贈其著二種」（6月27日），顧艮庵贈《怡園法書》一本（6月28日），潘麟生（鍾瑞）「贈《庚申惡夢記》」（6月29日），沈明哉「贈《寡過錄》、《戒淫錄》等書數十種」（7月10日），「見贈久香先生著書三種」（7月17日），天童山僧人寄禪「贈其著《嚼梅集》及《天童山志》」（7月28日），彌勒寺僧

〔註1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21頁。
〔註1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25頁。
〔註1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35頁。
〔註1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43頁。
〔註1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69頁。
〔註1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3頁。
〔註1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3～174頁。
〔註1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3頁。

人普晉贈「陰符素書「(8月10日)，王夢薇（延鼎）贈安徽人江順詒所著《呰窳子》(8月18日)。從蘇杭返回訪上海後，張經甫贈《時事芻言》(9月6日)、《救時芻言》(9月12日)，王韜贈《(弢園）文錄外篇〔編〕》(9月26日)。遊訪燕京期間，丁韙良「贈《中外見聞錄》」，馮申芷（芳緝）贈其「先人林一先生（桂芬)《顯志堂集》」(10月27日)，丁韙良又「贈《同文館題名錄》、《西學考略》」(11月6日)，李容生、沈子培「贈長篇」(11月9日)，周府尹（家楣）贈「《晉略》、《忠義錄》等書五種」(11月10日)。再訪上海時，李芋仙（士棻)「贈新刊《臥遊集》」(12月5日)，「李鍾鈺寄示《興亞策》五篇」(12月14日)。踏訪粵南之際，龔少文（易圖)「贈其著《烏石山房詩存》」(1885年1月22日)。而所得中人贈書中部頭最大者當屬《廣東通志》:

乃東希道，借廣東風土書，寄致《廣東通志》。余以謂所借，作書答謝。希道答曰:「分家藏書，贈呈左右。」余深感厚義。

而浩瀚大著，《通志》爲第一。(1月29日)〔註20〕

大多清朝士子都對儒學者岡千仞表現得極爲友好，屢屢引以爲異域同道，海內知己。他們甚至會拿出自己珍愛的文房四寶予以饋贈或專門爲岡氏創作書畫：如王竹孫（錫璋)「爲余作大字及山水小幅」(7月23日)，王夢薇「贈畫附潤筆例」(9月10日)，張裕釗（濂亭)「贈《輞川圖》拓本，曰供船中展觀」(11月17日)，「徐翰林贈石鼓墨本」(11月24日)。岡氏希望收集佳硯，徐次舟（賡升）奉上自己多年的舊藏，令岡千仞感動不已：

一商來賣端硯，買稍佳者八面。端硯良者難得，余囑次舟物色良硯。(2月9日)〔註21〕

次舟寄端硯一面，曰:「遍索市肆，無一可者。家藏一硯，銀線羅紋、翡翠白玉飣皆具，硯品最上者，爲海外知己割愛。」余在廣東，搜索佳硯不得，常爲慊事，得此硯大悦。(2月26日)〔註22〕

在接受贈書的同時，岡千仞也主動訪求搜購中國典籍，例如「近購《五家評杜詩》」(12月31日)，又如「余求書志紀風土者，廣瀨姓寄《羊城抄古》六卷，曰搜索古肆，僅得此書」(1月29日)。他特別留心搜集中土文士的海外文字：

〔註2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78頁。
〔註2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83頁。
〔註2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90頁。

> 余在北京，歷搜書肆，購得斌椿西使以後遊海外諸名人日記筆錄十數部。（12 月 8 日）〔註 23〕

岡千仞關心域外大勢，對西洋文明頗多注意，曾譯《美利堅志》與《法蘭西志》，校閱《萬國史》，故遊華同時留意搜購晚清使臣所撰歐美行紀，繼續擴展其對於海外世界的認識。

但岡千仞在華購書的目的並不只是一味滿足自身的閱讀興趣。

> 余充三百元蘇杭遊資，中途返棹，猶贏百餘元，乃囑吟香，購取宋、金、元、明諸史以下五十餘種。是日裝爲兩匣，託輪船東致。余老矣，且眼不明，多購書，不必讀。唯三世書香，不可不培殖，待從遊子弟，不可無書籍。余常語諸侄曰：「余無望當世，將得千金重修鹿門精舍，擁萬卷擬萬户侯。」他日能達是願乎否？中土書院，皆大官豪富捐資營築，以聘名師教子弟者。我邦無此等事，唯天使余有壽七十，此願不難達也。（9 月 13 日）〔註 24〕

岡氏上述文字發自肺腑，頗爲眞誠，在豔羨中國書院事業繁盛蓬勃的同時，道出遊華不忘搜羅書籍的眞實原因，其中流露出的培養弟子、養育後進、延續學風之心令人動容，而這也是一個傳統漢學者在面對新興洋學衝擊之時所發出的「執拗的低音」〔註 25〕。

第二節　近代中國人眼中的岡千仞中國行

本節旨在輯錄遊華前後晚清民初文獻中提及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之處，以此材料爲基礎，分析中國人對於這位東洋宿儒禹域之行的看法與態度，並從另一側面探討近代中日文士之間的交往。本節所涉文獻材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代中國知識人的相關著述，主要包括詩文、日記、書信等。二是媒體，尤其是報刊的相關記載。

一、晚清文集視野裏的岡千仞中國行

岡氏踏訪禹域期間與眾多清人有過直接或間接的交往，僅《觀光紀游》提及的晚清文士便達兩百餘位。在岡千仞逐日記錄所見所聞的同時，也有不

〔註 2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7 頁。

〔註 2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8～79 頁。

〔註 25〕2011 年 3 月，王汎森在復旦大學做了以《執拗的低音》爲主題的一系列講座。

少他所結交的清人將自己對於岡氏中國行的觀感訴諸文字，以詩文或日記等著述形式傳於後世。《觀光紀游》的寫作展現了岡氏的中國觀，而晚清文集的相關記載則從文字層面反映出晚清文士對於岡千仞本人的看法以及《觀光紀游》在士人階層的接受情況。

（一）1884年前清人文集裏的岡千仞

親訪禹域之前，岡千仞與中國人曾經有過接觸。他與清人的密切交往始於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雖然不通華語，但岡氏與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及其他民間人士之間通過筆談進行交流，留下了豐富的資料。〔註26〕而晚清文士也將與岡千仞的交往記錄在文集之中。

當時與其交往最爲頻繁的，當數以民間身份訪日的王韜。後人評價王韜「尤與岡鹿門最爲莫逆」〔註27〕。在其所撰日本行紀《扶桑遊記》中，王韜近七十次提及岡千仞，不吝讚美之辭。書中除了記錄二人多次進行筆談與詩歌唱和外，岡氏亦「出其所著文稿見示」，王韜稱其「性豪爽高亢」，爲東京「不凡之士」中「尤其嶠嶠〔佼佼〕者」，視爲異域知音。〔註28〕同時，岡氏亦極其重視王韜，列其於「晁衡、吉備」等人之後，以爲「中華名士」。〔註29〕岡氏曾向王韜「饋酒一瓻，謂風雨之夕，聊作消遣計」〔註30〕，當王韜「病齒」時，他又「擬偕往西醫處求治」〔註31〕。而當他與河野通之深夜造訪時，本已解衣入睡的王韜「重剪燭作筆談」〔註32〕。因而可以說，《扶桑遊記》中體現出的二人關係可謂是親密無間，惺惺相惜。〔註33〕

官員方面，黃遵憲曾在文集中多次提及岡千仞。1877年，黃氏以參贊身份隨清國首屆駐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由於文名卓著，風度翩翩，受到眾

〔註26〕可參《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

〔註27〕鄭逸梅《瓶笙花影錄》卷下，上海：校經山房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3）6月版，第33頁。

〔註28〕《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第412頁。

〔註29〕《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第427頁。

〔註30〕《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第409頁。

〔註31〕《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第450頁。

〔註32〕《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第409頁。

〔註33〕二人之間也曾發生過誤會，但最後渙然冰釋，友情依舊。詳參鄭海麟《關於王韜與岡千仞——跋東洋文庫藏王韜致岡千仞書稿》中《一場誤會》，蘇晨主編《學土》卷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01～203頁。

多日本書士追捧，其中就包括岡千仞。根據《人境廬詩草》，在日期間，岡氏等文士曾多次邀請黃氏參加雅集，彼此以詩文酬贈唱和。如卷三有詩題作《庚辰四月重野成齋（安繹）、岩谷六一（修）、日下部東作（鳴鶴）、蒲生綗齋（重章）、岡鹿門（千仞）諸君子約遊後樂園，園即源光國舊藩邸，感而賦此》。又如卷七《續懷人詩》其七附注曰：

大沼厚、南摩綱紀、龜谷行、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壽、小野長願、森魯直、岡千仞、鱸元邦皆詩人也。壬午（1882）春，余往美洲，設餞於墨江酒樓，各賦詩送行，多有和余留別韻者。〔註34〕

除了雅集，岡千仞與黃遵憲之間也有頻繁的筆談交流與通信往來。〔註35〕在光緒五年二月（1879年3月）的筆談中，黃遵憲談及岡千仞《法蘭西志》，稱讚道：

閣下所著文筆雄深，若吾國有翻刻本，必當不脛而走。〔註36〕

另外，岡氏還曾奉上其《藏名山房集》與《北游詩草》，呈請黃遵憲批改。而黃氏雖屢屢在函件中發以謙言，如

大著急於奉璧，百忙不及著圈點，謹誌數語於後，冒昧狂妄，多罪多罪。〔註37〕

兩辱惠臨，未及倒屣，且慚且懼。大著經讀一過，尚未加墨。容日閒好，將自行齎到高齋，並暢敘衷曲也。

大著閣〔擱〕一月未動筆，亦職是之故。

大作奉還，僕亦廖贅數語，想不鄙棄也。〔註38〕

但他對岡千仞的兩部詩文集均題寫序言，並精心評閱，寫下大量批語。其中，黃氏評岡氏之詩「神采未足」，「爛漫猶待」，〔註39〕對岡氏之文則尤爲歎賞，在致函岡氏時也明言「僕來大國，閱人多矣。然於文最愛吾子」〔註40〕。

駐日公使館員中與岡千仞交往最爲密切的當數楊守敬。1880年，楊守敬

〔註34〕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3月版，第129頁。
〔註35〕詳參《黃遵憲全集》上冊。
〔註36〕《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第639頁。
〔註37〕《黃遵憲遺墨》，第147頁。
〔註38〕《黃遵憲遺墨》，第148頁。
〔註39〕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3月版，第245頁。
〔註40〕《黃遵憲遺墨》，第148頁。

應何如璋之邀赴日。1882 年黎庶昌充任第二代日本欽使，楊守敬留任館中，其自撰《鄰蘇老人年譜》中記錄此年之略歷如下：

> （日則訪書、購書）夜則校書，刻無寧晷，日本詫爲萬夫之稟，且上新聞報中。是時，與日本書人往來最密切者岩谷修（一六）、日下部東作（鳴鶴）、岡千仞（振衣）。〔註 41〕

楊守敬嗜書如命，精於版本，在日期間變賣字畫器玩，搜訪隋唐逸書，協助黎庶昌刊刻《古佚叢書》，澤惠後世。收藏古書亦爲岡千仞學術興趣之一，故楊守敬引以爲同好，並視作「日本書人往來最密切者」。

此外，岡氏未至禹域之前已在中國享有文名，俞樾編選《東瀛詩選》，於卷三十四選其《廿七日與石田、梅村、永井諸子飲於竹迺樓》、《十一月一日過根岸村莊，曩余與家兄伊藤氏買村莊、闢荒萊未就，移寓東京，弟德輔代課耘鋤，今已十餘霜，桑茶鬱然，喜賦》、《八日細谷直英爲余張宴山水含清輝樓，增田遠藤、佐久間怡土、若生湧谷、中目松倉諸故舊會者三十餘人。顧余弱冠出鄉二十八年，於今飢寒奔走亂離間關，其有今日得一生於百死者，慨然賦二律示諸子》、《那須野途上歌》與《十六日經宇都宮書感》共六首詩作，稱其詩爲「紀遊體」，評其人爲「奇士」。〔註 42〕又，1884 年 7 月 18 日俞樾致王廷鼎函亦提及岡氏，云：

> 去年亦曾選錄其詩，但未見其全集，所選不多耳。……此選就地取材，亦不足觀。〔註 43〕

則俞樾所選岡氏之詩並非錄自全集，由於條件所限，《東瀛詩選》未能反映岡氏詩作全貌。

（二）中國行期間清人文集裏的岡千仞

岡千仞於 1884 年 5 月 29 日從東京新橋停車場出發，31 日乘坐「東京」艦抵達神戶港。《觀光紀游》在此日條下有「黎理事（汝謙）出迎……黎君饗華饌……過黎君……理事賦送長篇，余和答」的記錄。〔註 44〕黎汝謙爲黎庶昌之侄，光緒八年（1882）隨叔父出使日本。黎氏時任神戶領事，故與岡氏

〔註 41〕《楊守敬集》第一冊，第 18 頁。

〔註 42〕俞樾撰，〔日〕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卷三十四，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第 471 頁。

〔註 43〕《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6 頁。

〔註 4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1 頁。

相交。「理事賦送長篇」題作《甲申（1884）五月七日，日本岡鹿門（千仞）將遊中國，道經神戶，留飲（岡君邃於史學，著有《尊攘紀事》、《讀史紀略》諸書行世）》，見收於《夷牢溪廬詩鈔》卷三（見附錄四）。岡氏 「和答」則爲《神戶黎理事招饗，見贈長古一篇，次韻以答》，《觀光游草》開篇即列此詩：

翩翻黃龍旆，層閣倚天高。山氣浮紫翠，海光漾泓坳。一臨千里勢，頓覺意氣豪。使君大國英，盛名眾所褒。藻思逐屈宋，道源出虞姚。興來揮筆翰，神采凌青霄。此日陪盛宴，八珍厭煎熬。顧余一無能，蟹鳴學孟郊。一字一珠淚，刳腸事鏤雕。大鵬萬里翼，鷦鷯一枝巢。何爲羈海域，徒自歎飄蕭。巨濤躍黿鼉，長風吹鬢毛。使君嘉微志，辱收列下交。雄句辱投贈，深杯菩〔喜〕慰勞。滿酌不敢辭，扶醉上車軺。〔註45〕

黎詩提到，岡氏「此行徑欲蹤羲巢」，「他時遊罷覓歸路，紀遊詩草應盈軺」。「羲巢」與下句的「神州」、「赤縣」同義，謂岡氏此行將要尋訪中國，黎氏在其行前已有對其寫作「紀遊」、「詩草」的期許，而後來《觀光紀游》的出版實際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這一期許。黎詩的核心體現在「方今四海同文軌，珠盤玉敦聯邦交」一句上，意在強調中日由同文同軌而生發出的睦鄰友好。岡氏的「和答」採用了次韻的形式，從形式上講是對於原作的一種互文性回應。在內容上，岡氏一方面不斷自貶自謙，一方面稱讚對方「盛名眾所褒」，充滿了尊崇之情。

岡千仞此行結交了不少新知，雙方多賦詩唱和酬贈。清人詩作中常突出中日同文的特點，視岡千仞爲遠方友朋，海外知己，強調彼此間的深情厚誼。

客來瀛海獨清親。〔註46〕（葛士濬）

之子在萬里，山海隔中州。……弦望自有時，念子悵悠悠。〔註47〕（姚文枏《集句贈別岡鹿門》）

記取天涯今夕酒，早聯中外共觀摩。〔註48〕（易順鼎《和岡鹿門詩》）

〔註4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88頁。
〔註46〕《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2頁。
〔註47〕《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2～283頁。
〔註48〕《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3頁。

仙臺仙客重東溟，萬里飛來作客星。〔註49〕（俞樾）

名山有幸逢知己，滄海頻更賴史才。〔註50〕（徐琪《贈〈盤西紀遊集〉並題詩）

迢迢滄海寄知音，萬里行程一覿尋。〔註51〕（周家楣）

岡千仞遊華期間不斷向清人贈送自著，中土大家碩學讀其書，知其人，在贈詩中表現出對岡氏學術品格與處世高行的欽佩。

書卷光陰雙鬢白，山河興廢一編青。……鹿門先生自海外來訪我吳下，兼以所撰《讀〔涉〕史偶筆》、《尊攘紀事》見贈，因賦贈一律，即希吟正。〔註52〕（俞樾）

自愧蕭夫子，文章海外通。……況君精乙部，此業冠東方。（著有《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又欲撰英、俄、普三國志，已屬草）（李慈銘《日本仙臺人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舊直史館，來遊中國。持湖北人楊惺吾書，介鄧鐵香來訪。於其行也，持絹索書，爲詩三首送之》）〔註53〕

爲士當死學，爲兵當死戰。……讀岡鹿門先生文集、日記，欽其風烈。〔註54〕（沈曾植（《贈別岡鹿門詩》）

著書瓊嶋成眞逸。〔註55〕（袁昶《送岡鹿門處士歸日本》）

岡君種學鬱奇氣，東西秘籍紛耙梳。藩侯納土義旗建，尊攘著論扶皇輿。身膏椹質幸不死，塊磊聊借奇文攄。觀書卓犖眼如月，《吾妻鏡》内窮褒誅。（君著有《尊攘紀事》、《涉史偶筆》，當奧羽諸藩拒命時，以持正論陷縲縲，幾死）〔註56〕（朱一新《送日本岡鹿門

〔註49〕《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6頁。
〔註50〕《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92頁。
〔註51〕《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94頁。
〔註52〕《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6頁。
〔註53〕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越縵堂日記》本，第2219頁。
〔註54〕《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98～299頁。
〔註55〕袁昶《漸西村人初集》詩十三，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65冊，據清光緒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頁。
〔註56〕朱一新《佩弦齋詩文存》佩弦齋詩存一卷，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65冊，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龍氏葆眞堂刻拙盦叢稿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頁。

千仞》）

贈序是中土文士與岡千仞交流的另一途徑，王韜、張煥綸、陸純甫、梅豫棖、徐琪、張裕釗等亦均在岡氏遊華期間爲其撰寫序文。其中前三人之序均作於岡氏自上海往遊京師行前，分別見收於《觀光紀游》之《蘇杭日記》、《燕京日記》與《滬上再記》卷首。王韜之序云：

> 日本鹿門岡君，今之豪俠士也。……君以一書生，睥睨當世，眇視朝貴，其志可謂大矣！余獨惜其不能見用於世也。〔註 57〕

勾畫出岡氏勇於擔當的豪士形象，感歎其報國無門。類似的描述亦見於陸純甫序中，他曾於「席上賦呈『白頭爲壯遊，聲譽隆隆起』句」〔註 58〕。筆者對校日本東洋文庫所藏張煥綸贈序〔註 59〕與《觀光紀游》所載，發現雖然岡千仞在編選時從修辭上對文字進行過潤飾，但大義保持不變，張序稱：

> 岡君寧維直其道於友，且將直其道於天下也。……岡君寧維直其道於友，且樂其有直其道於己也。……岡君固深愛我邦者。〔註 60〕

意在突出岡氏耿直的性格及對中土的熱愛。

岡氏與中土新知亦有書信往還。特別是當雙方出於禮節考慮或限於地理阻隔時，書信打破了時空限制，成爲彼此溝通的重要渠道。清人在信中對岡氏著述及爲人屢有品評。王廷鼎評岡氏之文「宏才鉅識，欽佩靡已」，認爲其詩「清矯之氣，激昂之概，躍躍楮上」，「雜於唐人集中不易辨也」「惟於律詩……常有不洽律者」〔註 61〕。李慈銘希望岡氏寫作外國史「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大須詳載氏姓名諱」〔註 62〕。徐琪稱岡氏「胸有萬卷，包羅百家」〔註 63〕，故詩作近似王漁洋。袁昶贊其爲「東國之英」，詩文「蘊蓄深厚，通古今之變，達天人之故」〔註 64〕。龔易圖謂岡氏「胸襟磊落，蹤跡合離」，願與其「訂神交」〔註 65〕。朱一新除云岡氏爲「語長而心鄭重」之「有心人」外，亦贊同

〔註 5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3～24 頁。
〔註 5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42 頁。
〔註 59〕《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78～279 頁。
〔註 6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88～89 頁。
〔註 61〕《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5 頁。
〔註 62〕《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7 頁。
〔註 63〕《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90 頁。
〔註 64〕《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95 頁。
〔註 65〕《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301 頁。

其中日當「思同仇偕作之義」〔註 66〕。尤其是在張煥綸寄送岡氏的數封信函反映其與岡氏交往後思想觀念的轉變。

> 弟此次赴松，無意中得學臺青眼。然弟久薄八股文，偶一爲之，俗眼多震驚歎服，亦自謂快事。然不復欲以科名自溷，故決然不應選拔之科。〔註 67〕

儘管在淞滬考場發揮上佳，但張氏已決意不再參加科舉，這顯然是受岡氏批判科舉弊病的影響。

在踏訪禹域、結交新知的同時，岡千仞亦注意與在日中國故友保持書信聯繫，抵達上海後不久，他即致信告知時居東京的公使館員姚文棟。姚氏回函稱：

> 昨奉書，知已到上海，與我邦諸名士過從，海外今雨，互商舊學，其樂可知。蘇杭山水之區，視吾鄉別一光景，吟屐所至，塵慮爲之一清。楊君同遊，必有知己之友譚藝，當不寂寞也。〔註 68〕

姚氏從學術角度著眼，期待岡氏與中土名士交流的盛況，並希望其由楊守敬引導，在蘇杭獲得異於日本國內旅行的別樣感受。岡千仞探訪蘇杭之際，其時往遊日本新潟的浙江商人王治本收到族弟王惕齋書信覆函稱：

> 欣悉相伴遠客，同到敝鄉：……溯貴邦友遊我域者，自昔唯推晁、吉兩大夫，想當時或亦限於邦禁，未必能遍涉也。近者，商遊者固不足道，即如井井子胸墨無多，目之所經，未必口之能吟。料撫今懷古，覽勝賦奇，獨在閣下矣。……爾後如我二人遊蹤迢隔，縱不能面，當時通郵報，各述遊途勝況，亦足傳兩地佳話。〔註 69〕

岡千仞造訪慈谿故里，王治本自豪之情溢於言表。另一方面，王氏不僅認爲「晁衡、吉備」當年未能暢遊，而且以「胸墨無多」評價此前日本中國旅行記名著《棧雲峽雨日記》的作者竹添井井，稱只有岡千仞才能擔當抒發古今感受、刻畫中土名勝的大任。此外，他還希望與岡氏保持書信聯繫，互通見聞感受。

清國首屆駐日公使館之主要成員包括正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

〔註 66〕《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302 頁。
〔註 67〕《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79 頁。
〔註 68〕《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69 頁。
〔註 69〕《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70～271 頁。

遵憲及沈文熒等人，他們都曾在東京與岡千仞進行過筆談，相談甚歡，亦爲其著題贈序言。岡氏此番遊華，希望重逢故友，再續前緣，卻屢屢未能如願。《蘇杭日記》卷首稱「是遊本擬首抵福州見何子峨（筆者注：如璋），而後遊四方」〔註 70〕，然 8 月中法戰於福州，「（何如璋）當戰發，狼狽奔竄」，岡氏「爲之慨然」，感歎「人間禍福，何常之有」〔註 71〕。11 月 10 日周家楣向岡氏詢問何如璋、張斯桂，岡氏答曰：

沈（文熒）、黃（遵憲）二人交誼尤親，期僕來遊極殷，發書告遊，亦不答。〔註 72〕

並責怪中土文士不知禮義。其實當天岡氏作客周府時，張斯桂一直在使館等候：

夜見公使，曰：「張魯生來，待子至暮」。〔註 73〕

沈文熒時居陝西，11 月 22 日覆書岡氏，贊其「文章知己必有神契於微」，「奇才積學，必爲都中士夫所推重」〔註 74〕。又，沈氏所覆乃「上海邵君所寄」〔註 75〕之信。張煥綸《致岡鹿門函》末稱：

去年邵公交到沈君一函，擬俟臺駕返滬面致，後留弟處忽忽忘之。〔註 76〕

張氏所指「沈君一函」或即沈氏覆書。張氏此函文首云：

貴恙知已霍然，東望海雲，無任雀躍。〔註 77〕

則表明此時岡氏已回國，是信當作於 1885 年 5 月之後。由於張氏疏忽而致延誤，使岡千仞未能及時收悉，故其燕京之旅有「禮久已不行於中土歟」〔註 78〕之疑。黃遵憲早先於 1882 年調任清國駐美國舊金山領事，名句「吟到中華以外天」即當時所題以留別日本友人。〔註 79〕岡氏撰作《送清國黃君公度赴任

〔註 7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5 頁。
〔註 7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72 頁。
〔註 7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5 頁。
〔註 7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6 頁。
〔註 74〕《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63 頁。
〔註 75〕《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63 頁。
〔註 76〕《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1 頁。
〔註 77〕《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0 頁。
〔註 7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25 頁。
〔註 79〕黃昇任《黃遵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8 月版，第 620 頁。

美國序》相贈，羨慕黃氏「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註 80〕。黃遵憲此時身處大洋彼岸，直至 1885 年 11 月，即岡氏東歸後，方才返回中土，故無從獲悉岡氏信函。綜上所述，張斯桂與沈文熒均及時回覆岡千仞之信，張斯桂更是坐等其直至日暮。何如璋、黃遵憲則限於客觀條件未能於岡氏見面。岡氏稱中土文士不知禮義屬一時意氣之語，有欠考慮，如其俟後覆語，當不至徑言若此。

除詩文酬贈、書信往還外，晚清士子在日記中也曾提及岡千仞，這些材料可參照《觀光紀游》中的相關文字對讀。其中記錄最爲詳備者，當推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該書自甲申（1884）九月初一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保留了大量與岡千仞交往的細節。（見附錄四）雙方初次見面，《觀光紀游》僅言李氏「問我邦沿革」〔註 81〕，頗爲簡略。而《荀學齋日記》則稱岡氏持楊守敬介書來訪，述及書中內容，「前日鐵香又爲之先容，不得已見之」。似乎李慈銘與岡千仞見面原非初衷，而是礙於好友情面，勉強爲之。儘管起初印象不佳，但岡氏著述頗豐，且「人亦誠，竺見余，始終去冠」，故與其「久談而出」。正是岡氏的知書達禮才使李氏的態度有所改觀，二人筆談得以延續。此後岡氏接連數次造訪李氏宅底，皆因其病重而未能如願，而《荀學齋日記》所記明顯較《觀光紀游》更爲豐富。尤其是九月二十三日李氏賦詩三首送別岡氏及九月二十五日中「數日前嘗以詢岡鹿門」「日本刻書」之事在《觀光紀游》中全無蹤跡。（見附錄四）此外，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記》亦曾記錄同月岡千仞見訪一事，謂其人「抗志不仕，憤世道之衰，衺說橫流，乃東夷之賢者也」。（見附錄四）

（三）近代中國知識人文集裏的岡千仞

1885 年 4 月，岡千仞結束中國之旅，返日修養。已屆「知天命」之年的岡氏此後再未離開國土，行遊域外。但從清人的詩文與日記中可以略窺一二的是，岡氏或借助鴻雁傳書，或進行當面交流，繼續與中土友人保持聯繫。根據岡千仞與清人交往時間的先後順序，以上材料大致包含下列四種類型。

首先是岡千仞此前在日本即已結識的舊友。上文提到，岡氏來華正值王治本往遊新潟之際，二人通過書信交換彼此的見聞感受。岡氏回國後，王治本「即訪其廬，一笑之外，互說遊情」。光緒乙酉（1885）夏四月，王治本爲岡千仞《贈言》題詞，描繪了去年鴻雁傳書的情形：

〔註 80〕《黃遵憲遺墨》，第 155 頁。

〔註 8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05 頁。

鹿門與余相交六七年，才學之博，意氣之豪，心欽久矣。去年余在越北，鹿門往遊春申，泛吳江，渡浙水，北涉燕都，東探粵嶺，隔海飛鴻，時傳音信，各道其跋涉所經山川之勝，並錄一二遊詠，以示旅行之情興，雖萬里猶比鄰也。〔註82〕

二人天涯知己的友情躍然紙上。類似的表述在王氏當年西行前的贈詩中亦曾出現：

十年作客長兒子，四海逢人皆弟兄。

別淚多於梅節雨，詩情清似竹林風。〔註83〕

岡氏無疑已被王氏當作海外弟兄，因而離別時分才會淚如雨下。明治戊子（1888）長夏日，岡千仞爲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記》作序，對此書評價頗高，同時也稱《觀光紀游》與《觀光游草》「自許不甚負此壯遊也」。（見附錄四）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也是岡千仞的好友，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爲其《藏名山房文集》、遊乘五種（《新潟游乘》、《會津游乘》、《福島游乘》、《靜岡游乘》，等）與《硯癖齋詩鈔》）題詞。尤其是《硯癖齋詩鈔》所題之「好遊、好詩、好文、好記事皆其癖也」鮮明準確地點出岡氏的主要興趣。黎庶昌之侄黎汝謙亦有《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雜作〉題語》。岡千仞赴華途中曾在神戶與黎汝謙有過詩文唱酬，不久「以差竣去」，庚寅（1890）冬「又隨節東渡」。辛卯（1891）夏四月再次與岡氏在東京相遇，岡氏出示《藏名山房雜作》，「屬爲點定授」。黎氏可謂熟知岡氏者，故其文末所評較爲妥當：「鹿門不偶於世久矣，其所爭者，固不在一時之榮，而在於千秋之業乎」。（見附錄四）

其次爲岡氏遊華期間結交的新知在其歸國後撰作的回憶性文字。1884 年 7 月 28 日，岡千仞慕名而遊浙江鄞縣天童山，並參訪山中寺廟，寺僧設宴款待，請其留宿，岡氏

以舟待辭。寄禪曰：「猶有玲瓏岩可探，衲且導。」破笠草鞋，杖而出。峻阪險絕，奇峰峭峙。有一岩窟，曰「了塵禪室入定處」。余賦示一律，寄禪與諸僧傳觀。贈其著《嚼梅集》及《天童山志》，意頗懇款。〔註84〕

〔註82〕《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72 頁。

〔註83〕《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72 頁。

〔註8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1 頁。

岡氏所賦見收於《觀光游草》卷上，題作《天童山賦贈僧寄禪》：

天童名久藉東瀛，登覽聊攄羈客情。寺徑境幽千竹矗，禪扉晝鎖萬禪鳴。林巒浮出樓臺影，朝暮打來魚鼓聲。深契偏因師撚起，玲瓏岩上悟三生。（寺背岩壁十丈，曰玲瓏岩。有王安石、王陽明諸人題詠。）〔註85〕

天童山盛名遠揚，爲日邦「名衲之所問禪」〔註86〕，岡氏來華前即有耳聞，曾多次表達造訪天童的意願，此番作客蘇杭，當然不會放過登臨送目的良機。在「寄禪」的引導下，他得以一探玲瓏岩的美景，「登覽聊攄羈客情」就是其心情的眞實寫照。「寄禪」僧法號敬安（1851～1912），號八指頭陀，俗姓黃，名讀山，湖南湘潭人，後任中華佛教總會第一任會長。〔註87〕其所贈《嚼梅集》凡二卷，收詩三百餘首，光緒七年（1881）刊於浙江。〔註88〕岡千仞當晚抵達寧波，臥床翻閱是著，認爲

其詩自禪而進詩，眞得妙解者，恨匆卒唱和，未及與之訂文字緣。〔註89〕

由於時間倉促，岡氏無暇與寄禪從容談詩，未能結緣，引以爲憾。但岡千仞回國後，寄禪先後撰作四詩，表達對於舊友的思念。《秋夜懷鹿門戒兄》（1885）云：

去歲麓山寺，相逢笑口開。驚心復黃葉，行跡長青苔。鴻雁書難達，別離情易哀。寄聲湘浦月，好送夢魂來。〔註90〕

《懷日本岡千仞，即次甲申（1884）夏日遊四明天童玲瓏岩原韻》（1901）云：

高人白首臥東瀛，應憶天童水石清。洞古苔深無客到，岩陰晝靜有蟬鳴。松杉曾見當年植，鍾梵同聽下界聲。雲海茫茫萬餘里，因緣強自說來生。〔註91〕

又，《日本岡千仞寄次甲申（1884）夏同遊天童玲瓏岩韻見懷並所著〈觀光紀游〉，感疊原韻二首》（1902）云：

〔註8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293頁。

〔註8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51頁。

〔註87〕梅季《前言》，釋敬安著，梅季點校《八指頭陀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7年12月版，第1頁。

〔註88〕梅季《前言》，《八指頭陀詩文集》，第8頁。

〔註8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51頁。

〔註90〕《八指頭陀詩文集》，第81頁。

〔註91〕《八指頭陀詩文集》，第217頁。

尺書報我自東瀛，展讀如聞笑語清。春水綠波人萬里，幽溪碧樹鳥孤鳴。觀空猶憶前塵影，問訊還勞遠寄聲。一別玲瓏岩下路，滄桑百感竟叢生。

每聞海客話東瀛，風俗還如太古清。所學皆能爲世用，其人不僅以詩鳴。閒雲亦抱爲霖意，野鳥都含贊佛聲。中日本來唇齒國，掣鯨休使海波生。〔註92〕

《秋夜懷鹿門戒兄》作於岡氏東歸當年，懷念去年言歡的情狀，感歎書信難通，只能寄心明月，託以相思。第二首則作於多年以後，其間中日發生了甲午海戰，但追次原韻的方式足見國家交惡與時空阻隔並未沖淡寄禪對舊友的思念之情。1902 年，寄禪收到岡千仞記錄中國之旅的《觀光紀游》及相關詩作，疊韻追和，作詩二首。上述四詩中屢屢流露出寄禪物是人非、滄海桑田之感，然而從岡氏原作開始，通過寄禪的系列詩作，可見其對海外知己的感情在十餘年中步步加深乃至昇華。雖然時過境遷，中日在官方層面的關係急劇惡化，但岡千仞與寄禪——民間、私人——的關係卻跨越了國別種族與意識形態的界限，朝著與兩國政府相反的方向發展，岡氏當年遺憾未竟之「文字緣」，反而在十數年後締結，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說寄禪因文字與岡千仞結緣，那麼張煥綸則主要在思想上受到影響而發生徹底轉變。岡氏回國後不久，張氏便致函問候：

承教西學當務其本，不獨服先生識見之高，尤見先生愛我國之深。〔註93〕

敝處創設書院之意，蓋懲今日學古者多不知外務者，粗知外務者尤淺薄不足倚任，思有以酌劑之。

弟平生最不喜八股文。〔註94〕

對於岡千仞指斥的中土弊病與提出的「藥石之語」，他在信中幾乎全盤接受，即使在談及岡氏豔羨的書院時，張氏的觀點也分明透出岡氏的論調。

另外，岡氏所交新知中有些人在岡氏東歸後赴日遊覽，得以再次與岡氏當面交流。庚子（1900）正月，文廷式應日本東亞同文會之邀開始近兩個月

〔註92〕《八指頭陀詩文集》，第 227～228 頁。
〔註93〕《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0 頁。
〔註94〕《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 281 頁。

的東瀛之旅，以《東遊日記》記錄此次遊訪。〔註 95〕（見附錄四）二月六日，文廷式拜訪「十七年前廣東舊友」岡千仞。1885 年 2 月，岡千仞曾在廣州與文廷式多次筆談，結爲好友，尤其是文氏所贈《廣東通志》屬清人贈書中部頭最大者，使岡氏印象深刻。1900 年岡千仞已近古稀之歲，老態畢顯，但依然筆耕不輟。「大學」、「文科」均屬新興西洋教育範疇，堅守傳統漢學陣地的岡氏面對急速變化的社會頗多無奈。根據《東遊日記》，岡千仞在二月八日偕重野成齋與文廷式筆談。二月十一日，包括岡氏在內的四十餘位漢學家與文廷式雅集，賦詩酬唱。另一位在東京與岡千仞見面的中土友人是盛宣懷。1884 年 11 月，二人在天津相識，當時盛氏正督理天津海關，公務繁忙，他在筆談中流露出對於岡氏縱情山水的羨慕之情，仍希望能有機會再遊日本。

（岡）先生十四年前東遊，爾時逢敝邦士人誰姓？

（盛）前在貴國各處遊歷，均未多日勾留，與貴國友人相識無多。

（岡）不知先生有何公幹東遊？

（盛）彼時中東初次通商，吾國人民經營於貴邦者甚多，奉李傅相委赴察看。〔註 96〕

（岡）敝邦比先生東遊時大改面目，殆如別世。不知先生無意再遊乎？已有公館及各港領事署，先生何不藉而東？

（盛）鄙意滿擬往遊，惟因官而遊爲未能自主耳。爲自主不容易。〔註 97〕

（岡）敝邦山水，松島爲第一，實爲弟鄉里……若得臺下一遊，眞爲山水生色者。

（盛）京都一水可通，公既遠來，自必前往，但冠裳之地，無甚閒情逸致。〔註 98〕

（盛）貴國山水以何處爲佳？弟他日去官，必將東渡作數月遊。〔註 99〕

〔註 95〕孔祥吉《文廷式的日本之行》，《百年潮》2004 年第 3 期，第 76～80 頁。
〔註 96〕《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4 頁。
〔註 97〕《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1 頁。
〔註 98〕《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2 頁。
〔註 99〕《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第 503 頁。

盛氏上次東遊是在十四年前，即同治十年辛未（1871）。〔註 100〕1868 年日本改元明治後，政府主導維新改革，推動對外開放。1871 年 9 月 13 日在天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中日近代外交關係正式建立。當時有不少清人在日本經商，盛氏是奉李鴻章之命察看中日通商情況，受限公務而未及停留，故與日人交流較少。但二人筆談的 1884 年距 1871 年已經過去了十餘年，日本明治維新已初見成效，一掃幕府治下的黑暗閉塞，岡氏「大改面目，殆如別世」的形容並不爲過。儘管因公出遊並非自己所能決定，但盛氏對於鄰國東瀛始終心嚮往之，向岡氏打聽日域風土佳處，冀望致仕後再行前往。盛宣懷的願望在光緒戊申（1908）提前實現，時任清廷郵傳部右侍郎、會辦商約大臣的他「久患痰喘」,「請假赴日就醫並考察礦廠」〔註 101〕，獲准東行，著有《愚齋東遊日記》。〔註 102〕盛氏此遊自八月初七日從上海乘「高麗」號輪船出發至十一月初二日返回上海，歷時近三月。據《愚齋東遊日記》，九月初二日，盛氏此行首次與「二十五年前舊交」見面，稱其「博學能文」,「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岡氏以《觀光紀游》持贈，盛氏以「重繙日記兩三卷，猶憶風姿廿五年」一聯即興回覆，雖然時光荏苒，但二人情誼未變。十月初三日，盛氏動身前往神戶，岡氏亦赴車站爲其送行。（見附錄四）

最後一類是岡氏歸國後才結交的中土友人。丙戌（1886）春，無錫人許玨隨欽差大臣張蔭桓往使美國，途徑日本，恰與岡氏同席。酒酣耳熱之際，二人賦詩唱酬，雖然相逢即別離，但許氏將出使看作自身職業需要，勸慰岡氏「莫爲風波惜遠離」。（見附錄四）光緒十三年（1887），傅雲龍通過選拔前往前往日、美等十一國考察。傅氏在日期間，岡千仞曾託弟子館森鴻奉上《觀

〔註 100〕關於盛宣懷首次赴日情形的描述，筆者所見僅《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其他材料似均未提及。夏東元編著《盛宣懷年譜長編》（上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第 12 頁）亦是據此文獻進行繫年。

〔註 101〕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二十三，第 29 頁，轉引自《盛宣懷年譜長編》下冊，第 887 頁。

〔註 102〕對於此次東行的性質，學界態度不一。因非本書討論重點，茲不贅述。可參夏東元《盛宣懷年譜長編》（第 891 頁）、王曉秋《師彼所長，去我所短——盛宣懷〈愚齋東遊日記〉》（載氏著《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北京：崑崙出版社，2005 年 8 月版，第頁）、綃紅《東遊日記——盛宣懷扶病東洋取經實錄》（《文匯讀書周報》2009 年 12 月 4 日。〈http://whdszb.news365.com.cn/tg/200912/t20091204_2545750.htm〉，13/05/2012 available.）及王爾敏《盛宣懷東遊日記日譯本序》（載氏著《新史學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8 月版，第 379～387 頁）。

光紀游》，傅氏「改其文數首」。（見附錄四）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黃慶澄前往日本進行考察。六月二十二日，他於西京廣瀨氏宅初見岡千仞。六月二十五日，再訪岡氏，以其「性嗜史學，長於辨才」，「晤談良久」。此行受到岡千仞與廣瀨夫婦的悉心款待，令黃慶澄「不勝感荷，臨別黯然」。（見附錄四）

回顧此遊，岡千仞在《觀光紀游》卷末稱：

> 足以少報蓬桑夙志。唯觸嶺南瘴毒，一病奄奄，僅免一死。豈名山有靈，不悦余妄弄三寸不律，漏泄中土千年靈秘耶？〔註 103〕

在得償夙願的同時，他還是對由於染病而提前回國頗爲遺憾，末句看似玩笑語，實則蘊含了岡氏寫作時的自信：發掘出「中土千年靈秘」。岡氏引以爲豪的「中土千年靈秘」究竟是什麼？在《觀光紀游》卷首的《例言》中他提道：

> 是書記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議其過甚。顧余異域人，直記所耳目，非有意爲誹謗。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爲藥石之語乎？〔註 104〕

從深層意義上講，「中土千年靈秘」主要指「失政弊俗」，岡千仞的貢獻不僅是把中國的社會問題揭示出來，更重要的是開出療治社會弊病的藥方。作爲「興亞論」的倡導者，岡千仞固深愛中國者（張煥綸語），「藥石之語」並非恣意污蔑，而是他經過實地考察後的肺腑之言，體現了史學家的嚴謹與理性。上世紀 40 年代汪向榮便稱：

> 而這些所指謫者，日後皆成了不幸而言中的事實。對於這個人，我們不能不佩服其有先見之明。
>
> 在這裡我們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岡氏者，其原因不惟在其有先見之明而已，且感其能公諸冊籍而供有心人之取爲藥石也。〔註 105〕
>
> 而尤以儒者如鹿門岡先生似者，其對中國之領土，決無領族之意。〔註 106〕

雖然汪氏寫作此文正值日軍侵華之際，但他在文中客觀寬容地對待《觀光紀游》，而非徑以民族主義情緒拒斥，實屬難能可貴。誠然，岡千仞及其《觀光

〔註 10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14 頁。

〔註 104〕《觀光紀游・例言》，《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5 頁。

〔註 105〕汪向榮《記「觀光記遊」作者岡千仞氏：六十年前日本人的中國觀》，《新生命》，1944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17 頁。

〔註 106〕《記「觀光記遊」作者岡千仞氏：六十年前日本人的中國觀》，第 24 頁。

紀游》，特別是在「藥石之語」方面，對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近代思想的轉換與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甲午戰後，倍感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知識人紛紛以先進國家爲標杆，尋求民族復興之路。日本成爲中國學習的主要國家，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日益受到學界關注。1900 年 4 月，宋恕爲《親燈餘錄》作序時提道：

> 年二十六，遊學申浦，始見彼土書三種，則岡鹿門氏之《尊攘紀事》、《觀光紀游》、岡本子輔氏之《萬國史記》是也。其後客南北，銳意求彼土書，所見日多……然弗敢忘岡氏、岡本氏之最先引我入勝也。〔註 107〕

宋恕生於 1862 年，「二十六歲」即 1888 年左右遊學上海，首次接觸日邦著述。作爲入門所讀，岡千仞的《尊攘紀事》與《觀光紀游》令其印象深刻。根據宋恕光緒十八年（1892）日記，他在當年二月五日「始見岡鹿門《觀光紀游》」〔註 108〕。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三日，宋恕致函岡千仞，提道：

> （恕）局促鄉邦，未曾東渡，自幼聞貴邦山水之佳，文物之盛，神馳久矣！吳人張經甫與恕善，每論東土，必及先生。經甫，敝邦第一流人也，而心中有先生，於是恕心中亦有先生矣。既又獲讀大著《尊攘紀事》、《觀光紀游》二書，名實克副，欽慕益深。〔註 109〕

張經甫即張煥綸，爲岡千仞中國行中結交之密友，曾獲贈《尊攘紀事》、《觀光紀游》等書。宋恕所讀或即岡氏贈書，宋氏從學張氏，而張氏又幾乎全盤接受岡氏之理念。岡千仞在《觀光紀游》卷首自序中引莊子「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功分定矣」〔註 110〕，楊際開的觀點頗有見地：

> 這提供了由東西文明衝突走向相互理解的視座，表現了一種價值中立的亞洲主義全球化世界秩序觀。通過岡千仞—張經甫—宋恕，近代中日兩國間形成了早期的民間文化角色網。新的世界秩序觀通過這一網絡得以進入到中國的文化脈絡中來。〔註 111〕

〔註 107〕宋恕著，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函牘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2 月版，第 294 頁。

〔註 108〕《宋恕集》下冊「壬辰日記摘要」，第 933 頁。

〔註 109〕《宋恕集》上冊「函牘下」，第 556 頁。

〔註 110〕《觀光紀游・自序》，《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4 頁。

〔註 111〕楊際開《作爲思想範式的日本觀——宋恕與變法運動》，《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 年 9 月號，總第 6 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003022g.htm〉，14/5/2012 available.

岡千仞在宋恕思想觀念形成上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視。宋恕曾有志興亞，「著書十萬餘言」攻擊僞儒的虛假面目，但在中國曲高和寡，反爲僞黨肆意攻擊，只能「藏諸石室，雖未敢示人」〔註 112〕。此外，1899 年 7 月 26 日，蔡元培在日記中摘引《觀光紀游》批判「八股毒」的文字後稱「十年前見此書，曾痛詆之，其時正入考據障中所忌耳」〔註 113〕，這「表明了元培迴心的思想過程」〔註 114〕。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周氏兄弟也對《觀光紀游》頗多好評。1929 年 7 月 22 日，魯迅收到李秉中自日本寄贈的《觀光紀游》一部三本。〔註 115〕六天後，他在雜文《「皇漢醫學」》中批判了中國人只聽得進外人好話的劣習。既而引用《觀光紀游》7 月 23 日的一段文字，大意謂馮一梅盛稱日邦多紀元簡之醫書，卻對英醫合信所著絕口不提，囿於漢方，而矇於外事。〔註 116〕岡千仞提倡在延續傳統的同時向西方學習，魯迅較爲欣賞，在文末稱：

> 岡氏距明治維新後不久，還有改革的英氣，所以他的日記裏常有好意的苦言。〔註 117〕

魯迅的目的是促使國人反省，加速國民性改造，因而對於用心外事的岡千仞頗多好感。1930 年 5 月 3 日，他致函李秉中，信中比較王韜《扶桑遊記》與《觀光紀游》，稱王書所載「以文酒伎樂之事爲多，較之《觀光紀游》之留意大事，相去遠矣」〔註 118〕。無獨有偶，魯迅之弟周作人也將二書聯繫在一起對讀。1935 年 6 月 24 日在《關於王韜》一文中，他認爲王韜在日期間流連風月，爲日人所譏，至多可比袁枚，趕不上李漁、鄭燮，與岡千仞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註 119〕。岡氏在《觀光紀游》中指斥的六經毒「不獨指科舉制藝，

〔註 112〕《宋恕集》上冊「函牘下」，第 557 頁。

〔註 113〕蔡元培著，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26 頁。

〔註 114〕楊際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典範的轉換——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變化爲線索》，《浙江學刊》，2002 年第 4 期，第 50 頁。

〔註 115〕《魯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 708 頁。

〔註 116〕關於將《皇漢醫學》與《觀光紀游》聯繫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文章，可參〔日〕眞柳誠《魯迅のエッセイ〈皇漢醫學〉について》，《日本醫史學雜誌》2003 年第 49 卷 1 號，第 40～41 頁。

〔註 117〕《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40 頁。

〔註 118〕《魯迅全集》第十二卷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5 頁。

〔註 119〕《苦竹雜記》，第 21 頁。

並包括考據義理在內，可謂有識」〔註 120〕。而王韜所受的評價則相形見絀：「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閒，亂世則幫忙而已」〔註 121〕。上述周氏兄弟各文所撰時間大致相當，二人關係已經惡化，沒有相互借鑒的可能性，但觀點卻不謀而合。〔註 122〕

二、晚清傳媒視野裏的岡千仞中國行——以《申報》爲中心

1884 年，57 歲的王韜由香港重回上海，「被英人美查聘爲《申報》總編纂」〔註 123〕。是年夏，與王韜關係親密的岡千仞來遊禹域，日錄其所見聞。1886 年，岡千仞在中國期間所作日記以《觀光紀游》爲題結集出版。《申報》是《觀光紀游》中徵引頻次最高的新聞媒體，岡千仞所掌握的甲申事變、中法戰爭等時事消息有很多都直接來源於《申報》。上文第二章第二節提到，岡千仞最初將自己在中國的見聞感受發表於日本的《郵便報知新聞》，因而可以說，《觀光紀游》的產生與當時新聞傳媒的發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由於清末，尤其是岡氏遊華期間，恰好是中國傳媒業開始起步的階段，發展方興未艾，而且岡氏中國行的大本營上海又是近代眾多報刊媒體雲集的重鎮。〔註 124〕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上海成爲商業報紙的出版中心」〔註 125〕，在英文《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後更名爲《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法文《上海新聞》（*Le Nouvelliste de Changhai*）、德文《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 Lloyed*）等西文商報的刺激下，中文商報《上海新報》（後改辦《字林滬報》）、《申報》、《新聞報》等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而其中《申報》的成就在本地商報中最爲耀眼。

〔註 120〕《苦竹雜記》，第 21～22 頁。

〔註 121〕《苦竹雜記》，第 22 頁。

〔註 122〕舒蕪就指出「在《魯迅書信集》出版之前，周作人不會看到這封信（筆者注：此信即指 1930 年 5 月 3 日《致李秉中》）」，《魯迅、周作人後期的共同點》，載氏著《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第 391 頁。

〔註 123〕《王韜年譜》，第 158 頁。

〔註 124〕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地區所辦報刊爲數眾多，僅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小報便多達 365 種，可參李楠《晚清民國時期的上海小報》（插圖本）中《附錄一：晚清、民國時期（1897～1952）主要上海小報索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9 月版，第 383～416 頁。

〔註 125〕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月版，第 305 頁。

雖然上海的商報基本爲外商創辦，但《申報》幾乎「全由中國人主持筆政和經營報務」〔註 126〕，因此更具本土色彩。其次，作爲商報，《申報》具有以盈利爲目的的特性，不會像當時聲名顯赫的《時務報》或《萬國公報》那樣被賦予過多的政治與宗教色彩，而是出於商業考慮，以市場爲導向，努力滿足讀者的需求。再次，《申報》「義利兼顧」，不僅保存了大量的近代史料，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學文獻價值。〔註 127〕此外，拉斯韋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1948 年在《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三功能」理論，即傳播活動具有「監視環境」、「聯繫社會」與「傳遞遺產」三大作用。〔註 128〕作爲大眾傳媒，《申報》亦具備上述功能，這使從傳播學角度切入研究岡氏中國行在晚清社會的影響與意義成爲可能。

筆者輯錄出《申報》中關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相關的報導共計三十則，其中一半刊載於 1884～1885 年岡氏中國行期間。（見附錄五）岡氏於 1884 年 6 月 6 日初抵上海，而《申報》在一周後的 6 月 15 日即刊出《文士來遊》的報導，簡述其生平、學術及此行相關情況。筆者以爲，《申報》如此迅速的報導不僅源自岡千仞異邦文士的身份，更由於他和《申報》總編王韜之間密切的私人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總稱其爲「日東文豪」，「今之豪傑士」，「日本名流中之矯矯〔佼佼〕者」；學術上突出其「以文學稱於時」，「博聞強識」，「以國史自任」；讚賞其勇於擔當，「毅然不橈」，積極參與「定國是」的入世精神；並推測其「所至之處，必當倒屣爭迎矣」。從此文開始，岡氏正式進入《申報》視野之中，故《文士來遊》實際爲後續的相關報導奠定了基礎。此報導發布的第二天，岡千仞即在日記中提及，其對於《申報》之用心亦可見一斑。〔註 129〕6 月 12 日晚，王韜設宴，岡千仞偕侄岡濯赴邀，眾人詩酒唱和。岡氏之詩共二首，題作《王紫詮招陪袁翔甫、倪耕劬、錢昕伯、劉

〔註 126〕《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第 323 頁。

〔註 127〕參李振《論〈申報〉的「義利兼顧」及其現實意義》，《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06 年第 2 期，第 12～15 頁；趙增新、張渭笑《從現代角度看〈申報〉的文獻價值》，《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87～89 頁。

〔註 128〕李彬《傳播學引論》（增補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 8 月版，第 187～188 頁。

〔註 129〕「一將校出接，見余名刺，曰：『聞日東學士來遊上海，先生之謂乎？』蓋記《申報》所在『日東文豪某，攜著書千卷，爲中土山水之遊』語也。」（《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0 頁）

子良、姚賦秋，紫詮有詩，和答。翔甫實隨園先生孫》，見收於《觀光游草》卷上：

一醉論交月下欄，沉沉清夜漏籌闌。廿年心折倉山集，相見莫爲門外看。

纖纖眉月照危欄，銀燭飛觥酒興闌。到底隨翁眞解事，不如痛飲使余看。（隨園詩曰：「有酒余不飲，無酒余不歡。不如招飲客，痛飲使余看」。是席余酒半眩暈，不欲飲故云。）〔註 130〕

岡氏當日最大收穫即結識袁枚之孫袁翔甫。《隨園詩話》於寬政三年（1791）「傳入日本，並大受歡迎」〔註 131〕，袁枚「名藉海外」〔註 132〕，在日本家喻戶曉。但岡氏從袁翔甫處得知，袁枚書室與書版均已不存，不勝唏噓。此日同赴晚宴者亦即席唱和，其中一人步次岡氏原韻，刊載於 6 月 16 日《申報》附張中，末署「□北逸民」。宴會主人王韜一號淞北逸民，此詩或即王氏所作。岡作意在懷人，向袁枚致敬；王詩則重在描摹眼前情狀，作於半夢半醒之間。

其餘材料主要分爲三種情形。一是岡千仞所撰之詩文，包括第十一、十四、十五，與十九共四則材料。（見附錄五）前三則均爲岡氏詩作，屬未定之初稿，故可與定本對校，一窺詩作之最初形態，頗具文獻校勘意義。第十九則材料與之聯繫緊密，故一併討論。1884 年 12 月 20 日《申報》所載「岡千仞未定草」的最終定本見收於《觀光游草》卷上：

《邀饗李芋仙、王紫詮、曾重伯、何桂笙、錢昕伯聚芳園，和桂笙韻》

萬紙爭傳唱和詩，文豪名字四方馳。功名無分有爲日，風月多情初老時。塞北雲煙歸壯語，粵南波浪鼓雄思。問君說客舌三寸，孰與吾人筆一枝？（《申報》記余遊上海，曰日本書豪岡鹿門，攜著書千卷，爲中土之遊。桂笙爲《申報》社員。）〔註 133〕

岡千仞原詩詩題稱其與友人集於聚豐園，所作次韻「高昌寒食生」所贈，同席者尚有李士棻與王韜。而據定本，則似爲岡氏擺宴，來集友人除李、王二氏外，尚有曾廣鈞（重伯）、何鏞（桂笙）與錢徵（昕伯）三人，岡氏此詩是

〔註 130〕《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89 頁。

〔註 131〕張伯偉《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中國文化》，2009 年第 2 期，第 110 頁。

〔註 13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9 頁。

〔註 13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299 頁。

和何鏞之韻。何氏爲當時《申報》主筆之一，筆名「高昌寒食生」。具體到正文，除韻腳外，定本亦在內容與聲調上對「未定草」作較大潤飾。《申報》發表時徑稱「何桂笙」爲「高昌寒食生」，似屬何氏刊載時所作改動。驗之《觀光紀游》當日所記，則主人當爲曾廣鈞，饗宴地點爲聚豐園。〔註 134〕二詩似均有闕漏，然末句皆以「舌三寸」與「筆一枝」相對，強調筆談在岡千仞與中土文士交流中的橋樑作用。此詩撰作當日即被刊發，既由於其內容，亦與何氏之身份有關。1885 年 1 月 11 日《申報》刊載岡千仞「未定稿詩作」二首。根據詩題，二詩均爲次韻寺田望南之作，當時亦有王韜在場，第二詩即爲讀王韜和寺田四律後所作。《觀光游草》卷上載二詩定本，俱屬同一詩題：《寺田望南招飲紫詮、芋仙、重伯、易實甫、黃夢畹，與諸子和望南韻》：

卜來良夜此相過，瀲灩酒杯紅漾波。殊域遊如萍梗泛，中年感向友朋多。干戈滿地茫茫歎，江海無邊浩浩歌。壯士未容道途老，醉將長劍手親摩。

滬上汗漫一歲過，朔風吹雪海揚波。即今天地戰塵暗，自古詞人感慨多。遊倦未成歸去計，豪來漫唱莫哀歌。誰能長嘯卻胡虜？醉見艦旗相蕩摩。〔註 135〕

未定稿表明岡氏此時已絕意仕進，青年壯志灰飛煙滅，只是縱情於詩酒山水之間。時光匆匆，有如白駒過隙，他在感歎世事滄桑的同時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在定本中，岡氏雖有身世浮萍、老態初顯之感，但仍存手持長劍，漫遊天涯，兼濟蒼生的豪情壯志，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根據《觀光游草》，同席者尚有李士棻、曾廣鈞、易順鼎（實甫）與黃協塤（夢畹）諸人。《觀光紀游》12 月 26 日有此次宴會的記錄，赴宴者另有葉慶頤，眾人再次集於聚豐園。岡氏燕京之旅中已聽聞易實甫「年少異才」的文名，當日得見，以爲「奇遇」。此集岡千仞「和望南途上詩，紫詮、實甫、重伯、新儂屬和」，堪稱「盛會」〔註 136〕，詩作初稿大多見於《申報》。1884 年 12 月 29 日，《申報》刊載寺田望南原詩「待定草」一首及《申報》主筆王夢畹和詩「稿」一首，總編王韜和詩「未定稿」四首。翌日刊載「楫竹詞人」和詩「草」一首。王夢畹、王韜詩題中均提及「黃瘦竹處士」同飲酒樓，「楫竹詞人」即黃文翰（瘦竹）。

〔註 13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2 頁。
〔註 13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300 頁。
〔註 13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 156 頁。

易順鼎即席亦有和詩，回寓後再和二首，贈予岡氏，題作《日本寺田君望南、岡君鹿門邀飲滬上酒樓，即席賦詩，余既勉和，返寓復和二首，錄請岡君大雅正之》，詩曰：

琴聲如聽水仙過，坐上軒然起大波。四海一家前史少，十洲三島異人多。天東鳳鳥生仞國（見許《書》、范《史》及《論語讖》），門外驪駒奏雅歌。今日爭雄非晉楚，饜詩安用壘頻摩？

筆端驅使萬靈過，字體何曾異磔波。日月六經垂教遠，風雷八表降才多。終襄令主行周禮，休訝狂奴作楚歌。記取天涯今夕酒，早聯中外共觀摩。〔註137〕

翌日，李士棻致函岡千仞，將昨日參加宴集者譽爲「飲中八仙」，盛讚岡氏與寺田之作「皆入唐入〔人〕之室」〔註138〕。第十九則發表於岡氏回國之後，是其在好友李士棻去世後所作的祭文。二人1884年末在上海一見如故，互贈著書，惺惺相惜。李氏更豪言「方今詩人，西有芋仙，東有鹿門」〔註139〕。岡氏此文回顧往昔與李氏之交往，感情眞摯，催人淚下。文末所附王韜注評曰：「鹿門岡君寄此文來，少足爲芋老吐氣」。

第二種情形爲岡千仞中土友朋的贈詩，包括第四、五、六、十三、十七則。（見附錄五）前三則是岡氏遊華途中所交新知楊引傳、倪鴻、俞樾的贈酬詩作，現以第六則爲例說明之。關於岡千仞此行與俞樾的交往，第二章第三節在探討岡氏對於蘇杭的城市印象時已有論述。岡氏曾向俞樾贈送自著《涉史偶筆》與《尊攘紀事》，俞樾讀後回贈七律一首，其未定稿刊載於《申報》1884年8月21日第4079號上，但俞氏《春在堂詩編》並未收錄，屬其集外佚詩。日本東洋文庫存有此詩，爲鄭海麟輯錄，筆者對校發現二者文字幾乎全同，皆屬未定稿，但《申報》尾聯之「衹」，鄭氏整理作「祇」〔註140〕，據文意觀之，當以《申報》爲是。此詩別具匠心，巧妙融匯了岡千仞的學術經歷與治學之所，甚至里居也貫穿其中，尾聯雖遺憾雙方言語不通，無法在口頭上直接交流，但「鄉音」一詞還是表達了對於日邦來客的友善之情。第二十二則發表於1887年，是岡氏歸國後中土友人的感懷之作。此詩爲組詩《海

〔註137〕《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3～284頁。
〔註138〕《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4頁。
〔註13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第146頁。
〔註140〕《清季名流學士遺墨》，第286頁。

外懷人詩》之一，據詩末所署「策鼇遊客新儂葉慶頤待定稿」，知爲葉慶頤所作。詩題岡千仞後稱其「字鹿門」不確，明治維新後，岡千仞改字振衣，名千仞，號鹿門。（詳參第二章第一節）詩中檃栝岡氏生平、著述與行旅，末句「東望芝山繫我思」點明作者海外懷人的主旨。

上述兩類材料幾乎都與上海相關，所涉人物與《申報》館員關係密切，因而得以在《申報》上發表。其餘材料中，第七、八、十、十六則刊載於岡千仞中國行期間。（見附錄五）第七、八則提及岡氏在煙臺、燕京遊歷時喜與名士鉅公筆談贈答，勾畫出他學養豐厚的東國文士形象。第十則爲 1884 年 12 月 18 日《申報》刊發長文《日事客談》，其中岡氏詳述其「門戶堂奧」說，以屋爲喻，譬中國爲堂奧，日本爲門戶，高麗爲「自門至堂之甬道、遊廊」，琉球爲「門戶之有檻，堂奧之有階」，認爲中日唇齒相依，希望兩國互相提攜，攜手抗敵，共振亞洲。第十六則以日本「書生」岡氏「門戶堂奧」說之「高瞻遠矚」暗諷清廷主政者昏聵無能。1885 年岡氏回國後《申報》的相關報導以間接提及爲主，值得注意者爲第二十三與二十六兩則《觀光紀游》書後。（見附錄五）第二十三則爲王韜所作，發表於 1887 年 5 月。岡千仞 1887 年致函王韜，寄出三十部《觀光紀游》，託其在中國代爲銷售。〔註 141〕王韜所讀《觀光紀游》，或即此三十部之一。王韜對岡千仞極爲熟悉，故此文重點著眼其與岡氏的親身交往。介紹岡氏時，突出其「質直迂疏」的性格與「生平好遊」的興趣。具體到中國之旅，王韜稱岡氏此遊「可以無憾」。文中大段摘引岡氏關於時事、中土急務、外事的論斷，尤其是「門戶堂奧」之說，但王韜認爲中日聯手只是「民間公論」，日本政府則「實將朘削我以爲快」，岡千仞只是「一介儒生」，又是「局外人」，無法準確把握國事實質。一年之後，《申報》再次刊載《觀光紀游》書後，題後署「星溪閒人來稿」，其身份筆者尚未查知，待考。此文對《觀光紀游》評價頗低，作者「書數語以規」岡氏，稱其意「誠善」，然其行「則謬」，雖爲「東土之名流」，「惟不能統籌全域，抉摘中土受病之源」。文中對岡氏所謂「中堂公奉醇邸」之策，六經之毒，「學彼長技反噬其師」之論逐條批判，認爲他被「諸鉅公目爲蘇張一流，閉拒不納者若干處」實爲咎由自取。這兩則材料體現出《觀光紀游》成書後的清人最初的接受狀況：雖然文辭上無可指謫，但王韜及星溪閒人均對此書內容頗多微詞，並把矛頭對準岡千仞域外民間人士的身份上。

〔註 141〕《王韜年譜》，第 172 頁。

餘論：異域之眼：借他者之鏡反躬自省

在《迂迴與進入》（*Le Detour et L'accès*）中，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1951～）開創了一個獨特的研究方法：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註1〕雖然于連「迂迴中國似乎尚未結束，重返歐洲的日子還沒有到來」，但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1945～）依然認爲，他所倡導的外部視角應該收穫「最高的禮讚」〔註2〕。

上世紀的中國研究以西方觀念爲標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研究，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亞洲、返回中國」〔註3〕。當于連站在中國的立場將漢學當作審視歐洲的「手段和策略」〔註4〕時，大陸學界開始重視通過異域之眼，即「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註5〕，從周邊看中國，並將研究視角由西方轉向東亞。

在上述認識自身的實踐中，東西方學者所採用的方法異曲同工：借他者

〔註1〕《迂迴與進入》（*Le Detour et l'Accès*），〔法〕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著，杜小眞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2月版；《（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法〕弗朗索瓦·于連、狄艾里·馬爾塞斯（Thierry Marchaisse）著，張放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註2〕〔德〕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著，王卓斐譯《漢學：路在何方？——對漢學狀況的論辯》，《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11月刊，第88頁。

〔註3〕《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第109頁。

〔註4〕錢林森《漢學作爲方法與西方漢學傳統的顛覆——從弗朗索瓦·于連說開去》，樂黛雲、錢林森等主編《跨文化對話》第28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7月版，第253頁。

〔註5〕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總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版，第2頁。

之鏡反躬自省。本書就是從同一時期域外人士所撰中國行紀出發，探討其視野下的晚清鏡像。從外國對中國的研究出發進入中國，再返觀外國，最終迂迴地求諸己身，回歸中國。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一直處在微妙的曖昧狀態中。雖然同屬漢文化圈，但日本與朝鮮、越南不同，始終游離於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之外。〔註6〕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世風大變，轉而效法歐美。明治中期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輕視、藐視而蔑視，其自我感覺則由得意、優越而自負」〔註7〕，「強調日本中心主義，以東洋之英國自負，主張『脫亞入歐』」〔註8〕。以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日兩國關係開始急劇惡化。

岡千仞是日本幕末明治時期較爲獨特的漢學者。除了傳統的文史研究之外，他亦關注西學，曾與他人合譯《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等書，對晚清西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1884至1885年，岡千仞來華遊歷，縱貫中國東海岸，與眾多文士交往，撰寫《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與《觀光游草》記錄此行之見聞感受。其中，日本明治三大漢文遊記之一的《觀光紀游》最爲著名，出版後風靡一時。此書表現出岡氏幻想的破滅，想像中美好的憧憬與現實裏失望的觀感形成鮮明對比。作爲在野的「域外人」，他在書中無所顧忌地大膽直言，嚴辭批判中土失政弊俗，冀望後人取爲「藥石之語」。中國行期間，岡千仞拜訪了清朝兩百多位名公鉅卿與高人逸士。他反覆指斥拘儒陋生矇於外勢，進而提出一系列解決之道與改革措施。這些對策尤以仿傚歐美爲主，是其長期關注西學的結果，具體建議包括變風俗、廢科舉、建學舍、興實學、綜名實、究格致、講富強等，幾乎就是日本明治政府當年爲改變幕末黑暗現狀而全盤西化的翻版。雖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藥石之語」不爲清廷當政者所採，但岡氏此行亦曾結交志同道合者，該書此後也對中國民初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的演進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岡千仞遊華前後均以在野文人的身份自居，從其與中土友朋的交往來看，他們之間大多溫情脈脈、親密友善，而非國家層面那樣緊張尖銳、針鋒相對，這種民間、學術層面的良好關係難道不能爲當代中日雙邊問題的處理提供某種借鑒嗎？

〔註6〕《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序論》，第3頁。
〔註7〕《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第280頁。
〔註8〕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第148頁。

本書的寫作正值南京大學建校 110 週年之際，筆者特別想引用業師張伯偉先生當年 5 月 5 日在校慶「思想之光」講座上的發言結束本書：

> 冷眼打量充斥著思想暴力的當今世界，縈繞在心間的，難道注定只能是淒然的懷古之情嗎？

附　錄

一、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註1〕

1. 〔特 0227D〕釋親考（せきしんこう）1 卷續 1 卷附輩行說 1 卷，伊藤長胤 //著，安原貞平 //校，寬政 8 刊。
2. 〔特 0723〕鳥追阿枩海上新話（とりおいおまつかいじょうしんわ）存 3 編各 3 卷（第 2 編中缺）久保田彥作 //著，假名垣魯文 //校，橋本周延 //畫，明治 11 序刊（大倉孫兵衛）。
3. 〔特 0735〕艷娘毒蛇淵（いろむすめどくへびふち）3 編各 3 卷（第 2 編缺）柳水亭種清 //著，橋本周延 //畫，明治 13 刊（丸鐵）。
4. 〔特 0853〕童子問（どうじもん）3 卷，伊藤維楨〔仁齋〕//著，寶永 4 跋刊。
5. 〔特 0861〕辨道考注（べんどうこうちゅう）宇〔佐美〕惠（灊水）//著，本田黼 //校，宇〔佐美〕德章 //校刊。
6. 〔特 0867〕非物篇（ひぶつへん）6 卷（湯淺廉孫舊藏）五井純禎（蘭洲）//著，中井積善〔竹山〕//等校，中井積德〔履軒〕//等校，天明 4 刊。
7. 〔特 0873〕古學指要（こがくしよう）2 卷，伊藤長胤 //著，享保 4 刊。
8. 〔特 0874〕鄒魯大旨（すうろたいし）2 卷，伊藤長胤 //著，享保 15 跋刊，〔明治印〕。
9. 〔特 0884〕原子（げんし）（舊名・三省餘言）內篇 2 卷外篇 2 卷，原公逸〔狂齋〕//著，安永 7 跋刊。

〔註1〕此目錄引自〈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aspx〉，03/01/2011 available.

10. 〔特 0905〕經世學論（けいせいがくろん）鈴木善教（益堂）//著，安政 4 刊。
11. 〔特 0906〕經世學論（けいせいがくろん）鈴木善教（益堂）//著，安政 4 刊。
12. 〔特 0915〕經學要字箋（けいがくようじせん）3 卷，穗積以貫〔能改齋〕//著，享保 16 刊。
13. 〔特 0916〕名疇（めいちゅう）6 卷，皆川愿〔淇園〕//著，天明 4 序刊。
14. 〔特 0923〕（錦城先生）〔仁說三書〕（きんじょうせんせいじんせつさんしょ）序，洙泗仁說・一貫名義 1 卷附 1 卷・仁說要義 1 卷附 1 卷，大田元貞（錦城）//著，酒井履信 //等校，文政 4 跋刊。
15. 〔特 0937〕九經談（きゅうけいだん）10 卷，大田元貞（錦城）//著，奥山清興 //等校，文化 12 刊。
16. 〔特 0943〕辨疑錄（べんぎろく）4 卷，伊藤長胤〔東涯〕//著，元文 2 刊。
17. 〔特 0951〕善身堂一家言（ぜんしんどういっかげん）2 卷，〔龜田長興〕（鵬齋）//著，川村富谷 //編，文政 6 刊。
18. 〔特 0964〕山子垂統（さんしすいとう）後編 3 卷，〔片山世？〕（兼山）//著，〔小田〕煥章〔谷山〕//編，葛長壽 //補，安永 9 刊。
19. 〔特 0970〕（鼎？）經學文衡（ていけいけいがくぶんこう）3 卷（序文缺）伊藤長胤〔東涯〕//著，享保 19 刊。
20. 〔特 1129A〕偕行帖（かいこうじょう）（凱旋松川將軍に贈る）（鹿門鉛筆書入本）2 卷，岡千仞（鹿門）//等著，辻本清藏（耕堂）//編，大正 2 刊（活版）。
21. 〔特 1604〕櫻井純造遺稿（さくらいじゅんぞういこう）櫻井純造（竹崖）//著寫。
22. 〔特 1620A〕〔詩草〕（しそう）西山正吾 //著，〔岡千仞〕//校，寫（自筆）。
23. 〔特 1670〕報桑錄（ほうそうろく）（題簽・校刻報桑錄）齋藤馨（竹堂）//著，木村敏（愚山）//等校，明治 24 刊。
24. 〔特 1682〕啓輔記（けいほき）外題，岡千仞（鹿門）//著，萬延元寫（自筆）。

25. 〔特 1683〕鹿門日記（ろくもんにつき）外題，岡千仞 //著寫（自筆）。
26. 〔特 1685〕觀光游草（かんこうゆうそう）2 卷，岡千仞 //著，明治 20 刊（活版）。
27. 〔特 2239〕石鼓亭藏書目錄（せきこていぞうしょもくろく）（岡千仞藏・明治丁酉三十年八月調整）〔岡千仞（鹿門）〕//編，明治 30 寫（原本）。
28. 〔特 2240〕硯癖齋藏書提要（けんへきさいぞうしょていよう）（岡千仞藏）存 2 卷（卷 5・6）藤波皡 //編，〔明治〕寫（原本）。
29. 〔特 2241〕〔岡鹿門所藏〕圖書目錄（おかろくもんしょぞうとしょもくろく）外題（いろは別）附鹿門先生著述目錄 1 枚，寫（原本・附・活版）。
30. 〔特 2242〕〔岡百世氏寄贈書目錄〕（おかひゃくせいしきぞうしょもくろく）（岡千仞藏）（東京帝國大學總長古在由直禮狀添附）岡百世 //編，〔大正 13〕寫（カーボン）。
31. 〔特 2243〕〔岡鹿門藏書〕目錄（おかろくもんぞうしょもくろく）外題（唐本之部）寫（原本）。
32. 〔特 2244〕鳩居齋藏書目（きゅうきょさいぞうしょもく）（岡千仞藏）附整理藏書目，〔岡百世〕//編寫（自筆・鉛筆）。
33. 〔特 2245〕竹內文平氏所藏文書〔目錄〕（たけうちぶんぺいししょぞうぶんしょもくろく）扉，存 1 卷（卷 1）〔小島鉦作〕//編，〔昭和〕寫。
34. 〔特 2281〕〔岡鹿門雜輯〕（おかろくもんざつしゅう）岡千仞（鹿門）//著編，安政－明治寫（配自筆）。
35. 〔特 3559〕欽仰錄（きんげいろく）（北白川宮輝久）（肖像入）末廣清次郎 //著，明治 41 刊（活版）。
36. 〔特 3613〕僧胤康傳（そうたねやすでん）刊（寫眞版）。
37. 〔特 3621〕鹿門先生概歷（ろくもんせんせいがいれき）（岡千仞）（呈鹿門先生合綴）岡濯 //著（呈）齋藤一馬 //著寫。
38. 〔特 3622〕懇親會出席名簿（こんしんかいしゅっせきめいぼ）外題，附鹿門先生七回忌辰營祭於祐天寺參會諸公芳名錄（大正九年二月十五日）鹿門先生遺弟子開懇親會於紅葉館會在芳名錄（昭和八年六月六日）綏猷堂同門生 //編，明治 43 寫。
39. 〔特 3623〕鹿門先生贈呈品出資名簿（ろくもんせんせいぞうていひん

しゅつしめいぼ）題簽，綏猷堂同門生 //編，明治 43 寫。

40. 〔特 3624〕鹿門葬送錄（ろくもんそうそうろく）外題，3 卷（上）葬儀ニ關スル書類・來弔客・弔電・會葬者芳名錄（中）岡千仞履歷・會計簿（下）參會者名簿，大正 3 寫。
41. 〔特 3625〕妙柳大姉葬送錄（みょうりゅうたいしそうそうろく）外題（岡千仞夫人）大正 5 寫。
42. 〔特 3626〕〔岡鹿門五・七日來會者名簿〕（おかろくもんごしちにちらいかいしゃめいぼ）〔岡百世〕 //編，〔大正 3〕寫。
43. 〔特 3627〕先人遺稿發送名簿（せんじんいこうはっそうめいぼ）外題，附關係書翰等 5 通，大正 9 寫。
44. 〔特 3628〕禮狀發送控（れいじょうはっそうひかえ）〔岡百世〕 //編，昭和〔寫〕。
45. 〔特 3663〕昌平黌勤皇譜（しょうへいこうきんのうふ）（朝日新聞夕刊切拔）（繪入）森銑三 //著，昭和 18 刊（活版）。
46. 〔特 3667〕江戶現在廣益諸家人名錄（えどげんざいこうえきしょかじんめいろく）（題簽・當時現在廣益諸家人名錄）1 卷附錄 1 卷，天保 7 序刊。
47. 〔特 3687〕成齋先生と岡鹿門（せいさいせんせいとおかろくもん）岡百世 //著刊（活版）。
48. 〔特 3687 ア〕成齋先生と岡鹿門（せいさいせんせいとおかろくもん）岡百世 //著刊（活版）。
49. 〔特 3687 イ〕成齋先生と岡鹿門（せいさいせんせいとおかろくもん）岡百世 //著刊（活版）（有欠）。
50. 〔特 3707〕垂統紀（すいとうき）（題簽・垂統記）（稿本）岡千仞（鹿門） //著寫（自筆）。
51. 〔特 3766〕戊辰聞見錄（ぼしんぶんけんろく）4 卷，明治元寫。
52. 〔特 4018〕英國史殘稿（えいこくしざんこう）外題（稿本）千村芝溝 //譯，河野通之 //編，岡千仞 //校，〔明治〕寫。
53. 〔特 4041〕皇朝地志略（こうちょうちしりゃく）〔岡千仞〕 //著，〔明治〕寫。
54. 〔特 4042〕日本地志提要（にほんちしていよう）（稿本）卷 2（東山道・

北陸道)〔地理僚地志課〕//編，〔明治〕寫。

55. 〔特 4529〕職官志（しょつかんし）7 卷，蒲生秀實 //著，天保 6 序刊。

56. 〔特 4740〕昌平黌書生僚姓名簿（しょうへいこうしょせいりょうせいめいぼ）(弘化 3-元治 2）寫。

57. 〔特 4741〕書書生僚名簿後（しょしょせいりょうめいぼこう）岡千仞（鹿門）//著，〔明治〕寫（自筆）。

58. 〔特 4742〕綏猷堂塾規（すいゆうどうじゅくき）昭和 18 寫（石井研堂）。

59. 〔特 4743〕〔綏猷堂入塾證書綴〕（すいゆうどうにゅうじゅくしょうしょつずり）明治 8-19 寫。

60. 〔特 4744〕綏猷堂位置移轉願（すいゆうどういちいてんねがい）附〔東京府知事認可證〕，岡千仞 //著，明治 18 寫（自筆）。

61. 〔特 4745〕〔綏猷堂宛學事年報調查文書及回答控〕（すいゆうどうあてがくじねんぽうちょうさぶんしょおよびかいとうひかえ）東京市芝區役所庶務掛・岡千仞 //著，明治 27 寫。

62. 〔特 5499〕児戲杪（じぎしょう）題簽，目首，茶道児戲杪，3 卷，寫。

63. 〔特 6012〕筆記周易本義（ひっきしゅうえきほんぎ）16 卷，筆記周易圖說，1 卷，筆記讀易要領，4 卷，〔中〕村〔之〕欽（惕齋）//撰，增田謙之 //校，明和 3 刊。

64. 〔特 6026〕周易新疏（しゅうえきしんそ）(寛政 2 年刊本）8 卷周易新疏別錄 2 卷，河田孝成（東岡）//著，大正 15 寫（ペン）。

65. 〔特 6038〕古文尚書（こぶんしょうしょ）(題簽・尚書正文）4 卷，4 卷，版心作 2 卷，刊（木活、崇教館）。

66. 〔特 6039〕古文尚書正讀（こぶんしょうしょせいどく）2 卷，蒔田忠貞（雁門）//點，蒔田岳 //校，天保 11 序刊。

67. 〔特 6044〕尚書（しょうしょ）(清家正本）13 卷，漢孔〔安國〕//傳，清原宣條 //校，天明 8 刊。

68. 〔特 6045〕尚書（しょうしょ）(題簽・古文尚書標註）13 卷，漢孔〔安國〕//傳，宇〔野〕成之（東山）//標注，天明 3 刊。

69. 〔特 6049〕尚書注疏（しょうしょちゅうそ）(北監本）20 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 //等奉勅疏，明李長春 //等奉勅校，芥〔川〕元澄 //校，安永 6 刊（覆明萬曆）。

70.〔特 6137〕禮記陳氏集說補正（らいきちんししゅうせつほせい）（題簽・禮記集說補正）（通志堂經解本）38 卷，清納蘭成德 //著，享和 2 刊（官版）。
71.〔特 6138〕筆記禮記集說（ひっきらいきしゅうせつ）15 卷，中村之欽（愓齋）//著，安政 4 序刊。
72.〔特 6139〕禮記集說大全（らいきしゅうせつたいぜん）（五經大全零本）30 卷，明胡廣 //等奉勅編，〔林信勝〕〔羅山〕（道春）//點，〔承應 2〕刊（後印）。
73.〔特 6140〕禮記覺言（らいきかくげん）8 卷，明葉遇春 //撰，黃伯善 //等校，明嘉靖 11 跋刊。
74.〔特 6150〕二禮集解（にれいしっかい）12 卷，明李黼 //著，明嘉靖 16 刊（常州府）。
75.〔特 6164〕春秋正義（しゅんじゅうせいぎ）（文化 13 年重寫正宗寺所藏天文鈔單疏本）36 卷，附景鈔正宗寺春秋正義解說並缺佚考（缺）唐孔穎達 //等奉勅，昭和 6 刊（影印、東方文化學院）。
76.〔特 6167〕東萊博議（とうらいはくぎ）4 卷，宋呂祖謙 //撰，明黃之寀 //校，寬政 11 刊（有隣館）（後印、薄葉摺）。
77.〔特 6169〕春秋左傳屬事（しゅんじゅうさでんぞくじ）20 卷，明傅遜 //撰，菊池武慎 //點，〔明和 2〕刊（文化 9 修）。
78.〔特 6176〕左氏探賾（さしたんさく）8 卷，古賀煜（紫溟）//著寫。
79.〔特 6179〕左傳輯釋（さでんしゅうしゃく）25 卷（卷 1、4-6、11-25 缺）安井衡〔息軒〕//撰，成瀨篔・澀谷啓 //校，明治 4 刊，〔彥根藩學校〕。
80.〔特 6185〕公羊傳（こうようでん）12 卷，穀梁 //傳，12 卷（林學齋舊藏）明汪道焜 //校，林〔信勝〕（羅山）//點，寬文 8 刊（後印、穀梁傳缺）。
81.〔特 6193〕春秋集註（しゅんじゅうしっちゅう）卷 4 至末題春秋集傳）37 卷，宋胡安國 //著，寬文 3 刊。
82.〔特 6194〕春秋四傳（しゅんじゅうしでん）（題簽・首書・春秋集註）38 卷，首 1 卷，宋胡安國 //撰，〔松永〕昌易 //首書，寬文 4 刊。
83.〔特 6200〕春秋稽古（しゅんじゅうけいこ）81 卷，平賀晉〔中南〕//

著寫。

84. 〔特 6214〕孝經（こうきょう）（題簽・古文孝經標註）漢孔安國 //傳，太宰純音 //著，〔片〕山世璠 //標註，安政 7 刊。

85. 〔特 6218〕古文孝經解詁（こぶんこうきょうかいこ）〔宮田華龍〕（五溪）//著，寬政 6 跋刊。

86. 〔特 6219〕孝經纂義（こうきょうさんぎ）2 卷（卷上缺）中井豐民（乾齋）//撰，阿部喜任 //等校，弘化 2 刊（木活）。

87. 〔特 6223〕孝經參釋（こうきょうさんしゃく）川崎履（魯齋）//撰，川崎行恭 //等校，慶應 4 刊（〔明治印〕、朱墨套印）。

88. 〔特 6229〕古文孝經孔傳參疏（こぶんこうきょうこうでんさんそ）3 卷，山中祐之 //撰，葛山壽・荻原萬世 //校，寬政元刊。

89. 〔特 6254〕考經〔發揮〕（こうきょう〔ほつき〕）津阪孝綽 //著，明治 16 刊（銅版）。

90. 〔特 6282〕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しちけいもうしこうぶん〔ほい〕）周易 10 卷，首 1 卷，尚書 20 卷，古文考 1 卷，毛詩 20 卷，左傳 60 卷，禮記 63 卷，論語 10 卷，古文孝經 1 卷，孟子 14 卷，山井鼎〔崑崙〕//編，荻生觀〔北溪〕//補，享保 16 刊（寬政 3 修）（飯田藩主堀氏・島田重禮・島田鈞一舊藏）。

91. 〔特 6286〕經典釋文（けいてんしゃくもん）（抱經堂刊本）30 卷，附經典釋文序錄攷證・周易音義攷證・尚書音義攷證 2 卷毛詩音義攷證 3 卷周禮音義攷證 2 卷儀禮音義攷證・禮記音義攷證 4 卷春秋左氏音義攷證 6 卷春秋公羊音義攷證・春秋穀梁音義攷證・孝經音義攷證・論語音義攷證・老子音義攷證・莊子音義攷證 3 卷爾雅音義攷證 3 卷，唐陸德明 //著（附）清盧文弨 //編，文化 6 刊（覆清）（備前河本氏舊藏）。

92. 〔特 6292〕漢碑引經攷（かんぴいんけいこう）6 卷，附漢碑引緯攷，清皮錫瑞 //著，清光緒刊。

93. 〔特 6294〕新學僞經考（しんがくぎけいこう）14 卷，清康有為 //撰，林奎 //等校，清光緒 17 刊（康氏萬木艸堂）。

94. 〔特 6297〕古經文視（こけいぶんし）2 卷，大槻〔清〕崇（磐溪）//著，明治 3 序刊。

95. 〔特 6299〕（縮刻）唐石經（（しゅくこく）とうせつけい）附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チェンバレン・黑川氏舊藏）松崎復（慊堂）//編，天保 15 跋刊。

96. 〔特 6301〕石經考（せつけいこう）〔省吾堂四種本〕，清萬斯同 //撰，蔣光弼・錢朝錦 //校，享和 2 刊（覆清、官版）。
97. 〔特 6316〕大學私衡（だいがくしこう）1 卷，附學校辨，龜田興（鵬齋）//著，寬政 11 刊（善身堂）。
98. 〔特 6329〕大學〔參解〕（だいがく〔さんかい〕）鈴木朖（離屋）//著，明治 7 刊。
99. 〔特 6336〕中庸章句新疏（ちゅうようしょうくしんそ）2 卷，附中庸新疏結尾，室直清（鳩巢）//撰，荒井公廉 //訂，文政 7 刊（後印、附・嘉靖 7 序刊）。
100. 〔特 6337〕中庸抄（ちゅうようしょう）版心（題簽・中庸鈔）2 卷，版心，〔江戶初〕刊。
101. 〔特 6342〕中庸辨錦（ちゅうようべんきん）葛〔西〕質（因是）//撰，池晉 //等校，文化 14 刊。
102. 〔特 6343〕中庸略說（ちゅうようりゃくせつ）安積信〔艮齋〕//著寫（小林東山舊藏）。
103. 〔特 6355〕論語注疏解經（ろんごちゅうそかいけい）（題簽・論語注疏）〔清嘉慶覆刻汲古閣本〕，20 卷論語注疏校勘記（缺）魏何晏 //集解，宋邢昺〔ヘイ〕//〔等奉勅〕疏，〔弘化〕刊，〔越前藩、明治 2 印〕。
104. 〔特 6364〕論語徵集覽（ろんごちょうしゅうらん）（書入本）20 卷，附論語眾序，〔松平〕賴寬〔黃龍〕//著，寶曆 10 刊（守山藩觀濤閣、文化 9 修）。
105. 〔特 6365〕非徵（ひちょう）8 卷，中井積善（竹山）//撰，早〔野〕辨之 //校，天明 4 刊（懷德堂）。
106. 〔特 6367〕論語古訓（ろんごこくん）10 卷，太宰純（春臺）//著，元文 4 刊（後印）。
107. 〔特 6368〕論語古訓外傳（ろんごこくんがいでん）20 卷，附 1 卷，太宰純 //著，延享 2 刊。
108. 〔特 6373〕論語訓詁解（ろんごくんこかい）20 卷（湯淺廉孫舊藏）江馬元恭（蘭齋）//著，文政 9 跋刊。

109. 〔特 6376〕論語補解辯證（ろんごほかいべんしょう）10 卷，志賀孝思（南岡）//撰，山本惟清 //等校，嘉永 4 序刊（木活、聚星堂）。
110. 〔特 6389〕（古註）孟子考（（こちゅう）もうしこう）（書入本）2 卷，〔戶〕崎允明〔淡淵〕//著寫。
111. 〔特 6395〕孟子論文（もうしろんぶん）7 卷，竹添光鴻（井々）//著，明治 14・15 刊。
112. 〔特 6396〕（增補）蘇批孟子（（ぞうほ）そひもうし）全 2 卷，附年譜，宋蘇洵 //撰，清趙大浣 //補，藤澤恆（南嶽）//疏，明治 13 刊。
113. 〔特 6402〕孟子約解（もうしやくかい）3 卷（林學齋舊藏）大槻清崇（磐溪）//撰，井上親 //等校，嘉永 4 刊。
114. 〔特 6412〕學庸精義（がくようせいぎ）3 卷，久保愛（筑水）//撰，河尻育 //補，刊（養志亭）。
115. 〔特 6415〕論孟考文（ろんもうこうぶん）序首・題簽，論語考文 1 卷，孟子考文 1 卷，豬飼彥博（敬所）//撰，奧田正達 //校，天保 6 刊。
116. 〔特 6432〕四書章句集註鈔說（ししょしょうくしっちゅうしょうせつ）序首，大學章句鈔說 1 卷，中庸章句鈔 2 卷，論語集註鈔說（缺）孟子集註鈔說 4 卷，首 1 卷，〔中村之〕欽（惕齋）//著，寶永 5 跋刊（後修）。
117. 〔特 6440〕（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れんりどうじゅうてい）ししょぞんぎ）14 卷（存卷 14）附四書存疑考異（缺）明林希元 //撰，方丈 //訂，鵜〔飼〕信之（石菴）//點，刊（承應 3 印）（存四書存疑考異）。
118. 〔特 6442〕山中讀書印（さんちゅうどくしょいん）（題簽・四書讀書印）全 3 卷（學庸・論語・孟子）附讀書印補（奚疑齋・兒島獻吉郎舊藏）明張鼐，刊。
119. 〔特 6455〕四書纂要（ししょさんよう）存 5 卷（卷 1－5）金子濟民〔霜山〕//著，安政 5 刊。
120. 〔特 6456〕四書改點略（ししょかいてんりゃく）2 卷，版心（湯淺廉孫舊藏）新井直〔輔德〕//著，安政 3 序刊。
121. 〔特 6470〕爾雅注疏（じがちゅうそ）11 卷，晉郭璞 //注，宋邢昺〔ヘイ〕//等奉勅疏，〔唐陸德明 //音義〕，明會朝節・周應賓 //奉勅校，刊（覆明萬曆）。
122. 〔特 6473〕爾雅注疏（じがちゅうそ）11 卷，晉郭璞 //注，宋邢昺〔ヘ

イ〕//等奉勅疏，〔唐陸德明//音義〕，明會朝節・周應賓//奉勅校，刊（覆明萬曆）（明治印）。

123. 〔特 6487〕經傳釋詞（けいでんせきし）10 卷，清王引之//撰，東條喆（方庵）//校，天保 12 刊。

124. 〔特 6631〕舊五代史（きゅうごだいし）（百衲本二十四史單刊本）（劉氏嘉業堂刊原輯永樂大典有注本）150 卷（每卷附考證）目 2 卷，宋薛居正//等奉勅撰，民國劉承幹//校，民國 25 刊（影印）。

125. 〔特 6054〕筆記書集傳（ひっきしょしゅうでん）12 卷，〔中村之〕欽（惕齋）//撰，增田謙之//校，文政元跋刊。

126. 〔特 6071〕尙書典謨說（しょうしょてんぼせつ）2 卷，箕浦世亮〔靖山〕//著，文化 7 刊。

127. 〔特 6072〕尙書證（しょうしょしょう）（題簽・尙書證國字解）5 卷，高〔橋〕閔愼（女護島）//撰，瓜〔生〕惠迪（響臺）//校，享和 3 刊。

128. 〔特 6642〕資治通鑑（しじつがん）294 卷，宋司馬光//等奉勅編，元胡三省//注，齋藤正謙（拙堂）//等校，天保 7 刊（津藩有造館、嘉永 2 補）。

129. 〔特 6650〕資治通鑑綱目（しじつがんこうもく）59 卷（卷 11－末缺）首 1 卷前編（缺）續資治通鑑綱目 27 卷末 1 卷資治通鑑綱目 3 編 20 卷，宋朱熹//撰，明陳仁錫//校（續）明商輅//等奉勅（3）清張延玉//等奉勅，寬文刊（文化 6 跋修、（3）文化 6 跋刊、德島府學）。

130. 〔特 6674〕明史藁（みんしこう）全 310 卷目 3 卷（村上藩舊藏）清王鴻緒//奉勅撰，中島嘉通//等校，嘉永 6 序刊（覆清、高田藩）。

131. 〔特 6689〕貞觀政要（ていかんせいよう）10 卷，唐吳競//撰，元戈直//集論，元和 9 刊（古活）。

132. 〔特 6748〕晏子春秋（あんししゅんじゅう）（宇佐美灊水手校手補本）4 卷，明黃之宷//校，元文元刊（校注本）。

133. 〔特 6784〕廿二史言行略（にじゅうにしげんこうりゃく）42 卷，清過元昄〔ビン〕//編，矢土勝之//點，明治 18 刊。

134. 〔特 6798〕伊洛淵源錄新增（いらくえんげんろくしんぞう）14 卷伊洛淵源續錄 6 卷，明楊廉//著（續）明謝鐸//著，慶安 2 刊（後修）。

135. 〔特 6852〕普法戰紀（ふほうせんき）14 卷，清張宗良//譯，王韜//編，

明治 20 刊（活版、脩道館）。

136. 〔特 6076〕古文尚書勤王師（こぶんしょうしょきんのうし）3 卷，山本信有（北山）//撰，山本信謹 //等校，文政 7 跋刊（奚疑塾）（後修）（秋田藩日知館舊藏）。

137. 〔特 6080〕詩經（しきょう）（題簽・詩經古註）20 卷，附詩譜，舊題漢毛〔亨〕//傳，鄭〔玄〕//箋，明金蟠 //校，井〔上〕通熙〔蘭臺〕//點（附）漢鄭〔玄〕，延享 4 刊。

138. 〔特 6082〕毛詩（もうし）（題簽・毛詩鄭箋）（書入本）20 卷，附詩譜，〔漢毛亨 //傳〕，鄭〔玄〕//箋（附）〔漢鄭玄〕，寬延 2 刊。

139. 〔特 6088〕毛詩補傳（もうしほでん）30 卷，首 1 卷，仁井田好古（南陽）//著，天保 5 跋刊（紀藩樂古堂）。

140. 〔特 6091〕筆記詩集傳（ひっきししゅうでん）16 卷，〔中村之〕欽（愓齋）//撰，益田謙之 //校，明和元刊。

141. 〔特 7156〕周張二子書（しゅうちょうにししょ）序（周張全書）周子全書 7 卷張子全書 15 卷（缺）明徐必達 //編，延寶 3 刊（後印）。

142. 〔特 7167〕近思錄（きんしろく）14 卷，宋朱熹・呂祖謙 //編，刊（木活、好古堂）。

143. 〔特 7170〕近思錄鈔說（きんしろくしょうせつ）14 卷，版心作 5 卷，〔中村之〕欽〔愓齋〕//著，元祿 6 序刊（木活）。

144. 〔特 7186〕朱子訓子帖（しゅしくんしちょう）1 卷附訓子帖附錄，宋朱〔熹〕//撰，山崎〔嘉〕（闇齋）//校（附）山崎〔嘉〕//編，刊。

145. 〔特 7196〕小學合璧（しょうがくごうへき）（題簽・標註校正・小學合璧）6 卷，明陳際泰 //編，陳仁錫 //校，山中幸武 //校，〔萬延元〕刊，〔明治印〕。

146. 〔特 7199〕小學輯釋（しょうがくしゅうしゃく）6 卷首 1 卷，櫻田迪（赧然居士・簡齋）//著，元治元-明治 8 寫（自筆）。

147. 〔特 7214〕性理字義諺解（せいりじぎげんかい）8 卷，〔林信勝〕（道春）//著，萬治 2 刊。

148. 〔特 7332〕（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曆書（（ちゅうかみんこくにじゅうくねん）れきしょ）外題，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 //編，民國〔28〕刊（活版）。

149. 〔特 7633〕訂譌雜錄（ていかざつろく）（湖海樓叢書本）10 卷，清胡鳴玉 //著，文久元刊（官版、〔明治印〕）。
150. 〔特 7643〕風俗通義（ふうぞくつうぎ）10 卷，漢應劭 //撰，明鍾惺 //評，萬治 3 刊（後印）。
151. 〔特 7652〕櫝記（とくき）1 卷甕記全 2 卷，明吳延翰 //撰，□賀良恭（松臺）//校，〔寶曆 12〕刊（後印）。
152. 〔特 6108〕二南訓闡（になんくんせん）2 卷，皆川愿（淇園）//撰，富士谷成基 //編，百々俊德 //校，寛政 4 序刊。
153. 〔特 6115〕韓詩外傳（かんしがいでん）10 卷，漢韓嬰 //撰，鳥〔山〕宗成 //校，寶曆 9 刊（明治 18 修）。
154. 〔特 6119〕周禮（しゅうらい）42 卷，漢鄭玄 //注，明金蟠・葛鼐〔7709〕//校，寛延 2 刊（後印）。
155. 〔特 6123〕考工記圖解（こうこうきずかい）（題簽・周禮圖解）4 卷，川合〔孝〕衡〔春川〕//撰，草野意儔・土橋淵 //校，寛政 8 刊。
156. 〔特 6129〕儀禮圖（ぎらいず）（通志堂經解本）17 卷，儀禮旁通圖，1 卷，宋楊復 //撰，清〔納蘭〕成德 //校，寛政 11 刊（官版、享和元印）。
157. 〔特 6132〕禮記（らいき）2 卷，版心，文化 8 刊（木活、弘前藩稽古館）。
158. 〔特 6133〕禮記（らいき）20 卷，漢鄭〔玄〕//注，賀島矩直 //點，寶曆 9 刊。
159. 〔特 7864〕虛堂和尚語錄（きょどうおしょうごろく）目首（書入本）附虛堂和尚新添，唐釋智愚 //撰，釋妙源 //等編，〔元和〕刊（古活）。
160. 〔特 8053〕南軒先生文集（なんけんせんせいぶんしゅう）（紹興 3－淳熙 7）（題簽・張南軒集）44 卷，宋張栻 //著，寛文 9 刊。
161. 〔特 8065〕朱子訓蒙詩（しゅしくんもうし）宋朱熹 //撰，山崎〔嘉（闇齊）〕//校，〔明歷 3〕，刊（後印）。
162. 〔特 8121〕王心齋先生全集（おうしんさいせんせいぜんしゅう）（成化 19—嘉靖 19）5 卷，明王艮 //撰，清王榮錄 //編，弘化 4 序刊（後修）。
163. 〔特 8292〕（欽定）全唐文（（きんてい）ぜんとうぶん）1000 卷目 3 卷，清杜堮〔ガク〕//等奉勅編，清嘉慶 19 序刊（殿版）。
164. 〔特 8387〕（笑雲和尚）古文眞寶之抄（（しょううんおしょう）こぶんしんぽうのしょう）10 卷，卷末作 13 卷，釋清三 //編，〔江戸初〕刊。

165. 〔特 8664〕清經解一斑（せいけいかいいっぱん）（題簽・皇清經解一斑）6 卷，岡田欽（煌亭）//編，天保 7 刊。
166. 〔特 8696〕佚存叢書（いつそんそうしょ）目首，林衡 //編，寬政－文化刊（木活）。
167. 〔書 0049〕〔話舊帖〕送岡士文之豆州詩并序，七絕三首，行書，送岡士文之伊豆之行，草書，送岡士文序（詩）重野成齋 //著（伊）松本奎堂 //著（序）原忠敬 //著，紙本橫卷。
168. 〔書 0050〕〔送岡士文歸鄉詩文〕愛竹說送士文岡君歸仙臺，送岡士文之豆州，中秋後三日岡士文見訪告以東歸在近乃留宿話別士文有留別小倉士健詩遂依韻賦送，送岡士文歸鄉，序送岡士文還仙臺，送岡士文序（愛）武定 //著（豆）吉本鼎谷 //著（中）今井歡 //著（鄉）日高彰 //著（仙）鶴齋 //著（基）（序）宮原胤壽 //著，紙本橫卷。
169. 〔書 0115〕河野鐵兜，草書，紙本橫卷，右養老泉歌錄爲伊藤老兄清囑元治乙丑三月秀野人越罷。
170. 〔書 0342〕岡鹿門，千住驛別伊藤茂雄，七絕，行書，紙本未裝。
171. 〔書 0343〕岡鹿門，今市途上作，七絕，行書，紙本未裝。
172. 〔書 0344〕岡鹿門，四言，楷書，紙本未裝，壬子孟夏鹿門道人 //著。
173. 〔書 0672〕孫詒讓，硯銘，行書，絹本未裝，城井海庵先生鹽正光緒甲辰孟春孫詒讓 //書。
174. 〔書 0673〕孫詒澤，四言，行書，絹本未裝。
175. 〔拓 0270〕輞川圖卷，軸裝。
176. 〔拓 0482〕〔岡清二舊墓碑標石〕昭和十八年二月，〔岡〕百世 //志。

二、《叢刊》本與《集成》本、整理本的文字校勘

按，《附錄二》中「A 本」代表整理本，「B 本」代表《叢刊》本，「C 本」代表《集成》本。

1. B 本卷一頁一第 13 頁「南摩（綱紀）、野口（之布）、高橋（毅）、古山（貞）、橫尾（東作）、堀江（復）」，A、C 本作「南摩（綱紀）、野口（之布）、古山（貞）、橫尾（東作）」。
2. B 本卷一頁一 a 第 13 頁「日下部（東作）、濱村（大瀞）」，A、C 本作「日下部（東作）、二橋（元長）、濱村（大瀞）」。

3.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且曰」，A、C 本作「曰」。
4.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何枉途一遊」，A、C 本作「何枉途一訪」。
5.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先生爲桐城派耆宿，乃請作書通名姓」，A、C 本作「乃爲余作書」。
6.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見家眷及徒弟」，A、C 本無。
7.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楊君先在」，A、C 本作「楊君在」。
8.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二橋元長妝小輪船」，A 本作「二橋君裝輪船」，C 本作「二橋君妝輪船」。
9.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送至三菱艦」，A、C 本作「送至大艦」。
10.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艦長永野讓作延見艦樓」，A、C 本作「艦員永野讓作出迎」。
11.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特決人意」，A、C 本作「特快人意」。
12.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號笛瀏鳴」，A、C 本作「汽笛瀏亮」。
13.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繫泊諸艦，一齊拍手」，A、C 本作「諸艦一齊拍手」。
14. B 本卷一頁一 b 第 14 頁「三菱社長岩崎君（彌太郎）贐乘券。余一窮措大，何意逢好奇如斯人也？」，A、C 本作「三菱社長岩崎君（彌太郎）深嘉余志，贐乘券。二橋君爲鄉友，參三菱社務，以故爲艦員所渥待。案陳山海，坐列珍玩，不復知航海之苦」。
15. B 本卷五頁十 b 第 154 頁「十八日（三十日）」條止於「乃與時雨往賀，杉田、小諸二氏在。同酌」，C 本第 160 頁多「〔時雨，中島氏號〕」。
16. B 本卷七頁五 b 第 222 頁「十一日（廿四日）」條「若彼傲慢」，C 本第 228 頁作「若夫傲慢」。
17. B 本卷七頁十一 a 第 233 頁「實有故也」，C 本第 239 頁作「良有故也」。
18. B 本卷七頁十一 a 第 233 頁「紫翁來訪」，C 本第 239 頁作「紫詮來訪」。
19. B 本卷七頁十一 a 第 233 頁「紫翁、實甫、重伯、新儂屬和」，C 本第 239 頁作「紫詮、實甫、重伯、新儂屬和」。
20. B 本卷七頁十二 b 第 236 頁「要紫翁、新儂，登酒店」，C 本第 242 頁作「要紫詮、新儂，登酒店」。
21. B 本卷七頁十二 b 第 236 頁「余問紫翁」，C 本第 242 頁作「余問紫詮」。
22. B 本卷七頁十二 b 第 236 頁「翁曰:『老夫不甚悅船山』」，C 本第 242 頁「答

曰：『老夫不甚悅船山』」。

23. B 本卷七頁十四 a 第 239 頁「紫翁曰」，C 本第 245 頁作「紫詮曰」。
24. B 本卷八頁一 b 第 250 頁「中土自是而多事」，C 本第 254 頁作「中土自是而多故」。

三、《叢鈔》本與《集成》本的文字校勘

按，《叢鈔》本爲《集成》本的節本。《集成》本爲每頁十一行，行三十字，而《叢鈔》本則爲每頁十八行，行四十字，無他人序與岡氏自序，無句讀，無日文注音符號，不分卷，連續書寫，僅題「日本岡千仞著」，《集成》本則爲「宮城縣岡千仞振衣撰著，侄（岡）濯萬里校訂」。

《叢鈔》本與《集成》本（以下簡稱「C 本」）相較，刪節處如下：

1. 頁一百六十九 a「十九日（廿六日）」條止於「鶴田姓請余跋李中堂書」處，C 本第 38 頁多「乃書曰：『有爲之士，不留心末藝。今見伯相書，不似今能書人，慕晉仿唐，此伯相所以爲伯相也歟？』或曰：『世多伯相書，多出門客手。』」。
2. 頁一百七十一 b「七月一日（九日）」條止於「惟聯欄然爲異耳」，C 本第 55 頁多「鄰舟有貴官，吹毒煙，妖臭紛然，終夜不絕」。
3. 頁一百七十二 a「三日（十一日）」條止於「不行」，C 本第 57 頁多「姑息亦甚」。
4. 頁一百七十四 a「十二日（二十日）」止於「過一亭，小酌」，C 本第 65 頁多「余曰：『觀察、布政，任地方疾苦，超任此職者，必散萬金開花園。蘧園、怡園、留園，無園不然。中土大官，固如斯乎？』笠庵默然」。
5. 頁一百八十三 a「廿六日（六日）」止於「或僞奏捷歟」，C 本第 114 頁多「誣罔亦甚」。
6. 頁一百八十六 a「廿一日（三日）」條「更過經甫」與「酒飯更深歸寓」間，C 本第 128～133 頁多「余曰：僕本擬見邵公……中土固不乏有心之人也（文長不錄）」。
7. 頁一百八十六 b「廿五日（六日）」條止於「助濯理裝」，C 本第 135 頁多「館人出李中堂書，求余言。乃書其後曰：『中堂書不合法，豈英雄不善書歟？』其人不滿」。
8. 頁一百八十六 b～頁一百八十七 a「廿八日（十日）」條止於「大快人心」，

C 本第 142 頁多「余視紫翁溺毒煙，輒稱病苦，以爲非復前快人，何意腹中有斯議論也！唯翁涉彼大體，未究其學術，故間有論未透者。如論我邦，爲徒學歐米皮毛，則是也。我邦免至今日，無他，以學得彼皮毛也。若夫神髓，豈一朝所學得乎？」。

9. 頁一百八十七 b「二日（十四日）」條止於「害國體乎」，C 本第 145 頁多「要不解事體者」。
10. 頁一百八十八 b「九日（廿一日）」條「及其所未論到」與「不覺夜深」間，C 本第 150 頁多「痛論中人不達外情」。
11. 頁一百八十九 a「十二日（廿四日）」條「杏蓀來過」與「原領事曰」間，C 本第 153 頁多「曰中堂公深感子志，唯中土承百弊之後，皇族諸王徒自尊貴，且廟議確持拒絕，無可下手。嗚呼！使中土果用余策，則天下之事未爲難濟也。顧天時未會，人事未至也歟？因舉蒙叟七竅說，戲杏蓀曰：『東帝西帝，會於中央帝，兩帝感中央帝之有禮，爲之鑿開七竅，七日而混沌死。中土盍借東西帝之力，鑿渾沌七竅？』杏蓀大笑」。
12. 頁一百九十四 a「廿五日（七日）」條止於「豈謬記安南劉永福爲日本乎」，C 本第 173 頁多「鄙野人瞶瞶多此類」。
13. 頁一百九十四 b「廿九日（十一日）」條「歸自天津」與「飲入夜」間，C 本第 176 頁多「曰盛道臺稱子不止。余曰：『彼不涉洋事，余贈所譯法、米二史，故驚爲奇異而已。』余因舉中土澆季，非一掃煙毒與六經毒，則固有元氣不可得而振起爲說。公使曰：『余北遁日，聞子銳意倡勤王說，以爲醉六經者，何意其瞭域外大勢」。
14. 頁一百九十四 b「三十日（十二日」條止於「袁爽秋來訪」，C 本第 177～178 頁多「談及翰林連署彈劾張佩綸之事。余曰：『兵，專門事業，非倉卒嘗試可能。彼以善八股，取巍第，入翰林，又弄筆舌，論時事，遂握兵權，當方面。兵豈可以筆墨口舌爲乎？其一旦變起，先眾遁去，固其當然。』魏源曰：『方今急務，在綜覈名實，綜覈名實，在捨楷書帖括。胥吏例案，專講朝章，討國故。』余以爲朝章國故，與帖括例案，相距幾何？今日綜覈名實，唯有仿傚歐米，與各科學術而已」。
15. 頁第一百九十六 a「六日（十九日）」條「此亦不負萬里一來者」與「丁君贈《同文館題名錄》、《西學考略》」間，C 本第 185 頁多「鄧鐵香氣概嶄然，大爲快人，東請再見，不答。彼位貴官高，難屢引外客歟？將彼固執

戰論，不悅余反覆論無策也歟？余時持杏蓀書訪張蔭桓，再次不見，乃與書曰：『僕域外人，得見閣下與否，無所輕重與僕。唯他日見杏蓀，談再訪閣下不答，杏蓀亦將怪閣下待外人無狀，不類在大官者。』余初來上海，求見邵道臺不得，惕齋書曰：『邵公二與書養源，論引見先生可否？』忌外人，中土風習，與我邦維新前，忌歐米人一般」。

16. 頁第一百九十六 b「七日（二十日）」條「故毀壞至此」與「右折道隘泥深」間，C 本第 186～187 頁多「按曾侯日記，曰道光以後剿平粵逆撚匪，國帑匱亡，皇上難其重勞民力，一切路程，任其隳圮，不忍興役苦民，以至今日。按粵匪亂後，英法入京，賠償鉅萬，尋興招商、機器、造船各局，購大小軍艦火器，已耗巨費於此，勢不得不減常額於彼。垣壁攲側，道路破壞，橋樑隳圮，宮闕廢頹，細民賭博竊盜，孤寡流亡乞食。凡百惡弊，皆源於喪亂蔑資，公私困弊之餘者。特怪士大夫貪婪無行，居之不疑，尺寸以上，財賄之算，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者歟？」。
17. 頁一百九十七 a「九日（廿二日）」條止於「實本月六日之事」，C 本第 190 頁多「廷臣用事者，皆醇王黨，與中堂水火不容。」
18. 頁一百九十七 a「十日（廿三日）」條「乃與時雨往訪」與「府尹稱余《紀事》、《雜著》為作家」間，C 本第 190～191 頁多「意謂貴人見邀，必有所待。及見，情神不接，卒然問知何（如璋）、張（斯佳）二人乎。余曰：『小人在國，實約二氏是遊，臨發，二投書何氏，無一答字。來此三訪張氏，不見。沈（文熒）、黃（遵憲）二人交誼尤親，期僕來遊極殷，發書告遊，亦不答。中土貴禮，禮重交際，而僕來此，訪人數十名，概答不在。禮久已不行於中土歟？敝邦人接中人，備有禮。中人見敝邦人，猶恐浼。小國交大國，固宜如斯，大國待小國，似未為得矣。』府尹默然。時雨自旁促歸。余見府尹窘甚，謝曰：『小人始見長者，無意吐此狂言，唯長者問及何、張二氏，不敢不直答。』」。
19. 頁第一百九十八 a「十五日（廿九日）」條止於「滿園噪然」，C 本第 195 頁多「殆聚蚊為雷者」。
20. 頁第一百九十八 a「十六日（三十日）」條「皆有物之言」與「問東人亦喫洋煙否」間，C 本第 196 頁多「余常謂清一代競說金石，斷碣敗磚，所得幾何？閻、錢萬卷，一半無用之言，況舐餘唾者乎？因舉歐事，規切學弊，少有悟色。曰：『在壯年輩，不可不力。』」。

21. 頁第一百九十八 a「十六日（三十日）」條止於「汀鷺有怪色」，C 本第 196 頁多「中土儒流不解事，往往如斯」。
22. 頁一百九十八 a「十七日（十月一日）」條「又序余文稿」與「又贈《輞川圖》拓本」間，C 本第 197 頁多「大旨曰：方今宇內萬國，角立爭雄，而日域與中土，比壤地，同文字，眞輔車相依者。又異夷視域外，尊大自居者之言。過別汀鷺，有送詩」。
23. 頁一百九十八 a「十七日（十月一日）」條止於「把筆不措」，C 本第 197～198 頁多「已而眾起請益，余曰：余曰：『濂亭先生，師也，長者也。僕不可妄發狂言，失敬左右。諸君年少，僕有一事，切欲問諸君，諸君能有所教乎？』眾皆請誨。余曰：『凡士人讀書學問，將有爲於當世也。今也法虜猖獗，福州一敗，臺灣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諸君何策，以濟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虜無狀，中土大舉征討剿絕之，一擊之下，不使片甲隻輪西還，不必須先生之憂悶。』余書答其後曰：『此何異張學士（佩綸）滔滔萬言，而炮聲一發，狼狽失措，棄兵而遁。兵豈口舌筆册之謂乎？非僕之所願聞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皆曰：『此問非僕所能當，敢請大教。』余曰：『諸君業科舉，腹中萬卷，筆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際國家大變，不能畫一策，出一奇，以濟天下之急，此無須於讀書學問也。方今宇內大勢一變，不可一日忽外事。諸君盍以講八股之餘力，旁讀譯書，以講究彼所以日致富強，橫行宇內，策所以一變千年之陋習迂見？此爲聖賢之心術，此爲有用之學術。』因指斥科舉爲誤天下之本。眾或否，或然，議論紛然，遂不得要領而散」。
24. 頁一百九十八 b「十八日（二日）」條「晨飯將發禊亭來談」，C 本第 198 頁作「晨飯將發禊亭來曰」，此句與「出南苑門」間，C 本第 198～199 頁多「『昨辱大教，終夜不寐，書敢質所見。』懷出一紙，曰：『僕嘗一見天文、算術諸譯書，私以爲此學不可不一日講之，同學皆笑之。方急科舉，遂不終其說。唯濂亭先生不拒諸生讀譯書。僕已從事帖括，不能全力於此，爲平生慊事。今得先生教，頓發愚矇。』余進之曰：『三代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課八歲童蒙，以達其才，登其俊秀國學，授之格致之學，以成其實器；教之正誠之方，以成其實德。待其行成德立，而後任爲大夫，責以家國之大用。三代之學，豈有如今世學者擲百事，從事於訓詁帖括乎？今也歐米各國，設大中小三學，六歲入小學，授算數、書畫、歷史、天文、

地理大略。成童入中學，自淺近而深遠，自大綱而細目，秩然有序，一期成立。待其終中學教科，始入大學，講究專門一科之學，以其所學，施之家國事業。凡百工藝，彼駸駸日進高明，遂至逾九萬里波濤，巨艦大炮，威壓東洋各國，以富強稱雄五洲。要皆自格致誠正，而及治國平天下者。而中人不知彼強盛源於此，徒謂彼一切權詐，炫兵威，恫喝萬國，此未爲知彼矣。我邦先輩鹽谷宕陰先生著《六藝論》，曰：『三代聖人之學，亡於中土，而存於歐米。』是也。』禊亭大悅曰：『爾後書信，受教門下。』此人孝廉，能懷大疑，大爲可嘉」。

25. 頁一百九十九 b「廿四日（八日）」條止於「乃期明後日」，C 本第 204 頁多「李中堂喪母，此人議止官僚賻金，以故忤中堂云」。
26. 頁二百 a「廿八日（十二日）」止於「聊效班定遠之爲爾」，C 本第 208 頁多「中人好大言，雖古猶然」。
27. 頁二百二 a「八日（廿二日）」條「大悅借歸」與「余在北京」間，C 本第 226 頁多「經甫近修洋書，刻苦至廢眠，曰：『日來病眩，恐耗精過度之所致。』余曰：『修洋書，非中年人之所勝，不如以修洋書之力，博涉譯書。』曰：『稍覺有悟處。』學有悟處大樂。中土通好西洋各國猶舊，輪船火器一皆資彼，其民敏慧，尤長貿易。而士大夫矇然，不用心外事」；
28. 頁二百二 a「八日（廿二日）」條「登錄無疑」與「嵩燾使泰西紀程」間，C 本第 226～227 頁多「『時交議論，猶諷中土泥守舊習，徒尚浮化者然。此抄一則，曰：英國風習，人守誠實，無涉虛文。有官守職者，必終其事而不惰，守其法而不偷，持是非甚確，辨利害甚明。辭受取與，必以其情，不僞爲殷勤，不故爲謙讓。與人約言必蹈，鄙妄言違約者，等隳節敗名者。一切誠實爲本，可謂嚴以處己矣。』中土有識者，固已有此言」；
29. 頁二百二 a「八日（廿二日）」條「以是爲御史所彈」與「此事經甫所說」間，C 本第 227 頁多「褫官廢黜，鄉人不齒，泥古亦此」。
30. 頁二百三 a「十三日（廿七日）」條「示其著《書目答問》、《輶軒語》」與「一也來曰」間，C 本第 229 頁多「香濤主試山東時，爲生員示學藝之要，應試之方者。中土人論爲學之方，猶科舉以外無學問者。爲師者，以之率弟子，爲父兄者，以之責子弟。蓋國制自非科舉，不能立身成名，勢不得不然者。固無怪香濤是著也。案《答問》，揭《炮說》、《操炮法》、《炮表》、《水師操練》、《行軍測繪》、《防海新論》等諸書，爲兵書之不可不見者。

此皆譯書，無用於科舉者。香濤急於武備，故揭此等書目，用心當世者。唯《格物入門》、《地理全志》、《瀛環志略》、《萬國公法》等書，當方今急於洋務之時，不可不一日講之。而香濤不一言道及，未爲知時務也」。

31. 頁二百二十四 b「廿五日（九日）」條止於「第五海陸漕運」，C 本第 238 頁多「此錄說文策題，類推其他。（以下爲試題內容，文長不錄）學者通經，必先識字。我朝訓詁之學，各有專家，考訂之餘，盍言心得？答此等問，非專修《說文》，戛爲一家者，不能下筆，宜其黃口入學，白首無成也。抑《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一字，諳記無遺，何補於身心家國？先輩多論科舉誤天下，良有故也」。
32. 頁二百五 b「二日（十七日）」條止於「不覺失笑」，C 本第 244 頁多「中人似以衣冠文物自負，觀其文辭，則郁乎如天仙；觀其容儀，則曄乎如神人，此士大夫，千百居一二者。若夫閭閻小民，眼無一丁，鄙猥醜穢，卑污賤陋，自海外人而觀之，與蠢狂野蠻，相距一間。望南遊學歐土，其一見稱爲動物博覽場，亦宜也」。
33. 頁二百八 a「十八日（三日）」條「一文希道（程序）」與「談至日晡」間，C 本第 260～261 頁多「曰：『見貴著於亦槎氏，不禁佩服。』余曰：『域外人疏遠，聊因所著爲通名姓之資耳。』二人曰：『貴國學歐米，以三千年禮義之邦，一旦棄其舊，不可痛惜乎？』余曰：『敝邦國是，在取萬國之長，而補其短。試言一端，敝邦改服制。弟野人，野服，新舊唯其所欲。弟不欲趨時，故用舊服。此服長袖緩帶，坐作不便，且立國尚武，此服第一不可手火槍，故斷乎廢舊服，一仿歐米。』曰：『歐米戎事精練，工藝巧妙，唯倫理綱常，東洋自有萬古不可易者，不可一日棄我而取彼。』余曰：『倫理綱常，聖人之所以繼天立極。我東洋各國之卓出萬國，實在於此也。此外東西互有長短，平心夷考，東洋短所十中七八，西洋短所十中一二，此敝邦之所以取彼長而補我短也。』問我邦神道古典，及西教行否，余一一書實以答。既而二人太息曰：『祖宗闢國日千里，威武行於海內外，而上下恬熙，不見兵革，二百年於今。一旦海警，致是狓猖，不可長息乎？』」。
34. 頁二百十一 a「三十一日（十五日）」條止於「施教方法」，C 本第 274 頁多「蓋渠亦漸知科舉不足爲學耶」。
35. 頁二百十二 a「八日（廿四日）」條止於「不覺至此也」，C 本第 279 頁多

「後見小牧昌業語此事，昌業曰：『余在廣東，接官吏數人，多皆優柔。蓋士人拘泥六經，遏抑天性，漸陷迂腐，而不自知。賤民任天性，勤勞百事，通知物情，故至此，或溺讀書，或溺賭博，其亡羊一也。』昌也大笑」。

36. 頁二百十二 b「十四日（三十日）」條止於「三四百金云」，C 本第 282～283 頁多「中土風俗不可解者，墓域一風水說之決，信仙佛巫祝，所在淫祠，香火薰灼。人知片煙爲毒，嗜好不已。婚嫁喪節祭，節時放爆，皆由士大夫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也」。
37. 頁二百十七 a「十三日（廿七日）」條「法度善良」與「往年佐和東野歷觀歐米各國獄舍而還曰」間，C 本第 303～304 頁多「《四述奇》紀香港牢獄（以下爲《四述奇》內容，文長不錄）」。
38. 頁二百十七 b「十六日（三十日）」條止於「一至此極」，C 本第 306 頁多「而侮蔑外人，主張頑見，傲然以禮儀大邦自居。歐米人之以未開國目之，抑亦有故也」。
39. 其次，《叢鈔》本曾對《集成》本中部份文字進行改動：
40. 頁二百 b「三日（十七日）」，C 本第 219 頁作「十二月三日（十月十六日）」。按，此條前爲「二日（十六日）」。從此直至「十六日（廿九日）」之日期，此本均較 C 本陽曆（即小字部份）晚一日。
41. 頁二百二 a「八日（廿二日）」條「嵩燾使泰西紀程」，C 本作「嵩燾初使泰西紀」。
42. 頁二百八 b「二十日（五日）」，C 本第 263 頁作「廿日（五日）」。
43. 頁二百十九 b「三十日（十四日）」，C 本第 314 頁改爲「卅日（十四日）」。
44. 再次，爲照顧整體面貌，《叢鈔》本再敘述日期時有減省。
45. 頁一百六十九 b「廿一日（廿八日）」，C 本第 45 頁作「六月廿一日（五月廿八日）」。
46. 頁一百七十五 b「廿日（廿八日）」，C 本第 73 頁作「七月廿日（閏五月廿八日）」。
47. 頁一百八十二 a「廿一日（七月一日）」，C 本第 109 頁作「八月廿一日（七月一日）」。
48. 頁一百八十六 b「廿七日（九日）」，C 本第 141 頁作「九月廿七日（八月九日」。
49. 頁一百九十四 b「三十日（十二日）」，C 本第 177 頁作「十月三十日（十

二日)」。

50. 頁二百 b「三日(十七日)」,C 本第 219 頁作「十二月三日(十月十六日)」。
51. 頁二百六 b「八日(廿三日)」,C 本第 253 頁作「一月八日(十一月廿三日)」。
52. 頁二百十一 b「六日(廿二日)」,C 本第 277 頁作「二月六日(十二月廿二日)」。
53. 頁二百十六 b「十一日(廿五日)」,C 本第 301 頁作「三月十一日(廿五日)」。
54. 此外,《叢鈔》本亦曾改動字體不同者。如頁一百七十一 b「模糊」之「模」,C 本第 55 頁原作「米莫」;「惟聯欄然爲異耳」之「惟」,C 本第 55 頁原作「唯」。

四、岡千仞與中國文士交往資料彙編

按,關於岡千仞與中國文士交往的文字資料,學界整理的成果主要體現在筆談方面,同時亦包括序跋題寫與詩文酬贈,具體論文與論著如下:

1.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12 月版。(《與日本岡鹿門》)
2. 鄭子瑜、〔日〕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昭和四十三年(1968)版。(《庚辰筆話》第七卷(第四十七話,庚辰四月初九日))
3. 王韜《扶桑遊記》,陳尚凡、任光亮校點,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據日本東京「報知社」印本(明治十二年出版上卷,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整理,長沙:嶽麓書社,1985 年 3 月版。
4. 宋恕著,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2 月版。(《致岡鹿門書》(一八九六年七月三日)、《〈親燈餘錄〉序》(一九〇〇年四月五日))
5. 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6 月版。(二、日韓來客箋牘筆談 10～13)
6. 鄭海麟輯錄《王韜遺墨》,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九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4～146 頁。

7. 鄭海麟輯錄《黃遵憲遺墨》，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九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47～162 頁。
8. 鄭海麟輯錄《清季名流學士遺墨》，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十一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2～304 頁。
9. 陳捷《岡千仞與來日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以筆談錄〈蓮池筆譚〉、〈清讌筆話〉爲中心》，《日本女子大學紀要》（人間社會學部），2001 年第 12 期，第 137～159 頁。
10.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仰止帖〉跋》）
11. 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第 64～69 頁。
12. 黃遵憲撰，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3 月版。（《人境廬詩草》卷三《庚辰四月重野成齋（安繹）、岩谷六一（修）、日下部東作（鳴鶴）、蒲生絅齋（重章）、岡鹿門（千仞）諸君子約遊後樂園，園即源光國舊藩邸，感而賦此》、《人境廬詩草》卷七《續懷人詩》其七、《致岡千仞函》（1879 年 5 月 20 日、7 月 17 日、12 月 9 日，1880 年 1 月 20 日、1 月 31 日、2 月 4 日、4 月 16 日、7 月 21 日）、《岡千仞詩評》、《與日本友人岡千仞等筆談》）
13. 釋敬安著，梅季點校《八指頭陀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7 年 12 月版。（《秋夜懷鹿門戒兄》（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懷日本岡千仞，即次甲申夏日遊四明天童玲瓏岩原韻》（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日本岡千仞寄次甲申夏同遊天童玲瓏岩韻見懷並所著〈觀光紀游〉，感疊原韻二首》（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
14. 王寶平《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文獻》，2009 年 10 月第 4 期，第 173～184 頁。（11.《東旋詩紀》序、12.《禺於日錄》跋、13.《熱海遊記》跋）
15. 王寶平編《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 2 月版。（15～17）
16.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版。（上冊第一編一四二、一六三；下冊第三編跋三，

第四編）

17. 魏麗莎《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述略》，《文獻》，2011 年 7 月第 3 期，第 144～150 頁。（5.岡千仞與中國人筆談記錄）

是編主要輯錄其他岡千仞與中國文士筆談、序跋題寫與詩文酬贈的材料，以期爲今後相關研究提供便利。材料編次按時間順序逐條排列。

王韜《蘅華館詩錄》卷四（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58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1880）鉛印《弢園叢書》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82～483 頁）

《初至江户，集飲東臺長酡亭。來會者二十有二人：小野湖山、鷲津毅堂、藤野海南、川口江東、龜谷省軒、岡鹿門、三島中洲、小山春山、大鄉學橋、河野荃汀、寺田望南、星野豐城、木下梅里、鱸松塘、村山拙軒、小牧櫻泉、西尾鹿峰、豬野熊梁、野口犀陽、佐田白茅、蒲生絅亭、平山蕉陰，皆東都之魁儒碩彥也。或有位於朝，或致仕家居，並以文章學問，提唱風雅，一時之秀，萃於此矣。爰作長歌以紀之》

神洲三島浮鴻蒙，三千年未東西通。我來粵海乘長風，手招屏翳驅豐隆。神山被引住九日，揚帆徑指江都東。此間人才之淵藪，衣冠東國群推崇。自與泰西開互市，變法方詡中興功。二三有志守古學，與我文字猶相同。傴僂願執弟子禮，我拔其尤群爲空。我初至日開盛燕，牛耳高踞詞壇雄。二十二人悉健者，舉筆欲參造化工。湖山吟詩作初祖，鷲津習禮稱儒宗。海南鬚眉自清古，江東骨相非凡庸。龜谷出語妙天下，鹿門作史窮寰中。中洲倜儻春山樸，學橋風度何雍容。河野、寺田識奇字，佉盧能辨點畫重。豐城、梅里同史館，上下追逐如雲龍。松塘、拙軒文章伯，鬼神腕底驚詞鋒。櫻泉、鹿峰器瑚璉，熊梁、犀陽聲鍾鏞。白茅好俠絅亭靜，俱耽著述娛心胸。明治集編揚盛治，偉人傳出彰遺蹤。少年隅坐平山卓，席前請益時鞠躬。凡此一一群論列，當非吏僕所能終。嗟予潦倒眾所棄，海外乃與諸君逢。炎陬遁蹤十八載，菰蘆徒自懷孤忠。來遊禮數不寂寞，猶幸吾道非終窮。方今朝廷重鄰好，持節遠駕五花驄。兩邦苟聯唇齒誼，遠方何敢張弧弓。止談風月盡此樂，一言藉以明

吾衷。詩成寫向雪色壁，碧紗應待他年籠。

王韜《蘅華館詩錄》卷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58冊，第486～487頁、第489頁、第489～490頁、第490頁、第494頁）

《四月望日，藤田鳴鶴招諸同人小集於新橋濱。乃家樹木深蔚，泉石蒼古，居然一名勝所。亭中扁額題菊詩，尚是西鄉隆盛筆跡。余前日既覽〈鹿兒島戰功圖〉，今日又同鹿門諸君子歷覽招魂社，聞諸君說殉難義士遺事，曷禁慨然有感？爰於席上作長歌紀之，殊有鐵如意擊碎唾壺之概》

日東節義漢代匹，抱義懷忠多激烈。平生知國不知家，身可亡兮家可滅。西鄉本是人中豪，提戈欲靖邊塵囂。請纓有志急一試，赫然金石銘功高。功高賞薄尋常耳，何不角巾歸閭里？坐令一死鴻毛輕，照代宏勳等流水。吾在中土已歎吁，竭來東國觀戰圖。兩軍生死併一命，戰場血肉紅模糊。嗚呼此戰分順逆，順者終與逆者絕。當時義士爭捐軀，不重黃金殞白鏑。今經此地尚悲涼，鬱然樹木何深蒼。戰鐵可銷骨不朽，化爲碧血千年藏。驅車徑過到濱氏（酒亭當壚女子爲阿淺），迎門已見香軿止。美人窈窕多容光，歌聲欲遏流雲駛。小亭池石頗清幽，嫣然花木臨清流。主人昂首指扁額，西鄉筆跡今猶留。題菊詩工句清挺，武功文學一時並。歎有此才弗善用，不爲鸞皇爲隲隼。聽歌我尚有餘悲，主人勸我且吟詩。詩成一曲歌未終，美人烈士我心同。

《偕鹿門同謁神田聖廟，兼觀書籍館》

夙昔同文本一家，頖宮制度似中華。極知洙泗宗風遠，不獨蓬萊勝地誇。百首逸書逃世外，千年秘籍出瀛涯。鄉嬛何幸身親到，眼福於今十倍加。

《小集不忍池上嬌語亭，鹿門詩先成，即和其韻》

風傳嬌語隔湖聞，王貌當壚迥出群。醇酒婦人還好茗，算來猶勝信陵君。

濕翠浮波香遠聞，鷺鷗深處自成群。瑤英本是容平視，莫笑疎狂蘇使君。

《鹿門所招歌妓未來，戲呈一律》

一泓碧水漾漣漪，消夏亭中此最宜。未見紅裙捧觴立，卻教玉手捲簾遲。跳魚撥刺時聞響，涼鷺迷離正浴池。醉倒王郎歸去晚，蘋風荷露夜深時。

《即席間戲語偶成一詩，以示同人》

燕頷虎頭飛食肉，英雄貌自殊流俗。瓶城本相天下士，特張吾軍氣亦足。鹿門乃偏出別解，謂予消受惟豔福。一月之中易兩姬，要使餐花比饌玉。兩行紅粉盡嫣然，知余好色流媚目。三女成粲我所歡，惜若蟠桃猶未熟。（座中三歌姬綺年玉貌，嬰伊可懷）三千年作蓬萊遊，得遇仙姝緣不薄。藥姬去後玉姬來，伴我一月山中宿。靈丹九轉已入喉，石髓初凝還果腹。人生此即萬户侯，何須再要千鍾粟。世間富貴只尋常，天上神仙有嗜欲。一瞥功名安足論？百種溫存莫自促。千秋萬歲等銷磨，古人已作一邱貉。莫從身後博浮名，且向筵前聽短曲。

《成齋編修集諸同人大張祖席於中村樓，酒酣作歌留別》

我之來兮春光非，我之去兮秋風起。秋風起兮遊子歸，萬重山兮千重水。離情渺渺愁淒淒，相思不識何時已。臨行把酒勸重遊，子其祝我倘無死。子酌我兮金巨羅，我贈子兮玉版紙。上寫今日離別詞，中有淚痕流不止。瀛洲縹緲神仙居，百日因緣亦足喜。忽然欲去不可留，夢魂一夜歸鄉里。豈無窈窕解語花？綽約風前豔桃李。泥我飲兮我不辭，含情顧影明燈裏。況覆文字足相娛，座中往往有佳士。成齋卓犖天下才，誠卿斌媚今無比。鹿門龜谷多雄豪，時排筆陣摩吾壘。兩國相通三千年，文士來遊自我始。敢云提唱開宗風，結社清華爭倒屣。某年日月我去來，大書特書補青史。

《黃遵憲致日本友人岡鹿門短柬手跡》（程光裕《常溪集》（第一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6年版，第412～413頁）

《黃遵憲致日本友人岡鹿門短柬手跡》（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博士藏）

黃遵憲致日本友人岡鹿門短柬上書：「吾土新年多同貴邦風俗，客中凡百不備，亦無禮之不足觀，不過獻一茶具一點心耳。呵呵！

惟自愛玉爲人」。款題「鹿門先生執事：黄遵憲。己卯後立春日」。

俞樾《東瀛詩選》卷三十四（俞樾撰，〔日〕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卷三十四，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第 471 頁）

俞樾此書序於光緒癸未（1883）

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仙臺人，著有《東旋詩紀》一卷）

鹿門於明治戊辰（1868）之亂移家至東京，及己卯（1879）航海東旋，乃取途中詩訂爲一集。自序云：「余生長道途，中遭兵亂，百年城郭，蕩爲邱墟，親戚情話，恍如夢寐，俯仰今昔，不覺慨然。」奥羽之亂，一一出於目睹，而詞氣激昂，令人讀之有唾壺擊碎之意，亦奇士也。詩題每書月日，固紀遊體耳。

黎汝謙《夷牢溪廬詩鈔》卷三（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567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羊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57 頁）

《甲申（1884）五月七日，日本岡鹿門（千仞）將遊中國，道經神户，留飲（岡君邃於史學，著有《尊攘紀事》、《讀史紀略》諸書行世）》

不爲五嶽遊，不信名山高。不經滄海廣，不知在堂坳。不登韓歐門，未得知人豪。潁濱此語經千載，古今一轍如同條。鹿門岡君富才藻，眼空八極凌青霄。閉户著書忘歲月，抗心希古稽虞姚。尊攘大義嚴撻伐，賢奸洞燭憑譏褒。振襟直嫌九州隘，落筆便覺山河搖。胸中塊磊消不盡，乘槎更欲尋周郊。堯封禹跡恣幽討，吳山楚水窮搜雕。平生壯志渺東海，此行徑欲蹤羲巢。神州赤縣莽無際，放懷獨立風蕭蕭。登高回首望鄉國，扶桑煙點如鴻毛。方今四海同文軌，珠盤玉敦聯邦交。白浪如山船如馬，多君此役不辭勞。他時遊罷覓歸路，紀遊詩草應盈軺。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越縵堂日記》本，第 2201 頁、第 2201～2202 頁、第 2206 頁、第 2212 頁、第 2217～2218 頁、第 2218 頁、第 2219～2220 頁、第 2225～2226 頁）

（光緒十年甲申）九月壬寅朔。晴。日本人岡振衣千仞來訪，

攜有湖北楊惺吾閏五月八日書，並所刻景宋紹熙本《穀梁傳》。書中言，岡君爲彼國博恰之士，著述甚眾。早歲掛冠來遊中國，欲見余爲幸，前日鐵香又爲之先容，不得已見之。其人年五十餘矣，號鹿門，本仙臺藩籍，維新以後（維新者，其國今□以同治丙寅歲即位，年十四。次年其臣德川始歸，政改元明治，遂改制度稱維新），廢藩鎮爲郡縣，今爲宮城縣人。居東京，嘗入史館，因病辭職。嘗欲撰英、法、普、俄、米五國《志》，先成《米利堅志》、《法蘭西志》，已刊行，《英志》亦屬草矣，又有詩文諸集。人亦誠，竺見余，始終去冠，久談而出，以《米利堅志》爲摯。

初二日癸卯。晴。早得岡千仞書，以所著《法蘭西志》及《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爲獻。岡鹿門來言，將以明日遊西山至居庸。

初八日己酉。晴。……是岡鹿門自西山歸來訪，欲作重九之會。辭以病甚。

十六日丁巳。晨小雨。……介唐來得岡鹿門書言將還國，以絲絹四方乞書詩文爲別，高以病甚不能。

二十二日癸亥。晴，有風。……下午……岡鹿門偕其國人中島雄來。且告後曰：「行不能見」，作書予之。

二十三日甲子。晴，下午有風。岡鹿門以明日行，即其所持素縑，書三詩以送之。……《日本仙臺人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舊直史館，來遊中國。持湖北人楊惺吾書，介鄧鐵香來訪。於其行也，持絹索書，爲詩三首送之》

萬里行歸國，三秋氣正高。魚龍看戰鬥，詩卷壓波濤。月照雙輪艦，霜飛百淬刀。中華山色好，蒼翠上征袍。

自愧蕭夫子，文章海外通。身閒征戰後，詩富亂離中。談笑無西極，衣冠見古風。所嗟逢老病，尊酒莫相同。

足利千秋學，傳多古本藏。況君精乙部，此業冠東方。（著有《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又欲撰英、俄、普三國《志》，已屬草）系纂《吾妻鏡》，經馱大寶王。仙臺舊雄鎮，碑版有隋唐。

二十五日丙寅。澹晴。……余見日本所刻書，行字之旁，皆有

鉤勒，或小注數目字。數日嘗以詢岡鹿門。鹿門笑曰：「此敝邦之所以不免爲東夷也。凡書須迴環讀之，其義方明。如『大學在親民』，須先讀『民』，後讀『親』，方讀『在』。若如中國順文讀之，則不能解譬言。『吃飯』先言『飯』，後言『吃』，俗如此。今讀茂卿書，乃知由語言不通，音聲各別故吧。和訓顛倒讀之，亦猶之翻譯有三合、還音諸法，此亦後之史志所宜評也。」

張裕釗《濂亭遺文》卷一（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張裕釗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12～214頁）

《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

自泰西人創興輪舟，馳驟大瀛海之上，上天下地，日星所燭，霜露所濡，窮幽極遐，靡不洞闢。我國家長駕遠撫，柔服熹冒，交通市易，申結盟約者，殆數十國。而日本與中國同處亞細亞洲，相去萬里而近，唇齒輔車，依倚比附，其壤地於諸國爲最邇。且自隋、唐以還，使命往來，至於今不絕，其好睦於諸國爲最夙。又其人皆好文學，敦《詩》、《書》，服習周孔秩敘彝倫，其俗尚又於諸國爲最相類。夫以密邇之邦，重以久舊之睦，與大同之俗，然則國家辨通好四方萬國五大洲之地，而於日本宜爲尤親，豈不然哉？

往歲，朝廷命黎君蓴齋使於日本，長子沆實從久之，從其國人岡君鹿門遊甚歡。岡君從長子沆所見余所爲文而嗜之，君固將來遊中土，因屬長子沆以書爲之導。航海西來，道滬上，至吳門，歷杭州，以達四明，北抵京師。今又將南行，窮閩粵、溯江漢。乃迂道過保陽，訪余於蓮池講舍，猥欲以師事相推。且攜所爲書曰《尊攘紀事本末》、《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者相詒，又出其所爲文請是正。

余聞君負絕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於其國及吾中國振古以來治亂得失之故無不窺。於今日西北以往殊鄰絕黨，舟車兵械技巧之製，會盟戰攻之事，無所不究切，慨然將欲有所振於其國者也。噤不得施，弢斂奇特，抱獨而處。故其文深思長計，目營四海，才氣橫出，雜沓并集，無所禁圉。雖其間時亦縱橫旁軼，或不可以繩尺批抿。方屬余引以纆徽，而君顧迫欲行，不及待。且以君之才與志

若是，亦非可以區區之繩尺施其間。抑余獨有取於君之用心，有慨於余之志者也。乃爲序其首，以歸諸君。它日，君持歸以示邦之人，宜益知君之足以有爲。又憬然於余之言，深喻乎輔車唇齒之誼，而瘉益相固結，患則相恤，敗則相救，安同其福，危同其憂。然則余之與君，豈徒以文字相尚云爾哉？其所期有進於是者矣。

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記》（民國間抄本，第1910頁、第1911頁、第2046頁、第2411頁、第4276頁）

（甲申（1884）九月）東國岡君鹿門（名千仞）以星吾手書見訪，並饋所著《東國近事本末》二本，載筆亦不俗。（彼土文人體格多生澀而饒古致）惜予未歸，不及把晤。作筆談，擬寫紈扇一頭（所以微示文字相同之意），並字書一冊報之。

（甲申（1884）九月）答詣日本處士岡鹿門，與之筆談良久。其人抗志不仕，憤世道之衰，衺説橫流，乃東夷之賢者也。又云：「大秦以西，三十年前譯四書五經，至彼今頗盛行。復譯《大清律例》，經常之道，其將通於海西乎？」又贈予袖珍墬圖一幅。其從子萬里亦好文字，出縑索予作書。

（乙酉（1885）六月）昨得東瀛高士岡君鹿門書云：「此次遊中土，歸有客贈以古硯，又得石鼓拓本，將築亭度此二長物，榜曰「石鼓亭」、「硯癖齋」。萬里書來，屬予署之，予聞之亦殊欣然。

（戊子（1888）四月）日本變法以來，凡從前賢而有文者，鹽谷世宏、賴襄、物茂卿之屬率詆爲腐儒，岡鹿門亦爲日人所詬讟。

（丁酉（1897）六月）各國史學堂必須購備者……岡千仞《米利堅志》。

袁昶《漸西村人初集》詩十三（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65冊，據清光緒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頁）

《送岡鹿門處士歸日本》

昔聞海上如瓜棗，今見神山餐玉人。黃菊味原如紫柏，清秋調欲變陽春。著書瓊嶋成眞逸，執戟金門寄病身。倘許東遊訪耆舊，

欲將槎客斗牛津。

朱一新《佩弦齋詩文存》佩弦齋詩存一卷（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65 冊，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龍氏葆眞堂刻拙盦叢稿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77 頁）

《送日本岡鹿門千仞》

澥東自昔盛文學，來自百濟開唐初。惺窩山陽遞述作，勃窣理窟宗程朱。徂徠俊邁亦人傑，氣撼山嶽薄太虛。滄桑陵谷有代謝，坐使儒術成川徂。岡君種學鬱奇氣，東西秘籍紛爬梳。藩侯納土義旗建，尊攘著論扶皇輿。身膏椹質幸不死，塊磊聊借奇文攄。觀書卓犖眼如月，《吾妻鏡》内窮褒誅。（君著有《尊攘紀事》、《涉史偶筆》，當鼻羽諸藩拒命時，以持正論陷縲縷，幾死）直北蝦夷古窮髮，雪花八月如掌麤。徙民實塞漢遺制，北門鎖鑰嚴其樞。書生慷慨建偉策，謀國從古資純儒。（蝦夷北接蒲頁島，與俄鄰君建議開北海道。又曾遊歷其地，著《北游詩草》）六經大義炳如日，卮辭曼澶疇能踰。日求實是重實踐，漢、宋學術無歧趨。空談餖飣兩奚取，俗師往往拘於墟。摩西遺教乘閒入，立説乃與洙泗殊。尚同兼愛重堅忍，剽剝墨、老撏浮屠。自治其俗豈無補，授儒入墨嗟奚愚。百工之事尚技巧，聖前民用敢廢諸。殺機一發不可遏，積骸成邱血爲渠。斲雕返樸會有日，絕學先賴昌吾徒。仙山如瓜棗初熟，歸帆縹緲凌蓬壺。古文令嚴今已解，儻致未火秦時書。

許玨《復庵先生集》卷六（陶世鳳編（丙寅（1926）秋七月無錫許氏用聚珍版印），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三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版，第 271～272 頁）

《丙戌（1886）春隨使赴美洲過日本即席答岡鹿門千仞》

邂逅來傾酒一卮，與君同是未衰時。澄清瀛海吾曹事，莫爲風波惜遠離。

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餘紀》前編上（傅雲龍著，傅訓成整理《傅雲龍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0 頁）

（大清光緒十有三年（1887）十月）十六日

岡千仞弟子館森鴻以其師所著《觀光紀游》一書見求，改其文數首。

附：岡千仞《〈新潟新繁昌記〉序》（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記》，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抄本，請求記號：ヲ 06-03171。鈐「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甲申歲（1884），余遊中土，客慈谿，得王桼園書曰：「方滯新潟，所得詩文頗多。」余後書曰：「中土山而嵩、華，水而江、河，非下邦蕞爾瀛島之比。未知吾遊所得，與吾兄所得，孰多少矣？」今茲戊子春遊新潟，見桼園所撰《新繁昌記》，笑曰：「此桼園書中所得頗多者。」取而閱之，其書分地理、風俗、水利、學校、病院等十五門，該而能晝，簡而能括，使人一覽領全港之梗概矣。夫新潟爲北陸大港，而其地產名人，片山北海、卷菱湖、吳俊明，皆名當時，而未聞有一書記此地者。如鵬齋父子，貫名海屋鴨崖兄弟，皆遊此地，又皆無一著。唯寺門靜軒有《富史》，記酒肆、妓館之盛，此徒敗風俗者。其能紀全港梗概，以供世徵新潟沿革之用者，獨有桼園此著而已。桼園以海外遊客，能紀全港梗概，以供後徵沿革者，此在桼園，大爲可誇，而在邦人，未爲得也。抑余遊中土，有遊記十卷、遊草二卷，自許不甚負此壯遊也。而病歸以後不出年餘，桼園既已西歸，將一見示此二著，以話當日之事，而不可復得，對此書愴然，遂書爲序。

明治戊子（1888）長夏日撰　岡　千仞。

張德彝《五述奇》卷六（1901 年稿本，第 571 頁）

（戊子（1888）十二月二十六日）幸德國不比日本之按處追究，設彼國行文來問，又將何以對答？記日本國人岡千仞之《觀光紀游》内一則云：「凡軍艦有軍禮，吉凶節時，互通使問，符號約規，各國一律。中五月間，扶桑艦入吳淞口，發炮廿一，祝皇帝壽，而炮臺不應發。遣人問故，不見一將校。且道臺問是事，直曰『歐米軍艦無行是禮者』，蓋中國不講軍禮，故各國亦外之也。中人開口，輒曰：『夷狄殊類，不知禮義』，自外人而觀之，爲孰知禮義？其致今日之事，實有故也」云云。

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六餘編之外（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

書》集部別集類第 1561 冊，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84 頁）

《題〈藏名山房文鈔〉》

余不才，兩典使節於此，獲與東人士遊，東人士亦以余久故與相習。又同文也，用詩文投贈，比古縞紵之獻，事雅且法，余因是以讀其全稿者，有三氏焉，曰中村敬宇、藤野海南、岡天爵。敬宇措注時事，持議欲酌東西之中，而劑其平，其文若江湖之水，波瀾渟瀠，而無氾濫也。海南儒者，篤行自修，其文若煦日晴雲，藹靄使人可親也。獨天爵志在用世，百不遂一，其懷抱鬱勃之氣，充然不可詘止，其文若深谷高岩，時露巉愕。余讀其文，悲其志，未嘗不惜其窮老不遇，而無大力者爲之援也。往歲天爵嘗遊我中土，適有法越之難，未得極其意興所至。然北抵長城，南逾嶺嶠，亦足發胸中之奇矣。今以《藏名山房》名編，在天爵自處甚審，非恒人所得喻。文已有諸家評語，不復細論。論天爵之大者，天爵亦許余爲有當知言否？

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二月遵義黎庶昌。

黎汝謙《夷牢溪廬文鈔》卷二（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567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891）羊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72 頁）

《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雜作〉題語》

光緒八年，余隨使日本，曾識岡君鹿門於姚君子梁座中。厥後，余蒞事神户，不相見者久之。越二年，岡君與楊君星吾偕遊中國，道出神户，倉卒爲杯酒之歡，賦詩以贈其行，余旋以差竣去。岡君遊中國，亦倦而歸。去年冬，余又隨節東渡。今夏四月，東京名流設宴，弔孫君子與於紅葉館，同僚咸在。促然與鹿門相遇，舉盞道故，略敘契闊。於是與鹿門別八年矣，出示近所爲《藏名山房雜作》，屬爲點定授。而讀之皆掌故，所繫非僅僅記山水煙雲，以供不知何人之玩賞者。鹿門固長於史學，其平生著述多關國故，豈夫騷人墨客流連景光，炫染煙雲，爲山川飾色已哉？鹿門不偶於世久矣，其所爭者，固不在一時之榮，而在於千秋之業乎。

辛卯（1891）端午後二日，汝謙題。

黃慶澄《東遊日記》（王曉秋校點，史鵬校訂，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據光緒甲午（1894）刊本整理，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3月版，第355～366頁、第367～368頁）

（光緒十九年（1893）六月）二十二日　乘火車赴西京。……赴廣瀨氏宅。……會岡君鹿門自東京來，廣瀨君延宿其家。是夕，……廣瀨君夫婦介岡君延慶澄入會，因並晤岡君鹿門……暨同席者十餘人。

（六月）二十五日　再訪岡君鹿門於廣瀨氏家。岡君名千仞，仙臺侯藩臣也。奧羽之亂，君仗義以爭，下獄幾死。維新後，擢爲太學助教，今年七十餘矣。性嗜史學，長於辨才，著有米、法二史及《尊攘紀事》各書。又嘗遊中土，南極粵嶠，北至燕齊，東歷吳越，著《觀光紀游》若干卷。晤談良久。

廣瀨君夫婦延午餐。同席者六人，岡君陪座。東俗，凡盛饌必首進生魚，慶澄婉謝之。岡君戲云：「樊噲不辭生彘，於生魚乎何有？」慶澄云：「僕蓋羞於噲伍者。」岡君爽然，慶澄復云：「狂言以博一笑，勿罪。」……是遊也，岡君與廣瀨君夫婦備極款洽，不勝感荷，臨別黯然。

文廷式《東遊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月版，第1166頁）

（庚子年（1900）二月）

六日（6日）晴。訪岡千仞，十七年前廣東舊友也。頹然老矣，而劬書猶甚。問其子業成否，以筆答曰：大學堂卒業，已考文科。然老夫所學漢土之學，不知今何所爲大學、何所爲文科也。

八日（8日）陰，微雨。……岡千仞約同遊小西湖，重野安繹在焉，亦有麗人三人，略談數刻。

十一日（11日）陰晴不定。島田蕃根來。申刻，漢學家四十餘人邀余集於八百松間，仿柏梁體賦詩。……是日同集者，重野安繹、岡千仞、森泰二郎、長尾槙太郎、末松青萍子爵、荒浪市平、藤田

達芳、日下東作、成瀨翁、内藤虎次郎、岩谷修、飯尾麒太郎、松前讓、龜谷行操岸上、柴原和、薄井龍之、大畑弘國、田代眞樹、入江爲守（子爵）、速水一孔、手島知德、本田幸之助、濱村藏六諸人，大抵皆名士（有失去名紙者不能悉記）。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11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頁、第530頁）

岡千仞言：「高麗諺文，里土所撰，（里土人名）至今已千餘年。」里土，唐時人，然高麗今時之諺文，則明初所修，又非里土之舊。（卷三十一）〔註2〕

余嘗舉《吾妻鏡》書名問日本岡千仞振衣，振衣答云：「『吾妻』地名，函根以東總稱。日本武尊皇子東征時，風波蕩舟茫無所從。夫橘姬代皇子投海而死，及凱旋過雄井嶺時，東望歎曰：『吾妻不能共歸乎？』故相傳稱『關東』曰『吾妻』。『吾妻鏡』猶曰『關東』。」《通鑑》此書當時實錄日記類，以和文中土人不能讀。和文且甚蕪雜，千仞輩亦倦讀不能，終唯鐮倉。按此「關東」，源賴朝開幕府之地實錄，乃證古者所必取云。據此，則近時翁廣平撰《吾妻鏡補記》，日本通國之事實未知二字之義也。又日本有「我妻氏」，「我妻」即吾妻，其能樂中亦有「吾妻」能、狂言。翁廣平書黃蕘圃，猶見其鈔本。（卷三十六）

張謇《張季子詩錄》卷八（〔清〕張謇撰，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張謇全集・第5卷・藝文（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116頁）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贈日本西村子雋（時彥）》

舊知進一與岡千（竹添進一、岡千仞皆日本漢學家），子復新詩手自編。遊學遠征唐史傳，觀風來識禹山川。輔車終古存虞鑒，縞紵從今愛箚賢。倚劍中宵同不寐，長安三輔正烽煙。

〔註2〕業師張伯偉先生告知，此處或記錄有誤，「里土」或即「吏吐」，用漢字記音，可視作諺文之前身。謹致謝忱。

盛宣懷《愚齋東遊日記》（清末刻本，第35頁，第106頁）

（光緒戊申（1908）九月初二日）午後，東瀛宿儒岡振衣（千仞）過訪。岡氏博學能文，曾遊京、津、蘇、杭、滬、粵等處，爲俞曲園先生所稱許，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係二十五年前舊交也。以所著《觀光紀游》三卷持贈，余亦贈以一聯云：「重繙日記兩三卷，猶憶風姿廿五年」。

（十月）初三日。陰。七點鐘上車，送行者胡、李兩星使……岡千仞氏……王愓齋諸君。

李鍾玨《且頑七十歲自敘》（民國鉛印本，第437頁）

（民國）二年癸丑（1913）六十一歲……余素持中日親善主義。當壬午、癸未之間，嘗著《興亞論》三篇登諸《字林滬報》。日人岡千仞君來遊，引爲同志。其時朝鮮事初起，余謂朝鮮爲日俄所必爭，中國力不能保，當與日本立約共保之。共保朝鮮即共拒俄人。

五、《申報》對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相關記載

按，本節所輯爲《申報》關於岡千仞及其《觀光紀游》的相關報導，按時間順序逐條排列，前此尚無文字整理，此處爲首次錄文標點。引文出自《申報》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8月版。

一、1884年6月15日（清光緒十年五月念二日，第4012號，第3版）

《文士來遊》

日本岡鹿門先生名千仞，字振衣，今之豪傑士也。素居仙臺，以文學稱於時。及長，讀書於昌平黌舍，所交多名下士。鹿門博聞強識，尤爲世所推許。在鄉築廬於鹿門山下，名曰「藏名山房」。有一亭，曰「草私史亭」，頗具泉石花木之勝。生平以國史自任，最稔於當代掌故。日本戊辰之亂，奥羽諸藩奉仙臺藩侯爲盟主，執牛耳，以抗王師。岡君獨執大義，侃侃持正論，以折群藩。有司羅織其罪，遂收下獄。是時，其危間不容髮，而岡君毅然不撓。翼歲亂定，日廷命四條公巡察諸藩，仙臺藩侯以專對難，其人特釋岡君，□纍囚中充使命。岡君日與二三同志定國是，一人心，收田祿，立官制，將大有所振作。然藩侯卒不能始終委任，俾效力於王事，故不能成

□功，論者惜之。維新以來，岡君至東京，入史館，掌學校藏書事。開拓北海之役，岡君首倡其議，久之頗收厥效。後岡君以目疾去官家居，壹意著書。所已刻者，《法志》、《米志》、《尊攘紀事》、《涉史偶筆》十數種。久思作中土之遊，擬南窮閩粵，北極燕趙，一豁其襟抱。積賣文所入一千五百金爲遊貲，亦足以豪矣。前日至滬，行篋中有書數百卷，諸友薦引筆札數十函，此固日本名流中之矯矯者也。想所至之處，必當倒屣爭迎矣。

二、1884年6月16日（清光緒十年五月念三日，第4013號，第11版）

《日本岡鹿門集飲於淞北寄□，即席有詩，即步原韻，口占和之》

惜少紅粧倚畫欄，舉杯一笑興初闌。玉釵銀燭年時事，曾許劉楨帶醉看。（酒罷詩成，把□看滿天星斗，夜將闌，置身百尺樓頭上，自念行爲獨憑欄）

淞北逸民。

三、1884年8月5日（清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第4063號，第4版）

《贈媚媚侍史，即步中山醉侯元韻，錄呈韞玉樓主人、鹿門山人、高昌寒食生、廉讓居士同政》

少年誰不愛名花，何必安期覓棗瓜？況復含苞多秀色，動人憐處王無暇。

燈光□熱月光寒，媚態盈盈欲畫難。獨有癡情渾不解，百花隊裏百回看。

海上了緣生戲筆。

四、1884年8月8日（清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第4066號，第4版）

《奉贈日本岡鹿門先生》

有才如此史兼詩，倒屣相迎恨已遲。卷軸羅胸精練冶，山川過目助清奇。煌煌著述千秋定，矯矯襟期一望知。海上琴心本超絕，□音未敢附鍾期。

淞濱老圃醒逋楊引傳初稿。

五、1884年8月28日（清光緒十年七月初八日，第4086號，第9版）

《贈日本岡鹿門先生》

不憚梯航遠，來從萬里餘。生無食肉相，著有等身書。槃敦論交篤，衣冠入世疎。海東吾欲到，一訪異人居。

……

滬瀆過客倪鴻甫稿。

六、1884年8月31日（清光緒十年七月十一日，第4089號，第10版）

《鹿門先生自海外來訪我吳下，兼以所撰〈讀史偶筆〉、〈尊攘紀事〉見贈，因賦贈一律，即希吟正》

仙臺仙客重東溟，萬里飛來作客星。書卷光陰雙鬢白，山河興廢一編青。人傳楊子談經宅，家有遺山野史亭。祇惜鄉音中外異，清談霏霄未容聽。

曲園居士德清俞樾蔭甫氏未定稿草。

七、1884年10月18日（清光緒十年八月三十日，第4137號，第2版）

《烟臺近事》

……

有日本人遊藝中原，思欲一擴海天眼界。數日前，負笈至烟，僑居旅邸。其名片係「岡千仞」字樣，曾向道署拜謁，又喜與文人學士遊。每與筆談，議論生風，不可一世，亦東國者有數人才也。

八、1884年11月20日（清光緒十年十月初三日，第4170號，第2版）

《金臺談屑》

日本岡千仞君鹿門遊歷至京，與各鉅公往來贈答，及赴萬里長城作汗漫遊，屢登本報。茲岡君業已回京，行將附輪南下往粵東，謁張香濤制軍。蓋制軍經濟文章冠絕一世，岡君心契而神馳也久矣。嘗在京中語人曰:「中國有名望人最爲欽慕者，莫如北張南俞。」「張」即香濤制軍，「俞」乃蔭甫太史也。

九、1884年12月9日（清光緒十年十月念二日，第4189號，第4版）

《邂逅日本岡鹿門先生千仞，喜而賦此，即請政和》

自昔曾窺絕妙詞，傾心東海久神馳。烟波脈脈三千里，寤寐拳拳十二時。何幸春風欣入抱，恍逢舊雨慰相思。兩情默契無多語，文字因緣筆一枝。

古越高昌寒食生甫脫稿。

十、1884年12月18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4198號，第1-2版）

《日事客談》

日本名士，自號鹿門山人，懷經緯之才，抱周遊之志，航海來華。北遊於京師，隨感而遇，皆發爲詩歌，作《燕薊攬古詩》二十首。近日由京來滬，於小春晦日，遍招滬瀆諸寓公中之知名士，置酒雅集，相與談笑。山人默默不語，蓋不諳中華語言。乃命中書君作通事，筆底風雲，縱論時事，洋洋灑灑，動輒數千言，中書君幾至於老而禿。時坐客爲二愛仙人、淞北逸民、昂首青雲客、友琴居士、心儂子與余及主人而七。二愛有小恙，倦倚胡床。命燒獸炭於盆，獨對取煖。淞北與友琴、心儂均能操日本語，與山人問答酬應，獨僕與山人不能以詞通，即席次作筆談。山人問余曰：「高麗之事究竟若何啓釁？君必有所聞，請以語僕，以解杞憂，可乎？」余曰：「此事傳聞，其說不一，本館所登天津來電似爲近之。而頃又接北京電音，則云『法人因越南北圻爲華兵所攻圍，其勢岌岌，不可久持。因勾通日人，以兵二千，突擾高麗，據其三道，以圖牽制華兵之勢。李傅相接到高王告急之信，已據情入告，請旨飭援』云云。本館有聞必錄，不得不取以入報。然鄙意則竊有疑焉，以爲日與法何恩，與華何怨？日本爲東洋大國，夫豈法人所能嗾而使者？此一可疑也。即使日本爲法所嗾而用兵於高麗，則亦不足以牽制北圻兵勢。蓋剿北圻之華兵，皆係滇粵之陸隊，若高麗有警，斷不能撤此以趨彼。且北洋勁旅霧沛雲屯，烟臺一水，對渡即是。此時北河已凍，法人不能北犯，則派北洋兵船以靖高亂，最爲便捷。高亂既靖，還以防法，尤爲順時而動。法人豈見不及此，而顧爲此拙計乎？此二可疑也。日本媚法，有何奢望，有何利益？而輕舉妄動，至於如此。或者京中傳言如此，而非的確之耗也。然而來電以爲，李傅相已奏

聞，請旨飭援。則其說又不似模糊影響之談，殊不敢以暗度。但據《廈門報》稱：『日本扶桑兵艦某日購辦牛肉若干，食物若干，其數甚鉅，似非一兵船所需用，故廈人見者，皆不能無疑。』觀此情形，則又似日人果有暗中接濟法人之事。既暗中有接濟之事，則安知不聽法人之驅策，而以兵擾高麗，謀分中國之兵力乎？前此曾聞法人招募日人爲兵，以攻東京，聲稱招工，以圖掩蓋。既而爲劉軍所敗，死者甚多。其因傷而載回，至中途斃命者，則皆投屍於海中以滅跡。此等信息，先時以爲必係無稽之談，若以今日之事徵之，轉不能無所疑矣。嘗謂中日兩國之在亞洲，實有唇齒相依之勢，唇亡則齒寒。若中日自相攻擊，祇以爲泰西之利而已。至若高麗界於兩大之間，則即兩面俱屬，未始不可，何必若吳蜀之爭荊州，而使阿瞞坐收漁人之利也乎？日人常以琉球一事爲疑，此則不過日人自知盜竊而陰據之之爲非義，而自覺有愧於中國。而中國則初無措意，夫安得因羞而成怒也哉？先生乃日本高明之士，當必有高見遠識，以釋群疑，請謹聆妙論，可乎？」山人慨然以興曰：「豈有是哉？僕前在京都，獲見榎本公使，見其拳拳爲中國之事，用心頗苦。又至津謁見李傅相，時榎本公使亦至津，二次與傅相晤談，談之甚久。僕在旁見之，雖不知作何語。然而公使與傅相殷勤晉接，以及詞色之間，要無非和易近人。向至中日兩國忽有交惡之舉，日前適與淞北逸民言及中日兩國之雄長於亞細亞也，中國譬如屋之有堂奥，日本譬如屋之有門户。有堂奥不可無門户，以壯赫奕之威。有門户不可無堂奥，以保宏富之業。彼高麗則譬諸自門至堂之甬道遊廊，正藉此以聯絡門户、堂奥之形勢，傳遞堂奥、門户之消息。兩相倚即兩相屬，何不可者？若琉球則不過若門户之有檻，堂奥之有階，殊不足爲重輕也。堂奥、門户，形勢聯絡，聲息靈通，則鄰人望之而生畏，見之而起敬。若中日兩國互相兵爭，則是以門户而攻堂奥，以堂奥而攻門户，二者必有一傷。門户傷，則升堂入奥者，無復顧忌。堂奥傷，則門户更無所倚著，而孤立將何所恃？如此則祇以爲鄰人之利而已。故中日兩國和則亞洲安，而歐洲各國必不能藐視乎亞人。中日不和，則亞洲不安，而歐洲各國勢且駸駸乎袖手，而收鄰人之利。中國固不乏高朗之士見及於此，即我日本政府諸公，亦豈無深謀遠慮瞻言

及此者，而何至爲法所結也哉？」二愛仙人鼓掌大笑曰：「二君所論雖極正大，然此時高麗之事，仍未見有明文。不過私相揣度之詞，又何必喋喋然費此口舌，斤斤然勞此筆墨也耶？我則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於是洗盞更酌，盡歡始散。余歸而備錄其語，正欲付剞劂氏，適又接長崎來信及《文匯報》傳單，則啓釁之由，實在日本。嗚呼！門户之見左堂奥之憂深矣，可奈何？

《高亂詳述》

高麗亂耗，言人人殊，本館惟照錄所聞，以符新聞體例。其中是是非非，執筆人非目擊身親，固不敢妄爲臆斷也。昨長崎訪事人來信，言之較詳。據云：「上月二十六日晨，日本千年輪船由仁川展輪至長崎，内有負傷者三十餘人。傳言高麗京師有仁川亂民肇事，國王避難登山，大將閔泳翊被殺，大臣遇害者共八員。國王慌迫異常，急召中日兩國駐防兵入宮護衛。事定後，日兵不肯退出宮門，致與華兵互鬥。華兵傷士八名，日使署亦被亂民燒毀。事聞於日廷，遂派比叡艦兵船前往查辦。又聞尚須添派一艘前往，至其因何釀成大事，尚未訪明。當此時事艱難，不料事出意外，又增宵旰東顧之憂，爲之輒喚奈何。」來信之言如此。然則本館前登長崎及天津來電，言：「高麗内亂，國王逃避。」又譯西報，言：「在高華人與日人互鬥諸事，俱屬信而有徵矣。」亟再錄之，以供衆覽。

《津電述高麗亂耗》

昨晚七點鐘，本館又接天津訪事人發來電音，云：「中朝聞高麗亂耗，已派吳清卿星使前往彼處靖亂矣。」又云：「起事之夜，高麗開化黨死五人，日兵入衛者死三人，傷七人。日使公署付之一炬，高王之妃被亂兵所戕」云云。按，津友此電與前次所發之電相符，且可與長崎信參觀互證。是高麗致亂之由，不在外侮，而在内變矣。惟《文匯報》所發傳單，則有大相逕庭者，照譯於下，以見傳聞之異。

《高亂續聞》

《文匯報》於昨日下午，發有傳單，云：「得有高麗亂耗」。但其所言，尚未甚詳。據云：「十月十七日，有高員請穆君麟德及西官

高官等數人在書信館內用膳。至晚九點鐘，忽聞外面有大呼火起者。時有高麗大員閔君，乃高后之姪，亦在坐中間警出，視其□從之。比出門，有人執其主僕而痛毆之，頭上受傷甚重。毆者旋即逸去，閔君送至穆君公館，延西醫療治，恐不能保其性命，閔君曾任美國使臣。頃之，又有高員四人、華弁三人，亦爲亂黨所戕。即晚，日本公使帶兵一百八十名前赴王宮，強以前此曾爲日本使臣之高員某立之爲相，凡平時喜助日本諸高員咸加爵秩。次日，日本兵艦上複調兵八十人至王城。嗣是而後，內外閤絕，聲息不通。有傳言謂『高王及后業已被害』者，有人欲入探消息，日本兵輒阻之，不使進華官，至則亦阻之。見華兵則開槍擊之，俄而華兵與高麗兵合力攻勦，立將王宮恢復，日兵敗退。至十九日，穆君麟德往見高王，乃知前言之謬，相與商理朝政。其未經被害之高員，亦漸漸復集。高人忿怒，立將書信館拆壞，某官之署亦被焚燬。是日下午，日本人自燬其使署，退至仁川。高員中之黨於日人者，亦偕遁。」此信因忽促，未及詳敘，後當再述。惟聞「西員之在高者，均無被害，華官已發船至旅順，報事至二十三日。日人發船一艘，載受傷之日人約三十人，并日本婦女約二百人，開往長崎。現在華兵及高兵在王城保護各官衙署，仁川之海關前，泊有英兵船一艘」云，此《文匯報》所發傳單之言也。並聞本阜所泊英美兩國兵船，聞高亂信息，業已展輪東指矣。

十一、1884 年 12 月 20 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第 4200 號，第 4 版）

《聚豐園即席，奉和高昌寒食生見贈原韻，請芋仙、紫詮二先生政之》

愚智爭傳幼婦詞，雷霆腕底快奔馳。功名已付少年輩，風月恰宜初老時。塞北烟雲歸壯語，海南波浪鼓雄思。不知蘇季舌三寸，孰與文豪筆一枝？

岡千仞未定草。

十二、1884 年 12 月 29 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第 4209 號，第 9 版）

《日本詩人岡鹿門招同寺田望南君，李芋仙刺史，王紫詮廣

文，易實甫、曾重伯二孝廉，黃瘦竹居士，小飲聚豐園。望南賦詩留別，依均和之》

翩翩裙屐喜相過，燭影搖紅月展波。舊雨快同今雨聚，酒痕爭比墨痕多。烟花跌宕閒中樂，琴築淒涼醉後歌。猶有雄心消未得，干將出匣手頻摩。

申左夢畹生稿。

《寺田望南從東來，偕其國詩人岡鹿門，邀諸名士集飲酒樓。時在座者李芋仙刺史、易實甫部郎、曾重伯孝廉、黃式權茂才、黃瘦竹處士及余也。望南即席呈詩，因和其韻》

高軒海外快相過，廻首歡場感逝波（予在日東所眷角松，聞已埋玉）。客裏夢隨人影遠，杯中酒遜淚痕多。河山百戰悲陳劫，風月頻年付短歌。老懶衰殘消壯志，華髮且伴病維摩。

水末西風一雁過，傳來消息駭鯨波。放懷今古雄才少，喜事乾坤亂日多。獨客憂時聊痛苦，今宵對酒且高歌。試看長劍天邊倚，幾度停杯手自摩。

良朋異地喜重過（實甫從杭州回，重伯從吳淞回），海上雲萍託素波。文字傳薪流派遠，詩篇東笥紀遊多（實甫有《遊杭詩》數十首）。把杯漫作看天語，拔劍聊爲斫地歌。高踞胡宋且向火，斧柯莫假手頻摩（謂芋仙）。

兩國橋邊記昔過，同登畫舸泛輕波（日東新橋、柳橋，歌姬所萃處也）。離愁刻骨團欒少，恨事廻腸感慨多。重著征衫覓鴻爪，不辭遠道唱驪歌。相逢喜汝還初服，聊把頭顱一撫摩（望南曾棄官爲僧）。

天南遯叟王韜未定稿。

《將發東京，留別同人》

木落山河秋已過，長風又破萬重波。草堂舊雨酒邊散，古驛新愁雁外多。南泛湘潭弔忠憤，北遊燕市聽悲歌。且尋鬼谷縱橫士，欲向天涯學揣摩。

日東寺田宏士弧待定草。

十三、1884年12月30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第4210號，第10版）

《日本岡鹿門先生招同人集酒樓，寺田詩先成，即步其韻贈鹿門》

此日欣從江上過，萍蹤風聚漾情波。□樽雅集風流甚，萬里交遊著述多。詩膽壯時聊縱筆，酒腸寬處且狂歌。諸君盡有安邊策，愧我空將劍珮摩。

榑竹詞人草。

十四、1885年1月3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第4214號，第9版）

《燕薊攬古》

方今我朝以玉帛訂盟於中土，實爲隋唐以來未有之盛事。余也以一窮措大，逢斯盛世，殘老餘齡，作瀛海萬里之遊，殆繼晁卿之武於千載以上矣。傷來悲往，寄感慨於山河，弔古憑今，寓諷刺於歌詠。賦《攬古二十首》，聊紀燕薊遊跡，且請大雅諸君是政。皇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五日，鹿門山人識於滬上廣業洋行樓。

○覺生寺

在西直門外，皇帝禱雨之所也，有洪鐘，俗稱大鐘寺。碑刻乾隆皇帝和沈德潛韻長篇，以永樂帝悔靖難之役，興此寺，懺罪障爲首，頗渾圓。

燕王爲帝營禪刹，鈎屋洪鐘大十圍。曾此興師犯大順，應知誓佛懺前非。淨庭晝寂松棲鶴，深院花薰客繫騑。攬古吾遊從是始，先題詩句合龕扉。

○圓明園

在覺生寺西北，康熙皇帝晚年築此園爲離宮，雍正皇帝爲太子時居之。英法陷北京，罹兵火，□委荊棘。

兵禍當年何慘其，玉樓金殿黍離離。忍將蕩矣委天數，誰不慨乎思往時？荒草徑堆紅玳瑁，敗磚人踏碧琉璃。中興諸將英謨足，聞道八旗徵法夷。

○萬壽寺

在宛平縣，萬曆年間建寺。面昆明池，疊石七八，□像普陀、清涼、峨眉三山。康熙皇帝重修殿宇，□麗比圓明園，罹兵火，悉皆傾圮。

人壽古來無百年，呼爲萬壽爲誰憐？涼淒金地噪烏鵲，狼藉寶階堆□磚。祇樹林荒搖落日，昆明池浸廓寥天。鬱蒼王氣無窮已，寄語諸君請勉旃。

◯玉泉山

在宛平縣，清泉從石隙噴湧。池上望湖亭刻乾隆皇帝「玉泉趵突」四大字。有上下華嚴、補陀、金山諸寺，七眞、呂公、七寶諸洞。

仙佛場荒鎖老寒，吾來半日試遊觀。名流題字埋衰草，聖上奎章壓敗欄。趵突泉從淵底噴，蜿蜒山自樹間攢。池頭餘得琉璃殿，三塔宛然鼎立看。

◯普覺寺

在宛平縣，有唐時臥佛。明代奄官佞佛，爭修佛閣，誇宏莊，西山一變，爲□地。康熙、乾隆二朝賜聯額，建豐碑，更爲生色云。

紫翠洗眸山四圍，重重寶閣據崔巍。雖然僧俗無文字，猶覺境幽忘世機。爭建豐碑頌聖代，謾將□力鎮王畿。低徊到處添詩興，面面塔尖映夕暉。

◯碧雲寺

在宛平縣，元耶律阿利吉捨宅爲寺，阿利吉，楚材孫。至明大監，范宏拓新之，□□築殿，溪山環拱，有藏經閣，五塔對立，尤爲奇巧。是日，恭邸王妃行香。

誰將膏血飾丘園，欲起昌黎泉下論。千尺赬廊河漢近，萬釘畫棟斗星繁。果然唐爲家奴覆，何意佛因奄豎尊。是日王妃行香火，雲從輿馬簇朱門。

◯三山庵

與碧雲寺隔山相背，一名四平臺。三禪剎占山腰，深樹蓊鬱，歐米人每夏借寺避暑云。

落葉紛紛點角巾，昏尋山寺度璘峋。數聲犬吠隔深澗，一笑僧知敬遠賓。香火頓生塵外念，粥魚恍覺夢中身。壁頭佛畫松煤暗，炊飯起聞雞報晨。

十五、1885年1月11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念六日，第4222號，第9版）

《甲申至後五日，紫詮先生來訪，約往酒樓。適芋仙刺史偕曾重伯、易實甫、黃夢畹、黃瘦竹同過，遂與寺田望南命車至酒家小飲。望南出示〈東京留別詩〉，即席和韻。望南於前四日至自日東，與紫詮先生本舊交也》

今宵攜客酒家過，瀲灩杯中泛綠波。遊歷蹤隨雲外遠，友朋感向酒邊多。乾坤暗動茫茫歎，江海惟宜浩浩歌。一醉且休談世事，壯心久已付消磨。

日本鹿門山人岡千仞未定稿。

《天寒欲雪，與望南圍爐對飲，讀紫詮先生所和四律，輒作一篇，仍步前韻》

彈指光陰一歲過，朔風吹雪晚揚波。即今大地兵戈滿，自古傳人感慨多。歸臥欲求千日酒，遠遊漫唱五噫歌。擁爐不覺今宵永，鄉夢無端到薩摩。

日本鹿門山人岡千仞未定稿。

十六、1885年1月15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第4226號，第1版）

《書廿八日本報津電後》

天津西友發來電信，登諸昨日報中，細閱之，竟不甚解。何以日與高之和如是之易，而日與中之和如是之難也？……日本政府豈曰無人？度必有見及於此者。岡鹿門，日本一書生耳，亦且高瞻遠矚，爲門户、堂奥之説，乘軒者何遽憒憒若此？故以爲日人必不然也。……

十七、1885年1月19日（清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四日，第4230號，第9版）

《餞鹿門山人遊南海》

江樓置酒洗離愁，嶺外風塵尚未收。貫斗光芒霜滿劍，照天燈

火夜登舟。萍蓬愧我爲孤客，冰雪憐君賦遠遊。從此圖南千萬里，伏波銅柱應回頭。

日本寺田望南未定稿。

《招鹿門山人小飲酒樓，即送其往遊粵東，和望南韻》

莽莽乾坤不送愁，殘年急景眼前收。梅花故國孤燈夢，風雨寒江獨客舟。潦草杯盤聊餞別，飄零湖海懶從遊。明春有約江干去，同掛征帆過石頭。

天南遯叟王韜未定草。

十八、1885年2月11日（清光緒十年十二月念七日，第4253號，第4版）

《送陳哲甫中翰出使日本》

三世交情似北平（令祖雲山同年，於道光丁未在京同寓郡館，樂敘晨夕，嗣識尊翁仙海觀察於吳下），年來與子倍多情。大才本覺塵寰隘，奇遇同尋海國盟。祖硯勤磨文自富，父書飽讀筆能耕。君家故事公卿長，縱使懷慚亦自榮。

跨海東遊幾汐潮，迥殊西域路迢遙。雖然異服沾他族，畢竟同文肖本朝。一自藩封夷屬縣，更無遺制度天橋（往年冊封琉球使者，至其國，架天橋於城上，以度使者，所以敬天使也）。彼都名士岡千仞（岡君爲日本名士，今年來遊滬上，余曾識之），好去談詩破寂寥。

桐鄉嚴辰芝僧氏識於隱居求志齋。

十九、1886年9月23日（清光緒十二年八月念六日，第4828號，第3版）

《祭李芋仙文》

年月日，日域晚學岡千仞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芋仙李翁之靈。嗚呼！余初見翁上海客舍，翁不良足，就床偃臥。余見其傲，不敢不下，乃贄《雜著》，進請示罅。翁亂抽卷，蹶然起坐，曰：「殆失人，吾過，吾過」。余出近作問詩，何奈言語不通，筆資話欛。翁擊按吟，一頓一挫，每會其意，再四歎詑，執手許余：「作者流亞，其明未餐。」翁步蹣跚，手扶兩客，來敲余門。余問：「當今誰宗斯文？」翁睢盱曰：「有一芋仙，余子碌碌，今得鹿門。」余不當，曰：「莫乃戲□。」翁掉其頭，瞠雙目，云：「文章一事，未戲許人。」

指《莘老集》曰：「此幸傳，鹿門所作，豈讓是篇與？」翁征逐賓，創是筵，上海形勝，爲東南止。四方名士，東送西□。昕伯、桂笙，實主文柄；王君紫詮，客居養病。翁來自蜀，交友爲命，無意當世，專耽諷詠。酒亭茶館，折柬延請。醉酣興適，連篇相兢。停盃揮毫，珠璣輝映。一投《申報》□刊，以□萬目駭愕，稱一時盛。翁負英資，少名能詩。曾文正公一見爲奇，老生鴻儒，逡巡交推。時方兵亂，廓清自□。中年失意，謝絕塵羈。塞門撰著，與世相遺。漢注唐疏，推究是非。道家釋門，出入藩籬。浩博其學，富贍其辭。瀟灑其懷，眾論所歸。嗟余小子，何呶呶爲？余遊南越，握手話別。會罹瘴毒，異症交發。遊半航歸，遼絕溟渤。往歡一逝，夢寐徒切。翁惠新著，附言問疾。未草答書，訃報忽達。申浦一握，傷哉□訣。顧余生東，學無所宗。語言被服，異俗殊風。交目東鬼，如狄與戎。翁何所取，待以禮容？翁何所契，許以深衷？不特今世，不易多逢。未聞邃古，得一相同。天劃地限，瀛海萬重。幽明冥漠，魂神不通。此陳哀誠，一慟塞胸。神若有靈，庶其來饗。

自李芋老歿後，余少一遊友矣。至於詩文，亦復獨倡無和。花天酒地中，意興索然。芋老死，余無一詩以哭之，其餘友人，亦未睹其篇章。嗚呼！何挽之者不及壽之者多耶？鹿門岡君寄此文來，少足爲芋老吐氣。今又屆八月矣，距芋老之沒已一周。展閱此篇，淚爲之涔涔下。

天南遯叟附注。

二十、1887年1月14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念一日，第4941號，第9版）

《中國創設海軍議》

浙江寧紹臺道薛取錄格致書院，丙戌夏季課藝超等第二名，王恭壽。

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地循環之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今沿革之運。至於合無可合，天乃特開一千古未有之奇局。……近日，日本仿德國兵制，欲驅一國之民皆爲兵。又向別國購置器械鐵甲，國中製造兵械，整頓武備。無論已復使岡千仞來華，繪我中

國輿圖，結聯中國英才。其意可見，其機已露（其詳已見壽所輯《東望冷窺錄》）。……

二十一、1887年2月19日（清光緒十三年正月念七日，第4970號，第3-4版）

《東遊日本，紀之以詩，並留別海上諸子》

男子端宜志四方，豈能鬱鬱老江鄉？斯饑況已來驅我，載贄何妨賦出疆？他日編詩應秉筆，今年訪舊去扶桑。近時關愛惟親故，尚有臨歧饋酒漿（王君鏡波、鄧大嘉生、王三柳生，各有所贈）。

……

王郎說士情何重？華燭高燒尺素修。（王文紫詮爲致書曾根嘯雲、重野成齋、水越成章、岡鹿門諸先生及朱君季方，爲余道地）甘爲不才通姓字，豈徒高誼共車裘？荊州此去依劉表，海外無難識馬周。慚愧客囊差澀甚，僅將詞賦答名流。

……

正月廿六日也。

□安孫語聖與甫。

二十二、1887年3月17日（清光緒十三年二月念三日，第4996號，第12版）

《海外懷人詩》

……

岡千仞，字鹿門，仙臺人。

天縱奇才遇亦奇，挺身慷慨救時危。棄官落拓聊耽酒，滿腹牢騷不合宜。著述千秋《尊攘記》，壯遊一卷贈投詩。微局迫返剡溪棹，東望芝山繫我思（君寓居東京芝山下愛宕町，甲申來滬，旋赴粵東，因疾作，遂東歸）。

……

策鰲遊客新儂葉慶頤待定稿。

二十三、1887年5月22日（清光緒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第5062號，

第 1 版）

《書日本岡千仞〈觀光紀游〉後》

岡君名千仞，字振衣，一字天爵，自號鹿門山人，宮城縣士族。出爲奧羽陪臣，時值幕府末造，政事多所變更。奧羽藩王將連盟抗王師，君力諫，反覆陳大義，以死爭之。當路嫉焉，下獄瀕死，君卒持大節，無所屈撓。當是時，君義聲震天下。維新治啓，辟爲大學教官，君辭不就。老屋三椽，授徒自給，歌聲出金石，於世一無所干，人以是高之。君秉性質直迂疏，不能俯仰隨流俗，視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者泊然也。生平好遊，於其國中，足跡殆遍，於是，慨然興域外之觀。己卯年，與余約遊中土，閱五載而後克踐。甲申五月來滬小住旬餘，即作蘇杭之遊。時法事方亟，倉皇返櫂。勾留一月有半，又復束裝出遊，北窮幽燕，南極粵嶠，可謂壯矣。所至得見其地之名公鉅卿，高人逸士，與之上下。其議論辨說，是非得失，悉筆之書。以腹瀉東歸，未得上泝長江，探洞庭、鄱陽之勝，斯闕典也。然是遊，君亦可以無憾矣。其論時事曰：「方今光氣大開，萬國交通，此五洲一大變局。而拘迂儒生，輒引經史，主張陋見，不知宇内大勢，所以至此，其猶巢幕之燕歟？事至今日，非一掃洋烟毒與經生毒，則不可下手。洋烟縮人命，耗國力，竭中土之精英，歲千萬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六經爲聖人垂世立言，惟經生拘泥末義，墨守陳言，牢不可破。孟子不云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則六經之遺弊何異老莊之流毒晉宋乎？黄公度在東好論洋事，嘗曰：『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洞觀當今形勢，不可無此見解出。」其論泰西曰：「洋人製機器，駛舟車，資紡織，盡力農桑，凡百工業，靡不究心。其日致富饒，趨強盛，雄視宇内，實機器之由。中土之取法乎泰西者，將收彼長爲我用也。此眞殫精竭慮，以培國本者也。或謂其『去質實而趨機巧』，此大不然。試觀上古唐虞之璇璣玉衡，周公之指南車，諸葛武侯之木牛流馬，祖沖之之千里船，無一非機器也。聖人製耒耜墾田畝，製機杼織布帛，製鋸斧營宮室。其開物成務，皆由機器而來。洋人殆因襲中土聖人之製作，而集其大成者乎？」其論

中土當今之急務曰:「宜變風俗,興學校,仿歐米諸國,建大小學舍,使子弟修孝悌,旁講格致有用之學。海軍、陸兵另設專塾,火器、航海,延師教導,壹志講求。絕大關係則在一變國是,廢科舉,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習,振起天下之元氣。」時法人方橫於海上,馬江之役,基隆之戰,其勢實逼,而高麗又有中日兵鬨之舉。岡君之論中日,始終在棄嫌崇好。李明經鍾珏撰《興亞五策》,謂:「不如付琉球於日本,與之協力,以當歐米。」岡君亦言:「中土堂奧也,日本門户也,堂奧、門户相須而成一家,琉球末界微事耳。今中土受強敵,而復生事朝鮮,非特敝邦之失,亦非中土之計也?中土將興富強之治,與歐米角逐□瀛海之外。而安南將爲法據,朝鮮惴惴,僅免危亡。四鄰同文之國,稍有氣力者,惟一敝邦而已。敝邦於中土隋唐以來傳文學,通貿易,一千年於此。其爲唇齒輔車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也。若中土積區區之微嫌,目敝邦爲異國,責以匪衷之語,則東洋之□事源於此。《傳》不云乎『鋌而走險,不可不戒焉』?其言當出於誠□。」竊窺近來日本政府之意,大有不然者。日本方崇西術,棄漢學,舉國若狂媚泰西,而輕中土,已成習尚。大抵民間公論,尚期中日之相聯,政府非特無此意也,實將朘削我以爲快耳。彼將謂中之厚,日之薄也,故其平日所爲,實不足愜。中人之望此,不能因岡君一言而寬之也。昔人論日本之所長,曰:「陸戰悍守岸,嚴刑罰,斷號令。專能禁邪教,斷烟害,使不得輕犯,此中土之所不及也。」然彼之所自誇者,近亦少餒焉。岡君書中所短者,尤在語犯忌諱,意存藐視。每見達官貴人,退後必多微詞。又有隱昧之事,虛實未可知,斷不宜形之筆墨者,而亦牽率以書之,殊失君子慎言之道矣,竊不爲岡君取也。嗚呼!以一介儒生而妄論國事,未有不隔十重簾幕者。蓋在位君子,既秉國鈞,物來畢照,敵無遁情。我之所知所見,彼早已料及,所以不出此者,必有故在,夫豈局外人所能測哉?而況鄰國之人歟?岡君少時讀書昌平黌舍,早有文名,生平尤留心於國事。曾築野史亭於鹿門山下,守殘泚闕,剌取見聞,以成一家言。所著《尊攘紀事》,《法》、《米》二志,具有史才,名重一時。遊記特其載筆所偶及,非其至者也。天南遯叟王韜拜手撰。

二十四、1887年12月4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第5257號，第1版）

《論使臣理事任能持大體》

國家之設立使臣，遣往遠方，本欲其折衝於萬里之外，以尊我國體，張我國威。……貴國遊歷人員徧於中國，如岡千仞等來遊來歌，任其經行内地，初無扞格。若貴國堅持弗許，我亦當上詳總署，彼此照例而行，何如？……

二十五、1888年1月22日（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第5306號，第1版）

《論著書當紀述近事》

古今來能文之士，必當求可傳之事而託之以垂不朽。……日本嘉永年間，美利堅水師提督伯理奉其國書，至浦賀，以求開埠通商。……岡千仞著有《尊攘紀事史略》，初編起於嘉永癸丑伯理入港，訖於明治己巳諸侯納王；二編自佐賀騷亂，訖於用兵臺灣始末。《尊攘紀事》皆紀通商以來，國内稱兵作亂者蠭起，訖於平定而後已。……

二十六、1888年5月27日（清光緒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第5424號，第1版）

《書〈觀光紀游〉後》星溪閒人來稿。

統地球各國而論，我中華地大物博，立國最先，經歷代聖人，開蒙破混，創制顯庸，迄今文物聲名，實爲五洲之冠。自開海禁以來，遠人攜家屬以遊，挾重資而居者，殆不可數。雖曰通商一事東西並重，豈無借遊覽之名而采風俗，一觀我政治之得失哉？光緒十年夏五月日盤桓十閱月。本岡君鹿門來遊滬瀆，由蘇杭而入燕京，往粵東程，途萬餘里，所至名流會集，議論縱横。又復飲酒賦詩，以爲樂駸駸乎，一時之盛事也。岡君既與中土賢士大夫遊，復致謁當道，意欲劇談時事，諸鉅公目爲蘇張一流，閉拒不納者若干處。旋嬰病東還，暇時撮其日記大略，著《觀光紀游》一書，付諸梨棗友人。雲間一鶴讀而善之，余亦流覽一過，因作而歎曰：「岡君之意誠善，岡君之行則謬矣。當法人之稱兵海上也，各口戒嚴，岡君以

異域之人而能知唇亡齒寒之大義，一念輔助中國，形於辭色，是雖求我國中之食毛踐土者，亦不可多得，誠不愧東土之名流矣。惟不能統籌全局，抉摘中土受病之源。第見法人滋擾，我與之戰，則爲以弱敵強師，雖直亦老。不知中國之積弊實由於不戰而弱，非由於不和而屈也。欲逞一人之口舌，誤我事機。殆素憚法人之船堅礮利，而不知我中華人心之固，宿將之多，國本之不可動搖歟？夫馬江爲法人殘毀，出於詐謀，人神共憤。當時如得天子一詔，□□深至，凡在戎行，必奮忠憤之氣。如秦晉韓原之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者庶於今日見之，何岡君所見者小，而一主於和也？法人悍詐無禮，惟力是視，惟利是圖。岡君之言曰：「國有大事，則大臣越疆而謀。今也國事方亟，中堂公盍奉醇邸？若恭邸使於法國，見大統領，詰責中土，何所負於法而出賠償？法何所怨於中而寇雞籠、福州？就條理之所在，而究曲直之所歸。此以霹靂手段，出彼意料之外也。」噫！其計左矣。中堂坐鎮天津，北洋水陸兵權握於一手，醇邸運籌帷幄，軍國大事，無不與聞。此二人者，一爲親臣，一爲重臣，朝廷方倚之爲左右手。一旦出使外洋，設有重大機密之事，誰可與謀？且無論長途之險阻何如也，天下豈有兩國之兵既已交鋒，而反遣親臣、重臣面折廷爭者？且法人於中朝之事無不洞若觀火，此舉若成，法廷必當早知而預爲之備，何所見爲霹靂手段，而出彼意料之外也？此險策也，亦下策也。何岡君之不知情勢，而大言不怍也？岡君動言「六經毒」，且以《春秋》「日食」屬蝦蟆，緣後人解經之謬，以實其「經書不可盡信」之説。因之謗毀聖賢，肆無忌憚，屢見於篇。夫六經乃聖賢眞誠之言，教人統籌體用而設，後人斷章取義，演説紛繁，反不如古人簡練之爲。愈近世，好名之士喜著書傳後，一詩一文，沾沾自喜。六經之外有毒，六經中無毒也。推岡君之意，必欲中土人盡讀歐米書，置經書於高閣，方逞其願。吾不意日東同文之國，岡君文雅之士，竟有是言也。岡君又云：「學取彼長技，又以其所學報彼，是反噬其師也，豈人情乎？」嗚呼！是何言歟？夫槍礮之利，鐵甲之堅，各國互相則傚，而疆場之釁一開，即以最精之火器從事於水陸，未聞有所顧忌也。近二十年內，中國不惜重資師西人之長技，原欲固我疆圉，捍禦外侮耳。若云「學其所長不可以

報彼」，則必於槍礮、鐵甲之外，另圖利器，而後可有是理乎？況事物取資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即如火藥創於中國，及元明宗至順元年，日爾曼人四華司始傳其法於歐洲。今法人專尚火攻，是取我之長技而施之於我也，我獨不可傚彼之所長而報之於彼乎？岡君辯言亂政，獨不顧旁觀之齒冷乎？總之，岡君以域外之人而觀光上國，效我之所長，棄我之所短，著書傳世，令日人有所觀感而興起，則庶幾不負此遊矣。若欲與人家國事，而執一偏之見，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一世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智士也。目爲蘇張一流，而閉拒不納者，非當道諸公忌外人，實岡君有以自取也。吾甚惜岡君抱此美意，無益於中土，而徒博游說之名也，故書數語以規之。

二十七、1888年10月28日（清光緒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第5578號，第4版）

《跋葉君新儂〈策鰲雜摭〉》

葉君新儂遊東瀛，歸成《策鰲雜摭》一書，詳紀東海風土人情。……僕於東瀛諸名士頗有契合，如岸吟香、岡鹿門、井上至德、北條鷗所諸先生，皆以文酒往還，時相過從。間嘗詢以東國風俗，道其職官，則其所言，皆一一與葉君之書相吻合，以視他人之耳食者，蓋不啻霄壤矣。拜讀一過，書此以誌欽佩。

古越高昌寒食生拜手。

二十八、1889年12月29日（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第5999號，第1版）

《海天驪唱圖序》

圖爲本秋山儉爲所作，蓋記離華返國之行蹤也。儉爲日之東京人。……噫！我見日人之來我華者多矣，非輕身作賈，以零星玩物牟什一之利，即輕世肆志，放浪閒遊。如岸老鷗所及，岡鹿門、寺田望南、井上子德、島田友春諸君，能送抱推襟，流連風雅者不數數見。……

二十九、1890年6月26日（清光緒十六五月初十日，第6171號，第1版）

《日本書學源流考》

日本爲我同文之國，風流儒雅，照耀海東。……不佞嘗航海至江户，與此邦文人學士遊。見夫重野成齋、中村敬宇之文草，岡本監輔、岡鹿門之經濟，神波即山、龜谷省軒、向山黄村之詩，要皆造詣精純，一時莫並。……

三十、1892年10月16日（清光緒十八年八月廿六日，第7000號，第3版）

《鰈使傳言》

……華人王惕齋久客東京，名望頗著。一日行至某處，被日人濱野茂所駕馬車撞斷右臂，遂倩醫生，爲之鋸斷。嗣後，控不得直，而一臂已成殘廢。其友重野成齋、岡鹿門、岸田吟香三君，惻然憫之，製成小啓，約友集金佽助，皆已列報章者也。兹得江户友人手，畢悉惕齋在醫院。時諸友之親臨慰問者，醫生禁不使入，謂恐多語傷神。及歸，鋸處雖已合口，而筋脈縮短，不能伸屈自如。濱野恃有護符，仍不肯出養傷之費，至諸君所斂助者，惕齋堅卻不受，一律修函璧之。

三十一、1900年1月22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第9619號，第1版）

《重遊避債臺記》

苦海之濱，愁城之内，有窘鄉焉。……顧爾時，雖年矢催人，窮愁潦倒，而芋老既執詩壇牛耳，一時名士皆從之遊。如日本岡鹿門、北條鷗所、黟縣程蒲生、江都李洛才、湘鄉曾重伯、龍陽易實甫推襟送抱，興往情來。當夫風瀟雨晦之天，往往相約登酒家樓，在醉鄉中覓生活。……

三十二、1901年11月2日（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廿二日，第10253號，第1版）

《觀蔡紫黻徵士〈中國興利除弊良言跋語〉，試衍其義》

《中國興利除弊良言》，洋洋數千言，爲江海新關税務司戴榷使樂文所著。既登本年九月《萬國公報》。上海蔡紫黻徵士跋其後，曰：「此篇西文元本類，皆至理名言。譯作華文者，聞係南洋公學肄業

生，亦頗明白曉暢。惟間染近來惡習，剌取日本新創譯書字義，彌望生澀，最爲可惡。爰爲淘汰淨盡，還我華文面目，仍不失譯文當用字義，譯者細玩自明。……猶憶昔者日本名人岡天爵來華攬勝，歸而著《觀光紀游》一書。謂「中國人有三毒，一六經毒，一時文毒，一鴉片毒。去此三毒，則國日以興；留此三毒，則國日以敝。」僕則以爲，六經爲天地間至文，安得有毒？時文雖無用，不必以毒目之；其用以毒中華者，向惟鴉片一物。今則併和文毒而二之矣。語雖涉於詼諧，自問亦不爲無據。徵士係今之識時務者，試以此言質之，以爲何如？

三十三、1903年12月17日（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廿九日，11015號，第1版）

《和文考略》

和文者，日文也。……以及近人土井格、竹添光鴻、中村正直、矢土勝之、藤野正啓、宮島誠一郎、岡千仞、重野安繹、岡本監輔諸君之以古文詞鳴者，亦無一雜用和文，即反點亦芟薙。……

參考文獻

引用書目

中文文獻

1. 《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美〕孟德衛著，江文君、姚霖譯，新星出版社，2007 年版。
2. 《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英〕伊麗莎白・伯德著，卓廉士、黃剛譯，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3. 《18 世紀法國視野裏的中國》，〔法〕亨利・柯蒂埃著，唐玉清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版。
4. 《2000 年西方看中國》，周寧編著，團結出版社，1999 年版。
5. 《申報》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 8 月版。

A

1. 《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法〕奧古斯特・博爾熱著，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版。

B

1. 《巴黎女子拉薩漫記》，〔法〕亞歷山塔麗雅・大衛—妮爾著，錢林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2. 《八指頭陀詩文集》，釋敬安著，梅季點校，嶽麓書社，2007 年版。
3. 《半島唐風：朝韓作家與中國文化》，劉順利著，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4. 《比較文學導論》，〔瑞士〕費朗西斯・約斯特著，廖鴻鈞等譯，湖南文

藝出版社，1988年版。

5. 《比較文學形象學》，孟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C

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常溪集》（第一册），程光裕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6年版。
3. 《朝天錄》，珪庭出版社，1978年版。
4. 《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陳尚勝等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 《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日〕夫馬進著，伍躍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 《陳亮集》，〔宋〕陳亮撰，中華書局，1974年版。
7. 《穿過鴉片的硝煙》，〔哥〕唐可・阿爾梅洛著，鄭柯軍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
8. 《穿藍色長袍的國度》〔英〕阿綺波德・立德著，劉雲浩、王成東譯，中華書局，2006年版。
9. 《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體性理論及其當代效應》，嚴澤勝著，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
10. 《從周邊看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中華書局，2009年版。
11. 《傳播學引論》（增補版），李彬著，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
12. 《純常子枝語》，文廷式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11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D

1. 《東方學》，〔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 ，三聯書店，1999年版。
2. 《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尹德翔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 《東亞歷史年表》，鄧洪波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版。
4. 《東遊日記》，黄慶澄撰，王曉秋校點，史鵬校訂，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據光緒甲午（1894）刊本整理，嶽麓書社，1985年版。
5. 《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9年版。
6. 《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

獻館編印，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3 年版。

7. 《第四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1 年版。

8. 《第一次中日戰爭》，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等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六冊，正中書局，1957 年版。

F

1.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爾德·克里斯蒂的經歷與回憶》，〔英〕杜格爾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澤·英格利斯編，張士尊、信丹娜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2. 《風起東西洋》，周寧著，團結出版社，2005 年版。

3. 《符號學原理》，〔法〕羅蘭·巴爾特著，李幼燕譯，三聯書店，1988 年版。

4. 《扶桑遊記》，王韜撰，陳尚凡、任光亮校點，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據日本東京「報知社」印本（明治十二年出版上卷，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整理，嶽麓書社，1985 年版。

5. 《復庵先生集》，許玨撰，陶世鳳編，丙寅（1926）秋七月無錫許氏用聚珍版印，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三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版。

G

1. 《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日〕西原大輔著，趙怡譯，中華書局，2005 年版。

2. 《觀光紀游》，〔日〕岡千仞撰，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年版。

3. 《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日〕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中華書局，2009 年版。

4. 《觀看之道》，〔英〕約翰·伯格著，戴行鉞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5. 《關於「異」的研究》，〔德〕顧彬講演，曹衛東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6. 《光自東方來：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錢林森著，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7. 《廣州「番鬼」錄》，〔美〕亨特著，馮樹鐵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H

1.《互文性》，王瑾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2.《互文性研究》，〔法〕蒂菲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3.《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美〕丁韙良著，沈弘、惲文捷、郝田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
4.《韓國漢文燕行錄選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研究院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5.《漢學菁華》，〔美〕丁韙良著，沈弘等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版。
6.《蘅華館詩錄》，王韜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58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1880）鉛印《弢園叢書》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7.《黃公度先生傳稿》，吳天任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版。
8.《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美〕黃仁宇著，張逸安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版。
9.《黃遵憲評傳》，黃昇任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10.《黃遵憲全集》上冊，黃遵憲撰，陳錚編，中華書局，2005 年版。
11.《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郭眞義、鄭海麟編著，中華書局，2009 年版。
12.《黃遵憲研究新論：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史學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版。
13.《黃遵憲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王曉秋、陳應年主編，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14.《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第一卷》，〔日〕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版。

J

1.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版。
2. 《漸西村人初集》，袁昶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65 冊，據清光緒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3. 《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4. 《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日〕山根幸夫、中村義、藤井昇三、太

田勝洪編，周啓乾監譯，金禾出版社，1995 年版。
5. 《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陳室如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版。
6.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曉秋著，中華書局，2000 年版。
7.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齋》，王勤謨編，寧波出版社，2011 年版。
8. 《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王曉秋著，崑崙出版社，2005 年版。
9. 《（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法〕弗朗索瓦·于連、狄艾里·馬爾塞斯著，張放譯，大象出版社，2005 年版。
10. 《舊年人物》，夏曉虹著，文匯出版社，2008 年版。

K

1. 《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法〕老尼克著，奧古斯特·波爾傑插畫，錢林森、蔡宏宇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版。
2. 《苦竹雜記》，周作人著，止菴校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L

1. 《拉康：鏡像階段》，〔日〕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2. 《拉康選集》，〔法〕拉康著，褚孝泉譯，三聯書店，2001 年版。
3. 《龍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國社會與禮俗》，〔英〕吉爾伯特·威爾士、亨利·諾曼著，劉一君、鄧海平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 年版。
4. 《旅遊體驗研究：走向實證科學》，謝彥君等著，中國旅遊出版社，2010 年版。
5.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十二卷、第十四卷，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版。

M

1. 《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大陸雜誌社，1970 年版。
2. 《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法〕謝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譯，東方出版社，2011 年版。
3. 《明清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張昇餘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4. 《明治的漢學家》，〔日〕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版。

5. 《明治前期日中關係史研究》,〔日〕安岡昭男著，胡連成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6. 《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日〕實藤惠秀著，陳固亭譯，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1 年版。
7. 《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劉建輝著，甘慧傑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O

1. 《歐人之漢學研究》,〔日〕石田幹之助著，朱滋萃譯，中法大學，民國二十三年（1934）版。
2. 《歐洲與中國》,〔英〕G. F. 赫德遜著，李申、王遵仲、張毅譯，中華書局，2004 年版。

P

1. 《佩弦齋詩文存》，朱一新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65 冊，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龍氏葆眞堂刻拙盦叢稿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2. 《毗邪台山散人日記》，袁昶撰，民國間抄本。
3. 《瓶笙花影錄》，鄭逸梅著，校經山房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3）版。

Q

1. 《契丹傳奇》，周寧著、編注，學苑出版社，2004 年版。
2. 《「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國觀察》，馮天瑜著，商務印書館，2001 年版。
3. 《錢鍾書英文文集》，錢鍾書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年版。
4. 《且頑七十歲自敘》，李鍾玨撰，民國鉛印本。
5. 《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6.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張伯偉著，中華書局，2007 年版。
7. 《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劉雨珍編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8. 《清代西人見聞錄》，杜文凱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年版。
9. 《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劉爲著，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10. 《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王爾敏、吳倫霓霞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版。
11. 《清李文忠公鴻章年譜》，李書春撰，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版。

12. 《清史稿》，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1976～1977 年版。

R

13. 《人境廬詩草》，黃遵憲撰，民國鉛印本。
14. 《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王寶平編，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版。
15. 《日本漢詩選評》，程千帆、孫望選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
16. 《日本漢學史》第 1 部《起源和確立》，李慶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17. 《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日〕溝口雄三著，李蘇平、龔穎、徐滔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
18. 《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陳湛頤著，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 年版。
19. 《日本中國史稿》，嚴紹璗著，學苑出版社，2009 年版。
20. 《日本中國學史》，嚴紹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前言》，〔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22. 《阮述〈往津日記〉》，〔越〕阮述撰，陳荊和編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版。

S

1.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日〕滬友會編，楊華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
2. 《盛宣懷年譜長編》（上、下冊），夏東元編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
3. 《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德〕利奇溫著，朱傑勤譯，商務印書館，1962 年版。
4. 《十九世紀末南京風情錄——一個德國人在南京的親身經歷》，〔德〕駱博凱著，鄭壽康譯，南京出版社，2008 年版。
5. 《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英〕約・羅伯茨編著，蔣重躍、劉林海譯，中華書局，2006 年版。
6. 《十年詩草（1930～1939）增訂本》，卞之琳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7. 《世界之中國：域外中國形象研究》，周寧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8. 《宋恕集》上冊，宋恕著，胡珠生編，中華書局，1993 年版。

9. 《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王稼句編纂點校，古吳軒出版社，2005 年版。

T

1. 《弢園文新編》，王韜撰，李天綱編校，三聯書店，1998 年版。
2.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黃枝連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
3. 《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下冊），周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4. 《同文集》，黃超曾編，陳洙重選，《房山山房叢書》本，民國九年（1920）版。
5.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美〕芮瑪麗著，房德鄰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版。
6. 《圖象晚清：點石齋畫報》，陳平原、夏曉虹編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版。

W

1. 《外國人拍攝的中國影像》，張明主編，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 年版。
2. 《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國》，沈弘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版。
3. 《王朝間的對話——朝鮮領選使天津來往日記導讀》，劉順利導讀，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4. 《王韜年譜》，張志春編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5. 《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美〕史景遷講演，廖世奇、彭小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6. 《文廷式集》下冊，汪叔子編，中華書局，1993 年版。
7. 《文學社會學》，〔法〕羅・埃斯卡皮著，於沛選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8. 《我的北京花園》，〔英〕阿奇博爾德・立德夫人著，李國慶，陸瑾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版。
9. 《五述奇》，張德彝撰，1901 年稿本。

X

1. 《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念：1840～1876》，〔美〕M.G.馬森著，楊德山譯，中華書局，2006 年版。
2. 《現代散文類型論》，鄭明娳著，大安出版社，1987 年版。

3. 《現代傳記學》，楊正潤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
4. 《想像心理學》，〔法〕薩特著，儲朔維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年版。
5. 《想像中國：從「孔教烏托邦」到「紅色聖地」》，周寧著，中華書局，2004 年版。
6.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王錫祺輯，杭州古籍書店，1985 年版。
7. 《新漢文化圈》，〔法〕汪德邁著，陳彥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8. 《新史學圈外史學》，王爾敏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
9. 《新潟新繁昌記》，王治本撰，抄本。
10.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比〕鐘鳴旦、〔荷〕杜鼎克、黄一農、祝平一等編，方濟出版社，1996 年版。
11. 《荀學齋日記》己集，李慈銘撰，《越縵堂日記》本。

Y

1. 《燕行錄研究》，邱瑞中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
2. 《燕行與中朝關係》，楊雨蕾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年版。
3. 《楊守敬集》第一冊，楊守敬撰，謝承仁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4. 《揚子江上的美國人：從上海經華中到緬甸的旅行記錄》，〔美〕威廉·埃德加·蓋洛著，晏奎、孟凡君、孫繼成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年版。
5. 《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比〕鐘鳴旦、〔荷〕杜鼎克主編，臺北利氏學社，2002 年 4 月版。
6.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全 6 卷），鄭德第、朱靜等譯，大象出版社，2001～2005 年版。
7. 《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美〕赫德蘭著，吳自選、李欣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年版。
8. 《夷牢溪廬詩鈔》，黎汝謙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567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羊城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9. 《夷牢溪廬文鈔》，黎汝謙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567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891）羊城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10. 《異鄉人手記》，〔英〕虹影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11. 《異想天開：西洋鏡裏看中國》，周寧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12. 《英國文學論集》，范存忠著，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13. 《影像論》，〔法〕薩特著，魏金聲譯，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 年版。
14. 《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周寧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15. 《遊的精神文化史論》，龔鵬程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16. 《遊歷日本圖經餘紀》前編上，傅雲龍撰，傅訓成整理《傅雲龍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
17. 《迂迴與進入》，〔法〕弗朗索瓦·于連著，杜小眞譯，三聯書店，1998 年版。
18. 《愚齋東遊日記》，盛宣懷撰，清末刻本。
19. 《越南漢喃目錄提要》，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版。
20.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劉玉珺著，中華書局，2007 年版。
21.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
22. 《越南通史》，〔越〕陳重金著，戴可來譯，商務印書館，1992 年版。

Z

1. 《在北京最後的日子》，〔法〕皮埃爾·綠蒂，馬利紅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版。
2. 《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 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德〕余凱思著，孫立新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3.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美〕柯文著，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 年版。
4. 《張謇全集》第 5 卷，張謇撰，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江蘇古籍出版社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
5. 《張裕釗詩文集》，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6.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章太炎撰，湯志鈞編，中華書局，1977 年版。
7.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葛兆光著，中華書局，2011 年版。
8. 《棧雲峽雨稿》，〔日〕竹添井井著，馮歲平點校，三秦出版社，2006 年版。
9. 《棧雲峽雨日記》，〔日〕竹添進一郎撰；《葦杭遊記》，〔日〕股野琢撰，張明傑整理，中華書局，2007 年版。
10. 《在北京最後的日子》，〔法〕皮埃爾·綠蒂著，馬利紅譯，上海書店出

版社，2006 年版。

11. 《中法文學關係研究》，孟華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12. 《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邵循正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13. 《中法越南交涉史》，劉伯奎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版。
14. 《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下冊，楊昭全、何彤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5. 《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英〕雷蒙・道森著，常紹民、明毅譯，中華書局，2006 年版。
16.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張伯偉著，中華書局，2002 年版。
17. 《中國江南：尋繹日本文化的源流》，王勇主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年版。
18.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 9 集・第 23 卷・書信日記集一》，鄭逸梅、陳左高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 年版。
19. 《中國覺醒》，〔美〕丁韙良著，沈弘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版。
20.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三聯書店，1983 年版。
21. 《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葛兆光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
22. 《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孟華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3. 《中國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范存忠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24. 《「中國研究」外文舊籍彙刊・中國記錄・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
25. 《中國遊記文獻研究》，賈鴻雁著，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26. 《中國與東亞崛起 1840～2000》，〔德〕金德曼著，張瑩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版。
27. 《中國之歐洲——西方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下冊，〔法〕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28. 《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三聯書店，2006 年版。
29. 《中國總論》（上、下冊），〔美〕衛三畏著，陳俱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30. 《中韓關係史論集》，〔韓〕全海宗著，〔韓〕全善姬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

31.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王曉秋、〔日〕大庭修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32. 《中日文化交流史話》，王曉秋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33. 《中日文史交流論集：佐藤保先生古稀紀念》，佐藤保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
34.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方漢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
35. 《中外比較文學的里程碑》，李達三、羅鋼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版。
36. 《中越文化論集》，陶鎔、陳以令等著，「國防研究院」出版部，1968 年版。
37. 《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
38. 《周作人的是非功過》，舒蕪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年版。
39. 《拙尊園叢稿》，黎庶昌撰，顧廷龍、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561 册，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40.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張伯偉著，中華書局，2011 年版。

韓國文獻

1. 《高宗實錄》（二），〔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高宗純宗實錄》中，東國文化社，1955～1958 年版。
2. 《國譯燕行錄選集》，〔韓〕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 年版。
3. 《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資料叢書》（共 200 册，子目略），景仁文化社，2000～2004 年版。
4. 《燕行錄全集》，〔韓〕林基中編，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年版。
5. 《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韓〕林基中、〔日〕夫馬進編，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 年版。
6. 《燕行錄選集》，〔韓〕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社，1962 年版。
7. 《〈燕行錄選集〉補遺》，〔韓〕林熒澤編，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年版。
8. 《陰晴史》，〔朝〕金允植撰，〈http://db.history.go.kr/url.jsp?ID=sa_006b〉，08/12/2011 available.

9. 《雲養集》,〔朝〕金允植撰,〔韓〕趙昌來標點,梁鴻烈監修,《韓國文集叢刊》第 328 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 年版。

日本文獻

1. 《北游詩草》,〔日〕岡千仞撰,《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草私史亭,明治十四年(1881)版。
2. 《補訂版國書總目錄・著者別索引》,岩波書店,1991 年版。
3. 《藏名山房文初集》,〔日〕岡千仞撰,大正九年(1920)版。
4. 《沖繩志》(一名《琉球志》),〔日〕伊地知貞馨著,重野安繹校,有恆齋,明治十年(1877)版。
5. 《大正中國見聞錄集成》,〔日〕小島晉治監修,ゅまに書房,平成十一年(1999)版。
6.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日〕岡千仞撰,鳳文館,明治十七年(1884)版。
7.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編,株式會社東京堂,1995 年版。
8. 《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
9. 〈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aspx〉, 03/01/2011 available.
10. 《東旋詩紀》,〔日〕岡千仞撰,明治十三年(1880)版。
11. 《東瀛詩選》,俞樾撰,〔日〕佐野正巳編,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
12. 《對支回顧錄》下卷,〔日〕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昭和十一年(1936)版。
13. 《法蘭西志》,〔日〕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露月樓,明治十一年(1878)版。
14. 《漢學者傳記集成》,〔日〕竹林貫一編,名著刊行會,昭和五十三年(1978)版。
15.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鄭子瑜、〔日〕實藤惠秀編校,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昭和四十三年(1968)版。
16. 《狂詩書目》,〔日〕齋田作樂著,青裳堂書店,平成十一年(1999)版。
17. 《鹿門岡千仞の生涯》,〔日〕宇野量介著,岡廣,昭和五十年(1975)版。
18. 《米利堅志》,〔日〕岡千仞、河野通之同撰,光啓社、博聞社,明治六年(1873)版。

19. 《明治の碩學》，〔日〕三浦叶著，汲古書院，平成十五年（2003）版。
20. 《明治漢詩文集》，〔日〕岡本黃石等著，築摩山房，昭和五十八年（1983）版。
21. 《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陳捷著，汲古書院，2003 年版。
22. 《幕末明治海外體驗詩集》，〔日〕川口久雄編，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昭和五十九年（1984）版。
23. 《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日〕小島晉治監修，ゆまに書房，平成九年（1997）版。
24. 《訥耳遜傳》，〔日〕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土屋書店，明治二十年（1887）版。
25. 《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岩波書店，1983 年版。
26. 《日本詩軍》（附《烏合集》），〔日〕烏玉山人戲著，東京新進堂發兑。
27. 《欽仰錄》，〔日〕岡千仞撰，〔日〕末廣清次郎編，三省堂書店，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
28. 《清末中琉日關係史の研究》，〔日〕西里喜行著，東京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 年版。
29. 《山寺攬勝志》，〔日〕岡千仞撰，保砬會，明治三十四年（1901）版。
30. 《涉史偶筆》，〔日〕岡千仞撰，草私史亭，明治十五年（1882）版。
31. 《涉史續筆》，〔日〕岡千仞撰，草私史亭，明治十六年（1883）版。
32. 《仙臺志料》，〔日〕岡千仞撰，明治三十年（1897）版。
33. 《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日〕竹添進一郎著，奎文堂，明治廿六年（1893）版。
34. 《尊攘紀事》，〔日〕岡千仞撰，甘泉堂、博聞社、鳳文館，明治十五年（1882）版。

越南文獻

1. 《大南實錄二十・大南正編列傳二集》，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
2. 《大南實錄十八・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五年（1980）版。
3. 《大南實錄十九・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五年（1980）版。

英文文獻

1. Clifford, Nicholas,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 Hooper, Glenn and Youngs, Tim eds., *Perspectives on Travel Writing*, Aldershot: Ashgate, 2004.
3.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6. Clark, Steve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Transit*,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St. Martin's Press, 1999.

法文文獻

1. Guiraud, Pierre, *La Sémiologi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2. Mounin, Georges,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0.
3. Dessons, Gérard and Bergez, Daniel,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u Poème*, Paris: Armand Colin, 2005.
4. Meng Hua, *Visions de l'Autre: Chine, France: Textes Extraits des Conférences et des Séminaires Prononcés à l'étrange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引用論文

學位論文

1. 《八指頭陀詩研究》，謝秀蓮，高雄師範大學，2009 年碩士論文。
2. 《〈觀光紀游〉、〈中國遊記〉與〈我的留學記〉中的中國情》，陳淑玲，福州師範大學，2011 年碩士論文。
3. 《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1884～1885）》，朱寒，華東師範大學，2008 年碩士論文。
4. 《〈天津談草〉探微》，薛瑞東撰，內蒙古師範大學，2010 年碩士論文。

期刊論文

1.《1862 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長崎派遣船「千歲丸」隨員們的中國觀》，

〔日〕橫山宏章，《檔案與史學》，2004 年第 12 期。

2. 《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國之歐洲」的演進》，〔法〕米麗耶・戴特麗著，唐睿譯，《跨文化對話》，2011 年第 28 輯。
3. 《18 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陳受頤，《嶺南學報》，1931 年第 2 卷第 1 期。
4. 《朝鮮王朝「領選使」金允植的中國歌詠》，劉順利著，《漢學研究》，2008 年第十一集。
5. 《從〈觀光紀游〉看岡千仞眼裏的中國》，陳華，《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 7 月刊。
6. 《帝國斜陽下的親密接觸：論朝鮮官員金允植的天津領選》，王鑫磊，《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
7. 《東遊日記——盛宣懷扶病東洋取經實錄》，綃紅，《文匯讀書周報》2009 年 12 月 4 日。
8. 〈http://whdszb.news365.com.cn/tg/200912/t20091204_2545750.htm〉，13/05/2012 available.
9. 《岡千仞の上海體驗》，〔日〕福井智子，《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6 年第 15 期。
10. 《岡千仞と來日した中國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蓮池筆譚〉〈清讌筆話〉などの筆談錄を通して》，陳捷，《日本女子大學紀要》（人間社會學部），2001 年第 12 期。
11. 《岡千仞と王韜》，〔日〕中田吉信，《參考書志研究》第 13 號，1976 年 8 月刊。
12. 《岡千仞と清仏戰爭》，〔日〕福井智子，《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7 年第 16 期。
13. 《岡千仞〈蘇杭日記〉》，〔日〕青木茂夫，《浙江文化研究》第 25 號，昭和十八年（1943）3 月刊。
14. 《岡千仞「燕京」への旅——〈燕京日記〉を中心に》，〔日〕福井智子，《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8 年第 17 期。
15. 《岡千仞與黃遵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學術思想性的一章》，鄭海麟，《近代中國》，2009 年第十九輯。
16. 《岡田篁の〈滬吳日記〉につぃて》，陳捷，《日本女子大學人間社會學部紀要》，2001 年第 11 號。
17. 《〈觀光紀游〉に見る「病」と「治療」》，〔日〕福井智子，《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2009 年第 18 期。
18. 《關於王韜與岡千仞——跋東洋文庫藏王韜致岡千仞書稿》，鄭海麟，《學土》，1996 年卷一。

19. 《漢學：路在何方？——對漢學狀況的論辯》〔德〕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著，王卓斐譯，《中國圖書評論》，2010 年 11 月刊。
20. 《漢學作爲方法與西方漢學傳統的顛覆——從弗朗索瓦·于連説開去》，錢林森，《跨文化對話》，2011 年第 28 輯。
21. 《黃遵憲遺墨》，鄭海麟輯錄，《近代中國》，1999 年第九輯。
22. 《記〈觀光紀游〉作者岡千仞氏：六十年前日本人的中國觀》，汪向榮，《新生命》，1944 年第 1 卷第 6 期。
23. 《拉康的主體認證理論》，張海蓉，《哈爾濱學報》，2004 年 6 月刊。
24. 《魯賓孫的中國文化觀》，陳受頤，《嶺南學報》，1930 年第 1 卷第 3 期。
25. 《魯迅のエッセイ〈皇漢醫學〉について》，〔日〕眞柳誠，《日本醫史學雜誌》2003 年第 49 卷 1 號。
26. 《論〈申報〉的「義利兼顧」及其現實意義》，李振，《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06 年第 2 期。
27. 《旅行者的眼光與現代性體驗：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體驗的形成》，周憲，《社會科學戰線》，2000 年第 6 期。
28. 《奈何鬚眉變巾幗——從晚清海外文人的異域體驗説起》，楊波，《中國圖書評論》，2011 年第 2 期。
29. 《明治漢學紀要》（上、下），〔日〕町田三郎撰，馬振方、馬小立譯，《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2 期、第 3 期。
30. 《明治漢學家的中國遊記》，張明傑，《讀書》，2009 年第 8 期。
31. 《明治前期の中國遊記：岡千仞の〈觀光紀游〉について》，張明傑，Vol.1（2005），pp.26～40.
32. 《「歐洲遊記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國際研討會日前在北大召開》，葉向陽，《中華讀書報》。
33. 〈http://www.gmw.cn/01ds/2001-09/19/10-C0D9BCD46E24C2A948256ACC0001432C.htm〉，03/26/2011 available.
34. 《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王寶平，《文獻》，2009 年第 4 期。
35. 《清季名流學士遺墨》，鄭海麟輯錄，《近代中國》，2001 年第十一輯。
36. 《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述略》，魏麗莎，《文獻》，2011 年第 3 期。
37. 《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晚清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易惠莉，《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
38. 《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易惠莉，《近代中國》，2002 年第十二輯。
39. 《日本紀行文學的興隆成因及其演變》，劉春英，《日本學論壇》，1990 年第 1 期。

40. 《阮述〈往津日記〉引發的學術因緣——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戴密微、饒宗頤往來書信爲中心》，龔敏，《社會科學論壇》，2011 年第 3 期。
41. 《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裏的趙氏孤兒》，陳受頤，《嶺南學報》，1929 年第 1 卷第 1 期。
42.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典範的轉換——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變化爲線索》，楊際開，《浙江學刊》，2002 年第 4 期。
43. 《試論遊記在建構異國形象中的特殊功能》，孟華，《中華讀書報》，2002 年 9 月 18 日。
44. 〈http://www.gmw.cn/01ds/2002-09/18/10-3C35592ED3D55E7948256C380007C8B9.htm〉，19/01/2012 available.
45. 《晚清上海崇明黃超曾所輯日本漢詩集〈同文集〉》，潘建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 年第 3 期。
46. 《王韜遺墨》，鄭海麟輯錄，《近代中國》，1999 年第九輯。
47. 《王錫祺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其他》，吳豐培，《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 年第 1 期。
48. 《文廷式的日本之行》，孔祥吉，《百年潮》2004 年第 3 期。
49. 《〈燕行錄全集〉考訂》，左江，《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08 年第四輯。
50. 《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日〕杉村邦彥，《書道文化》，2007 年第 3 期。
51. 《域外人中國行記整理的新成果——〈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書後》，葉楊曦，《書品》2011 年第 4 輯。
52. 《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易惠莉，《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6 期。
53.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張伯偉，《中國文化》，2009 年第 2 期。
54. 《作爲思想範式的日本觀——宋恕與變法運動》，楊際開，《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 年 9 月號，總第 6 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003022g.htm〉，14/5/2012 available.

後 記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以岡千仞〈觀光紀游〉爲中心》是我撰寫的第一本書，如今它出版在即，細細想來，感慨頗多，聊書於此，以爲銘記。

2005 年 9 月，我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直到 2012 年 7 月研究生畢業，在母校相繼完成了本科和碩士階段的學習。這七年是我開始踏上學術征程的起點，也是人生中十分幸運和珍貴的經歷。本書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2012 年 5 月通過答辯，不敢說爲我求學金陵的時光劃上了完美的句號，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這段生活豐富而精彩的種種側面。

本書能夠完成最該感謝的是業師張伯偉先生，2009 年我在本系繼續攻讀中國古代文學碩士，有幸得以投入張老師門下。素聞張老師治學認眞嚴謹，指導學生亦頗具技巧，我親炙教誨後有了更深的體會。

碩士和本科的學制存在差異，培養方式也大不相同。本科階段我曾廣泛修課和旁聽，反覆記誦知識點以應試。剛進入研究生階段，我延續了本科時的狀態，但在參加第一次師門讀書會後，我恍然大悟，並及時做出改變。張老師指出，研究生有別於大學生，不宜把絕大部份時間花在修課和應試上，自己看書和獨立思考才更爲重要，精力應集中於「課外」。幸虧得到張老師的及時提醒，我才不至於迷路過遠。

讀研以來，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如何確定碩論題目。選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起初，我也曾奢望張老師「賜給」我一個題目，但卻被委婉告知好的題目不是別人給的，而是自己找的。本科期間，我曾在金程宇老師指導下研究過唐人殷璠所編《河嶽英靈集》的成書與版本問題，最初想延續這個

主題做下去，與文藝學相結合，進一步討論此書在文學理論上的價值，並照此方向撰寫了程章燦老師「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課程作業《〈河嶽英靈集〉何焯評點芻議》。張老師爲此曾專門找我談話，委婉地表示不要畫地爲牢，故步自封。我從大四開始同時在法國駐上海領事館與南京大學合辦的「精英法語班」（Classe Élite）學習，逐漸對法國漢學產生興趣。尤其是研讀華裔法籍漢學家程抱一（François Cheng，1929～）的《中國詩畫語言研究》（*L'Écriture Poetique Chinoise, Vide et Plein: le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後，我特別想選擇題畫文學領域展開研究。研一時，受到趙憲章老師「文藝學的方法與體系」課上從歌德切入談及文學與圖象研究設想的啓發，亦有賴於南大圖書館豐富的館藏，我特地在港臺閱覽室和藝術閱覽室找來巫鴻、徐復觀、衣若芬、于連等學者的相關論著閱讀，想結合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文圖關係等角度分析中國古代題畫詩。不過，張老師指出此類選題要有一定的藝術基礎作支撐，我也覺得難以深入，於是就將它否定掉了。

記得剛上法語班的那個學期，每位學員都被要求做一次報告，當時選擇了類似「外國人眼裏的中國」這樣的題目。對它的思考並未因報告結束而終止，而是一直伴隨於我腦海之中。碩論選題面臨山重水複的僵局之際，爲我燃起希望的正是這一想法，另外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有張老師的一番閒談。張老師喜歡中午跟學生一起去學校食堂用餐，某次飯後在校園散步時，頗爲惋惜地提及幾年前向圖書館薦購了一套韓國影印出版的《近世東亞細亞西洋語研究資料叢書》，但幾乎無人使用。此後，我專門前往查找《叢書》，驚喜興奮而又頗爲無奈地發現 200 冊同一風格的大開本精裝書正安靜整齊地「躺」在外文閱覽室最後兩排書架上，幾乎都布上了灰。這些恰恰是解決縈繞我心間多時問題的重要資料，大部份又是我能看懂的英文、法文文獻。在概覽、摘錄的過程中，研究「近代外國人中國文獻裏的晚清」的想法油然而生，碩論選題似乎也有了眉目。2011 年也就是研二時，我開始在位於鼓樓校區逸夫館九樓的域外漢籍研究所擔任研究助理，看似是負責辦公室和書庫事務的「門衛」，實則有固定的場所和海量的文獻可供閱讀思考。2002 年，張老師創辦了全國首個域外漢籍研究所，十年間研究所的藏書從無到有，到精而全，實現了質和量的雙重飛躍。那些日子與研究所藏書朝夕相處，我對所內豐富的近代東亞士人中國行紀類文獻產生濃厚興趣，也做出一些嘗試：錄入整理朝鮮《燕行錄》並進行解題，爲新出版的越南燕行文獻撰寫書評，等等。而最讓

我著迷的是明治時代日本儒生岡千仞記錄遊華體驗的《觀光紀游》：一方面，此書不僅部頭較大，還涉及不少名公鉅卿，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學界關於它的先行研究仍存在可進一步開拓深化之處。至於本書題中出現的「鏡像」一詞，則源自法國哲學家拉康的理論，他的賞識和提攜也是程抱一日後能夠成爲法蘭西學院（Institut de France）史上首位亞裔院士的重要原因。此外，我試圖在書中運用的形象學理論、「迂迴與進入」方法也都與法國學界息息相關。當我將這些想法整理出來，向張老師彙報時，終獲首肯，並表示優秀的選題應具備可持續性，其深度和廣度足資日後繼續挖掘，鼓勵我未來對異域士人的中國行紀進行綜合研究。

以上所述雖僅僅圍繞論文選題而言，或過於瑣碎，但卻是難忘經歷的眞實記錄。本書在答辯前曾三易其稿，每次打印稿上大到脈絡框架，小到字詞句讀，都有張老師詳細醒目的紅筆修改批註。同時也要特別感謝主持答辯的曹虹、徐雁平和馮乾三位老師。曹老師建議我行文時注意書評與學位論文區別的教誨尤其讓我受益匪淺，大一上學期徐老師強調的讀書札記寫作方法引領我走上學術正途，馮老師講授的明清文學是我關於本書所涉時段最初的認知。

本書的完稿亦離不開金程宇、卞東波老師對我走向學術之路的引導，以及從材料到思路上提供的線索與啓發。能在南大中文系讀書眞是件令人感到幸福而且刻骨銘心的事。七年來我有幸聆聽到武秀成、莫礪鋒、程章燦、鞏本棟、嚴傑、許結、徐興無、趙益、俞士玲、苗懷明、劉重喜等老師開設的諸多課程，受到南大「兩古」專業最基礎的訓練。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我也得到過童嶺、付星星、趙永剛、商海鋒、林月萍、葉蕾、劉學軍、張宇超等師兄師姐和同門劉一以及訪問學者合山林太郎老師的熱心幫助。感謝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劉殊同學協助校對書稿。感謝我的博士導師陳平原先生的推薦和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楊嘉樂女士的協調，本書的出版才得以順利完成。更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他們尊重並支持我藏身象牙塔中，免去後顧之憂。

本書對碩論並無太多調整，只是修改了一些明顯的錄文、字句、標點等錯誤。因爲比起精雕細琢，與時俱進，我更想將它當作 26 歲前的青春紀念冊，存其原貌，以見時況。

葉楊曦

2017 年 10 月 10 日

